

# 认识媒介文化

——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英] 尼克·史蒂文森 著

文化和传播研究

周宪 许钧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文化 和 传 播 译 丛

# 认 识 媒 介 文 化

——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英〕尼克·史蒂文森 著

王文斌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 年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英)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文化和传播译丛)

ISBN 7-100-03268-7

I. 认… II. ①史… ②王… III. 社会学-关系-大众传播-传播学-研究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1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和传播译丛

认识媒介文化

——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英〕尼克·史蒂文森 著

王文斌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268-7/G·438

---

2001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2

定价：20.00 元

*Nick Stevenson*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

**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根据塞奇出版公司 1995 年版译出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Nick Stevenson 1995.*

## 文化和传播译丛

# 总 序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

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献给埃尔西、唐娜和夏洛特



## 内容简介

作者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地位的各种方法作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对诸如意识形态、结构和代理机构以及媒介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再评价。

封面设计：曹方  
湛磊

## 作者简介

尼克·史蒂文森 (Nick Stevenson) 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社会学讲师。除本书外，著有《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雷蒙德·威廉斯与 E. P. 汤普森》(1995)、《媒介的演变：全球化、伦理与道德》(1999)、《文化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2001) 等。

# 目 录

|  |     |
|--|-----|
| 中译本序言 .....  | 001 |
| 鸣谢 .....   | 005 |
| 引言 .....   | 009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   |     |
| 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范围内的讨论:<br>雷蒙德·威廉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br>和斯图尔特·霍尔 ..... | 020 |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 .....                                   | 020 |
| 雷蒙德·威廉斯:传播与长期革命 .....                                    | 023 |
| 文化唯物论与霸权 .....   | 029 |
| 雷蒙德·威廉斯与物质文化:电视和报刊 .....                                 | 034 |
| 雷蒙德·威廉斯与传播理论 .....                                       | 037 |
|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与电视偏见问题 .....                                   | 046 |
| 两个案例的研究:坏消息与好消息 .....                                    | 047 |
| 观察者的眼光与媒介研究的客观性 .....                                    | 050 |
| 意识形态与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 .....                                     | 055 |
| 斯图尔特·霍尔、大众传播和霸权 .....                                    | 059 |

认识媒介文化

|                                  |     |
|----------------------------------|-----|
| 控制危机:报刊、道德恐慌和新右派的崛起·····         | 060 |
| 意识形态:受约束的回归? ·····               | 062 |
| 对媒介话语的编码和解码 ·····                | 069 |
| 话语的过分膨胀和其他相关的评论 ·····            | 071 |
| 小结·····                          | 076 |
| <br>第二章 哈贝马斯、大众文化与公共领域·····      | 078 |
| 公共文化·····                        | 078 |
|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 080 |
| 哈贝马斯、大众文化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 ·····         | 085 |
| 大众文化存在的诸种问题: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br>学派····· | 091 |
| 公共领域和公用事业广播 ·····                | 101 |
|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         | 110 |
| 小结·····                          | 120 |
| <br>第三章 受众研究中的各种批判视点             |     |
| 阐释、代理机构、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br>诸种问题·····  | 121 |
| 批判受众研究的崛起·····                   | 121 |
| 戴维·莫利与电视受众:再论编码/解码·····          | 126 |
| 符号学、社会学和电视受众 ·····               | 127 |
| 家庭休闲时间里的阶级、权力和意识形态 ·····         | 133 |
| 约翰·菲斯克与通俗文化的快乐 ·····             | 142 |

|                                      |     |
|--------------------------------------|-----|
| 通俗的报刊使生活更有乐趣·····                    | 148 |
| 空洞的民粹主义还是抵抗的快乐? ·····                | 151 |
| 女性主义和肥皂剧:在快乐中解读·····                 | 162 |
| 女性主义、大众文化和收看《达拉斯》·····               | 163 |
| 心理分析、同一性和乌托邦·····                    | 167 |
| 女人看女人: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                 | 171 |
| 小结·····                              | 178 |
| <br>第四章 马歇尔·麦克卢汉与文化媒介                |     |
| 地球村里的空间、时间和内爆·····                   | 180 |
| 技术媒介·····                            | 180 |
| 英尼斯、麦克卢汉和加拿大社会理论·····                | 182 |
| 媒介即讯息·····                           | 185 |
| 空间与时间:技术和文化研究·····                   | 195 |
| 口语的、印刷的与现代的文化:杰克·古迪<br>和安东尼·吉登斯····· | 201 |
| 更多的批判意见·····                         | 210 |
| 小结·····                              | 223 |
| <br>第五章 博德里亚的暴风雪                     |     |
| 后现代性、大众传播和象征性交往·····                 | 225 |
| 作为一个异质场域的后现代主义·····                  | 225 |
| 博德里亚、阿尔都塞和德博尔·····                   | 227 |
| 后现代主义、象征性交换和马克思主义·····               | 233 |

|                         |     |
|-------------------------|-----|
| 法国的麦克卢汉:模拟、超现实和民众 ..... | 247 |
| 博德里亚和詹姆森 .....          | 252 |
| 博德里亚的非理性主义 .....        | 261 |
| 小结 .....                | 276 |
| 第六章 媒介文化和社会理论中的各种       |     |
| 视点 .....                | 277 |
| 大众传播研究的三种范式 .....       | 277 |
| 媒介与海湾战争:霸权、受众和模拟 .....  | 290 |
| 人类需要与大众传播 .....         | 303 |
| 大众传播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文化、后民族性   |     |
| 和欧洲 .....               | 314 |
| 结语 .....                | 330 |
| 注释 .....                | 331 |
| 参考书目 .....              | 335 |
| 索引 .....                | 356 |
| 译后记 .....               | 371 |

# 中译本序言



为本书的中译本写一个新序言，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希望，本书将为促进有望标志新世纪的跨文化理解尽一份微薄之力。学术界普遍宣称，我们正在迈入或许可以称之为全球性的时代。这将是一个文化差异与文化同质并存的时代。媒介与传播系统的全球性发展表明，我们大家都收看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的新闻报道、观看美国电影，而且类似于最近发生于科索沃的战争等全球性新闻事件在我们当中迅速传播。然而，我相信很多人都已意识到，这类过程并不能保证我们均以同样的方式来阐释这些事件，科索沃战争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从种族的民族主义和公民的国家主义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对于政治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影响，已深深地触及欧洲人的记忆，唤起了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回忆。这标志着在典型的极善于忘却的消费社会里历史意识的戏剧性回潮。建立欧洲共同体的目的（这将在本书结束时再作讨论），是企图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进行建设，并在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促进和平共处。就这一意义而言，人们普遍感觉到，贝尔格莱德政权严重地威胁了在一个多元的市民社会、民主和资本主义之上建立一个共同体的目标。也有许多其他的声音，对这一场战争的宗旨、目标和目的各抒己见。



各媒介机构每天传递关于难民潮、北约组织的“误伤”、卷入这场冲突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等信息，这在东道国民众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人们对媒介操纵和战争贩子的纷纷指责说明，一些团体和知识分子斥责这场战争至少是错误的，极言之，则是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这些对抗性声音竭力制造另一种霸权，以取代欧洲及美国政府所采用的“官方”策略。然而，我知道，我的许多中国读者也已以批判的眼光对这些事件作出了阐释。本世纪最具经济和文化实力的国家轰炸欧洲的一个小国（包括轰炸中国大使馆），这对那些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反对种族灭绝暴虐的正义冲突的人们，必定会激起不同的情绪，并引发不同的看法。因而，媒介的全球化和我们社会的全球化，可能会引发关于阐释性冲突的诸种问题（我们日益感受到我们对事物的不同阐释），同时也有可能将一种空洞的一致性文化强加于人。我们以何种方式有可能建立各种新的体制和建设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论坛，以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现暂且搁置不论，我想将我新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的书概观了社会理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一些思潮，可这远远不是包罗万象的。的确，还有许许多多丰富的思想传统，我没有在书中包括并加以论述。譬如说，我本可以更多地探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理解大众传播媒介的情况：乔姆斯基、席勒和其他人的著述在本书里并没有得到多少反映，尽管我将在下一本书（史蒂文森，1999）里继续这一思路。那么在本书里都谈了些什么呢？本书提出，关于媒介的研究

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各种批判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探究对媒介进行意识形态歪曲的各种系统性形式以及媒介与更广泛的所有制、权力和权威体系的联系；第二，各种象征和文化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探讨媒介的符号丰富性以及这样一种情况：理解仰仗于社会结构中受众的态度、文化解读和时空中的具体位置；第三是这样一些研究方法，它们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

以上这些观点并非意味着西方媒介研究一种连贯一致的研究方法。首先，在此表述的诸种思想传统，大多吸取于（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若干不同社会的交互作用，而且混合地表征了各种学术交流的情况。第二，这些思想的诸种传统和体系具有内在的矛盾。这就是说，尽管从所有这三种研究方法中都有可能学到某些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在任何意义上在这三种研究方法之间作出一种选择），可这三种研究方法对彼此均持批判态度，而且许多执牛耳的文化评述人对这三种研究方法的理解也是智仁互见。最后，既然有了各传播理论的历史（我是指这些传播理论不可能被包容于任何一种文化），那么这些理论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被获取，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能被翻译传送到中国的读者那里。如果在此检阅中的这些著作能继续给 20 世纪的读者以灵感，那仅仅是因为这些著作与一代代新读者和新的思想家的想像和视点保持了一种联系。收入本书的某些思想可以在新的理论和经验性的研究（常常有违原作者的意愿）中被获取并得到应用，正是这一愿望使我同意请人将本书译成汉语。

王文斌对本书作了很好的翻译,我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

尼克·史蒂文森

写于 1999 年

### 参考书

N. 史蒂文森(1999),《媒介的演变:全球化、伦理与道德》,朗曼出版公司。

## 鸣 谢



全书的写作过程中，倘若没有受到时时萦绕于心的一些思想和情感上的影响，本书的情形便会大不一样。遗憾的是，对这些思想和情感，在此只能有选择地提及几个。安东尼·埃利奥特和肖恩·霍默的批评和友情极为珍贵。为了我每每遇到困难时他们给予的帮助，以及我们在一起度过的一些欢乐时光，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亚历克斯·麦克唐纳、戴维·穆尔和保罗·兰塞姆给予我长期积极的影响，谢谢你们。我要特别感谢唐娜·勒夫给予我的爱和友情。她乐意与我探讨本书中的许多问题，并向我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批评，我从中的受益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卡罗琳·奥茨、艾伦·弗朗斯和莫里斯·罗奇的思想对我也很重要。所有这些人均直接地影响了陈述于本书的论点。本书的前面一部分，即“哈贝马斯、大众文化与公共领域的未来”这一章曾发表于1994年的《伯克利社会学杂志》。他们允许我将修订稿在此重印，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我还从以下这些人士中汲取了更为远距离的灵感：克里斯·巴伯、米克·贝利、保罗·贝拉比、朱丽叶·卡彭特、唐·克拉克、尼克·克罗斯利、艾利什·英格利希、戴维·劳、乔治亚·梅森、利安·奥尔德、杰格迪什·帕特尔、尼尔·塞勒斯、鲍勃·辛普森、纽里亚·特里安娜、史蒂夫·韦布和西蒙·昂格尔，在此向他们致谢。对居住于德比的埃尔

西、琼、丹尼斯、史蒂夫、简和夏洛特,我永远充满感激之情。与那些声望卓著的学者的一些交谈也影响了我思想的形成,这些学者包括特里·伊格尔顿、彼得·戈尔丁、安东尼·吉登斯、格雷厄姆·默多克、J. B. 汤普森和菲利普·施莱辛格。吉姆·麦圭根作为读者向我提出了非常有益的意见,我向他表示感谢。我也想感谢我的许多学生向我提出的建议。最后,安东尼·吉登斯、史蒂夫·巴尔、塞奇出版公司和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的所有的人(尤其是蒂姆·肯德尔和艾伦·沃克)对我的能力给予了带有批判性的信赖,我必须向他们致谢,因为他们的信赖对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同前述,假如没有这些人,书中的内容就会不一样,然而,最后的责任则永远是我自己的。

眼界极为狭窄的人开始感兴趣于某事时,会变得愚蠢,然后对自己不想了解的事物发泄怨恨,因为他们对这些事物可能只是太了解了,因而,妨碍当今世界感知其本身秩序荒谬性的人间愚蠢,是统治者堕落而顽固的意趣的进一步产物。

(阿多诺,1974:198)





# 引言

1

## 一

当今媒介文化有何意蕴？如同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大众传播全球性形式的崛起已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经验性内容。然而，同其他各研究领域相比，传播领域的重要性有多大？大众媒介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其他诸方面有何关系？传播的各不同媒介已怎样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难道媒介文化再次肯定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种种社会关系？电子传播现正在培育哪些同一性？在思考以上这些问题时，谁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主要思想家？在此，笔者希望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共同认识，尽管对问题的有些可能性答案是泛泛而论。

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是试图去思考大众传播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可时过不久就发现了一个悖论。我拜读过的好些社会理论均是探讨工作、性征、结构与机构、意识形态、商品化、无意识、时间与空间、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全球化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然而，在这些许多的文本里，大众传播媒介似乎处于边缘的地位。在匆匆论及政治领域中经济基础的改变或体制的改革前，时下的大多数文章均在表面上承认在现代性里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重要性。这看来是不正确的。我自己的生活的感悟到这一重要性：媒介的某些内容存在于我的业余时间，存在

于交换礼物时朋友之间的交谈，存在于与其他缺席的朋友的联系，也存在于对公众观念的展现。可是，我也注意到了一些认为媒介十分重要的观点。在这些观点看来，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似乎无处不在，社会的各主要弊端均可归因于此。尽管这些观点至少承认了媒介的重要性，可如同那些漠视媒介影响的人那样，这些观点对待媒介的方式是很随意的。右派的和左派的思想家均同样认为，媒介是社会颓废的原因，也是粘合不公平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的胶合剂。这种观点似乎有某种合理性，但在通常情况下均是过分的还原和本质主义。

在本书里，我将同那些认真对待媒介的社会理论诸方面展开通达的讨论。诚然，这一讨论大体上不涉及社会理论考察媒介重要性为何如此迟缓的缘由。在讨论中，我的论辩策略是楔入以上所简要介绍的两种观点之间。首先，我要把大众传播媒介与包含于公共和个人生活领域内的其他各项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据此，本书将认同那些认为媒介实践与历史和空间的实践领域相联系的观点。其次，大众传播媒介组成了无法还原为其他形态的社会实践本身。无线电广播节目、阅读杂志或收看电视等行为，实质上均是一项有意义的社会实践。于是，本书也要探究媒介诸实践的特征。书中需要保留这些内容，抵挡住将这些内容塞入到对经济学、政治学或文化的笼统性论述里的诱惑。然而，我在此意识到了另一个悖论。倘若社会理论最终花时间和精力去注意大众媒介的重要性，那么电视时代是正在兴起的文化过程。因为这个原因，除了马歇尔·麦克卢汉（1994）和于尔根·哈贝马斯（1989）之外，被评论中的大多数理论思考均忽视其他的传播媒介。这不是一个我在此能够扭转的倾向。可

争议的是,一旦大众媒介无法被忽视,那么社会理论就会感兴趣于其影响。这意味着在电视时代到来之前,大众媒介对社会批评源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的。19世纪的古典社会理论往往认为,与资本主义、官僚资本、权限和社会失范(anomie)等问题相比,大众媒介是一个缺乏重要性的边缘现象。当下的后现代观点则轰轰烈烈地想办法去改变这种认识。在后现代性里,大众媒介被概念化为既在技术上相互联系又能扩大大众化的互文性范围(这种范围在历史上是不稳定的)。可争议的是,电视的主导地位已被激光唱片机、微机、杂志文化和盒式录像机等复杂的技术领域所替代。现在,在诸媒介形式的快速技术发展中,电视和报刊所保持的永久性和持续的结构优先权容易被人淡忘。尽管出现于网络空间的许多学术论文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可是更为传统的媒介具有改变公众与个人之间极为重要关系的优势,在削弱这种优势之前,它们仍有一段路要走。的确,人们难以抛弃这样一种观念:这些学术论文与其说致力于严肃的分析,倒不如说多半是从事于知识生涯的构筑。虽然有一些饶有趣味的新视野正在展现,但这些迄今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均没有真正提高我们对当代媒介文化的认识。<sup>①</sup>

## 二

为何要探究媒介文化?起初,我拟将此书起名为“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幸运的是,我不久就得到了一个朋友的忠告:这一书名听起来极其乏味,而且显然不是她想要阅读的那种书!即令书中涉及的各主题重要,这书名看起来也是错误的。再说,

我想这样的—个题目并不非常符合我自己的目的。借助媒介文化，我想要表达的，可概括为三点。第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各种各样的媒介传播着古典的歌剧、音乐、关于政客私生活的庸俗故事、好莱坞最新近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新闻。这已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其他两点更有学术味。第二点是，我在本文本里所讨论的大多数理论家，均在对现代文化过程更广泛的分析中建立起自己的媒介视野。譬如说，如果我们要理解哈贝马斯（1989）关于公共领域的文章，那么我们也不妨看一看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同样，博德里亚（1993a）对模拟（simulation）和内爆（implosion）的研究，是与他的其他文化研究和他自己的思想经历分不开的。因而，尽管我集中讨论一些特定的理论家对大众传播的阐释，可我总会将他们的观点融进更广阔的文化研究里去。这样做时，我意识到了某些民族思想传统的持续性。学术文化很有可能是时下正在流行中的最具国际性的文化。传播理论的交流已显然产生了地理上的影响，可民族倾向依然明显。本书大体上集中探讨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作者的观点。我注意到，这会给这一文本带来欧洲中心论的偏见。然而，书中较为明显的解释学、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传统并不是特定的民族所拥有的。但是，这些思想的流传方式，并不像谈论无处不在的全球文化可能表现出的那样自由自在。譬如说，尽管受到法国思想文化和在较小程度上受到德国批判理论传统的影响，英国的文化研究多半都漠视原来产生于加拿大的理论贡献。但是，目前正在产生这种影

响的博德里亚显明的法国社会理论，也许会使我们想起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眼里加拿大思想的某些分支的重要性。倘若我更为严谨地对这些支流追根寻源，那么我就会写成另外一本书。这给媒介文化增添了第三个方面——需要介绍那些已建立了媒介理论的学者彼此进行思想交流的历史。可是，这又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然而，阅读本文本时，细心的读者或许想要记住这一点。我更为关注的是那些主要作者们的思想和著述的产生，而不是其思想方面的语境。况且，这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资格。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概观目前正在谈及大众传播的社会理论里的所有观点。这在其他地方已做得很好。<sup>②</sup>我也想避免以一种过分统一的方式来陈述资料，因为这样的方式展不开所有批判性论辩以及潜心研究的领域。出现在这里的，都是精选出来的对批判和理论实践的各特定思想领域的悉心研究。在这样的研究里，我已优先考虑那些试图对大众传播进行评论的理论传统和思想传统。但是，即便在这里，有些潮流也几乎没有涉及，而另外一些只是一笔带过。譬如说，关于芝加哥流派或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本可以写成一章。我没有这样做，这显示了在当今关于大众传播的辩论中我自己的坐标和在英国的语境下自己的定位。诚然，我作如是说，并不意味着本书的写作没有把广泛的读者放在心里。同时，承认我的文化特征，并不需要相对论应用于在本书中显而易见的理论工作。我已尽一切可能来阐释各种论点，以便能使他人相信自己论点的正确。对于既使我感到兴奋又使我感到刺激的思想论辩中各思想的组成部分，我想尽力地加以描述。我也想集中探讨我认为自己有话要表达的各个思想传统。对于遗漏部分，我并不表示歉意。这毕竟不是想下

定论。我希望我已取得的是一个能让不同的传统得到比较的批判空间，并且能清楚地叙述各传统间的彼此联系和忽略。我的选择是否明智，而且我是否达到了这预期的目的，要由读者来评判。

### 三

观看那些关于首批登月者\*的摇曳不定的黑白图像，是我孩提时代最为强烈的记忆之一。我现在仍依稀记得兴奋不已地收看那些处于危险境地的宇航员的电视图像时的情景。太空的探索似乎使我的全家和学校的同学们为之神往。记忆中除海湾战争和生命援助 (Live Aid) \*\*这两件事情之外，这件事情也许是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我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其他读者有他们自己最为深刻的记忆。但是，社会理论是怎样帮助我认识这件事情的社会意义的？大多主流的理论分析会轻易地认为，我对登月的兴趣不是无关紧要，就是有点儿不像我在家庭或社会阶层里的地位那样真实，因而对此无需加以考  
5 虑。这让人难以接受。这种想法，说得好听一点是回避，说得难听一点是缺乏想像力和独创性。如果我们接受本书所陈述的一些理论视点，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对我小学生时代的投射可以作各种各样的阐释。

---

\* 1969 年，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号航天飞船首次登上月球。——译注

\*\* “生命援助”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由一位名叫鲍勃·赫尔多夫的英国摇滚乐歌手率先发起以救济埃塞俄比亚饥民为目的的义演活动，首先在演唱界展开，尔后遍及西方国家的其他社会阶层。这一善举以后逐渐发展为以救济穷人为目的的慈善募捐活动。——译注

在这一文本里，我对大众传播研究的三种范式作了粗略的区别。头两章考察英国和德国的研究，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力量的重要源泉。这些观点的重心，主要围绕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与意识形态和公共领域相关的诸问题。总体上说，这些讨论关注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本书中所描述的由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展开的这一组讨论，可以说对大众传播所采取的是批判的研究方法。第三章从受众与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更具阐释性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想展开与我们大多数人都参与的日常实践有关的诸问题。本书所反映的研究，是探究无意识自我确认的诸过程、家庭里的权力关系和有意义的符号的产生。第二种范式可称为受众研究，这样的称说是有益处的。这些主题为在第四章讨论传播的技术途径设下了场景。麦克卢汉独树一帜的分析已被想方设法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评论的社会理论家所忽视。在这一方面，媒介的内爆、混合(hybridity)和时空的重构均可作出大贡献。这在杰克·古迪(1977)和安东尼·吉登斯(1991)对口语、印刷和电子文化的重要讨论里是显而易见的。第五章凭借博德里亚(1993a)和詹姆森(1991)的讨论，将麦克卢汉对技术媒介所关心的问题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详细而独到地规划了一个围绕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范围，旨在解释正在显现的文化实践。如同在前面两部分所提及的，这里所陈述的各观点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和思想上的张力。然而，这些观点在描述离散、断续和模拟的通俗文化时得到了统一。第四章和第五章反映对大众传播的研究，集中讨论传播媒介。最后一章试图阐明这三种范式之间的区别。大致可以发现，对于更为无意识的诸过程或



对现代媒介文化不可预知并已偏离了中心的特性，这些范式缺乏任何实质性的叙述。在这里，关于人类的需要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讨论被人疏忽的诸方面，我也将进行探索，因为这些方面对于未来的讨论极为重要。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虽然不会形成自己的不同范式，但实际上体现了彰显于最肆无忌惮的后现代主义形式里规避问题的若干方面。

全书始终强调这一事实：媒介文化具有无可改变的多元性。这使坚持这三种研究范式成为必要，因为这些范式均突出了媒介文化的各个不同方面。企图创立一种宏大的理论已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极有可能无法解释媒介实践的每一个方面。

- 6 可是，在另一方面，体现于后结构主义某些方面的离散性排他主义，常常看不到理论与媒介实践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这应该予以避免。我要展现一幅处于不断演进、永无完结的复杂图景。如果循着这些思路，那么描述于本书的多种多样的理论话语，便均有可能向我揭示许多关于我早期对看上去模模糊糊的宇航员寄予关切的原因。

女性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像杰西卡·本杰明(1988)和于尔根·哈贝马斯(1989)那样，很有可能让人注意这种情形：通过对阿波罗号飞行的风靡性再现，那些有益而富有男子气概的推理方式日益主宰着这个生命世界。我的全家被阿波罗号的飞行所吸引，这可以从某些意识形态上理论的统摄力的角度来得到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不适当的计划生育的方式，而且还存在着极端的贫困。在这样的世界里，太空时代便应运而生。登月的竞争也使冷战和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合法化。况且，用来讨论太空探险的经常出现的性表象，说明男人沉溺于支配和有别于

女性。这清楚地表明了男人对我们大家对这个星球和其他人所肩负的责任的逃避。月球上没有其他的人，允许对绝对控制的各种幻想的投射。最后，随着阿波罗号火箭的发射而涌现的科普计划，设法将某些批判问题与这个生命世界和技术推理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这些计划逐渐主导着这类想法，而并没有主导从属于传播道德或女性主义道德的各种技术问题。

这种问题只能将我们引到这一阶段。第二种范式，即受众研究，本来是想记录哪些人开始感兴趣于太空飞行，而且是怎样感兴趣的。譬如说，我当初是不是和父亲一起观看月球行走的？我妹妹和母亲是否感到被排除于男人科学文化之外？或者说，也许这些问题太离谱？我可以保证，我仍然记得，我所有的家人是带着怀疑的心态来对待这些计划的。当然，他们都推想，这些钱本可以有更好的用途，在了解这些宇航员的日常生活之前，我们何必要倾听所有那些让人生厌的科学家的话？这些宇航员都吃什么？他们是怎样消磨时间的？我们何时才能放心他们会很安全？这些问题或许已反映了大众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它们与由媒介促成的官方陈述是不同的。

最后，第三种范式的视点带来了需要我们面对的各种不同问题。麦克卢汉(1994)会毫无疑问地指明这种情形：技术媒介会延伸时空，并将媒介表征带进我的起居室；他同时也会指明科学文化和日常印象已内爆的方式。科学不再是属于精英文化的专业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能普遍享受的。博德里亚(1983)会表明太空能得到模拟的程度。譬如说，他会声言，关于太空旅行的观念是通过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阐释体系得到社会的构建。他也会提出，欧洲人的开拓精神，在意识形态上帮助他们

对美国本地人的殖民化，火箭发射的大众化表征就是这种精神的现代等同物。关于太空的大众化思想也吸收了美国的喜剧书籍、科幻影片和 1950 年代的广播连续剧。太空具有互文性，不能作为一个现实而存在。此外，博德里亚会认为，单向的传播形式的建立有助于将这种文化强加于人。根据这一理解，大多数人只会以最分散的方式，将注意力放在摄自月球的已偏离焦距的照片上。可是，博德里亚认为，关于太空的观念是依凭通俗的代码得到反映的，虽然詹姆森(1991)很有可能会同意这一观点，但他不会否认这些观念也具有真实性。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一样，他对批判性公共领域的殖民化可能并不那么关注，但对探寻大众化的乌托邦式的契机则较为关心。这在我自己的经历里无疑是很明显的。尽管当时只有八岁，可观看这件历史性事件时那种紧张的感受，对登月的迷恋而产生的充满希望和乐观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在 1960 年代末期，这些投射与人们的普遍想法一致：科学技术可以被驾驭，用来提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这种想法一直未被实现，这使得我走回到更为批判的理论潮流里。

这有点儿印象主义的分析，并不能恰当地处理明显表现于本文本里的问题的复杂性。任何严肃而详尽的研究，都不能用以怀旧的心态谈论发生于 1969 年的那个事件的片言只语来加以概括。然而，接下去的讨论试图呈示各种视野，以便能得到学生、专家学者和非专业的读者的应用。这样做兴许能表明，社会理论和大众传播可以为我们认识现代世界作出很大的贡献。凭借对一组具体的理论问题的探究，我旨在反映这些问题的原委。就这一意义而言，希望本书既具有批判的又具有民主的作

用。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媒介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是重要的。毋庸置疑,媒介文化的实践在现代世界里变化很快。这些变化由许许多多的社会力量使然,这包括新型的所有制模式、新的技术、全球化、国家政策和受众的实践等等。这些激动人心的变化在学术圈内外,均需要具有广泛形式的讨论。可争议的是,我们文化的真实本质就在于不断变化,这给现在的和将来的一代代人提供了种种新的可能性,也构成了种种新的危险。在接下去的几章里,我想要概述一下在这一方面关于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课题的早期阶段。这需要重新 8 将文化实践与经济的和政治的实践联系起来,以便它们各自的特性得到尊重。这在文化和媒介研究的历史上有许多先例,虽然在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和符号学的最近发展中未曾做到。在此,我将设法提供一些理论工具。如果我们想要妥贴地分析发生于媒介实践的各种变化,并谨慎地指明这种分析可以与更加民主的潮流和事务重新联系起来的方式,那么就需要有这些理论工具。这就应该给予读者一些必要的工具,用于自己的媒介分析,概括对媒介文化产生影响的更为广泛的结构变化,并对所研究的领域提供广阔的批判知识。然而,本书的宗旨是以书面形式明晰地叙述理论实践的复杂方面,并在愈益混乱的时代为民主媒介文化的规范性关联辩护。如果我能实现这一宗旨,那么我的努力就已经是值得了。

# 第一章

## 9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

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范围内的  
讨论：雷蒙德·威廉斯、格拉斯哥  
大学媒介组和斯图尔特·霍尔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



历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已对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分析，它努力强调在目前的社会再生产中大众传播媒介所起到的作用。虽然自由主义声称，大众媒介对维护言论自由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像（images）和表征的形成。就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已指明了所有制问题与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所具备的真正联系。自由主义者声言，思想的自由交流可以在有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发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观点作了正确的批判。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局限性，它忽视了无法简称为阶级统治的其他形式的统治，如种族和性别等，同时低估了国家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在欧洲由国家支配的社会主

义社会里,信息的流通和市民社会的活动在通常情况下受到中央的集中控制。这一点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危机一样,它对能否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继续发挥作用构成了种种难题。尽管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讨论的背景,可在此无法全面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论辩。即便有这些局限性,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我们理解媒介文化仍有很大的裨益。雷蒙德·威廉斯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由传播可能将以何种制度出现?他以此为出发点,尽了相当大的努力了解民主自由主义。再者,通过与后结构主义的辩论,斯图尔特·霍尔试图对不是植根于社会阶级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统治形式作出诠释。最后,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对存在于新闻制作方面的阶级观点的偏见提供了经验性的例证。

凭借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对大众传播主题的当代论辩,本章对两个中心主题作了追根寻源:彰显于文化事业的各种所有制型式和控制型式,以及这些型式对文化内容和主观性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以批判的态度试图发展大众传播理论依然至关重要。我将提出,对诸种现代文化形式的研究,是分析各种体制结构如何产生和播撒这些文化形式的先决条件。采取这种理论举措的目的,在于考察蕴藉于所有制和控制之间关系的诸种权力的结构关系,将这些物质关系置于历史语境,并解释商业体制和公众体制对无层次的诸种实践的影响(戈尔丁和默多克,1991)。在接受检阅的所有的人当中,唯有雷蒙德·威廉斯在这种语境下才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的理解。尽管政治经济学的诸种问题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各位成员和斯图尔特·霍尔所关注的焦点,可这类问题始终没有

占据中心舞台。

确定媒介在制度框架内的位置，如果说在这一方面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和斯图尔特·霍尔的贡献近乎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对涉及意识形态和主观性形成的诸种问题，我们就不能作如是说。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的研究范围内，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紧密相联的（安德森，1979）。在此，意识形态上的分析方法被用来解释晚期资本主义内部各种统治结构的延续性。在这一方面，尽管借用恩岑斯贝格尔的名言，即所谓的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表露出某种“漏洞”这一现象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恩岑斯贝格尔，1976b: 23），可控制方式还是得到了公正的强调。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前一篇文章里，恩岑斯贝格尔（1976a）声称，就商品的流通而言，“思想产业”（mind industry）无法得到概念化，因为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意识形态上销售现有的定货单。新左派从被感知的观念主义出发，对媒介作了许多分析。在机警地对这一现象作出回应时，达拉斯·斯迈思（1977）竭力纠正左派理想主义的倾向。在斯迈思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传播产业在经济方面发挥何种作用？只有掌握了资本主义文化形式在经济方面的情况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根据斯迈思的观点，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用于商品生产的时间）和休闲时间（出卖给广告商的时间）。受众被广告商所收买是以收入、年龄、性别、种族和阶级等不同的具体情况为基础的。因而，受众需做的事情就是要学会怎样去购买供出售的商品，这样才能明确地安排“自由时间”，以有利于消费资本主义。他断言，当代文化的经



济基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盲点”。

尽管我想在下面再讨论这些问题，可达拉斯·斯迈思看问题显然过于极端。如同格雷厄姆·默多克（1978）所指出的那样，达拉斯·斯迈思对广告商收买受众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言过其实。有一些文化产业，诸如电影、通俗音乐、连环画册和流行小说，更不要说公用广播事业，均只是在极小程度上依赖广告来提高收入。再者，大众传播理论不仅需要批判地分析金钱与权力这种双重媒介是怎样有益于诸种传播体制的形成，而且要分析这些体制是怎样有系统地歪曲社会对社会本身的理解。若要在理论上把握诸种大众文化形式的实施，人们就需要将对体制权力的分析与媒介的内容和偏见（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以及人类同一性无层次的心理形成过程等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整合起来加以考虑。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之间的论辩，威廉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和斯图尔特·霍尔均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然而对以上这些问题，他们从未做过综合的分析。

## 雷蒙德·威廉斯：传播与长期革命

雷蒙德·威廉斯的研究成果，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文化批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他的论文集对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政治理论以及大众传播，均有相当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威廉斯是昭然于战后社会里左派思想内部更大变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新左派群体内的其他学者一样，威廉斯意识到，明显表现

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的经济主义对民主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日益重要性的解释是不恰当的。再者，由传统批评从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的社会诸条件中割裂出来的艺术实践，被认为具有某种批判的内在性。这些问题引发了一个需要付出毕生努力的课题，这一课题将力求把握诸种普通文化和审美文化，以及这些文化与社会诸种体制的关系。

威廉斯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即《文化与社会》(1961)，或许最有名气。他对“文化”这一概念的表述，是按历史顺序收集从柏克(Burke)到奥威尔(Orwell)等一系列作者来进行的。通过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浪漫传统进行批判性的追根寻源，威廉斯希望表明，文化这一概念潜在性地保留着内在和批判的用途。实际上，他是融会了所谓的人类学和艺术学对文化的界定。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意味着双重意义：一种是“生活方式”(威廉斯，1961:137)，另一种是关于提供批判性诉讼法庭的人类完美的诸概念(威廉斯，1961:65-84)。他写道：

文化具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各成员接受训练以了解各种现成的意义和方向；二是可以获取并接受检验的各种新观察和新意义。我们就是以以下两种意思使用文化的：一是指整个生活方式——诸种普通意义；二是指艺术和学习——发现事物和创造性活动的特殊过程。(威廉斯，1988:4)

威廉斯的《长期革命》(1965)一书，尽管保留着他早期的一些倾向，可对文化变革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更是以体制为基础的方法论。长期革命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三种彼此联系的变化在历史上的缓慢进程。随着识字

人数、使用标准英语的人数和通俗报刊数量的增加,接触教育体系的机会的逐渐增多为共同文化提供了背景。长期革命的辩证关系,是由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与人类交流本性之间的矛盾构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劳资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再生产,对以解放的方式使用文化诸形式起到了阻碍作用。民众真正的学习和创造稟性的实现,只有通过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来达成(威廉斯,1965:118)。威廉斯面对的问题是,他所认为的作为变革主要力量的工人运动,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制度。

回顾一下威廉斯对文化的双重界定,能最佳地凸现长期革命的宗旨。首先,威廉斯渴望为一个有启迪作用、适合于有教养者、吸引参与的民主政体创造物质条件。唯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内部的诸种社会关系得到根本性的民主化,这才能得以贯彻。其次,威廉斯主张,“我们的”文学文化遗产和文化生产的诸种新形式,应该向每一个人的批判实践开放,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享有特权的人。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是竭力提倡一种肤浅和虚假的通俗文化,这种文化若不是使“严肃”的艺术降低到边缘地位,就是巩固了精英论者关于高品位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上层阶级的观点(威廉斯,1962:115)。F. R. 利维斯认为,古往今来,对“文化”的维护、批判和贡献仅是少数人的事。<sup>①</sup>威廉斯的这种特殊的视角反映了对利维斯观点的修正。对威廉斯来说,这是他强调点的重要改变,因为他先前相信某些文化精英人物在保护文学文化免遭“思维、感觉和臆测的诸种机械方式”之害方面所起到的必要作用(威廉斯,1952)。然而,威廉斯的文学渊源,对他形成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意向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精巧杰作《传播》(1962)一书里,威廉斯依然继续论述长期革命的许多主题思想。他写这本书的原先目的,是想发起对工党内部未来政策导向的讨论。虽然没有实现对大众媒介的未来作批判性的论辩,但此书一直是我将要所称的民主现实主义的杰出范例。威廉斯提出要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迫切希望为言论的自由、开放和真实创造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艺术家、评述人、表演家和书评家需要有一个保证他们对言论的表达方式有自主控制权的社会环境。威廉斯提出了一个“理想型”的传播自由,他写道:

一个良好的社会有赖于事实和观点的自由畅通,也仰仗于对意识和想像力的发展——明确地表达人们的实际所见、所知和所感。任何对个人言论自由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限制。(威廉斯,1962:124-125)

为了检验这一理想型,威廉斯简要地概括了四种模式:(1)专制式,(2)家长式,(3)商业式和(4)民主式。

一种专制式的传播体制,就是简单地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蕴涵于这一方式的,就是将排斥其他的或各种有抵牾的观点当作一种政策问题。在此,威廉斯所考虑的对象,是“实际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大众传播体系。由电子输入的代码信息的传播以及印刷媒介,基本上受到国家的集中控制,这严格地制约了市民社会内部不同意见的表达。威廉斯明显地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对经济领域内部所有权关系的强调,导致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理论疏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这种倾向,可以与实践中的以市民社会替代国家的倾向联系起来(基恩,1988)。威廉斯坚持认为,任何名实相符的激进民主政

治,都将必须保护信息的自由传播,使其免遭国家的监控。

在另一方面,家长式的诸种社会体制取向的中心点,是力求保护和指引,而不是维护统治权。譬如说,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建是以维持高标准的理想为基础的,这种高标准总体上反映了英国社会各统治集团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英国广播公司首任总经理洛德·里思为这一想法作了辩护。他说,一种更加民主的媒介会不可避免地流于低标准。根据威廉斯的看法,里思的公用事业模式具有将民族视作大众的一种内在倾向(威廉斯,1962:108)。使用“大众”这一词语,意味着否定民族文化多元性的一种思维方式。里思关于公用事业的观点,是竭力培育民族形成一种丰富和高层次的文化,以摆脱美国化了的同质性通俗文化。对威廉斯而言,里思的家长式观点与其意欲反对的商业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市场的目标是各种类型的消费者,可在家长式的方式方法里,诸种高低类型消费者的再生产“将我们的文化分为高低类型彼此毫无联系的不同领域”(威廉斯,1962:108)。威廉斯对公用事业模式的修正,是试图包纳一种更加多元的民族模式,同时在体制上加强了各种民主传播关系的基础。<sup>14</sup>

商业式的诸种文化产业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因为在市场上可以买卖多元的文化诸形式。但是,威廉斯(1980)在一篇论述资本主义和广告的文章里阐明,各种商业体系常常模糊了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对民主自治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广告能够玩弄这个特殊的意识形态把戏,是凭借对“死亡、孤寂、挫折、对同一性和尊重的需要”(威廉斯,1980:190)等更加本真性的问题提供诸种“边缘的”解决方法。再者,商业体制进

一步引发错觉，因为某些排斥态度已融进了资本主义文化推销的各种方法。也就是说，文化传播的各种商业方式，注定要排斥不可能快速销售和不可能有回报的商品。

文化生产的民主模式与上文概述的商业体系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这一模式强调了传播的自由。然而，根据威廉斯的观点，自由传播的某些权利应该得到保护，并应与市场上的资本统治隔离。威廉斯提出，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摆脱诸如资本和国家认可的并已得到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商业式和家长式体制的控制。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假如凡是有贡献的人善于接受“挑战和检阅”（威廉斯，1962：134），那么“言谈”的诸种开放性民主形式就不一定有终结。威廉斯相信，这种乌托邦式的自由传播，无疑会促进共同体的各种更加牢固的关系和联结。对国家传播体系的改革，也就会为以往遭受排斥的各种经验和观点提供一个公共的民主论坛。在此，威廉斯所特别关注的，是一代正在涌现的艺术家，如托尼·加尼特、肯·洛奇和约翰·麦格拉思等，这些艺术家在电影和电视方面正在建立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的情感结构。在长期革命的进程中，这些艺术家将最终会荡涤极其通俗文化的浮浅。简言之，威廉斯强烈地感受到，传播的诸种新形式（报刊、电视、广播和电影），能为严肃地参与和真诚地关注人类的需要创造一种民主氛围。

威廉斯的著述可被视为民主的现实主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致力于在长期革命中所概述的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他为现实主义的审美观所作的辩护。然而，与卢卡奇关于现实主义和艺术的著名观点不同，威廉斯并没有认为应该像镜子的映照一

样来反映社会(詹姆森,1977)。对威廉斯来说,诸种艺术实践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凭借各种物质的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来创造现实,在他后期的关于文化唯物论的著述中我们将能看到这一观点。通过威廉斯所描述的“对现实的态度”(威廉斯,1989a: 228),我们可以将文化生产描述为现实主义。对文化有贡献的人,应该努力抓住“现在真正发生的事情”,同时还应该竭力与受众的情感结构联系起来。对民主现实主义来说,唯有社会诸过程得到真实的表述,而且这种真实的表述能为受众所理解,我们才可以认为传播是成功的。譬如说,斯皮克·李的近期影片《马尔科姆·艾克斯》,可被视为一种民主现实主义的样式。这一部电影以围绕黑人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为历史背景,刻画了激进的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影片的叙述显然是想在象征意义上对“真正”的社会诸过程作出重新注解,而且联系了现代受众的情感。这种方法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威廉斯和奥罗姆(1954)所称的“全面表达”(total expression)。只有在受众离开影院或者读完一本小说时能熟悉作者的意图,全面表达才能得以实现。倘如否定各种具体文化形式和风格的重要性,抑或退隐于艺术家的纯审美意向,全面表达是难以实现的。其实,文化生产者恰恰是被迫根据某些常规和最易于他们与他人沟通的情感结构来从事文化活动的。

## 文化唯物论与霸权

雷蒙德·威廉斯的后期作品,更潜心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为回应这两个理论潮流,他对文化诸过

认识媒介文化

程作了更为实质性的论述。文化唯物论理论的建立是为了评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他发现这些观点以及抽象概念的物化诸形式，均明显表现于后结构主义的某些思想（威廉斯，1979b: 27）。

围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思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已表现为一个中心问题。这一观点通常被理解为是指基础（经济）对上层建筑（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而言具有优先的解释权，并且对其作了外部限制。大多近期的对这一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通常都受到格拉姆希（1971）、阿尔都塞（1977, 1984）和普兰扎斯（1978）的启发，力求阐明上层建筑至少相对自主于经济基础。诺曼·赫拉斯（1987）在他反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对这种现象作了最恰如其分的描述。赫拉斯通过想像自己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非常有益地要求我们借助形象思维重新想像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这种捆绑并不妨碍赫拉斯演奏小提琴或收看电视，但这的确限制了他上街购物或去参加埃尔维斯·科斯特洛\*的音乐会。就这一方面而言，被捆绑在柱子上的赫拉斯可以被认为具有了相对的自主，这类似于上层建筑相对自主于经济基础。然而，尽管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威廉斯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一隐喻依然持怀疑态度。这种论点是，（1）将上层建筑还原为对基础的反映；（2）对历史过程的抽象；（3）将人类的需要视为经济性而非社会性和（4）将文化诸问题游离于与经济结构相关的各种问题。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已对这些论点作过概述（史蒂文森，1995），我在此将聚焦于威廉斯的

---

\* 科斯特洛（1954— ），英国著名的摇滚乐歌手，其真名为 Daclan McManus, Elvis Costello 是其艺名。——译注



第一条重要反对意见。

威廉斯声称,如果将属于上层建筑的现象贴上标签,那就会使这种现象少了几分现实度。根据这种解读,上层建筑成了一个折射物质经济基础的具有依附性质的思想王国。将上层建筑还原为一个唯心论者的王国,这有悖于威廉斯想使文化诸实践变为物质的愿望。威廉斯关于文化唯物论的理论认为,一切社会实践是由有意义的和物质的要素组成的。他写道,文化是由两个主要特征构成:

(a)强调整个人生道路中“提供信息的精神”,这明显表现于各种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但最明显不过的是表现于“具体的文化”诸活动——语言、各种艺术风格、各种脑力劳动;和(b)强调一个“完整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可详细说明的文化,体现于各种艺术风格和各种脑力劳动,这种文化被视作主要由其他社会活动组成的秩序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威廉斯,1982:11-12)

威廉斯通过对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的讨论来阐明自己的论点。根据威廉斯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一个把原材料做成钢琴的工人参与了一项生产活动,而演奏钢琴的钢琴家并没有参与。这是因为这个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像钢琴家,他直接参与了对资本的社会再生产。与马克思相反,威廉斯坚持认为,演奏钢琴这一实践既是物质的也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一观点就是想表明,如同给麦当劳餐店打工一样,聆听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项生产实践。

---

\* 斯普林斯廷(1949— ),美国20世纪80年代摇滚乐的超级明星。——译注

与英国左派的许多做法一样，对非还原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探求将威廉斯引向了格拉姆希。威廉斯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开始熟悉格拉姆希对霸权问题的研究工作（福尔加奇，1989；兰塞姆，1992）。简括地说，如果一个统治集团凌驾于深受限制的经济问题事务之上，并在道德上和思想上领导人民，那么这一集团就可以被认为具有霸权性质。认识霸权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其视作一个连绵不断的战场，在这种战场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社会的其他集团结成各种联盟。在此的目的就是持续不断地将反对阵营孤立起来，同时使公众利益和公众观念的天平朝自己一边倾斜。就这一意义而言，格拉姆希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是饶有趣味的。意识形态被表征为社会的粘合剂，将不同的阶级联盟粘合在一起。根据格拉姆希的看法，如果意识形态能够联系民众的“常识”，并能动员他们思变，那么我们便能判断意识形态是富有成效的。

关于威廉斯所指的霸权最清楚的概要，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1979b)<sup>②</sup>一书里找到。为了与格拉姆希保持一致，威廉斯将霸权定义为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形成过程中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永无静止，也永远不会有体系。依照威廉斯的话来说，霸权的诸种实践可以是居高临下的或剩余残留的，也可以是意外紧急的，尽管如同威廉斯所表明的，没有任何社会秩序能够包容人类经验的全部。因此，某些社会实践，如在大学里讲授马克思主义或为艾滋病组织工作等，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并且偶尔还会具有对抗性，因为这种实践既是对占主导地位的霸权的挑战，也是对这种权力的再肯定。尽管这对在教育

和卫生领域工作的左派来说无疑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理论，可其历史倾向在总体上非常适合于威廉斯对文化的研究工作。<sup>③</sup>

根据威廉斯的分析，霸权是三种文化过程的结合体：各种传统、各种体制和各种形态。传统由民族国家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可其表现形式是刻板的、最终的和中立的。已被创造出来的各种传统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基本上仰仗于类似大众媒介的诸种体制。英国王室——在意识形态上最经久不衰的英国体制——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几乎不持批判态度的媒介报道为其大开方便之门。1932年，英国广播公司首次开设了君主国圣诞节广播节目，通过乔治五世的慈父形象，给人带来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印象（坎纳丁，1983：142）。凭借大众传播和教育系统这样的体制，各种传统的文化传递有助于在当代社会里形成民意的一致。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各种体制和传统之外，具有霸权性质的各种统治模式也有赖于市民社会里的各种结构。与早期现代主义的运动一样，各种结构尽管再次肯定了某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却错误地将自己表现为具有对抗性。威廉斯的遗著《现代主义的政治》（1989c）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认为，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在政治上具有歧义性。强烈的个人主义否定了与他人的联系，先锋派们借用这种个人主义，试图震撼和嘲笑资产阶级。对威廉斯来说，否定人类对共同体生活的需要是典型的右派思维模式，这种否定可能与某些新自由的思想脉搏有关。这一例子说明，所谓的“对抗性”倾向是复杂的意识形态构建，常常比初次出现时更为复杂。

## 雷蒙德·威廉斯与物质文化： 电视和报刊

对威廉斯的著述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倍加努力地去将文化诸过程表征为物质性。在这一方面，他改变了他早期对长期革命需要维护超自然的文学文化的强调，这种文化的指向是围绕“某些绝对或普遍性价值观”（威廉斯，1962：57）。他论述媒介的第二部著作主要是探讨电视的问题，这也许是他将文化唯物论应用于历史分析的典范。威廉斯的分析在三个层面上展开：（1）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2）对电视内容的潮流或格调的分析；（3）对隐藏于某些电视“效果”研究背后的某些假设的批评。在这三个分析层面中，威廉斯看来特别钟情于第一个。

1. 电视是怎样占领了我们文化生活的中心部分？这对威廉斯来说是一个首要问题。如果凭借技术范式，则难以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譬如说，对威廉斯的问题给出一个让人难以满意的回应，就是聚焦于发明了电视的科学研究。以这种方式来审视技术，就是从社会的各种需要、目的和实践中抽象出电视的普及。按照威廉斯的话来说，公用事业电视的发展，可以说是过度取决于经济、国家和他所称的易变的个人条件（威廉斯，1974）。在威廉斯所分析的许多原因中，最关键的原因是私人资本，其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广播的文化形式一样，电视的文化形式必须适应由家庭为基地的消费主义所形成的市场。换言之，电视技术必须适应各种“个人”收视条件的需要，而且体积要小得便于移动。最初电视机常常被置于家具内，这些家具被设

计为刚好能安置于家庭的客厅。威廉斯常常将这种条件称作个人条件,而这种条件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国家的公用广播政策抵消了。这些左右英国电视发展(虽然在美国并不是这样)的导向机制既具有公用性又具有个体性。尽管电视的商业化意味着电视是个人的消费品,可电视的公共管理给国家提供了一条促进其自身合法性的途径。既可以是家长式的也可以是民主式的公用事业广播的思想,产生于由国家界定的民族文化。然而,自1950年代以来,各种广播系统最重要的发展是美国传播的扩张。原先全国的和由国家控制的广播转变为全球的和商业的电视形式。这一形势已创造了一个电影、电视和录像的世界市场。<sup>19</sup>威廉斯声称,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在文化上正在涌现的卫星和有线电视系统的发展。在文化生产方面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削弱了英国的优势,并且可以通过廉价电视的倾销来遏制区域产品的制造。另一个办法是,对新型的传播系统所采取的更加“社会化”的方法,可以通过各种更为区域性的控制形式,尽力去削弱大规模资本和各民族国家的优势。公用事业广播在保持与国家和国际的联系的同时,可以继续不断地区域化和民主化。

2. 威廉斯通过审视各电视网上的电视节目的分布情况和他所称的电视流通(television flow),探讨收看电视的“体验”。对商业电视和大众文化教育电视的内容分析显示,大众文化教育电视能提供更具有社会性和教育意义的节目。但是,这两类电视的共同之处是,电视节目的编排被组织为一种连续性的流通,其用意是想吸引住晚间消遣的受众。伊恩·昂将电视流通描述为“各节目易变不定,缺少能给受众留下具体深刻印象的个性”(昂,1985:22)。把握这种现象的最佳办法,就是体验一下被动

地收看电视，而不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具体的节目里去。认为电视已成为一种个人消遣途径的观点，是一种观念上的疏忽。相反，威廉斯认为，电视传播诸频道的开设，能为更加有力的公众讨论提供一个批判论坛。

3. 威廉斯所评论的许多受众研究，与技术决定论的各种假设一样，也是基于对各种假设的物化。在威廉斯写这方面的文章时，对孤立于科学的“效果”的探索，已左右了这种研究的范式。这种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多半是因为将电视影响割离于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受众的语境和地点。同样，明显表现于这一分析的过于简单化的各种因果模式常常认为，电视的体制结构不值得研究。虽然威廉斯认为，受众研究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些问题不具备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所保留的政治重要性(威廉斯,1974:123)。

威廉斯的文章对于介绍英国的报刊历史一直很重要(威廉斯,1965,1978,1989c)。他的贡献与他对关于电视的贡献一样，将历史的研究方法与这样一种欲望融为一体：竭力沟通关于报刊的各种激进的和自由的视点。尽管威廉斯认为，要维护报刊的批判自由，有必要将全国性报刊独立于国家，可各种自由的观点往往漠视了联合大企业的控制力量。20世纪已目睹了全国性报刊的两大发展：激进的通俗报刊的销声匿迹和报刊在文化上的两极分化。因为关于激进的报刊的命运在其他作品中已经讨论过(柯伦和西顿,1985)，所以关于中等报刊不景气的思想对威廉斯(1985)来说尤其重要。科林·斯帕克斯(1992b)已提出，通俗报刊和严肃报刊的进一步分离，给通俗小报的读者提供了对体制诸过程具有明显个性化的报道。信息的高质量 and 低质量两

种形式的进一步文化离散，是与在工人阶级中不断深入人心的原子论和政治消极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威廉斯，1985）。对威廉斯而言，这种发展对未来任何参与性的共同民主制，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

## 雷蒙德·威廉斯与传播理论

在这一部分，我想更详细地审视威廉斯的各种论点。我将主要考虑四点：（1）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念；（2）威廉斯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概念；（3）民主现实主义的当代相关性；和（4）威廉斯文学背景的重要性。

1. 试图坚持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所表达的理论立场，与其说接近于恩岑斯贝格尔（1976b），倒不如说更接近于达拉斯·斯迈思（1977），而且在这一方面尼古拉斯·加纳姆（1986a）也不例外。在考虑文化的生产时，加纳姆认为，经济依然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定因素。分析诸种文化产业时，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他认同达拉斯·斯迈思的意见——仍然是关于文化产业为资本所起到的经济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在历史上一直是与通过更为直接的各种生产方式来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基础的能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层建筑的形态在历史上是凭借经济而形成的，因为“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决定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加纳姆，1986a:29）。目前对文化诸产业的投资，可以被视为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以及对投资新领域的一种探索所致。根据这种理解，上层建筑没有达到发展的自主层次，而是具体地与经济相联系。因而，威廉斯分析强调了社会诸

实践的物质性,这是正确的,可他忽视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特里·伊格尔顿(1989)与威廉斯的观点相对峙,他提出,<sup>21</sup>“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本体论的论题。只消回顾一下威廉斯关于钢琴演奏家和工人的例子,我们就很容易接受演奏钢琴与制造钢琴一样真实。但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不是本体论的问题。如同赫拉斯(1987)和加纳姆(1986a)所说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着意于揭示政治和文化诸实践所享有的相对自主权的各种层次。尽管伊格尔顿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可威廉斯的论点同样是想表明,围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讨论具有内在的还原性。加纳姆认为,威廉斯回避经济决定论的诸种问题,这一看法也具有误导作用。威廉斯在论述大众传播的第二本书里阐明,必须从历史角度对经济基础决定论追本寻源,它是无法假设的(威廉斯,1974)。问题不在于威廉斯想要回避围绕决定论的诸种问题,而在于他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理论有缺陷。就决定论这一问题,威廉斯写道:

我们不要把决定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力量,或者是诸种力量的一个单一的抽象,而应该把它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诸种真正的决定因素——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社会 and 物质的继承、集团之间规模与大小的关系——均会设置种种限制并施加种种压力,但在这些限制里或某些限制点上,并且在这些压力下或在这些压力的支持下,都既无法全面控制也无法全面预知复杂活动的结果。(1974: 130)

加纳姆和达拉斯·斯迈思尽管没有去体会彼此可以交流的态度,可他们均明显地致力于对诸种经济形式的解释。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讨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更加可取的。第一,而且



最重要的是，他将电视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复杂而不连续的过程。譬如说，基本上是因为军事研究，才将电视技术发展成传播的各种新形式。公用事业广播思想的产生，仅仅是在电视已经被转化为在市场上能够买卖的商品之后。这两个例子说明，国家和经济的互为联系在大众文化教育电视的文化生产方面是怎样成为决定因素的。参照美国，威廉斯提出，在其他历史语境下经济的作用更为显著，并且更少地受到国家规章的羁绊。假若大众传播理论能得到重新调整，主要围绕对经济优势历史的探索，那么这种理论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公众和商业规章的不同文化的结合体。第二——这一点我将在下文描述——威廉斯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然而，加纳姆和达拉斯·斯迈思坚持贬低由物质生产出来的各象征性形式在意识形态上的作用。

2. 具有霸权性质的文化体现了一套占主导地位的准则和价值观的连贯性。现代正在出现的情感结构，就是交流的无能、文化同一性的离散和对至高无上的个人价值的推崇（威廉斯，1989c）。为了与现代性的其他分析（B. 安德森，1983；弗里斯比，22 1981；吉登斯，1990；詹姆森，1991）相一致，威廉斯强调，现代主义者对情感的疏远、破裂和放逐的关注，应该与体制诸方面重新联系起来。根据威廉斯的看法，那就是，现代主观性的播撒，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和合理性经济诸形式的优势（威廉斯，1985：262）。唯有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和对自我管理的原则在体制上加以承认，一个更善于交流的社会才能出现。在这一点和其他点上，如果威廉斯依然抱着哈贝马斯的一些相关见识不放（伊格尔顿，1990：409），那么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观念同样是

有缺陷的。威廉斯和哈贝马斯高估了某些文化准则和价值观的凝聚力。威廉斯的潜台词是，如果艺术诸形式能借助某些类似于至高无上的个人价值那样的价值体系得到理解，那么这就更在总体上反映了文化的各种取向。如果说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着批判观点的多样性，而且这些观点又是由结构和文化的各种离散引发的，那么这种想法看来是极为可疑的（阿伯克龙比等，1980）。意识形态粘合剂确保了对不同社会集团的“两愿的”统治，可霸权的概念不应该同化于对意识形态粘合剂的讨论。可是，如果说威廉斯夸大霸权的文化力量，那么他的确是想提供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混合体：离散和某些具有粘合性的准则和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所产生的各种效果。霸权能够通过社会原子论的过程以及建立共同的信仰和实践来实施，这一观点演绎于卢卡奇和格拉姆希。威廉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制约了用一种文化来对抗另一种文化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

3. 威廉斯在此的各种论点需要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得到重新阐释。民主现实主义声称，如果从体制上认同区域的和民族的媒介与经济和国家在体制上的决裂，就会创造出一个更加强大的并且善于交流的公共领域。尽管民主现实主义同意威廉斯的看法，但没有提供一套适切的传播道德标准，而且在文化离散和文化国际化的现代语境下，其定位也是不恰当的。在此，我想将这些问题与对萨曼·拉什迪\*事件的简括性讨论具体地联系起来。

---

\* 拉什迪(1947— )，出生于印度的孟买市，现为英国的当代著名作家。1981年因小说《午夜的孩子》获英国图书奖。曾因发表《魔鬼诗篇》而引起种族争议。——译注

理查德·韦伯斯特(1990)认为,自1945年以来,西方文化经历了从对犹太人的仇恨转变为对阿拉伯人的仇恨。从表征上建立一个新的仇恨对象,这非常类似于反犹太主义宣传的古老形式。<sup>④</sup>这种看法与历史较为久远的西方“东方文化研究”(赛义德,1978)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想要了解萨曼·拉什迪之争时需要探讨的文化语境。根据西蒙·李(1990)的看法,自由学者都是从作者的言论自由的正义角度而不是从英国伊斯兰教徒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论争。假若各媒介都根据威廉斯关于民主现实主义 23 的理论来行事,那么英国伊斯兰教徒本该与英国国教一样,享有进入全国性公共领域的权利。同样,在对英国的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教共同体进行构建的和历史的分析时,英国伊斯兰教徒的各种行为,也本该得到更正确的定位。卷入这一事件象征性结构中的新闻记者,也本该能更好地理解那些因为拉什迪的小说的发表而明显感到威胁的人们。威廉斯已经作了修正的公共领域,也会力求做到更为通达地欣赏受众理解媒介信息的方式。关于焚书的媒介报道,本来可以预计到,这肯定要引发一种文化危机感的。的确,假若有更为多元的媒介,那么其中的一个结果是,焚书这一事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换言之,倘若英国伊斯兰教徒当初的抗议没有被忽视,或没有遭受偏见,他们也许已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当时发生反对《魔鬼诗篇》的运动的时间是先于公众焚书的时间,那么这看起来就尤其清楚了。

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会有助于建立一个能理解人的社会,可威廉斯的建议仍有局限性。虽然民主现实主义强调,需要根据特定的语境来判断“他者”(others)的各种言论,但他往往从权利

的角度而不是从义务的角度来看待言论自由。在《传播》(1962: 135-137)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威廉斯显然是回避对这种问题的讨论。这是因为他想像,一个更加民主的媒介可以凭借撰稿人的权利来实现。威廉斯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待对公共领域的修正,这或许可以从考查他的历史语境来得到解释。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观念,是在当时英国文化似乎受到市场和里思\*的家长式管理的控制时建立起来的。可是,市场和家长式管理都没有能力培植威廉斯所认为的正在出现的情感结构。假若将义务强加于文化贡献者,那么这就会意味着在艺术上让步于正在正常化的国家或市场的获利需要。这些思想固然重要,可是,威廉斯的文化分析根本就没有顾及现代社会的多种文化特性。因而,对纯粹是招来侮辱的拉什迪之争,我们本可以有着更为广阔的多种视野。对哈贝马斯而言(1989),参与讨论迫使我们去注意他人的想法,并且有理性地作出回应。同样,齐格蒙特·鲍曼(1991, 1992a)最近的著述敦促我们从他人的角度重新想像我们自己,并且认识我们责任的深度。鲍曼推论,唯有我们准备为他人承担责任,我们才能避免使一种没有道德内容的文化永远存在(鲍曼,1992a)。然而,总的问题依然是,除非参与者不得不尊重来自截然不同的人类生存状态的贡献和观点,自由传播不可能培育彼此信赖和彼此尊重的各种关系。

在另一方面,关于长期革命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这一论点就是支持更具区域性和全国性形式的文化供应。

---

\* 里思 (Reith of Stonehaven, John Charles Walsham Reith, 1st Baron, 1889—1971), 英国现代类型的公有而独立的企业的创建人。先后任英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帝国航空公司董事长; 内阁大臣; 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 殖民地开发公司董事长等职。——译注

尽管这样做能为新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的诸种联系提供背景,可这对许多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离散特性依然缺少足够的重视。在此,威廉斯将我所称的文化帝国论和民族主义论融为一体。这两个论题均有许多值得推崇之处,但它们对晚期资本主义均缺少足够的文化论述。文化帝国论认为,由于各大媒介联合企业的优势,一致性而非差异性正在组成全球性文化。根据这一观点,文化产业生产出麦当娜和麦当劳餐厅的美国化全球性文化(希勒,1970)。然而,民族主义论认为,不是全球性而是具有民族性的诸种文化,组成了各种现代同一性。各民族国家有能力组织一代代人的经验、表达共同的记忆和抒发共同的命运(史密斯,1990)。我的看法是,威廉斯似乎常常想使各种民族-区域文化激进化,以调和美国全球文化的效应。这一方法至少有两点不恰当之处。第一,任何未来的激进公共领域均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语境下运作,在这种领域内,各传播途径均没有得到民主的拥有和控制。民主理论需要有能够探讨这些体制能受到全球社会控制的各种方法。威廉斯对区域和民族文化的观点,纵容了一种退化的并漠视这一层次的精神性。一种比较令人满意的理论,会将民主原则应用于各个层次,而不仅仅是区域层次和民族层次。当然,许多离散的区域文化会体现于多种媒介,这可以从反对全球化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90)提出,种族暴力在整个欧洲的爆发,均可以从这些角度得到认识。对霍布斯鲍姆来说,各种新民族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对各民族国家的衰落和现代性的持续性文化变化的抵触性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防御性的原教旨主义的(fundamentalist)。<sup>⑤</sup>因而,威廉斯关于更加区域化的媒介的观点,

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支持从公众那里作非政治化的退却。

关于跨国文化生产的霸权观点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对诸种交流关系的离散，而不是求得文化上的一致性。譬如说，公民们对由萨曼·拉什迪事件引发的诸种问题可能会麻木不仁，他们可能喜欢从右派办的各种通俗小报上了解这一事件，也可能在翻阅报纸上的体育版时浏览一下关于这一事件的一篇文章，或者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太累，无法集中精力来收看电视上关于相关问题的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当然，也可能有其中一些人认为，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公民们的所有这些态度制约了类似于威廉斯的意图：构建具有民族和区域形式的协同性和共同体。诚然，尽管有必要认识这些制约因素，可这不应该分散人们对威廉斯在联系民主传播体系时所提出的各有关问题的批判重要性的认识。

4. 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分析，是以其对利维斯的文学批评的知识为背景的。从总体上讲，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注了艺术的生产方式。很明显，他关于霸权的讨论对“特殊”的艺术形态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媒介文化方面，这种倾向在他对电视流通和电视内容的讨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不难发现，威廉斯常常仿佛像分析文学文本一样来对电视镜头作出判断。与利维斯一样，威廉斯着力于通过慎密的检视来发掘蕴藉于文本的价值观。尽管这可能是有益的，可他以利维斯的美学理论为其知识背景，这意味着他认为，意义是一个可以通过聚神阅读来获知的稳定特性。这种观点不仅假设，受众“解读”已经得到协调的文本的方式类似于富有学养的学者，而且还把意义当作文本

里固定不变的东西。这并不是说,对瓦尔·杜尼肯\*演出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判断,不能有异于特定受众对其的理解方式。然而,威廉斯对电视流通的讨论,是將他自己对文本的阅读与一般受众的阅读相提并论(莱恩,1991:164)。

但是,这些批评可能也是言过其实。约翰·菲斯克(1987b)以类似的调子提出,在威廉斯蔑视松散的和随意的电视背后,潜存着对在一个作者的名下一个统一的文本的渴望。威廉斯没有能力欣赏电视的矛盾性和悬而未决的特性所提供的抵抗性解读。尽管菲斯克的话显然言之有理,可他自己对威廉斯的阐释也过于片面。威廉斯关于电视流通的看法,也受到我所称的民主现实主义的影响。现在应该明了,对传播的更强有力的创作形式的需要,是与共同体各种民主形式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批判性研究应力求展开的,也许就是威廉斯的文学倾向与他的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威廉斯的确没有充分陈述通俗媒介文化在话语方面的开放特性,可他又的确以在更为当代的批评里所没有的形式,将针对媒介、民主和共同体等问题的一些重要观点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媒介文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发挥民主的作用。只消联系他对文化生产和内容的思考,我们便可发现他的这一观点是一种极为深刻的见解。

与许多关于大众传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一样,雷蒙德·威廉斯能够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成为对霸权和具有

---

\* 杜尼肯(1927— ),出生于爱尔兰,著名流行歌手及作曲家。——译注

认识媒介文化

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他论述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围之广，人们对此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可以联系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所潜心研究的更具意识形态的框架，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

##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与电视偏见问题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期，就电视新闻的偏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识的研究（1976a, 1976b, 1982）。在以后成名的叫做《坏消息》的丛书里，他们凭借经验性和符号学的分析，着力于揭露对电视新闻报道具有系统性的阶级偏见。在当时，这些研究对大众传播的探索颇有影响。然而在目前，媒介组的论文集丛书正面临着不利的反应（菲斯克，1978a；哈里森，1985）。其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的理论里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失误，他们在总体上将研究重点，变化为对认识论和受众研究发展等问题。我的研究将会表明，格拉斯哥媒介组的许多评论立论准确——研究组的一些初期成员似乎确实重视这一点（菲洛，1990）——同时，他们的研究还保持了反思性见解的核心。对电视新闻的分析采取批判的方法，这依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大众传播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样说，可格拉斯哥媒介组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所作的关于受众阐释性理解的诸种假设、对客观性诸问题的迷惑以及对体制问题缺少分析。



## 两个案例的研究：坏消息与好消息

首先，如同他们或许会说的那样，《十点新闻》（*News at Ten*）是坏消息。大多关于《坏消息》的书是探讨 1970 年代后期对产业冲突的偏见性表征。凭借广泛的录像资料的呈现，他们提出，新闻重演了具有连贯性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新闻不是中立和客观的，也不是公正和无偏见的报道，而是有赖于与某些特定的阶级有联系的设想。对格拉斯哥媒介组来说，1975 年的头 22 个星期的产业新闻，可以说在三个方面存在着偏见。第一，对社会“现实”的错误表征使媒介带有偏见。这是否定电视新闻不具备社会构建，而是说对产业关系领域的一些表征较之其他的表征更具真实性。在这一方面，格拉斯哥媒介组发现，实际记录在册的工人罢工情况与电视新闻报道的情况没有一致的联系。相反，他们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情况<sup>27</sup>是，有些工作场所，如汽车工业等，受到过多的报道（格拉斯哥媒介组，1976a：191）。产业诸争端的新闻价值，看来取决于给商品消费者和服务消费者所带来的人们普遍感受到的不方便之处，同时也取决于那些象征英国经济不景气的产业。其次，人们可以根据电视新闻重申或肯定资本主义各种主要经济关系的程度，描述电视新闻的偏见性。媒介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致性里起作用，在这样一种一致性里，罢工从来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而且工人永远是错误的。电视新闻报道劳资冲突时，有赖于极度有利于现状的一套“限制性代码”。譬如说，在报道发生于 1975 年英国莱兰汽车厂的问题时，几乎没有提

及因为缺少投资和管理不善等事实（格拉斯哥媒介组，1982：20）。在此，格拉斯哥媒介组借用了当时身为工党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关于莱兰“罢工无必要性”的一篇演说。他们认为，演说原稿文本被英国广播公司作了相当大的修改，以致将指责断然指向工人。这混淆了原清楚地体现于威尔逊演说中的对劳资双方的呼吁。这里陈述的事实，可与关于产业新闻偏见性的第三点联系起来，这一点是说工人阶级的意见被排除于大众传播媒介之外。为何电视媒介产生如此封闭的意识形态？其缘由之一是，电视媒介的职业文化受到了以中产阶级为背景的人的控制。电视媒介工作者在物质和象征性意义上脱离于工人阶级。凡是有悖于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观点的信息，要不就是受到排斥，要不就是零零散散地被包容。这三种关于产业新闻偏见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衍生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歪曲现实，再次肯定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关系，并排斥各种异己之见。

现在来谈谈好消息。格拉斯哥媒介组（1985）将他们的工作推进到对产业冲突的研究，分析了英国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媒介报道。我将集中讨论发生于福克兰群岛的那场战争\*。很清楚，格拉斯哥媒介组在此的研究与先前的不同，他们更关注对在明确的界限内媒介内容生产的定位。对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新闻报道过分受到由国防部长、游说制度和新闻记者对公众舆论的判断所强加的直接控制形式的左右。格拉斯哥媒介组对特遣部队家庭的讨论，凸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为凝聚军队、国家和民意

---

\* 指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福克兰群岛（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所发生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阿根廷的失败而告终。——译注

的需要,必须象征性地制作好消息。

大多关于那些卷入这场福克兰群岛战争的士兵家庭的新闻报道,均集中于妇女。根据格拉斯哥媒介组<sup>①</sup>的看法,这些妇女的生活,正是因为自己的男人远离家庭却能带来新闻而变得有新闻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记者从女性亲属作为男人的关爱者和情感的支持者这些传统角色的角度来反映这些女性。在传统家庭模式衰落和妇女在经济建设中日显重要的今天,这不仅是对现实的错误反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将妇女定位为“情感之舟”(格拉斯哥媒介组,1985:99)。接受采访的妇女,不可能被问及她们对国家政策的批判性思考,被更多问及的是她们的感触。这种话语策略是利用一种不成文的男女区别:男人属于理性的公共领域,而女人则属于情感隐私的王国。再说,这种明显带有性别差异的对好消息的追求,营造了以妇女隐隐可见的私人情感遭遇为中心的家庭和共同体协同性的假象。这种对妇女的意识形态定位,可以通过1983年5月26日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一条新闻消息得到说明。这一消息谈的是40名海军妻子对部队的邮件速度太慢的抗议。这有可能会破坏这种描述方式:新闻始终将其作为爱国的关爱者来描述这些妇女的经历。然而,英国广播公司仅注重海军的狂妄自大,拒绝给予这些妇女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些妇女缺少接触媒体的机会,是因为存在着偏见,具体表现于以上所描述的三个方面。电视新闻中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抑制了社会中妇女的多样性,再现了家庭意识形态,而且压制了反对意见的发表。

## 观察者的眼光与媒介研究的客观性

在这一部分，我将集中探讨在与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的各种论辩时所显露出来的混淆不清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些探讨中所表述的坏消息和好消息，均仰仗于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观念，尽管人们认为这些认识因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不予考虑。对格拉斯哥媒介组来说，那些对汽车工业和英国军人的女性亲属的媒介表征是令人讨厌的，因为它扭曲了现实。这种说法显然难以自在地取决于对客观性的否定。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公正性的价值蕴含于这样一种论点：电视新闻有系统地将某些批判观点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认为这种价值属于意识形态而不予考虑，这排除了批判分析的理论依据。假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有更可靠的理论依据，那么他们本来会凭借自己业已表达了平衡、公正性和客观性等各种价值观，提供对媒介的内在性，批评。由于这些业已表达的价值观与这些价值观的实现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们往往认为这些理想虚假而不予考虑。专制社会更具宣传性的媒介形式表明，这种选择是灾难性的。在此所陈述的论点说明，与格拉斯哥媒介组相反，对平衡、客观性和公正性诸原则的激进化，是为任何未来民主媒介所必需的。问题不在于这些理想，而在于在媒介实践中推崇这些价值观的方式。

自从格拉斯哥媒介组的开创性著作首先在 1970 年代后期发表以来，这已越来越不受人欢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在总体上对文化研究中的客观性思想更持怀疑态度。后结构主

义、解释学和心理分析对文化分析的影响,使意义的不稳定性和受众的阐释视野得到了强调。欧洲大陆理论已从对文本的分析退却到对受众的主观性分析。这些发展已经引发了围绕抵抗、欲望和快乐等主题的一些受压制的问题。这些研究的焦点,已从对广播新闻相对封闭的话语转向音乐录像、矫揉造作的电影和肥皂剧等在话语方面更加开放的领域。在这种研究里,关于偏见的观点经常被认为是认识论上的天真抑或是经验主义的幻想而遭到否定。在此,有些文化理论思想声言,一切社会现实均是语言上的构建,而且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诸种要求是与权力集团的话语实践相关(菲斯克和哈特利,1978;菲斯克,1987a;哈特利,1992)。尽管这些研究对文化和媒介研究的持续性相关至关重要,可这里所提的要求是,媒介传播的批判理论无法始终如一地摒弃真理的要求。假若真理的要求总是作为权力集团霸权策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这蕴含着将各次要集团还原为政治干扰(拉克洛和穆菲,1985)。这种格拉姆希式的分析方式的总趋向,就是支持构建一个反霸权策略的企图,即令这是非理性的或不正确的(菲斯克,1992)。然而,真理太重要,不能将它留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尽管所有的电视新闻均涉及象征构建,可对现实的一些表征较之其他的表征却受到更多的偏见。

为分析的集中,这些问题将参考电视研究和1984年煤矿工人的罢工来加以探讨(坎伯巴奇等,1986)。选择这种方式的研究,是为了凸现某些政治含义,而这种含义是从内容分析转为受众主观性分析的方法论转变而产生的。广播研究小组的报告,是以从1984年3月2日至1985年3月5日长达12个月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每一篇《九点新闻》和工业电视的《十点新闻》为依

据的。坎伯巴奇和他的同仁认为,衡量偏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  
有接近独立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对现实真实性描述的机会。他们  
推想,就像对矿工罢工的不同感知一样,如果我们遇到对真实情  
况有抵牾的描述,那么判断偏见的各种问题无疑是困难的。在  
这一点上,这一研究小组与菲斯克和哈特利的看法相近。真理  
肯定存在于观察者的眼光中。不足为奇的是,在这一研究里,受  
众研究表明,那些支持矿工罢工的观察者较之那些反对者更有  
可能认为,电视新闻对罢工有偏见。这说明了受众收看电视新  
30 闻的某些现象。根据这一观点,人们在看电视时往往将新信息  
同化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感知框架。质问主题的,并不完全是电  
视内容(阿尔都塞,1984),而是将意义投射于文本的主体。⑥就  
像对收看电视时所牵涉的诸种阐释过程的描述一样,这种说法  
也是不适宜的,可这在本书里是无法探索的。我们在此更为关  
注的是,广播研究小组的报告的结论向媒介提交了一份相当清  
楚的检疫证书。其主要发现是,一般公众基本上满足于“无偏  
见”性的新闻报道。这一研究所提出的并为广大不同层次的受  
众所感知到的一个批评领域,就是关注媒介过分注重于罢工群  
众的纠察暴力。然而,只要人们考虑一下新闻所注重的是事件  
的特性,那么电视新闻为何往往突出罢工的行为而不是其原因,  
这便很容易理解了。总之,这种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对内容的  
分析既没有探究矿工罢工的意识形态语境,也没有对电视新闻  
生产的内容作恰当的分析。这些研究人员声称,因为向来不存  
在对电视内容的“无价值”陈述,偏见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必须  
涉及受众的各种不同理解。

坎伯巴奇把研究视线放回到受众,这样不可能对电视内容

作出客观的真理要求。循着科林·斯帕克斯(1987)的思路,我提出:受众是否感知到偏见,这是一个有别于偏见是否存在的不同分析顺序。朱迪思·利希滕伯格(1991)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新闻记者不能放弃客观性的观念。怀疑客观真理的存在,就是怀疑我们能了解不以我们的观点为转移的“真正所发生的事情”。这看来恰恰就是坎伯巴奇及其同事竭力所争辩的事情。假若果真是这样,那么如果媒介改变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以便与它们对现实的感知完全吻合,人们就没有理由提出反对意见。譬如说,人们常指责英国广播公司没有真实地反映发生于1984年的奥格里夫煤矿工人大罢工事件,新闻报道认为使用暴力的是矿工而不是警察。可以想见,受众研究难以帮助对这一事实的澄清。除非受众有其他的消息来源,他们对这一事件的了解有赖于他们自己的视界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唯有媒介再现注重对现实更加客观的反映,关于媒介表征的真理要求才有意义。就拿奥格里夫的煤矿工人来说,受众远离于矿工罢工的“真实事件”,这就意味着他们几乎无法判断英国广播公司对事件先后次序的安排。再说,受众的视界尽管无法具体接触文化生产的各种条件,可同其他事情一样,照样可以得到可靠的信息,这种观点搞混了我们眼前的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既可改变事件的先后次序也可不用改变这种次序。再者,倘使格拉斯哥媒介组就像他们在上文力求做的那样,认为媒介歪曲现实,那么这些想法也无疑是与客观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便承认对平衡、<sup>31</sup>公正性和客观性的要求形成于语言,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要求不是值得为之辩护的价值观。如果媒介丢弃这些原则,那么这在开放的民主信息交流中会使新闻记者和公民缺少行为依据。

假如接受真理是主观性的,那么借用菲斯克和哈特利的话来说,人们便很容易想像,这种讨论能以何种方式为权力集团的利益而工作。如果有这么一种想法:昨天晚上关于新的社会安全法规的记录影片因为不考虑对穷人的影响而太有失公正,那么这种想法就极容易被人否定。假若公正性的价值观被认为是主观性的而不是主体间性的,那么节目制作人就能反驳说,这不是他观察世界的方式。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制约这样一种可能性:针对由这部影片引发的诸种公众问题而展开的任何理性的对话和讨论。可是,如果真理的要求被认为是在传播中认定的主体间性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是以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情况为依据,那么这就会给眼前诸种问题的公开讨论创造条件。

哈里森(1985)与格拉斯哥媒介组各成员之间的辩论,难以让人对关于存在偏见的当初想法的准确性作出判断,这尤其是因为哈里森的评述显然是依赖于极为不同来源的资料(菲洛,1987)。如同哈里森(1985: 59)所表明的那样,假若指明格拉斯哥媒介组公开声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那么否定他们的观点看来是不可能的。假如情况果真如此,人们便永远无法断言电视内容遭受偏见,因为研究人员自己的成见总会紧密地介入对这类问题的判断。承认自己的史实性,与对真理提出客观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有矛盾。卡斯托里亚迪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学术研究人员应该像其他人一样想做一名公民;他/她也想根据权利成为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代言人。在这一空间里,他/她只能遵守对自己所假定的客观性所容许的各种限制的承认;他/她应该不仅仅在口头上承认,他/她竭力希望人们所听取的仍然是一种见解,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



知识，一种科学。(1991:12)

除非人们有能力在一个主体间性界定的公众空间提出真理的要求，要想开展大家都能参与的公众讨论是困难的。这是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个主要标准。雷蒙德·威廉斯(1989b)在对格拉斯哥媒介组的论文选集作批判性评论时指出，像英国广播公司那样的所谓民主机构没有广泛地致力于自己的各种发现。在这一方面，格拉斯哥媒介组的研究，只能被认为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可以被人接受：在某些有交谈义务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得到人们自由而有理性的赞同。在格拉斯哥媒介组的论文里，尽管还有许多地方有纰漏，更不用说他们对与客观性有关的诸种问题的困惑，可一种更加理性的民主文化本应该保证，他们的发现会受到它们应该受到的公众的讨论。 32

## 意识形态与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

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是格拉斯哥媒介组在讨论大众媒介的文章里所探讨的主要对象。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而不恰当地将各媒介体制对意识形态的生产语境化。这也许对内容分析具有内在的危险性。对媒介内容进行符号和经验的考察——如同我们已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样——依然是分析的一个关键层次。但是，对文本意识形态编码特性的任何解读，均存在着这样一个后果：将文本分离于文本的生产和文本接受的物质条件。尽管这是一个正当的举措，可实践者应该注意到这一举措给他们带来的诸种限制。因而，格拉斯哥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能力解释媒介是以何种方式能得到根本性

的革新，而且是以何种方式漠视解读电视的日常创造性劳动。现在让我们来展示其中的一些特征。

电视媒介的体制定位，永远不能完全占据知识的突出位置。根据这一理解，电视遭受偏见的事实是因为出身中产阶级的媒介工作人员把持电视。在他们论述媒介革新的文章里，尽管有一些相反的事实，记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设想与电视遭受偏见的特性有密切的联系。一种更具代表性的电视形式，可以通过包容于各媒介产业中更加广泛的各层次的受众来得到发展。广播的一些主要问题是缺少准确性和多元性（格拉斯哥媒介组，1982：153）。在此严重的疏忽是在分析中缺少严密性。对专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与体制语境之间的“适合性”考察，看来被忽视了。菲利普·施莱辛格（1978）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职业文化的经典性考察，在这一方面饶有趣味。在此，在电视新闻的制作中起决定因素的，是英国广播公司在现实中的体制定位，而不是记者的阶级背景。根据施莱辛格的观点，公用事业广播的体系，仰仗于为了保持与国家的距离而实施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诸种标准。根据目前的组织程序，简单地包容更广泛的来自不同背景的记者，对改变新闻的意识形态内容可能没有多大作用。的确，为了增强对存在于公众空间的多种观点的欣赏兴趣，将编辑作风变得更具对峙性，那就有可能引起来自国家的极为强烈和不利的反应。所以，国家新闻媒介往往偏心于议会制民主现存的各種标准，而不是偏心于现状。一种更为多元的媒介，  
33 应该力争雇用来自社会各个不同层次的记者，即安·菲利普斯（1991：63）所称的镜子原则（mirror principle），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社会的社会构建。可是，对实际的电视内容作重新配制，

那就需要更加强有力地探究电视媒介的组织。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格拉斯哥媒介组对男女新闻记者的专业文化方面缺少综合。粗略而言，对格拉斯哥媒介组来说，困于新闻工作实践的中产阶级世界观，保证了权力不对称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再生产。这种论点悄悄地将一些本该彼此分离的不同分析层面捏揉在一起。首先，这种论点在相当程度上过分强调了大多数新闻记者社会背景的重要性。存在于体制本身的力量诸关系及其与金钱和权力的导向机制在体制上的决定性关系，均具有更大的解释上的重要性。其次，他们设想，中产阶级的观点能活跃媒介文化，这失却了对专业实践具体性问题的探讨。现在我们暂且回过头来看看斯莱辛格（1978：166）的观点：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最佳描述就是“民主多元论”。公用事业广播的文化认为，社会中不存在居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这使英国广播公司能为那些希望继续进行对话的人提供一种公允的平衡。这种特有的态度，意味着那些谈论冲突和权力的人将被表征为“他者”。另外，施莱辛格所称的“停下来去观察文化”（stop watch culture），是审视形成新闻价值概念的一些假定。新闻记者在工作场所的实践，是注重报道的直接性、快速性和准确性。在形成新闻的社会构建过程中起作用的，不是一些意识形态观点的连贯性，而是新闻编辑部受事件驱使的特性。格拉斯哥媒介组的分析维护了新闻工作生活世界的某些距离，这是对这种分析的过分简单化。最后，格拉斯哥媒介组不仅将阶级的设想与工作场所的文化凑合在一起，而且过分强调了社会各阶级内在地虚构关于世界的各种稳定观点的情况。文化理论最近的一个辩论点，是社会阶级与某些文化信念之间的联系（伊格尔顿，1990；霍

认识媒介文化

尔,1988a;拉克洛和穆菲,1985)。尽管对这些问题人们仍然众说纷纭,可人们已普遍接受普兰扎斯早些时候对阶级和文化这两者之间关系所作的评论。对普兰扎斯来说,某些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不表现为“它们似乎是各社会阶级后背上所佩带的政治号码牌”(普兰扎斯,1975:202)。根据这一观点,意识形态方面的诸种策略只是在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构建的,而且并不一定具有阶级属性。尽管有一些理论问题在此被回避,可格拉斯哥媒介组没有悉心研究各社会阶级能够提供的意识形态封闭性的有限程度。格拉斯哥媒介组解释了由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权力而产生的存在于现状的意识形态优势,这忽视了明显表现于各精英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裂和冲突。譬如说,1980年代期间,撒切尔主义在中产阶级中的思想优势,并没有遏止住主张已经背时的“一个民族”观点的英国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拉克洛,1977),想要去争辩各意识形态的构造与社会阶级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假若格拉斯哥媒介组早已对这种关系的历史延续性寄予关注,那么他们的分析便会更敏锐一些。

格拉斯哥媒介组所铸造的各媒介体制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生产之间的和谐联盟,并不能解释电视的“各种矛盾规则”(凯尔纳,1981:36)。公用事业电视常常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那就是使国家的话语合法化和给信息的自由畅通提供体制上的语境。同样,就像凯尔纳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私有电视处于为利润而操心和为公众提供论坛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电视的各种具有冲突的决定性关系与电视内容有关。格拉斯哥媒介组忘记提及平衡和公正性诸概念可能会违背统治集团利益的

方式。反对党领袖、工联主义者、站在纠察线上的男男女女和工厂的工人代表均接受了采访，正是这一事实可能使受众构建起另外一种观点。再者，电视将注意力投放到社会冲突的各个方面，这会使某些反对观点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否则，这些观点就没有机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公众认识。如同其他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那些被认为会威胁议会民主的主题，如恐怖主义、罢工及和平运动等，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戏剧和记录影片中（埃利奥特等，1983；威廉斯，1989a）。诚然，这并不是说，电视促进了具有根本形式的改革。在另一方面，电视提供的象征资料，并不是在意识形态上构建得完美无缺，不会给批判性评价提供空间（霍尔，1980）。

格拉斯哥媒介组的主要弱点，在于对体制缺乏分析、对诸如客观性等问题的困惑和对自己没有致力于对受众的阐释诸过程作出分析而进行的经常性批评。我的观点有违媒介研究中目前的一些思想，认为，分析的诸种体制形式和媒介偏见的诸种观念对大众传播任何真正的批判理论均依然至关重要。格拉斯哥媒介组即便没有成功，可他们试图将电视的意识形态批评与更多的途径联系起来，这便有足够的理由需要我们给予重视。

## 斯图尔特·霍尔、大众传播和霸权

35

斯图尔特·霍尔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作为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位创始成员及其有关撒切尔主义的著述（哈里斯，1992；特纳，1991）。像威廉斯一样，尽管属于年轻的一代，可霍尔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英国左派重新崛起的一名突出

人物。他的理论著述是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同一性等主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对后结构主义领域里的一些执牛耳的思想家作了练达的再分析，他主要的思想试金石依然是格拉姆希。在大众传播领域，霍尔的特有贡献，就是将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诸形式与受众的解码策略联系起来。他自始至终贯彻这一联系，与此同时，他关注媒介符号和讯息（message）的变化不定的政治语境。对霍尔来说，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本始终是决定的主要层面。话虽然这样说，可他最新的著述昭示了他对具有通俗代码的话语开放特性的日益感悟。与格拉斯哥媒介组相比，霍尔表现出更加精细老练的分析层次，尽管他们的共同聚焦点是意识形态这一主题。然而，虽然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关于大众传播批判理论的嬗变，可霍尔的贡献并不是无懈可击。他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这一主题，这意味着其他的诸种决定性层面，诸如所有制和大众媒介的控制等，均无法进入分析视野。威廉斯在诸种传播结构和民主理论之间创造了一种卓有成效的辩证法，可霍尔在这一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 控制危机：报刊、道德恐慌和新右派的崛起

《控制危机》（霍尔等，1978）一书，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早期创始人所写的至今仍然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文本。这一著作包罗了复杂的解释学，雄心勃勃地致力于联系由报刊引导的由行凶抢劫、战后合意政治（consensus politics）的崩溃和独裁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引发的道德恐慌。通过经验性的研究，霍尔与他

的同事们发现,对发生于1970年代前期的暴力犯罪而带来的人们能够感知到的威胁,报刊作出了超乎寻常的反应。行凶抢劫这一标签舶自美国用语,被盛行的控制文化当作削弱社会民主的合意政治的一条途径而加以使用。在“行凶抢劫者”引发的恐慌出现于报刊之前,早就有强化反对异常黑人的治安动员。这一策略的结果,就是在法庭上出现黑人罪犯,而这反过来又为报刊注意力的不断上升提供了背景。在这一点上,霍尔与他以伯明翰为基地的同事们对主要解释人(primary definers)和次要解释人(secondary definers)作了极为重要的区分。主要解释人是在组织上占主导地位的集团,他们能够给媒介提供暗示,以便跟踪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媒介作为事件的次要解释人而行事,对从主要解释人那里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和阐释。有关治安的各种解释会导致道德恐慌,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赋予了特大的分量,因为它们能够造成高度的文化封闭。这在别种情况下事情就不可能是如此,譬如说,关于产业关系的媒介报道。在这种报道里,主要解释人会包括工会和雇主。霍尔指出,由于“是罪犯,他们失去了参与议定罪行的权利”(霍尔等,1978:69)。他的话消解了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所认定的中产阶级新闻业文化的重要性。这一论点可补充我早些时候所提出的观点,即关于分析的各种复杂历史变化的层次,应该受到新闻业社会学的尊重。因为谙熟这一论点,并根据霍尔的思想,施莱辛格(1990)提出,大众媒介研究需要对新闻业诸过程提出一个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解释。那就是说,尽管《控制危机》一书有过之无不及地将分析转向外在的解释人,可对新闻采集这样一种复杂的考察,应该着意于抓住新闻记者与新闻源之间协商的各种策略,同时还要

抓住更加经常性地得到陈述的内在体制上的诸种观点。

隐藏于《控制危机》一书背后的主要论题，为霍尔随后对1980年代撒切尔主义的论述提供了政治语境。产生于报刊的普遍道德恐慌，是以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危机为背景的。由于在年轻人中富裕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安闲自得的普及，战后时期经历了传统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沦丧。年轻人对一个在过去被认为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崩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霍尔已经作了探索（霍尔和杰斐逊，1976）。对生活更为传统和更为规范的诸种方式的取代，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忧虑，因此，消费热效应引起的文化上的不稳定，导致了对黑人和亚洲人的移位反应。这种文化决裂，随同英国较长时期的经济衰落，加剧了霸权危机和对独裁主义解决方法的探寻。政治右派对各种传统束缚的放松和对道德和思想霸权的各种新形式的需要，均作了最为精辟的阐发。1980年代期间这一策略在政治上得到了贯彻。根据这种策略，英国民众的同一性问题将在霸权方面给予重新界定。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现在才转向霍尔对媒介、意识形态和撒切尔主义的更具实质性的贡献。

## 意识形态：受约束的回归？

霍尔(1982)认定1940年代和1950年代美国的媒介分析属于“效应”派。这一研究的意旨，是想证实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类行为可以测量的影响；其结论是，媒介相对来说常常是没有什么害处的，能强化多元论社会所信奉的各种准则和价值观。然而，媒介研究中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已再次引入了权力观念，并



对现实的构建作了更有批判性的探讨。将目光转向意识形态，其最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来源是结构主义。在此尤其重要的是路易斯·阿尔都塞的著作。虽然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遇到了强烈的抵抗，他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对英国文化研究主导方式的影响起到了深刻的作用(汤普森,1978)。具有阿尔都塞影响的痕迹，遍及文化和政治研究的广泛领域，包括文学、电影、心理分析和政治理论(埃利奥特,1987)。他所关心的批判问题，是调查资本主义社会用来对诸种主要体制关系的再生产的途径。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钥匙。在一篇论述这一主题的著名文章里，阿尔都塞(1984)对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ISAs)和强制性国家机器(RSAs)作了区别。这两种机器均是具有意识形态作用的社会实践。两者的区别在于强制性国家机器(军事、警察等)主要依凭武力来发挥作用，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媒介、教育等)保证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根据阿尔都塞的系统阐述，意识形态的生产或许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尽管意识形态与体制分析结合在一起，可它不能被认为是现实的倒置或反映。恰恰相反，根据阿尔都塞让人难以忘怀的话，意识形态“再现了个体与他们存在的现实诸条件的想像性关系”(1984:36)。第二，意识形态不仅组成了我们与现实的象征关系，而且还将人类转换成主体。意识形态让个体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自我决定的代理者(agent)，而实际上主体是凭借语言和心灵的诸过程而形成的。主体将自己错认为独特的个体，而不是通过社会构建的同一性。阿尔都塞对通过意识形态的话语而形成自我的强调，对霍尔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p>⑦</sup>对霍尔而言，结构主义为大众传播开拓了两个主要研究领域：

(1)对排斥其他不同解释的主要话语的分析;(2)对各媒介体制本身怎样起到仅仅提供意义有限范围的作用的分析。现在让我们依次来讨论每一个层面的分析。

38 1. 霍尔(1977)提出,大众媒介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意识形态的体制。这是可以被断言的,因为传播体系提供了主要的象征王国,通过这一王国产生占主导地位的一致性。根据霍尔的观点,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凝聚社会的霸权代码的生产而发挥作用。再者,表征现实的诸种代码,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的有限领域中收集而来的,而这些话语又是汲取于社会诸种解释的有限范围。预想性的代码通过自然的表现来获致意识形态方面的效应。根据阿尔都塞的看法,因为语言不会反映现实,人们可以谈论意识形态的现实效应。未经媒介引介的现实的经验,就是通过语言得到象征性的构建。正是由于主体对自己同一性源泉的自我欺骗,媒介才看起来能反映现实,而实际上是构建现实。我也许会认为,今晚关于约翰·梅杰在唐宁街10号外面挥手的新闻图像只是在传播现实。我不会马上认识到,这也许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宣传性噱头,其设计的用意在于提高国家的合法性。尽管民族已陷入危机,可在唐宁街10号外面挥手的约翰·梅杰,可能是徒劳地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他像往常一样在履行公务。霍尔将这种现象称为“自然主义的假象”(霍尔,1982:76)。

霍尔(1988b)日后的著述日益注意实用主义对阿尔都塞的指责。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阿尔都塞原先的论题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传播错认各种真正支配关系的意识形态诸形式。阿尔都塞认为,这样,意识形态将诸个体捆绑于社会组织。

因而，意识形态的神秘效应保证了阶级社会的再生产。对霍尔来说，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在具体的诸种实践和仪式中得到物质化，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自己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就是考察由通俗报刊、电视采访和右翼智囊机构采用的各种各样话语策略。然而，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的政治著述，在发展陈述于《控制危机》的一些论点的同时，还力求设法解决阿尔都塞所遇到的一些理论难题。

新右派在劳资之间的战后妥协出现破裂的情况下崛起（霍尔，1983）。这与其说是对经济危机的一种机械反应，倒不如说这是像格拉姆希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建制危机”——各新兴的社会力量和集团的崛起，导致意识形态话语的重构。强化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控制，往往伴随着试图用来博取大众赞同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举措。霍尔（1988b）将这种策略描述为“独裁式的民粹主义”。根据霍尔的看法，因为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理论，理论家应该竭力识别一个特定的民族危机是怎样在象征性意义上得到解救的。撒切尔主义的成功，是因为它能够将各有身分阶级的恐惧和忧虑与右派的一致意见挂起钩来。这使右派能为因犯罪率、少年犯罪和道德随意性的增加而担心的“公众普通成员”说话，而社会民主左派看起来是为社会现状辩护。

统治阶级在组织上具备优势保证了某些观点的优势，这一论点为霍尔所否定。撒切尔主义的卓越之处在于其这样一种能力：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是凭借“常识”上的战役而得到构建的。结构主义的一个主要教训就在于此。意义并不仰仗于事物存在的方式，而是有赖于事物得到表达的途径，所以，类似的事

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因此，一个事件的意义成为一场为掌握话语而进行的符号斗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主体间所信奉的重要符号包括“民主”、“自由”和“个人价值”。这些符号可以通过不同的政治话语来阐发，因为这些符号不一定具有“归属性”，它们既不归属于右派也不归属于左派。譬如说，由于“民主”没有跨越历史的意义，其意蕴源自它在话语构建里的地位(霍尔,1986)。因此，大众媒介可被最佳地描述为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中的引力场(force field)。各种政治运动的任务，就是要关注类似于民主这样的关键词在时下从霸权角度给予界定的各种方式，并且要赋予这些关键词以新的意义，达到改变一致性的依据的目的。然而，霍尔认为，假如“民主”明显地与相对持久的历史意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某些稳定性就可归因于民主。从拉克洛和穆菲(1985；拉克洛,1977)更为激进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拉克洛和穆菲认为，实际上“社会并不是这样的”。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社会不存在构成各种差异的基础性原因，如经济基础等。他们认为，恰恰相反，霸权具有缀合的作用，因为主导性话语着意于给现代同一性提供它们所根本欠缺的连贯性。<sup>⑧</sup>这里的问题是，拉克洛和穆菲强调了意义的极端不稳定性，可这无法解释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更为持久的诸种形式。霍尔提出了与这一论题相反的观点，譬如说，尽管民主和议会之间不一定具有一致性，可在历史上这两者之间的某些联系已经形成。按霍尔的话来说，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通过相对稳定的文化习俗得到联系。

霍尔考察撒切尔主义的着重点，在于检视各种话语是怎样联结在一起形成一张有连贯性的意义网。撒切尔主义能将一些

意识形态上的线索与具有连贯性的通俗话语联结在一起。传统的左派认为,这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这种观点的意思就是,他们对政治的反应不可能像他们所可能做到的那样有效。

我在前文已表明,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这种分析在三个方面表现了与阿尔都塞的决裂。第一,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的作用归因于某些国家机器,而霍尔却揭示了撒切尔主义占领市民社会的能力。在整个1980年代,私人拥有和控制的通俗小报新闻,基本上受到由新右派所制定的议事日程的左右。这样,撒切尔主义能够占领国家范围之外的意识形态领域。除此之外,与关于阿尔都塞的其他批评家一样(G. 埃利奥特,1987; A. 埃利奥特,1992),霍尔提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接受作出了十分明显的一体化解释。霍尔强调意识形态诸策略的偶然和易变的特性,这比阿尔都塞本人的强调更能解释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最后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撒切尔主义将各种新的主体态度连贯起来的能力,没有得到阿尔都塞理论框架的足够重视。阿尔都塞基本上接受了拉康的看法(弗雷泽,1992)。在他看来,主体进入语言需要服从于象征性顺序。尽管拉康和阿尔都塞之间存在着差异,可他们的通病是,他们无助于我们对受到质问的主体已怎样通过各种话语策略有能力重新调整自己的态度的理解。假若像拉康所认为的那样,根据解释,文化的法则就是父亲法则(the law of the father),那么要了解妇女挑战家长制是困难的(霍尔,1980:162)。用更具阿尔都塞特点的话来说,现代主体性从来就不单单是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效应——这与其说是拉康的观点,倒不如说是阿尔都塞的看法——但是,就像霍尔已使我们意识到的那样,现代主体性是压制和多种社会话语的

各种破裂性效应的结果。从表面上看,阿尔都塞着意于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和社会同一性的再生产之间找到一个极为紧密的理论结合点。在霍尔(1991)最新的著述里,他对同一性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在有赖于分裂与认同的意识形态和心理诸过程的同时,同一性始终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这牵涉到这样一种认识,即现代的自我是由多种同一性,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同一性构成。撒切尔主义诉诸多种多样的主体,巧妙地将自己阐述为一种政治策略。这样,根据霍尔的分析,撒切尔主义就能够将各种不同的和在文化上具有复杂性的同一性浓缩为一种强大的霸权结构。实质上,撒切尔主义在1980年代之所以能成为主导性政治,其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文化构建能为各种各样的群体同一性提供一个聚焦点。

2. 霍尔对通过媒介传播的信息倾注了注意力,与此相比,他在大众传播的体制方面相对来说就没有多少发言权。在对撒切尔主义的复杂思考里,他对国家和资本的建构性影响仅作了极为有限的讨论。其实,霍尔常常远离主旨,提出比这种关系远具意蕴的,是新闻记者据此发挥作用的各種阐释的有限理论框架(霍尔,1972a:10)。然而,如同我们在联系《控制危机》时所看到的那样,霍尔想要借助对新闻源的结构性强调来修改这种内在主义的解释。显然,新闻业的文化语境与媒介讯息的符号内容之间的交叉关系,对霍尔来说依然是决定因素(1972a,1975;霍尔等,1978)。尽管霍尔关于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更具复杂性,可他与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的批判诸问题有共同之处,这就是未能将文化生产追溯至分析的各体制性层面。抛开这一点不论,霍尔的专业知识水平在于对媒介讯息的阐释,这最终会使他
- 41

提出为威廉斯和格拉斯哥媒介组所忽视的关于受众反应的诸种问题。

## 对媒介话语的编码和解码

在对媒介讯息所发挥的主导作用重新概念化时，霍尔借鉴了索绪尔（1974）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著述。根据这一观点，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而符号是由能指（书面上的文字或空气中的语音）和所指（能指所表示的思想）组成。因而，当人们说“报纸”这一词时，就会产生某种声音（能指），实际上是表达了由纸做成的、载有图片和黑色印刷符号的日常所购得的东西，即所指。在索绪尔看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报纸”这一词与它所指的事物之间，除了约定俗成之外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观点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意义是一个不稳定的特性，它有赖于其在各种话语构建里的表达。

罗兰·巴特（1973）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的真知灼见提出，通过媒介传播的意义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巴特称其为外延意义——是指意义十分明确的层次。就拿格拉斯哥媒介组对发生于1970年代的工人罢工的媒介表征的分析为例，这会涉及对以下各种情况的描述：谁接受了媒介的采访，都说了些什么，以及是谁说的。通过媒介传播的信息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内涵意义。巴特将其称作内涵意义，其意思是指有赖于某些文化联想的各种隐含和更为广泛的意义。同样以工人罢工为例，格拉斯哥媒介组在联系劳方时特别强调了“威胁”和“需求”等词语的意义。他们的论点是，这些词语在共同的文化环境里，在意识形态

方面将工人定位为非理性的和具有破坏性的（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1976b）。因此，符号的所指取决于不同的文化代码，内涵意义将各种意义附加给具有外延意义的主体。霍尔（1972b）发展了这一论点，提出话语具有构建讯息意义的各种主导意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仰仗于对文本的意义不能有多种多样的解读。在集中探讨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质时，霍尔是优先考虑主体性构建里的讯息。

42 后来，霍尔（1973，1980）逐渐放弃了这一观点，容许了对媒介讯息的各种抵抗性解读，并更加强调意义的多义性。针对媒介讯息的生产，霍尔对编码者和解码者做了基本的区别。他认同了有利于对意义构建进行编码和解码的知识框架、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之间的根本性决裂。对媒介文本的编码有赖于某些专业的规范和程序、体制关系和技术设备（电视摄像、录像带、传声筒、录音机等）。一旦讯息以符号的形式被编码，它就向受众使用的各种阅读策略开放。受众的接受仰仗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倾向、与更为宽阔的权力体系的联系和对批量生产的技术（收音机、电视、录像机、激光唱片机等）的接触。一个已经过符号编码的文本可通过三种主要方式来阐释。一种是以霸权为主导的阐释方式，是以讯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阐释文本的。如果今天晚上的电视新闻提出，所有的大学教师应该准备降低工资，而且如果我接受这一观点，那么这就可以说是一种霸权式的阐释。在此，在编码与解码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富有意义的一致性，可这在霍尔其他两种类型的阐释里未得到全面的阐述。其次，根据霍尔的看法，一个媒介文本的意义也可以是一种协商性意义的代码的结果。在此，由阐释者和经过编码的



讯息之间的界面所产生的意义是一种微妙的竞争。接受主导代码所暗示的总体框架，受众对讯息的理解就会具有矛盾性。在此，我大致上会同意，有些老资格的大学职员应该准备接受工资的降低，但认为这不应该适用于那些临时的或兼职的职员。对同一种新闻节目的对抗性解读可能会作出这样的阐释：这样一个由国家驱使的策略，正是对高等教育诸项原则的非难。对抗性的解读会与文本的愿望格格不入，不太会接受文本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提出阐释的这三种方式，目的在于以此作为根据各种主导性话语策略来对各种文本进行定位的方法，同时将这些方式与已经被编码的受众联系起来。

## 话语的过分膨胀和其他相关的评论

我们已经看到，对斯图尔特·霍尔而言，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凭借各种话语的表述构成。这些策略必须在概念上与权力的更广阔的诸种形态和具有霸权性质的诸种联想联系起来，而这些形态和联想清楚地表达了各种新的和矛盾的主体态度。可是，霍尔对大众传播理论的贡献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仅沉潜于 43 对话语的探讨。霍尔在言过其实地表达意识形态诸策略的凝聚力的同时，忽视了对大众传播独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的探究。在这一部分，我将对霍尔对由国家和经济提供的更为广泛并具有构建作用的诸种关系的漠视进行分析；对他著述中缺乏民主媒介生产理论的情况进行评估；他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的贡献作一讨论；并且对他关于媒介话语接受的论点进行论辩。

1. 霍尔提出，对现代媒介文化的考察，应该集中探讨讯息

的话语结构与受众阐释性理解之间的适合性。尽管霍尔正确地强调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可我认为决定性的层面在于别处。虽然霍尔清楚地表达了大众传播三个层面的模式，但是他没有认真地评价经济和国家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式。霍尔在后期的著述里往往忽视各种“真正”的社会关系给媒介讯息的结构和接受语境提供根据的方式。霍尔对诸种体制实践的著述，常常突出“主要解释人”或媒介产业的职业文化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戈尔丁和默多克（1979）的看法，霍尔将大众媒介看作是一个自主的意识形态机器。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霍尔基本上无视各种不同的媒介部门在经济上的日益相互渗透和各媒介集团的国际化，这一点就会表现得尤其明显。戈尔丁和默多克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对报纸产业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英国受到右翼报刊的控制，其原因就是为了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缺少要是换成别的出版物就会有能力获得的广告收入（戈尔丁和默多克，1979）。换言之，尽管霍尔作了种种说明，可他还是过分强调了现实与象征物之间的根本性分离。正是因为霍尔强调符号的任意性，他无法解释给各种社会话语提供根据的更有持久性的诸种体制关系。假若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霍尔是继承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许多思想的失败之处，因为他没有提出一套合适的符号所指理论。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理论不应该退隐于代码，而是应该竭力“理解在社会诸实践的语境下意义的关系特性”（吉登斯，1987b:86）。根据前文提供的例证，各种真正的跨国经济关系与报刊内容的话语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联系。也有有力的证据表明，所有制的诸种形式与组织之间、报刊内容与右翼各政

治派别的控制之间存在着联系(戈尔丁,1993)。所有制的诸种结构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决定媒介内容。霍尔所提出的看法就是对这一观点的一种激进的批评。可是,尽管霍尔的见解具有无可怀疑的深刻性,可他对话语的重视,割裂了各种物质结构与各种象征形式之间的决定性关系。

现举一个与目前有关的例子。英国保守党报刊最近摒弃了其保守党传统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随着撒切尔主义的衰落,报刊的霸权内容发生了变更,霍尔对符号的诸种研究,为观察这种变更的方式无疑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理论框架。但是,霍尔极为精明,他远离于在考察各种体制形态和报刊内容两者之间的持久性关系时自己所忽视的经济决定论。由白人男人占优势的全国性报刊,保留了某些若离开对体制诸种特征的重视就难以解释的观点,这种情况现在依然如此。譬如说,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民意发生了变化,可鲁珀特·默多克主办的各种报纸除非带着极端矛盾的心理,似乎不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全国性政党。即令这些报纸接受了其他的全国性政党,这种关系或许是以这些报纸不妨碍默多克的多种媒介商业帝国的运作为前提的。

2. 霍尔观点的第二个缺陷也是相关的缺陷是,他沉湎于对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对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雷蒙德·威廉斯的著述,这种批评需要探讨的第一层次,是经济和国家对大众媒介的构建作用。像霍尔所提出的那样,如果公用广播事业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国家机器,那么对它的保留和改革就不可能提出很好的理由。在此,霍尔以巴特和阿尔都塞的观点为依据提出,调和性和客观性的诸

项原则是与资产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尽管这些原则可能具有意识形态的效应,可它们需要内在的各种批评形式,而不是简单的排斥。对大众传播媒介重新进行系统的阐述,有赖于全球诸种结构关系的改革和对各项民主原则的深刻包涵。其实,就像在前文讨论威廉斯时所竭力强调的,由于公众传播受到目前广播的各种商业形式的腐蚀,对公众传播各系统的保护具有长期的政治优先权。霍尔明显的意识形态/符号参照系几乎无助于对文化的各种权利、需要和义务等问题的讨论,而公有和民办各系统的作用的发挥,却又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如果公众的某些规范界说必须得到保留,以抵抗市场的满足广告商的需要,那么与传播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相关的诸问题就会呈现出更多的相关性。

3. 霍尔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的讨论已提醒我们去注意语言意义和话语构建的重要性。撒切尔主义有能力在象征意义上对1980年代围绕正在崛起的霸权联盟的英国政治常识进行重构。这种独特的阐释尽管在1980年代流行,却也招来了批评,<sup>④</sup>其中最著名的批评对象是所谓的“两种国民”论点(杰索普等, 45 1984)。杰索普及其同事所陈述的论点是,霍尔在很大程度上过分强调了撒切尔主义阐述新的同一性的能力。尽管霍尔提出了一些见解,可撒切尔主义在其日程安排上没有设法去建立一种想像的一致性。在劳动力市场,政治的对立和各种经济变化的分野,比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感召力更有意蕴。根据这一观点,撒切尔主义逐步放弃了这样一种企图:将穷人整合进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各种普遍性形式,尽管这在实际上是通过减税和服务机构的私有化来赢得专职工作者的支持。能最佳地解释

1980年代期间新右派统治局面的，是经济和政治，并不是意识形态。简言之，霍尔对撒切尔主义诸种话语型式的关注，使他漠视了分析的其他层面。尽管对新右派著述的内在标记进行了巧妙的解读，可他对霸权的陈述过分注重文化方面，而没有考虑到撒切尔主义本来能吸引各种不同结构立场的各种不同解读。再说，霍尔可能因将各种话语型式抬高到佩里·安德森所称的“能指的狂妄自大”（*megalomania of the signifier*）而受到指责（安德森，1983:45）。但是，与此更有关系的是——而且我认为这是主要的一点——霍尔过分强调了撒切尔主义在霸权方面的“有效性”。霍尔将撒切尔主义割裂于其接受的各种语境以及经济方面的各个分析层面，这表明了符号学某些内在的局限性。

4. 斯图尔特·霍尔的著述的建设性一面，在于作为有系统组织的话语各层面的代码与意义的多种特点之间的张力。霍尔非常理解的是，意识形态诸策略唯有使意义固定不变才能被认为具有有效性。认为所有的意义如同彼此之间一样均是开放性的，这会割裂与决定和权力诸问题之间的联系。虽然霍尔将撒切尔主义视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但是他提出了有力的论点，反对从“各种个人的、独特的、不同的解读”角度来观察意义的做法（霍尔，1980:135）。对霍尔来说，业已编码的文本在某些范围和参数里可以说是偏爱某些解读的。这依然是一个真知灼见。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坎伯巴奇（1986）的研究，研究人员要不是理解意义是怎样投射到电视新闻上，他们就有可能抓住受众将意义构建为一种协商形式的方式。按霍尔的话来说，这样一种研究会着力于揭示煤矿工人罢工的诸种主导性话语型式，并考察这些讯息是怎样被特定的观众所解码。如同霍尔所主张的那

认识媒介文化

样，一种大众传播理论应该关注受众与诸种文化形式之间的阐释性关系，而不要将这两极混为一谈。

然而，这些观点依然存在着一些难题。最重要的是霍尔在理论上将各种主导意义与我认为是意识形态批判概念搅和在一起。<sup>46</sup>假如人们认为意识形态是指象征性手段，各种主导关系凭借这种象征性手段或是得到再肯定，或是被置之不问，那么受众完全有可能拒斥无线电广播节目所提供的各种主导意义，并再次肯定某些权力关系。这是一件很容易表征的事情。我可能会收听一个女性主义的戏剧节目，在这一节目里，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宣布她爱属于她丈夫的另一个女人。假如我因听到这一番话而感到恼怒，因此改选别的广播台，那么人们就有可能认为，我的行为再次肯定了某些异性恋实践的主导性。在时下性活动的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行为很难被描述为具有抵抗性质。遗憾的是，尽管霍尔试图将文化实践的各个不同层面联系起来，可他让这类问题悬而不决。

## 小 结

在检视雷蒙德·威廉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和斯图尔特·霍尔的各种观点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是根据两个主要考察点来提出论点的。第一，我主张大众传播研究应该清楚地阐述诸种文化产业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这种方法会关注经济与国家诸种形态之间的各种全球性关系。如果这一方法被认为具有批判性，并且是以雷蒙德·威廉斯的著述为依据，那么对民主的诸种原则在全球范围内会怎样得到应用这一问题就需要作更多的研

究。第二,我还提出,霸权和意识形态的诸概念对信息时代的理解依然至关重要。尽管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和斯图尔特·霍尔的著述对意识形态的论争具有重要的贡献,可这些著述应该同与政治经济学和受众的各种阐释视野相关的诸种问题重新联系起来。与威廉斯的著述一样,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和霍尔的观点均有某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倾向。在对多种形式的媒介文化进行概念化时,这些方法所反映出的局限性将在下面几章里表现得更加明显。

## 第二章

47

# 哈贝马斯、大众文化 与公共领域

### 公 共 文 化



化是一种由主体间性产生、公众所信奉的现象。它有益于提供同一性的源泉、社会交往的途径和共同体的意识。在 20 世纪的进程中,社会民主国家的诸种公众文化继续不断地被商业化和市场化。目前正在兴起一种建立于更加大众化快乐基础之上的更为离散的全球文化,以取代各民族国家的各种陈旧的一体化文化。这种跨国文化正在构建各种新的同一性,削弱了关于民族协同性的各种较为陈旧的看法。对公共领域持批判观念,这有助于我们以矛盾的心理来看待这一过程。各种新技术和文化形式的发展,似乎仰仗于消费的诸种个体化形式,而不是公开辩论和讨论的诸项原则。为对抗这些倾向,以各种社会主义、公有社会和共和政体的传统为立足点的某些学者,力求拓展各种新的方式,通过这些新的方式,市民社会也许会重新发现协同性和批判理性的道德观。虽然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统治如何构建文化交



往的分析,已被证明非常有力,但自由主义指明了通过建立集体公有权来限制国家权力的需要。哈贝马斯在此认为,摆脱金钱和权力统治的市民社会,需要传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以满足公民们的各种交往需求。这需要一项超越马克思主义逻辑和自由主义逻辑的解放工程。于尔根·哈贝马斯极为清楚地联系了这些观点——概述了目前面对诸种媒介文化的一批最为重要的争论点。

于尔根·哈贝马斯最近的贡献,对关于社会理论方面的各种现代论辩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他的著述涉及各种不同的学术领域,包括社会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学,对现代性作了实质性和复杂的陈述。尽管在当代的各种论辩中,哈贝马斯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可他对大众传播的论述,至今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现在有一批少量的文献正在稳步地发展。这批文献实际上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有关,可它们常常使这些有关部分脱离他后期的思想发展,并且使他的论述更显得以媒介为中心,而这并不是他的本意。这里所陈述的分析,将凸显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著述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采取这种特殊的方法,是为了考察哈贝马斯在更加当代的各种语境里维护诸种公众文化的优缺点。最近的许多媒介研究,均试图为现代的各种民主文化,汲取全球化、多样化、整合化和离散化的当代诸过程的内涵。本章的论点是,同样着意于考察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条件下公共领域的未来。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崛起的研究与本章的论点依然相关。这不是因为他的研究能提供一个可以实现或模仿的模式,而是因为他的研究的确提出了公众文化可发挥最佳作用的诸项原则。媒介文化的系统组织,可根

48

据这样的思路得到重新阐释：既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又要给那些想潜心于文化或政治对话的人强加各项合理的义务。的确，在这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迎来了像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媒介分析方法的新契机。

##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关于大众媒介的完整著作，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衰作了历史的叙述。这一著作尽管完稿于1962年，可到1989年才在英国面世。如同托马斯·麦卡锡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1989）一书的引言中所说的那样，鉴于人们对哈贝马斯其他著作的兴趣以及众所周知的他对人类传播重要性的重视，他的这一部著作的迟迟出版是难以解释的。从相当多的注意力已倾注于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产业的经营这一情况看，这本特殊的著作在较晚时间才翻译出版，这就尤其令人奇怪了。可以说为了恢复平衡，我将以说明哈贝马斯的几个主要论题作为本章的开始，以便为后面的讨论提供背景。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于封建制度。这种制度否定对人们普遍感兴趣的各种问题展开公开的大众讨论的原则。虽然在古希腊存在着一种公共领域，但在欧洲直到17和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共领域才显示出更为独特的形式。在这一时期，国家成为公共权威的领域，有使用暴力的合法权利。现代的国家可以明确地在司法上和体制上脱离市民社会。与国家不同，市民社会组成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私人”家庭的领

域。在公共权威领域与市民社会之间出现了公共领域的批判领域。公共领域的目的,是让民众有能力对公共领域本身和国家的诸项实践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公共领域最初发生于咖啡馆和沙龙,在那里,资产阶级、贵族和知识分子的男性成员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作品。至少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这些开放式的讨论总是以排斥性的实践为基础,可这些讨论保留了某种内在性。这些无休无止的对话的批判潜在性,是凭借三个主要理由得以维系的。第一,最终从文学批评转向政治批评的社会交流开拓了一种社会空间,在这种社会空间里,胜人一筹的论辩的权威可以得到坚持,以反对业已确立的现状。第二,在封建体制下遭受封锁的社会论辩诸领域,失去了原先由教会和法庭提供的“氛围”,而且通过不顾参与者状况的对话而愈益成为问题框架(problematised)。第三,哈贝马斯认为,主要在1680年和1730年之间发生于整个欧洲的沙龙和咖啡馆里的聚会,既有包容性又有排他性。尽管积极参与论辩的资格受到十分明显的限制,可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这种活动应成为民众的喉舌。哈贝马斯认为,尽管这样的“民众”的人数很少,可普遍性原则开始被人接受:那些符合理性、男性和有产阶级等这些资格标准的人,均可通过积极的参与,加入到公共领域。他声称,依凭公开性原则,确立了理性的大众使用优越于个体使用这样一个观念。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对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反思的主体间性的重要活动来追求真理,这能为改革力量的诸种不对称关系提供各种独特的可能性。因而,通过各种排斥活动,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资本主义阶级维持了其霸权地位,尽管在同时也提供了批评的各种文化依据。

认识媒介文化

50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悲剧在于，正是促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落和灭亡。由于传播通过各大商业财团而日益变得有序化，沙龙和咖啡馆里有组织的讨论必定会作出让步。只消看看报纸产业，这种嬗变轨迹就会昭然若揭。报纸行业起先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只是到后来才关注各种彼此分歧的观点和思想。哈贝马斯将这一时期描述为文学新闻工作的一种形式。新闻生产的各种商业目的在这一时期已隐退为背景，因为报刊被转变为哈贝马斯所称的“金钱贵族反复爱讲的各种话题”（哈贝马斯，1989：182）。但是，自自由时代末期以来——哈贝马斯将这一时代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引起了报刊的商业化。文学的各种表征形式，被受制于业主个人兴趣的专业新闻记者所取代。通过使用理性来寻求对政治统治的揭露，被这样一种方式所替代：凭借经济和政治操纵的各种机制来强加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各私人交流个体在公共领域参加讨论，若要继续不断地在体制上消除这种现象，就需强调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进一步分离。从这一观点出发，商业文化应由私人来消费，这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辩或讨论。与具有话语特性的资产阶级沙龙的印刷文化不一样，许多新媒介（电视、电影和无线电广播）不可能让人们谈及往事，也不可能让人参与。恰如人们在各种原子化的氛围里接受现代大众文化一样，各种新文化形式的技术发展，也以雷蒙德·威廉斯（1985）所称的“易变的个人条件”为基础而被社会所采纳。哈贝马斯补充说，随着文化的“个人消费”，文化产品的平庸化与追求市场高额利润的目标相符合。在哈贝马斯看

来,看待市场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市场看作是一个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的过程:既具有解放又具有支配的效应和内涵。譬如说,书市所提供的能阅读阳春白雪的文学的读者层面很小。然而,如果降低对读者层面的各种要求,那么这就意味着必须迁就大众的休闲文化,这种文化需要放松和易于理解。文化的这些大众形式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现代的各种文化形式将各主体整合成一种非政治化的文化。在公共领域里,与公正相关的诸种要求能得到讨论,可这种文化却漠视公共领域。

假若我们接受哈贝马斯的思想,那么以上概述的文化的诸种转换和过程已导致了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虽然宣传曾一度意味着通过对理性的使用来揭露统治关系,但公共领域现已被归入一个舞台受人操纵的政治戏院。当代诸种媒介文化被描述为具有以下各种特征:公民继续不断的个体化、公众关心和感兴趣的各種问题的平庸化和魅力化。各垄断集团对各传播问题的劫持,似乎将公民们转变为消费者、将政治家转变为免受理性提问的媒介巨星。

认为哈贝马斯与汤姆·奈恩(1988)两人关于英国国家的著述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性,这不是一种奇想。汤姆·奈恩是一位他所称的“温和的共和主义”的倡导者。他提出,英国统治阶级的主导文化既需要改革又需要延续。根据他的陈述,一个特定的南方最高统治集团已主要通过王室的文化支配地位而得到了凝聚。“着魔的酒杯”(enchanted glass)的象征优越性,已滋长<sup>51</sup>了在英国统治阶级中的一种落后的反工业主义。这一论点建基于1960年代人们所知的“奈恩-安德森论”。奈恩(1964)和P.安德森(1964,1992)认为,17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

的联盟，带来了一种缺乏独创性的意识形态气候。与欧洲的其他资产阶级相比，英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生产出致力于改革运动的经济主义，也没有创造出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再说，由于工业革命的早熟，而且缺少来自上层的思想，工人阶级形成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英国工人阶级来说，马克思主义到得太晚。奈恩提出，在更为现代的岁月里，要诊治这种为英国所独有的疾病的方法，就是共和的修复形式。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文化需要复兴，以便继续进行理性的启蒙文化所未竟的事业，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则只能借助独特的以民权为基础的北方工业文化。

奈恩和哈贝马斯两人，均以自己所承认的各自不同的方式提出，公共领域已受支配于一种肤浅的象征性文化，这种文化仰仗于展览和仪式，而不是公开的民主决策程序。他们一致认为，这种主导性文化提供了一种凝聚力，将民众看作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在意识形态上将他们束缚于各种具体的民族顺从形式。然而，虽然奈恩和安德森将资产阶级/贵族的文化遗产视为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性质，但哈贝马斯提出的观点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思想相比，显得更加辩证。哈贝马斯认为，问题是，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姗姗来迟，倒不如说是最后的霸权排斥了更为通达的传播文化。在20世纪末叶，民众不再高呼革命，因为他们彼此孤立，而且隔绝于绝大多数的媒介生产。

## 哈贝马斯、大众文化与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

哈贝马斯的著述表征了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认识论上的决裂。他的交流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置换了人们通常所指的意识哲学,这格外明显地体现于被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尔和马库塞所采用的主客观的诸种理性形式。关于交流理性的观念,从一种对抗过分自信的主体的传统哲学蜕变为一个客体世界。哈贝马斯的更具交互作用的理性形式表明,个性唯有通过主体间性的语言共同体才能显现。在哈贝马斯(1981a, 1983a)看来,我们是语言的使用者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表明,我们在交流方面有能力达到彼此的理解。哈贝马斯认为,在每一个言语行为里,我们能内在地提出相关于上文已经论及的三个有效性要求。他补充说,这三个有效性要求组成了西方社会里正常日常言语使用的背景一致性。这三个要求——言语使用者用来检验言语的有效性——可特征性地描述为命题的真实性要求、与适合性相关的标准要求 and 与诚实有关系的要求。尽管哈贝马斯思想的这种特殊方面已在别处得到了深刻的讨论(伊格尔顿,1991;汤普森,1984;怀特,1988),可这三个实用的普遍性概念,为一个“理想的言语情景”提供了基础。理想的言语情景的最佳表征,就是毫无阻碍的交流。只有具备参与交流的机会均等,并且只有在一句话能潜在地获致每一个人的自由认可而且是真实的情况下,这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唯有在激进民主的语境下——与目前的情况大为不同——才能使各

种社会条件允许民众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诸种需要和兴趣。

哈贝马斯在后期的著述中较少地谈及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而谈得更多的是经济和国家对文化领域的摧残。哈贝马斯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1983a)。可以说，金钱和权力的各种有系统的导向机制已成功地将生活世界殖民化；交流行为受到排斥，以支持工具行为(instrumental action)\*，这都是为了获取“成功”。哈贝马斯这样表达，其意思是，若支持不正当社会体系的诸种工具论的理性形式，就削弱了获致彼此理解的各种理性形式的可能性。哈贝马斯还提出，对生态运动与和平运动的防御性反应，均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得到解释。根据这一论点，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均已竭力抵抗导向性媒介的扩张，其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提出关于“有道德的生活”的各种非工具论问题。从媒介文化的角度来看，这就会意味着愈加强调各种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文化上的霸权性质，力求对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并限制更为明达的批评。根据这一解读，经济和具备体制的社会权力这双重压力，凭借一种文化空间度，千方百计地压制社会的批判性疑问。

生活世界的状况，不仅受到重新封建化和殖民化的歪曲，还受到了哈贝马斯所称的文化贫困的扭曲。以韦伯的思想为依据，哈贝马斯提出，自18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与知识、正义和欣赏力有关的三种不同要求的彼此分离。这些价值域的分裂和理性化，对具有解放性质的政治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同时造成了在日常生活的氛围里意义的丧失。哈贝马斯将这种现象归

---

\* 指实用主义的一种行为方式，主张“有用即真理”。——译注



咎于各种精英文化日益脱离于世俗实践的诸种语境。因而，一种更具解放性的政治形式，会包纳交流行为的基础训练与社会各界继续不断的对话相结合的结果(哈贝马斯,1981b)。

虽然哈贝马斯没有作出这种特殊的联系，但在他晚期的著述中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与英国报刊的发展联系起来。柯伦和西顿(1985)在其创新研究中提出，报刊的商业化有助于将报业发展为两种基本的形式。根据这一解读，严肃报刊试图面向一小批受众。这批受众不仅在他们所接收的信息质量方面富有，而且——对广告商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在购买力方面也具有殷实的财富。在另一方面，通俗报刊，所仰仗的并不是广告，而是大批的发行量，以增加收入。哈贝马斯关于殖民化和文化贫困的观点，可以潜在地解释已受到许多评论的通俗报刊的轰动性内容(斯帕克斯,1992a)。通俗报刊的商业化和商品化，已削弱了自己作为论辩的理性中心而行动的能力，而且还带来了一种文化离散的形式，以致于已遭到非政治化的大众被排斥于我们政治文化的重要论辩之外。如同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评述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基于普遍都能接触信息的普通公民集体。唯有借助各种普遍原则和交流行为的力量来论辩，文化的殖民化和文化贫困才可以以民主的方式来加以抵消。依凭交流行为的理论，哈贝马斯能为公共领域的重建提供哲学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不可能做到的。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1973;阿多诺,1991)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大体上是在1940年代期间发展于加利福尼亚，其意旨是揭示联合大企业的资本主义控制大众文化的方式。他们的论点是，工作和生产的理性化，反映于参与管理、控制和生产消费者

文化各种肤浅形式的工具主义理性的诸种形式。以欺骗性的意识形态为手段,这不能保证文化产业的效应,但通过调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民众意识,便可达到这一目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的作用,是助长对文化领域中的冲突、异质性和特殊性的镇压。这种“赞同性文化”的形式,在对交换的迷恋胜于对使用价值的看重(在这种观念里,一场音乐会的价值是通过入场券的费用而不是通过演出的质量来保证的)的同时,使受众产生了希望听到千古不变的演出的欲望。在阿多诺的思想里,现代文化是一种幼稚和退化的欲望,这种欲望就是要求对某些十分确立的文化定式的重复。在此,唯有现代的诸种艺术形式,才保留了各种乌托邦式的超然契机,也保留了关于个性和独立主义的给人以美感的诸种形式的各种重要观念。尽管哈贝马斯避开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极度的文化悲观主义,他同样将大众文化的生产表征为对资本主义各种需要的顺从。哈贝马斯和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商业文化在大多情况下缺乏内在的批判潜能,而且是仰仗于被动的受众。虽然哈贝马斯的确使用了既比阿多诺又比霍克海默尔更加精细的方式,表征了诸种现代文化的形式,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与他学术前辈的思想有着昭然的相似之处。再者,虽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诉诸高品位的现代主义艺术来寻求对主导理性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批评,但哈贝马斯同样在资产阶级沙龙社会里发现了一种具有解放性的和乌托邦式的逻辑。

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成员的存在,他就是沃尔特·本雅明。马克思关心新技术(死的劳动)(dead labour)对各种劳动过程(活的劳动)

(living labour) 的影响,但本雅明(1973)潜心于机械再生产对各种艺术品及其接受状况的影响。自从谷登堡\*的印刷术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以来,不仅导致了印刷品的批量再生产,也导致了摄影和电影的再生产,可以说艺术品的原作已失去了其韵味。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发生了接受诸过程中“文化距离”的改变。根据本雅明的看法,艺术神话地位的降低,其为更多的人所能接触到,使其有希望变得更加“普通”,而且由此会带来更多的参与。在新的媒介方面,生产的各种先进技术的应用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原作的权威性。譬如说,在摄影方面,如果所有的复制品均具有同样的效果,那么再去谈论其原始照片已没有多少意义。这种更为直接的经验形式,使得普通民众成了各种通俗文化形式方面的专家。

阿多诺对本雅明的文章作出了反应,他为先锋派辩解,而且对这种文化产业作了进一步的批评(詹姆森,1977:100-141)。唯一能抵抗晚期资本主义畸形逻辑的,只有大众无法接触的形式主义者的艺术品。本雅明想要辩解的对“文化距离”的消除,具有潜在的解放性影响,因为阿多诺只是竭力造就“极度和谐的消费者”(阿多诺,1991:38)。不顾阿多诺的抗议,本雅明辩证地评价原作韵味的下降。尤其是通过新媒介的艺术品复制的技术手段,为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的各种更加民主和有更多大众参与的形式提供了前景。本雅明提出,如果文化的各种生产力的发展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转变同步,那么这就会为使艺术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利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对艺术品的非神秘

\* 谷登堡(约1398—1468),德国印刷商,1437年将活版印刷术引入欧洲,因此被认为是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者。——译注

化问题，本雅明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这是因为原作韵味的衰微，标志着一种经验复杂样式的终结。本雅明总是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具有同样的想法，认为富有韵味的艺术为超验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能为己用，那么这就包含着未来幸福的希望。但是，本雅明与布雷赫特持同样的观点，却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的观点相左。他提出，共产主义应力求使艺术政治化，这是因为人们可以察觉隐藏于法西斯主义政治美学化背后的对人类构成的极其严重的威胁。

哈贝马斯以同样的矛盾心理来看待现代文化诸过程的演变。借用韦伯的话来说，文化的商业化连同国家和市民社会在体制上的分离，导致了一种已醒悟的公共领域的产生。富有“韵味”的封建社会的衰竭，加剧了各社会领域的世俗化和分离，这为一个富有更加“开放”潜能的社会铺平了道路。哈贝马斯在后期的著述中，通过采用波珀的思想（哈贝马斯，1981a：70），尤其清楚地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创造解放的可能性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各种文化传统必须剥离于其教条主义，以便我们能够通过更加对称的诸种权力关系，检验各种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在主体间性方面的效度。然而，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1983b），正是因为本雅明对神话的依恋，才使得他不能提出一套言之有据的社会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尽管本雅明渴望使艺术政治化，可他更着力于发展一套关于经验的普遍理论，而不是潜心于意识形态的批评。哈贝马斯解释说，致力于意识形态的批评，需要具有批判性的反思和对结构暴力的诸种体制形式进行分析的能力。本雅明的计划可更恰当地被总结为这样一种希望：粉碎神话和韵味，让经验能够

接触这些成分。对本雅明来说，能让人类赋予世界以意义的各种文化资源均积淀于神话。在本雅明的著述中，神话对真理的要求也是完全麻木的，并且具有自主性（门宁豪斯，1991）。因此，他从历史中提取神话和乌托邦式的内容，与其说是建基于一种批判的反思理论，倒不如说是建立在一种经验的观念之上。按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本雅明热衷于对神话的拯救，表明了一种保守的心态。在此，哈贝马斯有力地拒绝了本雅明将文化论辩的部分思想分离于真理要求的企图。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清楚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些成员的思想，其主要区别在于他修正了主体哲学，并试图以一种新鲜而具有挑战性的方式将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各种不同思想片段结合起来。哈贝马斯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那里继承了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内容所持的一种悲观倾向。尽管他与本雅明有着重要的区别，可他从本雅明那里继承了某些观点，重写了富有韵味艺术的衰微所带来的诸种解放性影响。我对哈贝马斯的思想语境现已作了交代，在将这些问题与公共领域的未来重新联系起来之前，我现在打算更具批判性地探讨大众文化的主题。 56

## 大众文化存在的诸种问题： 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

尽管至此为止我们是带着同情的倾向来表述哈贝马斯的各种论点，可他的著述对现代文化的阐述是不充分的。虽然哈贝马斯的思想是以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更具批判性和入木三

分的思想为基础,可有争议的是,他也承继了其在文化方面一些更为保守的思想方面。根据 J. B. 汤普森的一些评论,我们可以发现哈贝马斯的著述至少在四个方面有所欠缺:(1)他对文化诸形式的生产和内容的过分强调;(2)主导性意识形态的论点通过他对大众文化的阐述而起作用;(3)在英国的历史语境下,对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带有过分的悲观倾向;(4)他对全球和区域的各公共领域的有限把握。

1. 在以往的十年,当代文化研究的演变特征,可被描述为与社会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对接受语境的研究的关注表达得更加明确。尽管在学科中存在着一些同样重要的倾向——诸如日益增长的在全球化(金,1991)和心理分析(埃利奥特,1992)方面呈现的分析的重要性——可以看出的、注重社会学和受众研究的倾向也是既重要又有联系的。在英国和德国的语境里,文学的各种分析形式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联系。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以及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格特这些人物所持有的共识是,他们对各种通俗文化形式的考察,是深刻地由对一种文学文化的迷恋而构建的。在这些学者看来,一种“高”品位的文化正处于受到一种美国廉价文化的淹没的危险。这种正在入侵的肤浅文化,被他们理解为不仅仅是对一种更丰富的高品位文化的民主发展构成一种野蛮的威胁,而且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皮埃尔·布尔迪厄(1990:112)很有意义地描述了这些批评家的态度:他们认为,普通民众会使用同学术界的人一样的方式来理解各种通俗的文化形式,这是学究式的谬论。

保罗·威利斯所著的《普通文化》(1990)一书,对青年工人

阶级积极地理解各种通俗的文化形式的方式作了研究，由此进一步揭露了对通俗文化进行文学批评的文化保守主义。青年人不会耐心地等待号称是更加成熟的文化的教育意义，他们借助一种商业文化，竭力寻求快乐、自主和自我意识。在威利斯看来，类似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这样的学者，没有明确地区分现代各种文化形式的生产和接受之间的分野，他们通常不能解释许多现代文化可能具有的解放性影响。在此举两个例子足以更清楚地说明威利斯的论点。第一个例子是威利斯本人的观点，即令许多青年工人能找到有报酬的工作，他们也是常常受雇于不能发挥自己的水平和自主性的工种。相反，他们的业余时间却常常复杂地周旋于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威利斯写道：

诸种工作关系和为提高效率的内驱力，现在以抑制大多数工人日常进行的象征性活动为转移，文化业和休闲产业的必然联系，随这样一种对立的倾向而定：工人能力的发挥和精力的释放的一种形式。工人的理想模式是守时、守纪律和空虚的脑袋，但是，消费者的良好模式却恰恰相反——对象征性事物具有一个充满无限欲望的头脑。（1990：19）

威利斯在此的论点是，任何对商业文化的批评，都应该认识在商业文化接受过程中的日常象征性活动。

另一个例子源自保罗·吉尔罗伊的《英国国徽上没有黑人》一书（1987）。吉尔罗伊在书中令人信服地说明，英国黑人的通俗文化，一直在努力构建和重新阐述各种传统，这些传统体现于抗议种族主义的黑人音乐中。在吉尔罗伊看来，这些通俗文化的形式表征了对这样一个世界的乌托邦式的渴望：种族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的主题。青年黑人的音乐文

化，本身就是跨越各民族国家国界的散居在国外的黑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这一意义而言，成为黑人和英国人，其意义始终受到业已脱离于原初诸种文化生产语境的各种符号范式或形式的重塑。根据吉尔罗伊的观点，青年黑人有能力塑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政治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能够对自己被排斥在英国公民身分之外这一现象提出挑战。显然，这种具有批判性和全球性的想像形式，有赖于由文化产业传递的商业文化。将吉尔罗伊和威利斯的论点结合在一起，就能充分地说明，那些试图得益于一种已获得新活力的政治文化的各社会团体，现已沉迷于各种通俗的文化形式，并竭力从中获致意义。吉尔罗伊特别注意到，这具有某些政治方面的影响，在作任何涉及面较宽的评估时均需要考虑这一点。

至目前为止，像吉尔罗伊和威利斯这样的学者，均热衷于社会学的研究，这充分说明很有必要对文化接受的各种远距离语境采取更具考察性的研究方法。可是我认为，如果这种论点被允许渗透到对后现代通俗文化的一种盲目庆贺里去，那么文化分析就存在着各种明显的危险。菲斯克(1989a, 1989b)的分析认识到，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生产与沉迷于这些文化形式的各种常常是颠覆性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裂隙。在此，人们通过具体地参照大众对权力集团的各种话语实践的拒绝，探索各通俗文本的话语开放特性。根据菲斯克(1992)的观点，具有霸权性质的主导文化凭借公正性和客观性，试图造就各种轻信的而不是怀疑的主体。所不同的是，以轰动效应为目的的各种报纸和杂志反映了统一化主体态度的欠缺，这表明了需要一个社会代理者去积极协调的许多文本矛盾。譬



如说,耸人听闻的报刊标题通过夸张和渲染,怂恿读者对正常人和官员提出质疑。尽管像菲斯克这样的学者已非常有益地解释了这样一种方式:大众能成为一种具有抵抗力的微观政治的目标之所在,可他们的分析未免有些矫枉过正。<sup>①</sup>

简言之,菲斯克的问题是,对像哈贝马斯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对大众文化进行更多的体制方面和历史方面的理解,他几乎找不到什么空间。尽管通俗文化不是哈贝马斯所认定的大众形式的欺骗,可我也并不认为,这像一些接受理论社会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公开的参与性文化。菲利普·施莱辛格已将那些过分强调接受诸过程的人称为“新修正主义者”(施莱辛格,1991:149)。施莱辛格正确地提出,尽管文本的愉悦不容低估,可不应该允许这种问题去取代分析的力量。虽然哈贝马斯因为漠视受众的阐释活动而受到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批评,可他对明显表现于我们文化中的各种操纵形式提出了政治批评,而这种文化是像菲斯克这样的学者所没有接触过的。譬如说,我可以在每个星期四晚上坐在家里,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政治论坛节目“答问时间”进行讽刺性的解读(斯坎内尔,1992:345)。这种方式的解读,显然会抵抗这样一个既定策略:这一节目将我定位为一个对正在讨论中的话题很感兴趣的~~政治~~政治公民。假若我抵抗权力集团所强加的这种特殊的真理方式,那么这种定位显然会把我看作按菲斯克的话来说是颠覆性的。熟知哈贝马斯的著述,会在另一方面使我对这种节目进行一种更具政治性的解读。从广播的转播中所听到的各种声音非常有限,而且大多数声音是由主要政治党派挑选和精心“撰写广播稿”的。我可以先了解这一现象,再开始这种解读活动,然后我可能会继续揣摩受众是怎样在

随后的政治讨论中仅仅被赋予了一种被动的角色，而且会思考这些受众在这种背景下是怎样被赋予权力的。况且，我接着会对公用事业电视进行体制上的批评，而且会富有想像力地重新考虑可以得到民主重建的各种方法。总之，尽管哈贝马斯有忽视受众阐释视野之嫌，可如果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提不出相应的在体制方面的分析框架，那么这些研究看来就会作出很大的让步。

- 59      2. 早期和晚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均设想，各媒介产业消除了批评的各种基础，因为这些产业霸权地将民众捆绑于现状。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现代文化被磨去棱角的描述，可以与哈贝马斯对不允许具有批判性论辩形式存在的文化的阐述相媲美。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将受众还原为冷漠的烂土豆，而且过高地估计了媒介对通过霸权式的话语来再生产不对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责任。对哈贝马斯来说，不需要受众再作什么评论的非政治化的大众文化，可被最佳地描述为“一种动机整合文化”（哈贝马斯，1989：173）。在此，哈贝马斯抓住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主题——现状的再生产可通过对各从属性社会团体在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得到最好的解释。这一主题也明显地表现于哈贝马斯的其他一些著述。他在《合法性危机》（1976）一书里的基本前提是，动机的两个主要型式（公民职业和家庭职业）现正遭受到系统性的腐蚀。这一见解假定，若社会各系统让自己霸权地合法化，它们就有必要规范地将社会各主体整合进社会。戴维·赫尔德（1989）提出，恰恰相反，现代各社会的稳定的产生，更有可能仰仗于文化原子论，而不是外部强加的一致性。同样，迈克尔·曼（1970）主张，社会学家应该区分实用性接受与规范性接

受两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认为,唯有在各社会主导团体设法调动一致性,以便使其社会地位合法化时,规范性接受才会发生。然而,实用性接受是指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顺从,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另外一条现实的途径。

现代同一性的离散,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得到解释。譬如说,在文化研究中,表明广告商、音乐业、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节目怎样以清楚明了的方式将目标指向受众的各个不同群体,这已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晚期的资本主义已依托于在各种生活方式需求方面具有异质性的消费大众。要求意识形态统一化的幽灵依然潜伏于各种文化研究,这一事实又可以在某些方面归因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持续性影响。这种关于主导性意识形态的论点,已证明既不能解释现代文化型式的多样性,也不能说明通过接受而诱发的心理同一性的诸种复杂过程。在说过这些话之后,我想至少将分析的各种霸权形式的可能性留待大家去讨论。情况依旧是,虽然假若这种论点延伸得太远,大众传播对文化力量诸种问题的影响就可以被忽视,但是公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构建,要比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还要不稳定。在现代性中,大众媒介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这一事实不容低估。媒介可能没有能力在文化上依照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方式将大众凝聚在一起,但是,媒介理所当然地保留了某些霸权能力。在此,大众传播研究没有必要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文化的离散性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倘若具备某些结构方面的条件,各种媒介文化就有能力产生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效应。一种更为详细的研究方法,会力求凸显统一性与离散性之间的诸种张力,并在霸权性的融合与社会原子

论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

3.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的观念, 尽管保留了某些批判性的价值, 可却有失于过分的包罗万象, 以致不能充分地抓住通过媒介传播信息的各种现代文化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 景观的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已取代了趋向于对公正提出要求的理性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在相当程度上言过其实。在这方面, 我想用两个鲜明的论点来质疑哈贝马斯。第一, 哈贝马斯一旦引介了公共领域的观点以后, 他似乎就丢弃了任何具体的历史体系。他无法解释的是, 存在于现代社会里的经济、国家和公用事业广播之间的值得重视的体制张力。我的另一个论点是, 尽管哈贝马斯在我看来正确地强调了官方允准的全国性公共领域的重要性, 可他无法驾轻就熟地解释更加国际化的公共领域和更加区域化的公共领域的崛起。

帕迪·斯坎内尔(1986, 1990, 1992)对各公共传播体系作了有力的辩解, 他最近提出, 公用事业广播自诞生之日起就已建基于普遍接听的原则和提供内容广泛的节目。通过将私人生活重新置于公共领域氛围, 同样也将公共领域重新置于私人生活领域, 全国性的公用事业广播已在相当程度上拓宽了在公共领域里事物能得到合法讨论的范围。但是, 雷蒙德·威廉斯(1962)和其他学者已经指出, 英国广播公司与受众传统地保持了一种家长式的关系, 而且过分依从英国现存的制度。然而, 根据斯坎内尔的观点, 这种文化型式在 1950 年代后期就应该面临改革。随着工业电视(ITV)的出现而引入了竞争机制, 公共广播系统在应对那些权威系统时被迫采用了更为民主的态度。广播播音出现了一种更加通俗和开放的风格, 力求使国家对公众的意见作

出反应。新闻记者对来自外部的控制新闻生产内容的企图，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种能力显然有赖于各种特定的体制语境。虽然这引发了公共广播与像国家、警察和各种工会那样的外部“解释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这仍在相当程度上表明，新闻记者已具有历史意义地开辟了社会实践的一种相对自主的模式。

现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英国政府矢志不渝地干预有关北爱尔兰的记录影片、新闻和戏剧节目的制作。根据埃利奥特、默多克和施莱辛格(1983)的看法，国家干预的不断威胁，已使英国广播公司形成了一种内部的自我审查制度，其作用是制止出现关于北爱尔兰的各种批判观点。再者，当时的内政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在1988年10月19日宣布，政府将禁止直接广播有名气的恐怖组织，着意于进一步压制对英国政府的批评。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用来说明，现代国家是怎样企图“排斥”和操纵某些领域的公共论辩，而这种企图并没有获得彻底的成功。国家已践踏了人们在这一方面所提出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正是这一事实使国家成了批评的对象。这种干预并没有遏止住像肯·洛奇那样更加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或“严肃报刊”的某些版面展开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再者，各公共广播体制继续传播了少量的关于北爱尔兰的电影记录片，其中有些影片已尖锐地批评了英国。<sup>②</sup>

可争议的是，既然英国政府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关于北爱尔兰的信息流向公民，那么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有些人所说的媒介已被重新封建化的程度。这并不是说，那些被感觉为对一个具体想像中的民族共同体构成威胁的“他者”，并没有常常从善

恶之间的冲突角度来得到刻画。在此，哈贝马斯的著述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力量，因为这些文化表征漠视启蒙运动的真理要求和理性的质疑。但是，如果哈贝马斯的论点欲避免流于一般的正确性，那么他本该早就解释那些已抵抗各种殖民化策略或被这些策略所忽视的各种相对来说非商品化的和在话语方面具有开放特性的空间。

4.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著述，显然是与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这对理解公共领域来说是一种不恰切的概念体系。现代国家始终充斥着来自上层的各跨国体制的运作，而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来自下层的对自主权的各种新要求。某些商业报纸或严肃报纸拥有国际性的读者，这意味着某些社会精英集团在全球性公共领域的崛起(斯帕克斯,1992a)。这种现象可以与其他的全局化诸过程联系起来，这些过程，表明了吉尔罗伊(1987)早些时候所称的一次特定的黑人大迁徙，抑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92)所称的远距离民族主义。所有这些情况都属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与自我同一性和公民身分相关的诸种问题，不能从具体的民族文化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对这些演变的结果，就是会让人们放弃维系民族文化以抵抗具有侵蚀性的“外来”文化形式的企图，从现代各式各样的权利和义务所蕴涵的意义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多样性的各种问题(帕雷克,1991;巴布克,1992)。依凭这些新的社会变更，人们也会发现一种更具区域化的已被分离了的公共领域的涌现，在这种领域里，一群群小团体聚集在一起，公开讨论从核裁军到性征等一系列主题(菲利普斯,1991)。这些聚会已成为独立发行的小报刊和各信息网络的消息源。哈贝马斯无视这些具有两重性的文化诸过程，其

结果就是削弱了他对公共领域重要性的辩护，以致流于一种激进的民主主义。

但是，哈贝马斯想要提出各种程序准则的梦想，可被应用于关于公共领域的一种在空间上更加敏感的观念。这一事情的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借助于各种卫星和有线系统而跨越国界的广播的到来。目前，这些商业服务机构中的许多家，逃避了适用于公用媒介的各种责任和义务（内格里恩，1994）。在英国，这类系统规避了对平衡、公正和质量的各项要求。假如公民的某些要求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的竞争需要得到遏制，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实施有关义务的各项普遍准则，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中的有些问题及这些问题与公用事业广播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节里加以探讨。

## 公共领域和公用事业广播

采纳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诸种论点的大多数文献，均是千方百计地从他替公用事业广播辩护的角度来应用他的思想观点。有些学者所提出的论点是，废除对全国性公用事业的管制，这对民主国家的公民身分构成了威胁，因为这将我们对信息的控制权交给了国际性的联合企业之手。根据这种想像，这最终会导致对人人都已享用的“严肃”公用事业的损害，而且会放弃不能获得广告商支持的特殊兴趣节目的编排。新右派的兴起使这样做成为必要：在思想上重申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新右派谴责由国家组织的广播，因为这种广播费用昂贵，通过限制广告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并且不允许人们作出选择。很有

认识媒介文化

可能正因为是对选择的制约，才在意识形态上形成那种迫使人相信的论点(基恩,1991)。新右派分子提出,受国家保护的媒介会将社会精英的趣味强加到我们其他人的头上。根据这种看法,在自由市场里,市场会有能力对民众的实际喜好作出反应。这种意识形态攻势窃取左派的一些传统做法。英国广播公司的首任总经理洛德·里思曾经提出,公用事业广播有义务去教育人并向人们提供信息。然而,对这些准则的辩护在文化策略方面变得纠缠不清,因为这种文化策略竭力将一种阳春白雪的文化强加于一个含有多种成分的民族共同体。自里思时代以来,许许多多遭受排斥的声音批评了英国广播公司将英国人某种观点强加于受众。这隐含着一些围绕种族、性别和阶级等主题的观点的出现。这些观点均着意于批评里思的家长式作风。新右派要求反映这些声音,可问题是,这种要求无视存在于普通公用事业与媒介传播途径的私有制和私人控制之间的兴趣差异。

根据那些希望维护公共领域观念的人的看法,公用事业广播因为三个主要原因而依然重要:(1)从历史上看,公用事业广播已占据了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经济和国家的一种体制空间;(2)公用事业广播有潜力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的彼此交流提供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场所;(3)公用事业广播将民众视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

1.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最初概述强调,批判性辩论的思想空间是通过在其体制上区别于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拓展的。这允许出现宣传原则,在这种原则里,对理性的大众化使用的偏爱,胜过了对理性的个体化使用。许可证费机制在传统上被用来将英国广播公司隔绝于各种商业压力和当时的政府。然而,



就像 J. B. 汤姆森(1990)和尼古拉斯·加纳姆(1990)已指出的那样,所谓英国广播公司的中立地位,实际上常常被放弃,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权力集中于那些身居英国广播公司组织结构高位的官僚精英。这批与众不同的社会精英在传统上来自那些具有特权的各社会背景,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往往与其所处时代的政府的界定极为相像。这种特定的论点可常常溯源于里思为 1926 年工人大罢工期间的政府辩护的名言。然而,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的“独立性”的意义超出了意识形态形式上的不承认。帕迪·斯坎内尔(1986)对 1930 年代大众化的全国无线电广播节目《难得偷闲》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公用事业广播的早期形式保留了某种程度的独立于国家控制的自主性。这一节目原先着重于鼓励自觉地缓和大众失业的困厄,同时为失业者的体验提供一个“公共”空间。尽管受到左派的许多冷嘲热讽,可凭借得到全国认可的公共领域而出现的工人阶级的自我描述,起到了在议会议员中引发对失业问题论辩的作用。一旦在下议院中的论辩被报刊所报道,拉姆齐·麦克唐纳政府就压制无线电广播的系列报道,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贫困和失业等问题的认识,里思面对相当大的政府压力,拒绝停止系列报道。他宣称,如果政府禁止这一节目,他将以停止广播 20 分钟来取代 64 业已安排的节目播送。得知这一消息以后,麦克唐纳最后决定放弃原先的想法。

虽然我为维护公用事业广播而反对那些希望将其作用同化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人,但是如同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依然存在,即公用事业广播的民主化及其与国家更加正式的分离。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公用事

业,致力于高质量信息的传递,这仍然是公民身分现代诸形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 根据柯伦(1991)和加纳姆(1990)的观点,一个重新阐述的公共领域,能为不同的团体和阶级参与一般的公共对话提供机会。依照这一模式,公用事业广播能为一个多元的个人团体探讨他们是否有共同的兴趣提供一个人人能共享的场所。遗憾的是,这一论点没有以足够的认真态度来对待早些时候已经阐述的关于文化离散的诸种问题,而且漠视了现代后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信息的扩散。彼得·戈尔丁(1990)或许已经指出,尽管存在着一些更具乌托邦色彩的期望,可对现代信息诸种形式的获得,受到了国家诸种实践的构建,也受到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社会分离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受众不仅受到其特定的文化取向的分化(布迪厄,1984),而且通过他们对信息技术诸种新形式的不同获取而分散。一个人无需作为一个“没有理性的”唯物论者而被说服相信:朝着非规范化的有线传播系统发展,意味着对那些有大量的收入可以支配的人来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对那些相对而言收入较少的人来说,选择就会受到限制。即便国家必须致力于对公用传播的发展,即便新技术得到了各种发展,国家也不可能有能力保证一个民族共同体对此事的密切关注。

如果我们想到处于现代状态下的公民们目前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我们便可发现这一问题已被夸张。就像类似于博德里亚(1988a)和梅卢奇(1989)这样的许多后工业时代思想家所已认识到的,现代社会不能被描述为缺乏信息,而可以被认为是信息超载。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通过为有线电视、录像、书籍、通俗杂志和报纸筹措资金,已使整个世界充斥着信息。现代

文化的扩散如此迅速，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消化完一天单独一份报纸里的所有信息。尽管博德里亚与其他的学者一样，以政治保守的态度来理解信息的发展，可他给重新阐述公共领域的企图的确提出了各种难题。

以上各种考虑，限制了像柯伦和加纳姆那样的学者试图依 65  
凭英国的各种文化体制来构建关于协同性和共同体的各种新的民族形式。在这些观点里，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雷蒙德·威廉斯的影子。正是因为对老的新左派的深信不疑，现在正在显现的各种共同体形式和理解形式才得以通过大众传播的诸种形式的民主化得到了促进。这种基调也可以在哈贝马斯的著述里找到。跟威廉斯的陈述一样，哈贝马斯的表述看来是以下面这一情况为先决条件的：如果让民众参与论辩，其最后的结果将会出现对善的各种相同的理解，而且会加强社会的协同性。尽管这样一种策略能为各种新的主体间性关系提供背景，可它对许多社会生活方面的全球化和分离化特性，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除了跨国资本主义强加于一个多元化了的公共领域的诸种制约之外，对其重新投入精力加以研究的任何企图，均是很值得的。这并不是说，假若伴随着另外一些主张，对跨越区域的、全国性的和跨国的社会领域的诸种公共系统重新进行划分，不会有利于维系更具协同性的各种社会关系。最有可能的是，这些被感觉到的诸种联系将会越来越脱离民族语境。这些安排，随同对他人各种权利的文化认可和我们对他们的各项义务，会使彼此相异的各种小市场迅速增加。的确，这种类型的发展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得到保证，虽然这些安排的确有可能阻挡目前由肆无忌惮的市场滋生的一些更加极端的原子化压力。

3. 由于公用事业的模式隔离于市场, 根据其支持者的观点, 它在传统上已将民众视为公民, 而不是消费者。对哈贝马斯和加纳姆来说, 公民可以被界定为占据一个政治领域, 在这种领域里, 凭借辩论的公共权利, 共同体认可的有关规定可以得到集体的讨论。然后, 在公共领域里, 一致产生的一般行为准则会变得至高无上。现代世界中, 某些政治传统的合法性, 有赖于对这些传统进行富有想像力和创造性的占用, 而不是仰仗于一种永恒的神话般的统治地位。除此之外, 在经济领域, 各主体被看作不是生产者就是消费者, 他们主要具有个人爱好, 而不是公共兴趣。公用事业广播的非规范化的问题是, 个体越来越被当作消费者, 而不是具有各项权利和义务的积极公民。譬如说, 联合大企业的投资和营销策略, 不会与消费者进行民主的磋商。混淆公民的权利义务与消费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始终是新右派更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之一。加纳姆(1990)提出反对意见说, 一旦我们将这两个领域在理论上合并起来, 那么在新自由的论辩中, 表决权缘何不应该依据购买力来定夺, 对此, 没有可以预知的理由。

- 66 相反,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 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应该与政治上的公民权利义务的价值观分离开来, 那么这就会对具有象征性手段的私有制的合法性提出严肃的疑问, 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象征性手段, 各种事件才为人们所共知。现代文化的私有化, 也可以在政治家们为赢得选民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手段里找到影子。在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里, 政治家们通常的做法是将选民大众当作“纳税人”, 而不是当作关心公共利益的会思考的大众成员。有些人提出, 如果我们的文化继续受到跨国文

化生产的非规范化诸形式的左右，那么这种倾向就会被夸张。我们不应该将致力于公用事业广播重新认作维护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的手段，而应该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普遍准则来考虑这一问题(巴布克,1992;汤普森,1978)。

依然存在的问题是,在全球文化中,公民们所需要的信息不可能在一个孤立的民族国家内部产生。尽管显然存在着将消费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公众与私人这样不同的价值领域分离开来的明显例证,这些区别却没有必要从国际角度来加以重新划分。在考虑公用事业广播的未来时,我们需要制定能应对国际和民族各领域的有关政策。一个更具国际基础的公共领域,会着意于跨越民族国家国界的信息交流,向民族的陈规陋习挑战,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各民族国家各项政策的全球性内涵。一个重新出现的公共领域,如果与现代世界相关,那么就更有必要依靠公共合作的多种全球形式,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程度(默多克,1992)。

然而,将哈贝马斯的著述应用于目前大众传播研究的诸种问题,这意图虽然不错,却面临着若干主要困难。这些困难在于那些应用公共领域观念的人与哈贝马斯本人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媒介理论家往往从哈贝马斯对激进民主在体制上的实现更为宽泛的强调中,抽象出他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只消最为粗略地浏览一下哈贝马斯的作品,人们便可发现,将民主的诸种准则应用于大众媒介文化,这在哈贝马斯所着重强调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要求里所占的成分少得可怜。他的诸种论点被粗心大意地当作以媒介为中心的论点。如果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更为广泛的分析,那就有必要潜心探讨制约着公民全身心参与

民主决策的某些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媒介文化的各种社会实践，对这种情况只能提供片面的解释。另外一个问题我在上文已经说明，那就是哈贝马斯作为哲学家的地位。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普遍准则应用于当下的各种形势的分析，显然只能留待别人去做。尽管我愿意为这种应用的可信性辩护，可使这些

67 价值观念与经验语境相适应的方式，需要特别加以注意。应该清楚的是，哈贝马斯对交流理性的关注，是印刷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电子文化的产物。<sup>③</sup>的确，虽然这不会使这种理想成为累赘，但这的确意味着需要对诸种电子文化的构建力量进行更加缜密的考察。这些文化给公共领域的重构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些文化的迅疾特性和离散特性。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文化已目睹了个人空间的消失和历史性的衰落。我本人的看法是，这些变化使各种公共系统而不是商业系统更加强大，而不是更加虚弱。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作出回答。一个重新复活的公共领域以何种方式提供关于当今关键问题的延续意识和对话意识？为确保一个多元的公共辩论，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是应用哈贝马斯准则性思想的关键之所在。

哈贝马斯在对大众媒介进行阐释性研究时，对媒介体验的其他一些方面尚未作出充分的表述。譬如说，我们如何将理想的演说情景应用于对电影院的造访？从表面上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里，唯有当我们对所观看的电影和影像制作的诸种体制性联系进行一种更为广泛形式的集体性反思时，置身于电影院就会具有关联性。这一论调的难题是，它没有联系当代的许多文化体验。譬如说，显而易见的是，哈贝马斯与早期法兰克福

学派不一样，他对各种审美问题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他很想使交流理性摆脱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这些人将审美感受对立于是理性的各种工具论形式。再者，在更为当代的各种语境下，我非常同意哈贝马斯努力反对左派的先锋派主义和右派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威廉斯的论点几乎如出一辙，哈贝马斯认为，不是艺术家应该放弃实验法，而是他们应该竭力在审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两者之间营造出一种对话。这样做的意蕴就是，艺术的表达应该遵循某些社会义务，而不是着意于虚假地去统一艺术和政治的各个领域。然而，这些想法尽管值得推崇，可没有联系更加普遍的审美情趣的诸种形式。

音乐、电视和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对这些文化形式的沉迷，与解释学研究里一个难以识别的特征不相符。苏珊·桑塔格（1994）已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对阐释的关注常常忽视了对艺术作品感觉体验的分析。这一观点，如果被放置在各种通俗的媒介文化语境里，那就具有某种解释性的价值。譬如说，我对世界杯开幕式的热衷，只是在某些方面与这种仪式产生的各种意义相关。更有可能的是，这种观看仪式的诸种实践，是沉湎于色彩的过分渲染和场面的整体感。现在回到电影这一话题，我们通常听说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有这种体验。电影院里的技术氛围和审美氛围，加之与受众的相对隔离，以某种戏剧的效果提供了影像展示。简·坎皮恩的影片《钢琴》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女儿到达新西兰的场景。广袤的景致与这两个渺小的行人，通过大银幕的显示而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像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种感觉是电视所不能充分捕捉得到的。所产生的印象，取决于对这种文化

形式的审美鉴赏，这明显不同于对语言意义的阐释。哈贝马斯不可能竭力去否认这种现象，我也会同意他的这种观点：这种现象不具备能与公共文化的再生相联系的政治重要性。可是，他在分析上远离文化的接受语境，意味着他对当代的媒介文化只能提供片面的观点。

##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与公民 的权利和义务

哈贝马斯在对发生于1989年的革命作出书面的反应时，对另一种政治计划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可能会出现的情形，进行了富有想像力的重新思考（哈贝马斯，1990a）。他将左派的关键任务表征为对普遍兴趣的维护，试图对各种公共冲突重新进行道德解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诸种条件下，左派会在毫无理论框架的情形下去力求使金钱和权力的各种导向机制社会化，这种观念因其与时代不相宜而应该不予以考虑。某些需要和价值观在生活世界的出现，会制约金钱和权力的运作，这种制约的程度对哈贝马斯来说，依然是一个经验方面的问题。传播的诸项原则应该应用于公共管理的诸种形式，而不是竭力去让这些原则完全依附于公共管理的逻辑。哈贝马斯补充说，尽管批判理论不应该在其所推崇的事物中显得过分命令式，可重新形成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领域，仍然是一项必要的政治计划。在这种语境下，他没有进一步阐发这一论点。然而，我可以作这样的补充：除非我们有能力集体地实现共同体观念，并理性地关注他人的需要、恐惧和担忧，最后的结果将会是更具破坏形式的



社会原子论。就像我希望我业已表明的那样，为了使这一议事日程早日产生，我们的公民就要依靠“严肃”类型的信息和供讨论的各种民主论坛。

要想发展按阿伦特(1958)的话来说尽力去“扩大思维”的一种更具传播性的文化，唯有通过对文化产业的激进民主化，才会在各种现代的语境下成为可能。反映各种各样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在日常的接触中不是直接能碰到的人的意见，这在一个全球化和分离化的文化里尤其必要。我认为，一种希望之源，依旧<sup>69</sup>是普通民众永不枯竭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感觉到与远离自己文化语境的他人之间的协同性。那些力求强调这些情感的各种公用事业广播节目，需要将讨论中的各个主体表现为同样值得尊重，同时，要竭力巩固具有移情作用的在情感上的主体间性联系。这种“合乎道德的情感共鸣”(哈贝马斯，1990b)产生于明显表现于各种个人关系的相互认可的过程和社会化的初期过程(本杰明，1988)。在通过大众媒介传播而起作用的商业文化里，各种移情关系(empathetic relations)同样具有可能性，这一事实在这样一个事例里得到了最好的说明：发生于1986年的生命援助活动，对人类的苦难表达了全球性的关切。这一事件所表达的与他人是在想像上的联系，其作用不容低估。的确，这种联系只有通过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公用事业广播的价值观才能得到巩固。然而，如同我业已强调的，尽管这些合乎道德的要求，依然是重新阐述更以国际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的企图的核心，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诸种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关系中，对这些要求的可能性效应，我们应该保持谨慎。

在本章，我自始至终认为，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著述，

尽管有其缺陷，可依凭对传播和参与的强调而保持了相当大的实力（拉斯廷，1992）。这对目前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政治的和社会学上的论辩是一个重要贡献。根据 T. H. 马歇尔（1992）的观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现代诸形式，从赋予社会各主体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角度看，已得到的设想常常是颇为被动的（吉登斯，1985）。哈贝马斯的批评的中心论调是，目前通过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讨论，来重新想像社会协同性的各种新形式的诸种企图，有赖于已扩大的公民团体用来建立允许大众高度参与民主建设的各种物质条件。哈贝马斯的理论企图是，重新考虑与公共领域有关的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诸种观念，在此，我将粗略地概述他这种企图所存在的一些相关问题。在这里，本章的最后一节，我要说，哈贝马斯对当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研究方法，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应该强调，指出这三个问题只是尝试性的，而且有待于进一步的详细探讨。然而，在目前这一阶段，我想要提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和民主参与形式的论述，需要（1）更明确地认识到，传播行为往往具有某些局限性；（2）就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进行更加具体的论述；（3）在理论上需要修正其普遍主义倾向，以便解释各种差异。

1. 佩里·安德森富有见地地说，隐藏于哈贝马斯思想背后的，是“对德国启蒙运动的各种热切的理想和认真的乐观态度”（安德森，1983：63）。尽管哈贝马斯试图对当代的各种社会力量70 提供结构上的分析，可他的思想对晚期资本主义目前的政治危机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虽然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些富有洞察力的关键性见解，但他的哲学倾向，依旧是常常远离于对当代各种

社会组织分析。在安德森看来，这使他的论述产生了过量的形式主义和对政治的一种说教倾向。

一旦人们要求作详细的解释，哈贝马斯的道德极简主义 (ethical minimalism) 就会暴露出明显的弱点。我同意哈贝马斯这样的一种观点：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条件下，传播的各种“政治”形式应该朝着达到一致性的方向发展。可是，就像查尔斯·泰勒 (1989, 1991) 所已提出的那样，依然存在的问题是，哈贝马斯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应该希望理性地生活？或者我为什么应该力求理解他人？卡斯托里亚迪 (1991) 与泰勒具有相似的论调。他认为，哈贝马斯在努力回答这一问题时，最终会将他的答复建基于神话般的生物学基础。哈贝马斯声称，人类是主体间性的语言使用者，他们日常实践的先决条件是他们能获得解放。这一观点不能现成地告诉我们，我们为何为自由而奋斗？哈贝马斯所能告诉我们的是，获得更加解放的各种生活方式，唯有通过对各种普遍的有效性要求的应用才会成为可能。凭着一种明显的极简道德观 (minimal ethics)，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力地提供种种已经得到评价的缘由：我为何偏爱更能使人实现各种话语的民主体系。如同泰勒 (1991: 32) 所说的，“较之理性的理解，我们会偏爱各种不受准则制约的导向机制，这一事实是与我们对人类尊严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再譬如说，抗议海湾战争的和平运动的原因，与其说是与传播方面的失败有关系——尽管这也非常重要——倒不如说是与人们即将看到的各种大众苦难有关。如果哈贝马斯无法向现代公民们提供各种更加强有力的具有评价作用的理由：为何论辩的目标应该是产生一致性，那么“自由”的论辩也同样有可能对仇恨与误解产生各种难以改变的

看法。

除非哈贝马斯能对正义诸问题与有道德的生活之间的界限作出实质性的重新描述，他不可能回答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显提出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赛拉·本哈比勃(1992)已提出，为了致力于使论辩道德观在道德上有说服力，应该认识到道德观对某些实质性的先决条件的依赖性。本哈比勃主张，在各种对称的交流形式里，我们应该以同样的尊敬来对待他人，而且应该认识到，论辩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她说，这些适用于各种平等主义的交流方式的道德先决条件，当然容许争论，但是，这些先决条件的诸种规范性基础，是不可能通过人类的话语产生的。我们所能表达的是，如果违背了这些先决条件，那么说服就会被武力所取代。从这些反对意见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71 有一种在道德上更具“厚度”(thick)的努力，以确保交流行为的各项原则。这样做也许会力求提出与人类的需要有关系的文化诸问题的讨论。譬如说，除非我们认为人类需要生活在各种理性的共同体里，哈贝马斯关于交流道德观的思想就没有多少意义。这又是以一个多元的公共领域和一个参与性的激进民主为先决条件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组织目前忽视了这些需要，这在哈贝马斯的著述里具有明显的表现。人类具有某些集体性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只有在体制这一层面上才能得到满足。如果这种观念能够确立的话(我相信这是能够确立的)，那么这对交流的诸种体系的组织，也具有某些意蕴。我将在下文再回过头来探讨这些问题。

2. 哈贝马斯最近提出，针对民主的各项原则怎样才能得到应用这一问题作出规定性的陈述，起作用的不是哲学家(迪尤

斯,1986)。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相类似,说他不愿意提供一张变革的蓝图,因为这对由民主铸成的一致性的未来结果会进一步提供先入之见。但是,尽管这一论点具有某种连贯性,却容易引起一些异议。尤其是,即便哈贝马斯为民主的各种参与方式辩解,可的确看来奇怪的是,他没有试图对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各个主题作出更具规定性的陈述,因为代议制民主这一形式与作为直接民主的交流行为最为相容。只有在所有有关的当事人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论辩以后,直接的民主和各种“理想的”言论形式才会容纳一种由理性形成的一致性。但是,哈贝马斯会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民主的诸种直接形式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里只能被允许有一定限度的表达自由(博比奥,1987;赫尔德,1989)。尽管哈贝马斯始终不懈地坚持,交流行为的诸种限制只能通过经验得到检验,可极简道德观怎样才能易于应用这一问题,依然模糊不清。虽然没有意图去降低交流道德观的重要性,但当代的民主实践,可以最佳地被描述为下层民众对权力的使用,以及为反对权力的过分集中而进行的权力再分配。根据诺尔贝托·博比奥(1987)的看法,这一论点与其说是怎样去应用交流行为的各项规则,倒不如说是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特殊的混合怎样才能得到体现。哈贝马斯似乎想要提出的是,社会各种导向机制的部分社会化,有赖于对一个极简道德观的应用,这一观点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目前所有制的全球性集中和各媒介体系的全球性控制说明,经济的权力常常转化为政治的和文化的权力。在欧洲,默多克和贝卢索尼的影响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确保报刊、广播和

电视不受各垄断集团的控制。如同哈贝马斯所透彻理解的那样，这种需求只能被不恰当地阐述为一种对直接参与的需求。依然重要的是，需要政治权威的代理者来监督所有权的分配和

72 在代议制民主的所有层面上强力推行各项传播义务。再者，还可以作一件事情，那就是使在区域性、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各层面的各公共传播系统能在民主方面得到解释。我们知道，目前英国广播公司的主管人员，是由政治精英人物而不是许可证付款人 (licence payers) 任命的。如果这种广播能日益摆脱国家的控制，那么就会有可能会找到实行各种更加民主的表征途径的方法。其次，最近关于通俗小报平时侵扰普通民众的生活的论争，与其说是关注论辩权，倒不如说是关心隐私权。这些措施的难题，在于这些措施的使用以及这些措施在哲学上的合理解释。表征和隐私等公众权益的运作不能仅照顾各个社会精英集团，这需要有某些中间机构去监督。这引发了几个难题。怎样才能使英国广播公司的管理层去反映一种多种族的文化？隐私权实际上会给富有而又掌握实权的人提供哪些保护？这些主张需要更加深思熟虑的探讨，而这不是在此所能做到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与哈贝马斯关于话语道德观的研究相比，博比奥对代议制民主的界定能更有效地阐述这些思想。

3. 哈贝马斯强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诸种普遍形式，是将协同性和共同体的各主题重新引入当代政治论辩的一条途径。我们看到，这些价值观是想被用来当作能起矫正作用的措施而发挥作用，以反对新右派的个人价值主义论调。然而，在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各种论辩中，人们日益意识到，各种普遍性理论往往无视人类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的既多样又具体的特性

(帕雷克, 1991)。这一问题在女性主义的学者中得到了最为深刻的共鸣(本哈比勃, 1992; 利斯特, 1991; 佩特曼, 1989; 菲利普斯, 1991)。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 一种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 应该承认各种普遍性的需要和利益, 同时又应该密切关注那些不违背一般化需要和义务的诸种差异形式。康德哲学的各种理论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各种理论一样, 其特征就是漠视组织和文化上的差异。就像 T. H. 马歇尔所透彻理解的那样, 强制执行各种普遍性准则, 其天平常常倾斜于某些特定的集团, 而不是其他一些集团。利斯特(1991)和佩特曼(1989)对此作了尤其清楚的论述: 对一致性的设想看来具有一种内在倾向, 那就是对妇女需要的麻木。但是她们也补充说, 主张“差异性”(difference)的女性主义, 能同样起到诱使妇女陷入依附和从属地位的作用。人们所需要的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形式, 这些形式应力图改革国家的各种实践——开辟各种自主性领域——和重构市民社会的一种更加平等的形式。

哈贝马斯对当代女性主义的论述存在着某些疑难问题, 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尽管正确地说, 关于公共领域的任何理论均以公众与个人之间的分野为先决条件, 可女性主义作者<sup>73</sup>已使我们认识到的问题是, 对这种分野的传统划分方式使对妇女的压迫合法化。关于这一点, 卡罗尔·佩特曼作了如下评论:

在大众(和学术)的意识里, 女性和男性的两元性常常起到概括抑或表征各种自由离散的和对立的系列(或范围)的作用: 女性, 或者——本性、个人、情感、爱情、隐私、直觉、品行、赞美、挑剔、主观; 男性, 或者——文化、政治、理性、正义、公共、哲学、权力、成就、普遍、自由。(佩特曼, 1982:

罗西·布拉伊多蒂(1986)发人深思地提出,将妇女排斥于独立的男性公共领域之外,导致了男性推理形式的支配地位。从表面上看,她以像杰西卡·本杰明(1988)和南希·霍多罗(1978)那样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一个男孩通过放弃自己与母亲的最初同一性,能够建立各种牢固的分界线和一个独立的自我。男性与女性的分离,再生产了一个鼓励各种独立的理性形式的公共世界。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性表述里,关于女性的观念是被当作“他者”而重新提出来的。在布拉伊多蒂看来,像哈贝马斯那样的思想家,重新提出了女性与理性这两者之间的两重对立。这也许最鲜明地体现于哈贝马斯关于理想演说的观点:更佳的论辩的胜利,似乎有赖于不受情感和感情的左右。这些反对哈贝马斯将理性与欲望割裂开来的论点是很正确的,但我还想提出,这些论点是建基于一种同时排除各种批评依据的本质主义形式。

如同凯特·索珀(1990)业已提出的,认为男性公共领域表征了一个不受感情影响的领域,这与主观性错误认识的诸种男性方式毫无二致。在索珀看来,以男性为根据而界定的公共领域,根本就不是公正的,而且这可以从最近公布的在审理强奸案时某些男性法官的观点里得到说明。明显表现于这些案件里的那些道德推理方式,看来根本就不是公正和无偏见的。再说,假若理性和公正被看作天生的男性推理方式,那么女性主义者就没有能力合乎逻辑地反对各种男性的统治形式。女性主义者所反对的将公共(男性的)与个人(女性的)割裂开来的部分论据就是不公正性。将妇女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不仅剥夺了妇女同



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性，而且阻碍了男人积极致力于子女的养育。对这些领域进行政治上的重新排序，仰仗于对差异非常敏感的平等原则的普遍性应用。认为这些论点具有内在的大男子主义而不予以考虑，就否定了这些论点所固有的解放性逻辑，并将妇女归属于非理性的王国。再者，尽管哈贝马斯可以因忽视所谓的理性的另一面而受到批评，可他对理性公共领域的强调，尚未被他的批评家完全驳倒。的确，我们可以同样提出，<sup>74</sup>理性的诸种交流方式会在我们的情感需要方面容纳更多的反思。理性与情感的诸种关系可以重新描述，赋予公民们享受某些参与权利的机会，并与他人铸就各种心心相印的关系。再者，在现代性的文化复杂性和无意识情感起作用的情况下，虽然交流理性不会让各社会主体变得自我透明，但这无疑能提供权利和义务的体系，这种体系会接纳新的可义是不那么工具论的各种主体态度。

然而，南希·弗雷泽(1994)已经指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分析，没有顾及金钱和权力对个人领域里的男性支配形式所起到的强化作用的诸种方式。她提出，哈贝马斯的殖民化论题，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两种“媒介”对公共体制而不是个人体制的重塑作用的方式。从我们的目的角度看，这依然是各种大众传播研究方面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下一章将会表明，家庭里的男人权力常常意味着，以男性为主的核心家庭在与各种传播技术的日常互动作用中，再生产出诸种权力关系。再者，以女性主义者为首的研究，竭力凸显以下这种情况：家庭的从属性成员(妇女和孩子)，凭借各种霸权式的歧意性符号文化，已发展了各种抵抗性策略。

## 小 结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崛起的分析，在努力维系传播的各种公共体系方面，已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宣传的原则主张，文化是主体间性产生的，而且应该向理性的质疑开放。交流行为也对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意蕴，虽然这些普遍性准则需要得到巧妙的应用，以适当的态度对待差异和电子文化的影响。在通俗美学、接受语境、公用事业广播、公共领域的诸种空间度和男性权力等问题上，哈贝马斯的理论也被发现具有若干盲点。假如抛开这些不论，哈贝马斯的各种思想对大众传播的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而且在这一方面应该继续为批判研究提供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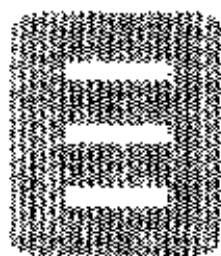
## 第三章

# 受众研究中的各种批判视点

75

阐释、代理机构、结构和意识形态  
方面的诸种问题

### 批判受众研究的崛起



前，人们正在进行的受众研究，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关于受众的第一个、也是流传最广的知识形式，由各种大型的传播机构收集而成。这种形式的考察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电视、无线电、电影院和印刷制作，需要吸引观众、听众和读者。为了吸引受众，现代各种传播机构需要获得关于“公众的”习惯、趣味和取向的知识。这能使各媒介法人借用某种节目抑或文本策略，将目标指向某些特定的受众。想要了解在任何特定的时间谁是受众，这有利于获取广告商感兴趣的有用信息，而且能让播音员们知道他们正在与哪些听众说话。

有些批评家认为，新的有线技术能让电视传播通过电话线来传递，这将能计算出在城市的一个特定区域，有多少人收看了前一天晚上的好莱坞电影巨片。这种愈来愈个体化了的知识基

基础,省却了目前存在的各种传播网的问题,在这些传播网里,绝大部分的广告均可能是下层人收看的,他们太穷,没有能力购买在出售中的商品。然而,新技术将会给广告商带来经过筛选的富有消费欲望的受众,这种想法听起来就像是资本家愿望实现的一种高级形式。虽然这也许是隐藏于对新的各种传播技术进行一些投资背后的一项策略,但是,这一策略的实现却是另一回事。受众已设计出如何回避符号资本主义的各种企图的方法,因为这些企图是让他们收看完强制性的广告插播。为了回避这些企图,可以选择另一频道、在播放商业节目时沏一杯茶或者按录像机上的快速转带键。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商业文化已力求将广告融入各种节目本身。虽然这样做能使受众还是不可避免地某种程度上沉湎于消费产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被

76 动。在1994年的世界杯比赛期间,美国观众极力想回避已经融进实况电视转播的千变万化的商业策略,他们将频道转向说西班牙语的各种有线电视台。这样做能看到更多的实况,因为这样不会常常受到广告的干扰,尽管绝大多数的观众不太可能理解该事件的语言学框架。这一例证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形:对不同传播网的利用和扩散,使受众为了自己注意力的集中而更容易地逃避一些“特定的”媒介策略。由这些条件产生的频道自由选择,反过来使收视率的计算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如同伊恩·昂(1991)已经提出的那样,使受众在统计学上变得可知这一实践,其结果是使这一实践的诸种实际的社会实践具体化。我们或许了解到,有20%的妇女卫生工作者收看了昨晚的《三十有几》的插曲,但关于她们的观看情景,或这些妇女从这一节目中所构建出的真实意义,我们实际上还是所知

甚少。各商业机构和国家机构所需要的能够量化的知识形式，一直受到受众的日常实践的破坏。在昂和其他一些人看来，受众成员照样有点无政府主义。坐下来收看《三十有几》的这些卫生工作者，也可能会很快地转到另一频道，去收看关于新王子的录像带，或者真的被一个与工作有关系的电话所打断。在这种情景下，要估算什么样的人算是真正“收看”了这一电视节目，是很困难的。构成大众传播研究第二范式的，正是这些所谓的收看、收听和阅读的普通性实践和快乐。收看电视的这一部分受众已受到阐释研究方法的研究，并将之应用于社会学和媒介研究。这些研究反对对各种商业组织进行的更显工具论的研究方法，力图探讨媒介受众生活世界的各种语境。在此，受众研究问题的焦点，在于已表现出的诸种阐释以及接受的诸种社会关系。

当代对受众阐释活动的兴趣，包含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某些成员的文化悲观主义的一种强烈的批评，同时也包含对所谓的用途与满足的研究方法(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pproach)的感激之情。我们在前文已了解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往往通过对各种现代主义高雅艺术的特殊依恋来审视通俗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倾向意味着，这些成员轻视处于社会特定地位的受众的各种阐释活动。这种倾向明显表现于对媒介所进行的各种文学研究方法，如雷蒙德·威廉斯和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等的研究方法。他们这些学者对文化的各种解读，着意于既昭示又取代缺席的各社会主体对文化的各种解读。然而，用途和满足的研究方法，则凭借对民众使用媒介的各种方式的分析，力图置换关于媒介对受众所产生的显著“效应”的观念。开这一研究

77 方法先河的，主要是战后社会心理学。这一研究方法将这样一种观念放到了显著的地位：受众对信息的感知可能与信息生产者的意图有着极大的差别。至于目前的受众研究是否受惠于这种研究视点，尽管还存在着某些争议，可这不是我们在此所要探讨的对象（柯伦，1990；莫利，1992）。但是，关于对受众的继续关注的思想根基问题，还是需要加上几句话作为顺便介绍。我想要探讨的部分文化理论，均产生于对这样一种设想的质疑：一个行为的意义可被单纯地认定为理所当然。那就是说，受众的主观性，通过与存在的某些物质条件的互为作用和各种各样的象征性形式而得到构建。这些问题通常与文化的象征性概念有联系。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1973）的著作，对文化研究的象征性研究方法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格尔茨提出，我们所称的文化，是由各种有意义的行为、物体和表达编织而成的意指（signification）之网。就这一意义而言，文化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经验主义者声称，客观硬材料（hard objective data）的产生（诸如各种收视人数产生的客观硬材料），能为各种社会科学提供一个稳固的支撑点。象征性研究方法认为这种观点错误而不予以考虑。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看来能提供能完全摆脱阐释领域的可能性。格尔茨对文化象征属性的强调，保留着一种开放性，有待非专业行为者本人抑或富有考察能力的社会学家的进一步的阐释。在此，有必要区别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的阐释之间的差异：需要区分各行为者本人产生的各种主体间性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家从这些阐释中所得出的意义。诸种文化表达对各社会行为者以及研究各种文化表达的研究人员，

均具有意义。再者,如果我们同意,意义是一种公众和主体间性的属性,那么其含义就是,意义似乎不存在于民众的大脑。简而言之,对一个特定的语言共同体的一个良好阐释,并不受制于一个作者的聪明程度,而是有赖于作者将读者带至象征性地产生的普通意义的“核心”的能力。

詹姆斯·凯里(1989)对最近发生于媒介社会学里的“阐释性变化”作了评述。他提出,各种功能研究方法(functional approaches)也有相应的变化。他所说的功能分析,是指集中探讨大众媒介是否证实或破坏现状的研究。他认为,对文化诸形式的更显象征性的研究,会力求检视交流中各种象征意义的互动作用。可是,尽管这是一个合理的研究领域,对大众传播的这种研究方法,依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直截了当地说,有些研究对文化采用了这种特殊的理解,可对在各种象征形式的产生和接受中的权力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循着在前两章已经探讨的思路,我将提出,意义的产生应该与各种机构和权力的作用相联系。再说,在某些情况下,对受众阐释能力的象征性赞颂,已被允许去取代一种更具批判性和规范性的社会理论。 78

虽然有许多关于受众研究的研究方法,本来可以得到检视,但是我将把注意力集中于论辩的三个主要方面,现一一罗列如下:(1)以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和解码的著作为基础,戴维·莫利对电视受众的阐释能力和各种收视语境,作了引人思索的分析;(2)约翰·菲斯克的著述汲取了一系列文化理论的营养,提出受众的游击性活动(guerrilla activity),是对权力统治集团的一种抵抗方式;(3)妇女对通俗浪漫文学和肥皂剧的解读,是既

愉悦又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女性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对这种想像的分析而作出其贡献的。在对这三种视点的每一点提供批判性的评述的同时,对这些观点能得到如何的改进和拓展,我也将力求提出一些建议。

## 戴维·莫利与电视受众： 再论编码/解码

与斯图尔特·霍尔一样,戴维·莫利对文化和媒介研究的特有贡献,产生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75年至1979年,莫利仍然在这一中心工作,他将霍尔(1980)著名的编码/解码文章,应用于对讨论时事的大众化节目《国内焦点》的研究(莫利,1980,1992)。现快速而扼要地重述一下,霍尔的文章提出,在对媒介诸文本的编码和解码的社会诸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区别。可以说,诸种文化形式,是凭借各种机构间的关系、行业准则和技术设备的一种特有的历史混和物得到编码的。受众采用的各种解码策略,同样仰仗于各种社会组织关系、政治和文化倾向,以及对相关技术的接触。尽管霍尔的文章阐述了文本生产的双重特性,可常常最为人们所记忆的是,这篇文章强调了受众解读策略的三种形式(预想性(preferred)、协商性(negotiated)和对抗性(oppositional))。这一模式给莫利研究《国内焦点》以及随后的关于受众研究的各种学术探讨提供了背景。



## 符号学、社会学和电视受众

在这一部分,我旨在追溯戴维·莫利的研究的演变轮廓,以提供足够的理论视点来紧扣电视受众的诸种文化实践。现在,请允许我在探讨他后期的贡献之前,以扼要地概述他对《国内焦 79 点》研究的各种主要问题,作为我讨论的起始点。根据霍尔的观点,莫利提出,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讯息(符号学)和观众的文化背景(社会学)的内部结构。《国内焦点》的“意义”,是文本所提供的预想性阐释和受众的各种文化倾向的产物。在业已编码的文本的层面上,人们需要应对的既有显明的内容又有各种“看不见的”并且是被想当然的意义。《国内焦点》的通俗话语,主要是关切家庭、休闲和消费场所,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具公众性质的劳动世界安静下来。为了理解文本视野是怎样能与受众的各种文化预设(cultural presuppositions)联系在一起,莫利力图将文本的论述方式阐述清楚。《国内焦点》将受众当作生活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政治共同体里的个体公民作为说话对象。这不同于,譬如说,体育竞赛解说所使用的说话方式,这种方式通常“同我们说话”,仿佛我们是快乐核心家庭的成员。那就是说,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析,应该力求揭示通俗文本产生某些主体立场的方式。但是,莫利论点的中心是,通过不同的解码策略,受众的带有文化准则的各种解读策略能抵抗文本的预想性意义。因而,虽然《国内焦点》对受众不具备一种因果“效应”,但是必须得到阐释。然而,这并不是说,受众在解读过程中能将任何意义都带入文本。文本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结构,永远不能取得

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封闭,在关闭其他一些意义的同时,能开辟另外一些意义。就这一意义而言,莫利对文化理论的以下两种方式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要不将意义还原为刻写于文本里的诸种主体立场,要不将意义还原为受众的诸种主观成见。

在更为近期的著述里,莫利(1992: 60)重新研究了斯图尔特·霍尔的理论思想。根据霍尔对拉康和阿尔都塞的批评,他提出,任何的阐释理论需要关注各个业已构建的主体和各种具体话语之间的空间。<sup>①</sup>一种阐释理论,除了蕴涵于文本的各种障碍之外,必须面对总是由话语构成的连续发生的障碍。因此,就像我们在讨论霍尔和拉克洛时所已了解到的,现代的各种同一性,是由许许多多的话语实践构成的异质构建。譬如说,一个白人的男性工人阶级工联主义者,会依赖语境,有能力作出要么是各种具有支配性质的霸权性或协商性阐释,要么是对抗性的阐释。更具体地说,我们的工联主义者可能是一个赞成工党的选民,也可能是一个性别歧视者,或者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如同莫利在后期所认识到的那样,他的《国内焦点》研究所存在的难题是,受众的阐释策略主要是通过一种阶级范式来得到理解的(莫利,1981,1992)。

在对《国内焦点》进行研究时,莫利和他的同事将这一节目  
80 的两个版本出示给几个具有不同文化语境的群体看。然后,他们决定一组组地采访被试人员,以便考察交谈是怎样通过讨论而得到集体性的构建。在与各种各样的群体的谈话过程中,莫利能进一步提炼编码/解码这一模式。他发现,银行经理们的谈话,对这一节目的内容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评论,因为关于内容问题,相比较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争论。这意味着,银行经理们的主

观性与文本所提供的主导性阅读态度几乎一致,使得文本的构建特性没有得到显示。这种阐释方式与工联主义者团体的阐释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能使这一节目的意识形态构建得到明显的表现,认为这种构建符合中级管理部门的利益。但是,莫利也发现,对抗性阐释不仅仅局限于处于从属地位的各个团体。印刷管理受训人员以右派的观点为基础,形成了对抗性的阐释。然而,虽然受众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但这些印刷管理受训人员对此却常常沉默不语。来自城市各区域的接受继续教育的学生情况也是如此。在此,这些学生的各主观成见和以符号为基础而构建的文本之间,看来几乎没有实际上的同一性。在莫利看来,这些发现表明,原先演绎于霍尔著述的编码/解码模式存在着某些问题。这一研究方法所遇到的几个困难可说明如下:(1)关于预想性解读的观点,引发了这样一种观念:信息内容受制于信息发送人的有意识的意图;(2)编码/解码隐喻,产生了一条意义的“输送带”,而并不是引发这些层面之间的根本不连续的可能性;(3)解码表明,受众关注文本,并产生意义,尽管如果文本对阐释者来说没有什么共鸣,那么意义就会被忽视;(4)预想性意义在具有单一性和封闭性的各种叙事文本里,是更容易察觉的。其他更加开放性的各种文本,诸如各种肥皂剧等,均仰仗于多种叙事以及相对不固定的主体立场。这种文本可能抵抗理论家的主导性霸权式的阐释。这些批评为分析莫利的家庭电视收视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背景(莫利,1988)。

对家庭电视进行研究,这在三个方面反映了关于《国内焦点》研究的一个飞跃。第一,莫利决定在各被试人员的家里进行

采访,因为早期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这种研究是在诸种颇为“非自然”的语境下进行,这样的语境脱离了正常的收视语境。莫利推想,男性工联主义者所形成的对《国内焦点》的对抗性解读,在更具家庭气氛的语境里,很有可能会失去其强度。其次,莫利提出,关于《国内焦点》的研究,给矛盾性解码没有留下多少余地。在此,他对我在前文已提及的关于拉克洛与霍尔之间的论辩,开始形成了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认识。莫利同意,围绕阶级范式这一问题,《国内焦点》的研究过度地压缩了受众的各种阐释。在此,拉克洛的著述极有价值,因为主体被表征为由各种话语母体构建而成。但是,根据莫利的看法,拉克洛依然保留了将主体还原为话语“效应”的倾向。<sup>②</sup>虽然莫利并没有深刻地发展这一观点,但他提出,各种话语提供了各种文化资源,根据这些资源,阐释性主体进行各种解读(莫利,1988:43)。莫利抵抗了拉克洛著述中的阿尔都塞情调,他提出,通过关注各主体在话语中受构建的诸种方式来预见他们所进行的解读,这是困难的。相反,就像对后结构主义抱批判态度的许多作者所声称的,主体有能力进行诸种批判形式的反思。提出受众不仅仅是社会实践和社会话语的“效应”,这并不是为万能的主体的自恋回归辩护。尽管主体在社会世界中有能力创造性地行动,可主体由于社会的和无意识的诸过程,依旧是非中心化的,这一事实是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再者,其实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莫利对社会学背景的关注,是更加强调电视在家庭语境中的实际用途的方式。这表明,他将注意力从符号学转向对影响各种收视实践的诸种权力关系进行更具社会学意义的研究。根据莫利的看法,这种着重点的嬗变,凸显了这样一种方式:收看电视这一

81

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种家庭关系构成的一项“个体化”活动。尽管莫利的研究点发生了这种变迁,可在我看来,他很明智地将这种可能性保持开放性:预想性意义能修正受众的各种主观成见。

这一家庭电视调查课题,考察了18户白人家庭(每个家庭有两个成人,并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他们在1985年接受了采访。尽管莫利密切地注意收视语境(他采访了失业的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可在电视收视的性别重要性方面,他的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聚焦点。关于电视收视这一社会活动的性别特性,明显地表现于跨社会阶级的所有家庭和社会等级。莫利写道,“考察家庭的电视收视情况,根据界定,就是考察男人能够处之泰然全神贯注去做,而女人似乎只能漫不经心或带着歉疚心情去做(因为她们始终想着自己的家庭责任)的某些事情”(莫利,1988:147)。

在大多接受采访的家庭里,控制家庭其他成员收视方式的,是家庭里的成年男人。家庭里男人处于支配地位的突出现象,还明显地表现于对电视机和录像机的操作。然而,男人控制的局面,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始终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挑战。在此仅举几个例子。接受调查的第三个家庭的一个成员(一个失业的父亲)说,他与电视的关系是一种“沉溺——它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兴奋剂”(莫利,1988:68)。莫利注意到,在这一家庭里,电视机很少关闭,这位父亲长时间默默无语地收看电视,表现出一种男子气的沉迷。这是男人通常收看电视所喜欢的风格的典型表现,而女人们则更有可能忙于至少是一种其他的社会活动。男人和女人们还都承认,男人看电视的时间远远超过女人。这种现象又被莫利从家务的性别分工角度加以解释。对男人来

说,家庭被体验为一个放松休闲的场所,而对所有社会阶级的女人来说,享受电视的欲望,总是需要在负疚和义务的诸种情感之间找到平衡点。当女人们能得到一点机会,通常是在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往往收看各种娱乐节目,这些娱乐节目尤其受到她们丈夫的负面评价,他们会说自己偏爱更具事实的电视节目。的确,由男人控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种情形,上文提到的那位失业的父亲对参与家庭外面的各项活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莫利解释说,因为家庭外面的各种活动常常是自由的,这位父亲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是为了避免“绝对权力”(total power)的潜在性丧失(莫利,1988:70)。

接受调查的第十个家庭的母亲(工人阶级),对肥皂剧常常在妇女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具有敏锐的意识。妇女相对孤立于公共领域,这意味着她们经常有三个主要的谈论话题(孩子、家务和电视),这些话题为共同体生活提供了社会“胶合剂”。根据莫利的研究,他注意到,尽管电视节目的主要收视者是男人,可妇女从总体上看,更有可能承认自己喜欢谈论电视节目。莫利在其以后的著述(1992)中,将男人对现实主义和事实性的电视节目的迷恋,阐释为防止陷入幻想抑或激情的一种方式。相反,妇女收看电视时需要“做点别的什么事情”,这可以与性别同一性构建于家长式社会的方式相联系。在现代的核心家庭里,妇女收看电视依然是一种有愧于心的快乐,其原因是妇女的性别角色,因为这种性别角色要求她们永远将自己的需要、欲望和快乐屈从于丈夫的需要、欲望和快乐。

最近,安·格雷(1992)继续进行了莫利的一些研究,她考察了妇女与家庭录像技术的关系。与莫利一样,格雷提出,传播研

究里的“效应”传统否认了主体的文化能力。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巧妙地补充了莫利的研究方法,因为她强调了妇女与录像和录像机互动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性。她的探索将性别凸显为家庭技术具体用途的主要决定因素。格雷发现,大多妇女,不论属于何种社会阶级,在一般情况下均不善于操作录像机,而且对录像机定时功能的操作尤其困难。有一种观点认为,妇女在这方面缺乏技能,是与对技术的普遍性恐惧相联系的,格雷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根据格雷的看法,同时也是家庭分工的明显特点是,妇女精通大多数男人所不具备的厨房技术。但是,成年妇女与家庭的其他成员相比,在借助录像机来组织收看电视节目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弱势。她发现,在录像带上保存视像信息,通常是一项非男人莫属的工作。尽管存在着这种现象,可在调查中接受采访的妇女,非常明显地喜欢对一个特定的电视节目仅收看一次,而有些男人则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收看同一部电影。在此,格雷再次与莫利的看法一致,即有必要将各种私人家庭快乐放置到性别关系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学语境里去。

## 家庭休闲时间里的阶级、 权力和意识形态

莫利对电视收视的社会学和符号学特性的观察,开辟了媒介研究的各种重要视点。本书前几章的讨论,已聚焦于现代各大众传播体系的具体的公共特性。莫利则反对这一倾向,他提出,在“普通”的家庭环境里权力的性别化运作,是收视型式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在他的家庭电视调查课题里表现得

认识媒介文化

尤其明显。这些深刻的见解根本不是莫利一个人所特有，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与女性主义者的思想流派一致。将公共语境与私人语境进行理论上的分离，这是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大众传播媒介所特有的方法。在这种语境里，对威廉斯和哈贝马斯的贡献，包括其他学者的贡献，我已力图作出批判性的辩护。这些学者的贡献依然明显地围绕着一个由男子界定的公共领域。尽管对大众传播网络运作的公共体制环境的分析依然至关重要，可这不应该被允许去掩盖私人领域的重要性。根据莫利和格雷的看法，家庭环境的诸种不平等关系，对受众所采用的各种解码策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问题依然是，诸如莫利那样的研究，再次产生了前文概述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者之间的一些性别分离。莫利颇为排斥性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种家庭环境，往往将它们孤立于这样一种情况：家庭环境不断受到更具公共形式的金钱和权力的作用的影响。因而，性别分离的结构重要性维系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内涵。这种研究上的疏忽，也许是借自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的某些缺陷所致。我在第一章已指明，霍尔对意义和符号学的研究，使分析远离权力的各种更具物质性的体制系统。可以注意到的是，莫利已具体地发展了这一模式的84 解码方面，而不是编码方面。尽管他最近的著述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偏见，我认为他的探索在这一方面的重新构建是不适当的。就莫利研究大众传播理论的著作而言，我的主要困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人们指责莫利忽视对各种宏观和微观语境的交叉点的分析。他(1992:275)最近力图针对这一指控为自己辩护。他声



称自己认识到,对受众的意义和实践的任何研究,都应该涉及对象征资源和物质资源之间的彼此联系进行分析,并且应该认识到,尽管受众被隔离于对体制诸过程的控制之外,可受众并不是完全“没有权力的”。结构主义传统将受众的诸项实践和阐释还原为文本效应,而用途与满足的研究方法则强调某些原子化了的的各种心理回应,而不是强调对受众各种行为进行历史的和社会学的陈述。莫利认为,他是在这两者之间谨慎地行走。他提出,在这一方面,他的研究与安东尼·吉登斯(1984)的构造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极为相似:

最后,这不是这样一个问题:简单地理解电视意识形态的(或表征的)作用,抑或简单地理解电视惯常的(或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功能,抑或理解电视的家庭(而且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说是社会的)消费。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去理解所有这些彼此有联系的论题(或方面)。(莫利,1992:276)

安东尼·吉登斯的构造理论的提出,是为了避免莫利在反对用途与满足研究方法和结构主义时所发现的那种两极分化。吉登斯反对将行为和结构视作分析的两个不同方面;相反,他从他所谓的“二元性”角度,对行为和结构进行理论上的表征。代理机构一般被视为以不同的方式去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的能力。社会学家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是,摒绝用这种行为的意识去反对各种起决定作用的结构。相反,就像“二元性”这一词所表明的那样,最好将代理机构和结构视为两个相互依存的理论范畴。吉登斯写道:

结构被理解为蕴含于各种社会体系的各种集合体“形式”的诸种规则和资源,可以得到跨越时空的复制,它就是人类代

理机构“人性”因素的媒介物。同时,代理机构是结构的手段,它是个体在其各种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来的。(吉登斯,1987a:220-221)

至少对我来说,吉登斯凭借对语言使用的讨论,最好地说明了他的构造理论。语言(*langue*)的各种规则演绎于言语(*parole*)的实际生产。因而,语言使用的一个不经意的结果,就是某些生成规则的再生产。当然,缘于实际性的实践,这些语言规则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语言作为一套规则和资源,不能被视作由一个人生产,或只为一个人生产;相反,语言先于言语而存在,而且是语言使用的85 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语言使用的一个直接产物。因此,各种社会结构可以被概念化为一套套的规则和资源,既能推动行为又能制约行为。同时,人类的代理者按照惯例,反思性地监督自己的举止,并且能够为自己的各种行为提供各种理由。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代理者总是意识到自己各种行为的结果,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自己各种行为的诸种条件。对构造理论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姑且不论,我认为,莫利关于媒介的论著,仅仅是在表面上与吉登斯的理论著述有联系。

吉登斯提出,人类活动的构造发生于各种体制环境。在这种语境里,莫利几乎未曾提及仰仗于阶级和性别的物质和象征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现在可以回到家庭电视调查课题里的那位失业的父亲,来说明这一个问题。在此,父亲沉迷于电视的收视,这说明了明显表现于家庭语境中的男子控制形式的具体体现。这似乎尤其明显的是,这位父亲不愿意参加家外的各种文化活动,因为这会削弱他对家庭各种文化追求的控制。莫利的阐释忽视了戈尔丁(1990)的这样一个论点:一个人在阶级体系

里的地位将构建一个代理者享用某些文化商品的权利。这就是说,一个家庭能得到免费戏票,并不意味着他们能享用得体的衣服、交通工具或培养孩子的费用。再者,布迪厄(1984)的研究已表明,为享受某些戏剧所必需的各种文化能力,取决于家庭背景和家庭的教育程度。因此,凭借权力的作用,某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限制着向公共环境和私人环境里的人们开放的物质和象征选择的范围。吉登斯会提出,尽管这种权力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可它的确限制着甚至那位最富有家长作风的父亲的主权。再说,尽管莫利(1992)最近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些观点,可这些观点并没有在《国内焦点》和家庭电视的调查课题里出现。

其次,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和出售的文化商品,大多是由各商业机构生产出来的。就像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提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文化里,一件文化商品的成功取决于这件商品能否赢利。在前面讨论雷蒙得·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研究的特殊贡献时,已阐述清楚的是,需要有回报这一动机,严重地制约着在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根据吉登斯的模式,消费者在这一过程里不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可以拒绝购买一些特殊的产品,但是他们对可以享受到的各种文化形式没有直接的控制权。因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相对来说是一套经久不衰的规则和资源,这些规则和资源“限制”了消费者的各种选择。莫利对更具微观社会语境的强调,又一次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现象。 86

2. 任何涉及权力不平等分配的分析,均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领到意识形态的领域。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非常有益地被界定为“这些方式:意义(意指)用来维系各种统治权的关

系”(汤普森,1984:130-131)。这种研究是以检验统治的各种结构被神秘化的方式为先决条件的,同时又重新肯定并混淆了各种力量关系。就像莫利所透彻理解的那样,在统治的诸种关系的语境里探讨意义的调动问题,就是关注意义在各种日常的环境里得到阐释的各种方式。尽管莫利更加注重于各种家庭语境,可他力求使这种可能性保持开放性:对文本的预想性解读能强化某些占主导地位的准则和价值观念。再者,就像对《国内焦点》的研究已经表明的,批评各种权力结构的各种电视节目,也可能会受到收视者更加开放的意识形态视点的抵抗。虽然莫利阐述意识形态问题的方式依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但在此我想集中讨论由格雷格·菲洛(1990)提出的几个问题。

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其时间持续之久,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和艰苦卓绝的论争,当时的英国新闻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菲洛想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权力和权威的霸权性运作,能操纵公众对这次罢工的理解。他根据一系列照片写了一篇能充分反映这次罢工的新闻报道,并广泛地向社会各阶层的受众作了了解,以此来说明他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揭示一只手枪的照片与警察、正在工作的矿工或正在罢工的矿工是否有联系。他发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手枪是与罢工矿工,甚至与那些同情这次罢工目的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菲洛认为,这一发现极有意义。他将这一发现与出现于罢工期间的新闻报道的各种主导性意识形态系统联系起来:纠察线意味着暴力行为,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责任在于罢工矿工。菲洛的研究还表明,如果不考虑政治视点,那些在罢工期间与纠察线有直接或间接牵涉的人,不太可能会相信,那些地方大多出现了暴力

冲突。因此,那些对纠察线有个人体验的人,不会接受媒介所提供的各种主导性视点。对电视新闻持怀疑态度的其他一个主要原因,是有机会接触其他各种视点,其主要的渠道是严肃的新闻报刊、地方新闻报刊和无线电广播。国家和全国性的广播媒介将这次罢工认定为事实犯罪,这使得更具公共形式的矿工凝聚力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国家对新闻报道的操纵,最明显地表现于将注意力放在罢工结束后矿工“大规模地返回”工作岗位的情况。在此,全国性的新闻报道的基本主题是返回工作岗位的人数(数据是由国家控制的煤炭委员会提供的),而不是仍在继续罢工的人数。这种话语策略的意识形态“效应”,以将放弃工作<sup>87</sup>的矿工孤立起来为手段,再次制约了罢工的凝聚力。

对像莫利那样的更具“微观性质”的各种研究,菲洛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这些学者的研究,不可能反映某些意义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生成并使其固定下来的社会诸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指控。虽然菲洛的探索近乎强调,要对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主旨进行修正,但他的确表明,有必要将某些有意坚持的视点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让人感到意味盎然的是,尽管莫利的后期著作想使预想性的解读可能性保持开放,可他无法提供许多例证来说明这一贯穿始终的过程。菲洛更具宏观的研究方法,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它有能力阐明国家和全国性的媒介能够提供这种意识形态框架的方式,根据这一框架发生了这些关于这场煤矿工人大罢工的论争。然而,即便存在着以上所讨论的各种观点,莫利更有明确定位的著述,矫正了菲洛的宏大计划。就像莫利在《国内焦点》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菲洛视点的盲点在于,职业性的群体讨论,人为地将意义和

语境割裂开来。菲洛没有真正探讨语言意义有赖于普通行为者受社会特定地位影响的各种阐释的方式。的确,他继承了格拉斯哥媒介组对这些方式的强调:由新闻媒介传递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利于形成关于政治论争的合法的话语范围。譬如说,那次煤矿工人的大罢工情况,在不同的罢工时期可能会被赋予各种不同的意义(各种采访是在罢工结束一年后发生的),况且关于罢工的情况是在公共场合了解到的还是在家庭环境里了解到的,会导致人们可能对此作出彼此相异的阐释。假如我们还没有忘记那长达一年之久的矿工大罢工当时是一件政治事件的话,那么对这一论点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就像莫利对《国内焦点》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归因于电视内容的各种解读,比起有可能霸权地保证社会的一致性来,更有可能衍生一种复杂而分歧的意义范围。

3. 人们常常感觉到,传播媒介是关于社会领域的各种思想和观念传播的一种强大动力。各种批判性研究,尤其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里的批判研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媒介内容影响各种自觉的信仰和实践的诸种方式之上。这种视点的传统批判是,它言过其实地表述由媒介传递的各种讯息的凝聚作用,而漠视对处于不同社会景况的各个代理者阐释一系列信息的方式进行剖析。莫利还进一步批判了这种范式,提出意识形态的诸种观念应该得到扩张,去审视媒介怎样有助于每天的时间安排。
- 88 排。播音员总是对各种受众怎样安排他们的时间和更加重要的是哪些人收视电视,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我们经常谈论早上的各种报纸、早饭时间的电视和晚上就寝时间的无线电广播第四台的书籍评论。对这些文化形式,我们都以一种共同的惯常

性方式积极地参与,这同信息的内容一样重要。

这些观点的发展很重要,因为这些观点反映了媒介构建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这样的社会生活超越了实际上自觉信奉的各种信仰。但是,莫利(菲洛就这件事也是这样)还会因为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影响各种意识视点(*conscious perspectives*)的方式之上而受到批评。特里·伊格尔顿(1991)提出,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电视的收视上,这在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作用于收视者的意识形态效应。或许最为至关重要的是,尽管人们收看电视,可他们并没有参与更加严肃的政治活动。按伊格尔顿的话来说,电视“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机器,倒不如说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伊格尔顿,1991:35)。这一点很重要,各种具有镇压特性的制度均未曾放弃这一点,它们均竭力使民众把兴趣保持在从世界市场可以买到的廉价的商业电视这种日常饮食上。在当代的西方社会里,电视的重要性可以与家庭里的各种休闲活动的个体化联系在一起(菲利普斯和汤姆林森,1992)。一种更以家庭为中心的休闲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也许能在诸种休闲实践和孤立于更为广泛的集体性之外的诸种社会形式的原子化里找到。的确,就像勒菲弗(1992)曾经提出的那样,休闲时间可以被认为是消遣的一种形式,因此是脱离劳动世界的一种休息。因而,休闲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在电视新闻广播的内容里找到,也不可能在公民们阐释电视新闻广播的各种方式里找到,但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实里找到:休闲是一项被动的,而且并不需要特殊智力的活动。这并不是说,媒介研究应该回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被动消费者的观念,而是想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大多数时间对大多数的受众来

说,积极地参与现代文化是逃避的一种形式。再说,虽然莫利的更具社会学意义的强调,是密切注意家庭语境,他的符号学倾向言过其实地强调了受众阐释能力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

在短短的一节里,我们已经看到,莫利对电视受众的探索,开创了对受众活动的一种符号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最近,女性主义对男人沉迷于公共领域而不是私人领域的情况进行了批评,从这一角度看,这些论点被认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莫利的分析证明,受众对媒介技术和各种文化形式的特殊“用途”,是通过对各种家庭环境的人类考古学来得到确定的。但是,尽管莫利作了一些限制条件,可他的著述依然远离于金钱和权力的各种更加广阔的结构语境。这明显表现于以下几种情况:通过各种更加宏观的权力框架来联系各种家庭语境的构建;融合这些

89 统治结构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在场(absence);将某些文化活动的

的作用当作社会控制的诸种形式,这可能比它们的符号丰富性更为重要。这些问题将在下面几个部分里继续得到关注。

## 约翰·菲斯克与通俗文化的快乐

像戴维·莫利一样,约翰·菲斯克力图详细阐述一套建基于霍尔原先关于编码/解码论文的通俗文化理论。浏览一下他关于通俗文化的大多数著述,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区别:表现资本主义特性的各种工具性而且合理化了的生产形式与消费者赋予这些产品各种创造性意义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生产各种文化形式的各种经济机构的利益与受众的阐释性关注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断裂。菲斯克将这种区别表达为“权力集团”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秩序)与“民众”(跨越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的一套套为人们所感觉到的社会忠诚)之间的对抗。“权力集团”生产出统一的而且是成批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然后转换成“民众”的各种抵抗活动。菲斯克提出,“通俗文化是由民众创造的,而并不是由文化业生产的”(菲斯克,1989a:24)。因此,为了被认为具有通俗性,各种商品必须能够为了经济回报而得到成批的生产,而且必须潜在地向民众的各种颠覆性解读开放。在菲斯克看来,我一旦从当地的音乐商店购买了麦当娜新的激光唱片,这一产品就已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策略。麦当娜音乐不纯粹是一种标准化了的产品,能够借助全球性资本主义的一些机构来购买,而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资源。消费行为总是蕴涵着意义的生产。

意义的流通,需要我们研究三个层面的文本特性,同时需要搞清楚它们彼此之间的具体联系。首先,随着麦当娜新的唱片集的发行,出现了各种文化形式,以营造一个媒介事件的理念。这些文化形式可以包括音乐会、书籍、海报和录像等。在第二个层面,在各种通俗的杂志和报纸、各种电视流行节目和广播节目里,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媒介的讨论。这些讨论均对麦当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判性评述。文本特性的第三个层面,即菲斯克声言他最为关注的层面,涉及麦当娜怎样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诸种方式。根据菲斯克(1987a,1989b)的观点,麦当娜的生涯,发迹于一首叫做《幸运之星》的早期歌曲的摇滚录像片。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密纹唱片和单人的演出节目、电影《拼命寻找苏珊》、出现于《阁楼》和《花花公子》等杂志上的裸体照片,以及对其某种“色相”的成功出售,麦当娜作为一个文化偶像,一举成

90 名于 1985 年。菲斯克认为,麦当娜为了巧妙地颠覆各种家长式的意义,在象征意义上玩弄由男人主宰的对处女和妓女的种种传统陈旧的观念。这就是说,麦当娜的文本特性在意识形态上破坏了对妇女的各种传统表征。为了解释麦当娜的成功,菲斯克提出,她是一个开放的或作家特有的(writerly)文本,而不是一个封闭的读者特有的(readerly)文本。就这一方面而言,麦当娜能够向她的崇拜者提出挑战,使他们从她和家长式的资本主义所提供的诸种文化资源中重塑他们自己在性方面的同一性。为此,作为一个文本,麦当娜是多义的、家长式的和怀疑性的。归根到底,麦当娜之所以能够走红,并不是因为她受到文化业的抬举,而是因为她想在由男人主宰的文化里塑造自己的同一性的企图,与她的崇拜者具有某种相关性。

尽管菲斯克汲取了一系列的文化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可米歇尔·德塞尔托(1984)的著作与菲斯克的研究方法具有一种特殊的共鸣。对德塞尔托来说,对通俗文化的最好界定,是对文本所起到的作用,而不是文本本身的实际域(actual domains)。日常生活必须在由权力集团所开辟的各种工具性空间里起作用。阅读一本时装杂志、倾听一集低劣的唱片集、戴上一条英式足球支持者的围巾或挂上一幅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照片,均是想找到使用通俗文化的一条途径,而这种通俗文化应该不受其生产者严格的规约。消费行为是弱者“战术”的一部分。弱者在占领强者的空间的同时,将惩戒性和工具性的时间转换成自由的和具有创造性的时间。规避统治的诸种工具性模式的各种具体战术,或者德塞尔托有时所称的文化偷猎(cultural poaching),实际上永远不会得到物化,因为这些

战术总是不断地变换,因而无法被察觉。根据这一思想脉络,德塞尔托将这些能够瞒天过海的机灵行为描述为“假发” 譬如说,在工作时写一封情书的行为,是从一种工具性的活动中偷取时间的一条途径,并将这种时间转换为一种更有美感的追求。所以,尽管权力集团的各种行为主宰着诸种文化形式的生产,并规范这些形式接受的空间,可弱者的各种解读过程逃避了直接控制的各​​种策略。再举一个取自德塞尔托的例子:虽然西班牙殖民者“成功”地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土著印第安人,但这些被征服者能从这种被强加的文化中,创造出某种不同于征服者所想要的东西。达到这一目的,并不是通过革命斗争,而是通过接受西班牙文化,并巧妙地转换这种文化,为他们自己所用。

菲斯克追随德塞尔托,舍弃了明显表现于当初的编码/解码模式里的关于“预想性解读”的观念。菲斯克和德塞尔托两人,均热衷于将自己远离于诸如由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各种文化理论。这些文化理论认定,与其说消费者制造更像他们自己的产品,倒不如说他们成了更像产品的人。在德塞尔托看来,更为保守的文化陈述,肇始于这种启蒙运动的信念:知识的某些已核准的形式能改变民众的习惯。这种特殊的思想倾向,在那些构建文本的专业知识分子和那些被认为是被动的文本吸纳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明确的等级制度。根据这种解读,“权力集团”企图依靠等级将某些阐释强加于他人,用来封闭文本的各种潜在意义。然而,现代世界已目睹了传统力量在总体上的衰落,尤其是以这种方式规约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衰微。德塞尔托写道:

如同飞机使这样一种事实成为可能:人们愈来愈独立于地

理组织所强制的各种约束，快速阅读的各种技巧凭借眼睛的极少停视，加速了扫视整页文字的速度，获致了与文本的诸种决定因素有关的自主权，并增加了阅读量。从各个固定的地方解放出来，阅读群体在流动方面较以往更加自由。（德塞尔托，1984:176）

的确，在德塞尔托看来，写作的需要来自想把握和整理世界的心理欲望。因而，小说的兴起，是企图再经历一番一些普遍性语言，这种语言在先前的时候将一个人的位置限定于传统社会里的世界。在原子化了的个体价值主义的现代，某些信念的承诺进一步衰竭。再者，由于诸如各种宗教和政治组织的体制失去了培植信念的能力，民众在诸种媒介和休闲活动中寻找避难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叙述”的社会，这个社会始终不断地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流传各种记叙文和故事。在这个后真理（post-truth）的世界，民众浸透着为赢得受众的赞同而努力的众多话语，所不同的是，象征着现代性特性的讯息爆炸，再也不会铭刻着这些讯息发出者的“权威”。德塞尔托贴切地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旧的各种宗教式权威形式，已被赋予读者而不是作者以权力的众多叙述性故事所取代。同样，菲斯克提出，从民族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意味着生产制度已变得更加“遥远”，为对抗性战术留下了必要的空间。菲斯克和德塞尔托所确认的现代性的重要悖论是，权力集团生产的信息越多，它就越没有能力控制处于社会特定地位的各主体对信息的各种各样的阐释。为了详细说明这一观点，菲斯克（1987b）经常引用霍奇和特里普（1986）对儿童与电视关系的创新性探索。

霍奇和特里普旨在驳斥这样一种凑合在一起的荒诞观点：

电视对孩子来说肯定具有教育上的坏作用，家长与孩子解读电视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的这种关注，尤其明显地表现于他们的这一努力：想阐明《H号牢房》这部肥皂剧风靡于澳大利亚小学生中的诸种原因。霍奇和特里普发现，小学生在心理上认同这部电视系列片中的女囚徒。两位作者通过小学生在学校中的<sup>92</sup>地位与那些虚构的囚徒的地位在构建上的诸种相似性，来解释这种现象。小学生和囚徒们均生活在一个单一的权威之下，在一个来自上级所强加的经过严密安排的秩序里受到同样方式的对待，而且他们的各项活动均要经过这种体制的理性计划的协调。这些小学生们还从以下这些情况的角度来说明学校与牢房两者之间的若干相同点：他们常常被关禁闭，与自己的朋友相隔离并享受不到权利，被迫上学，并且被迫遵守他们认为没有多少意义的各种规章等等。这些学生们的自我感知，类似于那些囚犯所表征的自我感知，他们在牢房里的角色也被还原为“像一个个孩子”。同样，作为权威人物的教师和狱卒，常常被相提并论。因此，《H号牢房》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因为孩子们将学校理解为监狱。现在让我们回到菲斯克的论点上来。就像霍奇和特里普所翔实表明的那样，“通俗”文化是开放、流动和易变的文化，其实现仰仗于弱者的象征性战术。唯有从存在于成人与孩子之间的权力的不对称关系，来理解孩子们的各种不同的阐释，这些小学生的各种象征性实践才能为人所理解。虽然我承认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但假如菲斯克的结论能够让人接受，那么对孩子与电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与其说应该关注电视在意识形态上的腐蚀作用，倒不如说应该关注电视是怎样被当作一种抵抗的形式。

## 通俗的报刊使生活更有乐趣

在一本重印的采访录里,菲斯克将自己的理论观点,描述为力图阐述“一种快乐的社会主义理论”(菲斯克,1989b)。这些产生于下层民众的不虔诚的享乐形式,与权力集团所采用的惩戒性策略形成对抗。在此,涉及受众对文本的解读,存在着双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关于意义象征性生产方面的享受,这与权力集团意义的象征性生产形成对抗;第二种快乐是关于能产性的实际活动。这些活动在各种现代环境里尤其重要。与他的同事约翰·哈特利(1992)一样,菲斯克提出,现代的官僚政治受制于一小批手中掌握着实权的人。议会民主“远离”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结构,意味着参与政治,只有通过对通俗产品的创造性使用来实现。在这一图景里,市场与权力集团的高雅文化的衰落不一样,它带来了民众批判视野里的某些文化产品。权力集团的许多文化生产的难题是,这些文化生产仍然缺乏多义性,并且太讲究对客观真理的探求。这种思想倾向暗示,寻求终极的普遍性真理是极权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其结果是关闭真理的多元性,而这种真理的多元性在一种民主秩序里是理应得到表达的。新闻应该更加准确和更加客观,这些论点实际上支持了权力集团的各种话语实践。电子新闻工作的一个更加民主的形式,会着意于揭示真理要求在社会和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式,以此竭力讽刺真理要求。声言只有一个真理,这就意味着向真理的统治政权投降,而且否定了文本潜在地获得自由的快乐。但是,一旦信息的生产放弃了“作者具有上帝的腔调”(菲斯克,

1989b: 193), 那么这就会鼓励受众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对世界意义的理解。尽管公民们被排斥于直接参与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各种决策过程之外, 可他们可以被允许以各种更加微观的方式参与符号民主。

菲斯克(1992)最近通过对报刊的讨论, 力求使这些理论观点变得更加具体。在此, 他概述了新闻生产的三种不同形式: 严肃性、他择性和通俗性。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 “权力集团”的文化生产通过鼓吹各种普遍性价值观念, 在意识形态上掩盖文化生产的偏心特性。就这一方面而言, 严肃性报刊通过对客观事实的生产, 实际上是使其产品适合于培植信念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在读者中滋养怀疑主义。在哈贝马斯(1989)的表述里得到辩护的 18 世纪的公共领域, 并不十分在乎在交往理论方面展开某些已经遭受到压抑的疑问, 因为这是统治的一种策略。决定是否传播并不需要弱者积极参与的某些信息形式的, 是权力集团而不是公民。第二, 对各种更为激进的视点的传播, 是由他择性报刊实施的, 这些报刊有赖于激进的新闻记者的行为, 并主要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阅读。这种形式的新闻的批判性, 与其说是针对严肃性报刊的行为, 倒不如说是针对统治者的行为, 但它们的读者和作者通常是由权力集团本身更具边缘性的代表组成。耸人听闻的或通俗性的报刊, 与严肃性的或他择性的报刊不一样, 它们削弱了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对抗性。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举措, 因为娱乐既是所谓的“硬”新闻, 也是一种话语的产品。况且, 为了使新闻更加通俗, 它需要有能力娱乐性地吸引受众。菲斯克还声言, 在严肃性报刊生产出轻信的主体的同时, 耸人听闻的小报却鼓励读者对文化生产更具批判态度。

凭借对各种开放性文本的生产,耸人听闻的报刊引发出:

- 94 带有怀疑性质的笑声,这种笑声提供了疑惑的快乐和未上当受骗的快乐。这种“看穿”他们(指此时此刻手中有实权的人)本质的大众快乐,是许多世纪以来顺从的历史性结果,可民众没有让这种顺从发展成为屈从。(菲斯克,1992:49)

耸人听闻的报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种报刊所发表的文章和新闻特写是否真的那么真实,而在于它对真理的官方体制所持的对抗态度。菲斯克提到一个关于外星人到达地球的故事,以此来详细说明这一论点。他说,这一故事经常出现于通俗小报的新闻写作。这类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们颠覆性地混淆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因而瓦解了由权力集团播撒的主导性语言游戏。再者,尽管官方新闻企图在意识形态方面遮掩明显表现于其话语中的诸种矛盾,可通俗报刊却有的放矢地竭力夸张某些标准,从而使这些标准反常化。菲斯克在此的论点是,具有通俗小报明显特征的轰动性故事,生产出作家特有的文本,因为这些故事公开地招引读者的阐释性参与。像诸如麦当娜和肥皂剧那样的其他通俗文本一样,各种通俗小报保持其通俗性,主要是通过以向弱者的战术开放的方式告诉民众有关世界的信息。根据这一理解,彰显于西方民主的各种各样的非政治化形式,与其说可归因于通俗的报刊,倒不如说是严肃性报刊使然。然而,菲斯克认为自己已意识到,通俗的报刊很少与政治上的进步目标合拍。但是,根据菲斯克的观点,通俗的报刊的文化形式和文体风格,可能会不利于权力集团的利益。左派的一个政治策略应该是,防止“说教”(菲斯克,1989a:178),并提倡给人以快乐的文



本，这种文本会抵挡强加某些社会正确意义的诱惑。这会开辟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真正的左翼报纸不会刻板地力图控制由读者产生的各种意义。

## 空洞的民粹主义还是抵抗的快乐？

约翰·菲斯克对媒介和文化的研究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他强调受众在进行各种协商性和对抗性的解读过程中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通俗文化的研究，并不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或公共领域的宏观性问题，而是关于弱者的规避性战术。这种观点对那些始终忽视受众参与符号造反的人，提供了一剂重要的矫正药。但是，我想提出，约翰·菲斯克的著述带有无可弥补的缺陷。在此，我将为这一看法提出五个主要理由：(1)他的阐述对构建象征性接受的诸种机构不够注意；(2)他的各种论点排斥意识形态理论的可能性；(3)他对通俗报刊的观点，没有包容<sup>95</sup>对其实际内容的任何具体考察；(4)他对公共领域的离散的政治重要性缺乏批判性概念；(5)他总是以自己对通俗样式的解读来取代受众的解读。

1. 菲斯克关于快乐的社会主义理论，仰仗于使民众民主地享受文化商品的市场观念。这种假定，唯有在文化的各种大众样式与所谓的“高品位文化”相比较时才能得到维系。布迪厄(1984)声称，想要享受“官方艺术”的那种相关的文化意向，有赖于主体的家庭和教育背景。这种意向——或者布迪厄所说的主导性审美情趣——是一种后天获得的肉体感受，这种感受强调，对积极的参与采取超然和沉思的态度是第一位的。统治阶级的

习性,可以在具有自然的感人超凡魅力的意识形态里觉察得到,同时也可以“品味”是一种天赋的这样一种观念里加以辨别。主导性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产生于在统治阶级中产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分离。知识分子与物质需要的分离,意味着他们在传统上已错误地将自己的文化生产当作没有私欲。布迪厄的意旨是,将诸如那些涉及文化生产的明显的中性实践(neutral practices),当作获取金钱和权力的一项策略来处理。知识分子的审美意向,将他们对某些类型的象征性商品的具体生产和接受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解释。相反,通俗的审美情趣,即工人阶级文化意向的产物,表达了对参与和直接满足的欲望。这或许可以将英式足球的风靡性解释为工人阶级男人中的一种观众体育运动,这更不用说参与时装表演和歌咏等活动的各种机会。体现于通俗审美情趣的诸种文化实践的范围,与由主导性的审美情趣生成的文化实践范围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在主导性的审美情趣中为受众的参与而产生的社会空间,受到更加严密的规范化。根据布迪厄的观点,从美术馆或博物馆的那种不那么具有自发性的氛围中获取快乐,是以人们能够享受合适的社会代码和社会意向为先决条件的。

如果我们回到菲斯克的观点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联系文化实践中大众对强烈参与感的需要这一方面,他和布迪厄的阐述具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些文化实践,是不是因为过多的通俗小报、肥皂剧的作家特有的文本抑或英式足球观众层面的更加直接的快乐所致,这可以在权力集团的工具性生产与资产阶级的审美意向的对立中得到界定。认为较之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或权力集团的通俗文化,市场的通俗文化更具有包容性,这

一论点看来的确具有某些道理。但是,在他们所承认的具有明显差异的分析里,菲斯克和布迪厄两人均没有持久地去注意文化业的各种机构(加纳姆,1986b)。譬如说,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商业体制,被调适为以某些部分受众为目标。迪克·赫布迪格将后福特主义从批量生产转向更为灵活的生产这一情况,描述为“富有抱负的社会学”(赫布迪格,1989:53)。他这样说,其意思是,文化的商业样式,在象征意义上被筹划为与各消费团体的生活方式和未来欲望相联系。在此,人们依然感到模糊的是,各目标团体的对抗性解读,实际上构成了各种抵抗形式,这些形式颠覆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或者说,文化的商业样式像菲斯克所暗指的那样在物质上具有可接触性。

再如,计算机游戏通过电视广告、商业杂志、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和通俗的报刊,出售给青少年受众。菲斯克可能会提出,有些游戏的布局构成了相对开放的文本,这让文本向符号的抵抗形式开放。这一论点的难题是,难以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是怎样受到这种活动的威胁。的确,就像其他的文化形式一样,计算机游戏可能具有某些特意输进去的符号开放性。我在第二章已经提出,统治的诸种结构,就像凭借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来维系一样,也通过社会的原子论来加以保障。社会想像的构建,是通过差异和多样性,而不是通过统一性,这样一个社会为资本主义的各种积累策略,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市场。诚然,就像菲斯克所表明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抱批判态度的某些解读,不能通过大众的积极参与来得到开辟。相反,我在此的观点是,一种离散的文化,对营造与那些在时空方面没有直接在场的人的协同性关系所必需的社会凝聚力,可能会起

到削弱的作用。这种情况可能会消解这样一些政治努力：象征性地创造弱者之间的联盟，以反对权力集团。的确，人们也许会提出，受众在文化方面的裂变特性对文化业有利，因为这会提供各种新市场，并促进一种具有个人价值主义的文化。

倘若这一论点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抵抗资本主义计算机游戏业的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就是采用消除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策略。这些行为可以包括建立向公众开放的计算机游戏方面的图书馆，并由各合作团体制作出新的游戏。这些计划之所以不太可能会实现，显然是因为投资受到了各大跨国公司的控制，这反过来又继续不断地使各种公共的文化形式私有化。这一问题完全被菲斯克所漠视。实际上，他甚至曾经指出，明显表现于舞池、风靡性文化以及其他大众行为的诸种新的协同性形式，可以为一个更具有社会正义的社会提供基础（菲斯克，1989a:176）。一个更具有体制性的参照系统，或许会

97 通过将受众的回应与在社会方面可以再生产的统治结构联系起来，借此使受众的创造性回应得到更加充分的语境化。根据这种阐释，符号的戏谑性和现状的主导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会超出菲斯克的预料。

同样，由于缺乏体制方面的视点，菲斯克所漠视的是物质，而不是受众中的象征性区别。就像彼得·戈尔丁（1990）已指出的那样，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享受文化商品方面，表现了极大的不平等。这种情形主要取决于被大量宣传的富人与穷人之间愈来愈大的差距。菲斯克似乎假定，资本主义市场具有民主化的效应，因为它使整整一系列的令人快乐的文本能被人们广泛地享受。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人们将各种真正的通俗文化

形式与那些需要应用少得可怜的象征性资源的文化形式相比较,那么这一论点就具有某种效度。然而,如果我们回到上文所陈述的对计算机游戏的分析,那么应该已十分了然的是,这种分析忽视了对必需具备的计算机技术的不平等分配的讨论。1986年,在每星期的收入超出550英镑的家庭中,有32.1%的人拥有一台家用电脑,而那些靠每星期的收入只有45英镑或更少的钱过日子的家庭中,只有1.3%的人才拥有一台家用电脑(戈尔丁,1990)。阶级结构除了设置象征性障碍之外,还给文化的参与形式设置了物质障碍,菲斯克对各种符号和象征的关注却忽视了这一情况。

2. 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有赖于这样一种观念:某些语言符号象征性强化了物质的主导性关系,或对这种关系置之不问。我倒认为,菲斯克始终将大众意识形态解读为一种抵抗形式,以此来排斥意识形态理论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回到布迪厄的观点上来,那么就会明白,菲斯克就是缺少了这样一种文化的主导性理论。布迪厄将主导性的审美情趣当作任意性,因为某些上层阶级的腔调和趣味为何应该表明一种高品位的文化,这没有内在的缘由。文化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资产阶级错误地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生产的形式看作不受世俗影响和没有偏心的。譬如说,教育体制通过主导性审美情趣被公认的优越性,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统治。布迪厄和帕斯龙(1977)提出,教育体制将生活的主导性形式强加于工人阶级。这种主导性习惯不会将各主体社会化到教育体制所需要的文化模式里去,但会导致被统治阶级的自我排斥。凭借布迪厄所称的象征性暴力这样一个过程,工人阶级认识到,那种主导性的习惯较之他们自己的习

惯优越。在布迪厄(1991)看来,语言并不纯粹是作为交往的一种工具而起作用,而是表达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换言之,语言并非  
98 不是确保资产阶级优越性的资产阶级词汇的复合体。相反,维系资产阶级的象征性统治,是通过其审查其他语言表达形式的合法性的能力来实现的。根据这一解读,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文化方面受到主导性文化风格视点的支配和评估。因此,甚至那些喜欢支持一个英式足球队**的强体力活动的人**,也很有可能将更高品位的文化实践(如观看歌剧等)看作更有意义的。另外,菲斯克将通俗文化视为抵抗的场所,而不是支配之地。民众可能会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实践的重要性比不上权力集团的文化实践,菲斯克低估了这种可能性,而布迪厄却无可否认地夸大了这一可能性。布迪厄的分析所揭示的是,由于存在于语言之外的诸种权威关系,某些文化风格和意向,能给其他的文化风格和意向以深刻的印象。

在讨论一个不同的主题时,迈克尔·舒德森(1993)触及了广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这一问题,他在这方面与菲斯克持有同样的怀疑。这是因为广告与其他的信息形式(报刊的评论、同行的评价和品牌忠实等)形成了竞争,而且也是大众怀疑的对象。然而,在某些方面,要使更加脆弱的消费者相信某种特定产品的优点,广告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这类消费者的其中一个群体是年轻的孩子,他们与成人相比,接触信息源的机会一定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尽管他们能理解电视广告的意思,可没有能力解读印刷媒介中的许多意思,因此相对而言,他们是一群没有经验的文化消费者。在回应这个问题时,菲斯克无疑会反对霍奇和特里普在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孩子与成人解读电视的方

式截然不同。也许菲斯克是正确的，可他无法解释孩子为何如此容易地成为广告商的猎物的原由。吉姆·麦圭根(1992)补充说，不仅仅是因为广告被用于千方百计地去激发年轻受众的物质欲望，而且是因为电视节目和电影常常为出售从昂贵的玩具到T恤衫的一系列产品而作了特殊处理。这就是说，孩子解码象征形式的方式可能会不同于影像设计者所意想的方式，尽管孩子认识到了购买一件特殊产品的需要。因而，就菲斯克敌视意识形态的批判概念而言，他似乎只会重视较为狭窄的文化实践面。

3. 读者阅读菲斯克对通俗文化的分析时所得到的直接印象是，他对通俗文化内容的感知是不充分的。虽然菲斯克(1982)在符号学方面的背景意味着他完全有能力探究通俗文本的诸种内部结构，但他明确地仅赋予这些结构以一种单向度的解读。实际上，在他的著述中，对通俗的文本很少有持久性的分析。这使得人们怀疑他对通俗文化研究的某些观点。他对通俗报刊看法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假定：话语的夸张模式在解读话语的主体身上产生某种怀疑主义。就菲斯克而言，关于外星人到达地球的故事颠覆了权力集团的语言策略。这种论点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菲斯克以这类故事广泛流传的事<sup>99</sup>例来支撑自己的这一论点，实际上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其实，有更多的事例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左证：通俗报刊的实际内容明显地具有意识形态的特质。譬如说，范戴克(1991)对社会体系内容的研究，已表明了许多报刊内容的种族主义特性。在1980年代，他在对英国和荷兰的报刊的研究过程中，揭露了报刊所报道的内容在意识形态上再生产了维持白人

团体统治的体系。虽然在此无法探索这些问题，但就实际内容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妨认为，与其说通俗报刊是以菲斯克所发现的奇异故事为特性，倒不如说是以种族主义的特性为特征。通俗报刊不是异化人们普遍所信奉的准则，而是更为经常性地参与对某些外团体(out-group)\*的象征性构建。白人的民族报刊始终忽视那些对少数民族来说极为重要的各种主题(如房子、工作和卫生等情况)，而将他们表征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暴乱、犯罪和移民等情况)。有一点是值得争议的——范戴克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即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来表征各个少数民族，那么报刊就会有助于维持白人的统治。这并不是说，读者一定是毫无批判性地接受这类描述，而是我至少想开辟这种可能性。菲斯克基本上漠视这种论点，这无可挽回地危及他对通俗文化内容的更具印象主义的观点。

4. 在探讨他择性的报刊时，菲斯克认为，这种报刊具有独裁主义和明显的规约性倾向。同样，在菲斯克看来，权力集团的文化将注意力集中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各种“官方的”活动，以致这种文化远离于所谓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正是这些行为，构成了由菲斯克提出的“文化沟”(cultural gap)的主要缘由，这种文化沟已产生于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和广大民众之间的西方民主。为了取代严肃性和他择性的报刊，菲斯克提倡一种在政治上更加多样化的通俗文本系列。这种论点与前几章里威廉斯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视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sup>③</sup>威廉斯和哈贝马斯提出，现代性已目睹了高质量信息和低质量信息所表现出

---

\* 指自己所属团体之外的团体，与“内团体”(in-group)相对。——译注



的日益明显的区别。这一过程和其他的过程,包括知识、社会原子论、经济萧条和民主受制约的特性,已促使公共领域继续不断地非政治化。反过来,这创造了一种社会真空,这种社会真空恰好由通俗小报用其具有明显特征的流言蜚语和耸人听闻的报道来充实。在另一方面,菲斯克揭示了已为通俗新闻所融合的一些话语策略,并提醒了我们,受众是有能力挖掘多层意义的。然而,菲斯克认为,一种多元论和参与性的文化,唯有在严肃报刊成为更类似于通俗小报时才能得到维系。他的这一论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科林·斯帕克斯(1992a)提出,通俗报刊往往从善恶之间的个体化冲突的视角来表征世界。严肃报刊,如果抛开其政治内容不说,它更加着力于将“各种事件”与社会和政治诸种关系的公共语境联系起来。斯帕克斯无可非议地提出,一个通达的公共论辩,必须以由严肃报刊所主办的有关体制性过程和实践的讨论为基础。我倒想要补充,菲斯克错误地理解了原先由威廉斯和哈贝马斯提出的关于公共领域的观念。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着局限性,可这两位学者均强调,需要有一种受到金钱和权力的作用保护的交往领域。因而,权力集团的文化,应该较少地致力于信仰的营造,而应该更多地潜心于理性思辨和理性讨论的过程。实际中存在的公共领域,常常使用各种意识形态策略,使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分子的主导性合法化,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就像威廉斯和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和文化,只能依凭多种多样的知识的生产,以及有助于民主参与形式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来得到保障。约翰·基恩(1991)根据这一思想脉络提出,在现代民主里,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环境里,公民中的通达论辩有赖于高质

量的信息形式。用他的话说——而且这类似于斯帕克斯的话——良好的考察性新闻工作，仰仗于诸种耐心的考察过程，这种考察应力图注意掌握实权的人物。我的怀疑是，菲斯克对一种更具备参与性的文化的看法，是更有可能围绕欺骗和诽谤这种饮食。这种观点，得到了他对某些民主传统的错误表征和他对轰动性小说的民粹主义的看法的强化。

5. 菲斯克的中心观点是，消费者瞬息即变的行为对主导的工具性社会构成了一种抵抗形式。尽管我质疑了他对符号抵抗观念的一些假定，菲斯克还是被认为开辟了考察受众的理论空间。与德塞尔托的问题一样，在此的问题是，菲斯克常常以自己对文本的体验来取代受众对文本的感受。约翰·弗劳(1991)认为，德塞尔托的符号学范畴导引他去注入自己的声音，从这种声音里我们应该希望找到通俗文化使用者的声音。菲斯克用经验性的事例，来证实他关于受众充满活力的活动的各种观点，然而却缺少实质性的内容。这是由于他自己对通俗文本的热情和他在符号内容分析方面的知识背景所致。<sup>④</sup>他对麦当娜的互文性的分析，大致上建基于他自己的灵活性解读，而且对麦当娜“崇拜者”的视点只是通过一本少年杂志的来信专栏作了简单匆忙的探讨。同样，菲斯克认为，通俗小报式的报刊向弱者的颠覆性战术开放，这一论点依然停留在文本这一层面。他无法为自己的论点提供任何经验性的论证。大家所公认的是，尽管电视和电影的研究正在开始开辟受众的视点，可对杂志和报纸文化的探索却几乎没有可与电视和电影研究相媲美的研究质量。

马克·珀斯豪斯(1987)对通俗小报消费者的解读行为，进行了人种论的阐述，这是这类研究为数极少的几个例子中的一

个。珀斯豪斯准确地将《太阳》报探讨问题的模式,描述为具有“异性恋、男子气、白人、保守、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1987: 2)。他的研究将接受采访的主题,表征为与报纸在象征意义上所构建的方式进行巧妙灵活的协商。这尤其明显地表现于妇女读者,她们将《太阳》报专栏中的三幅靓女照片和体育栏目视作禁区。珀斯豪斯还揭示,许多读者将这一报纸视为娱乐和解闷之源,可以当作日常工作之余的“消遣”来加以享受。但是,这一报纸通常被人理解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报纸,可其品位却被假定为应该拥有更多的属于中产阶级的读者层面。对这些读者来说,《太阳》报由在普通的语境里它所拥有的个人用途来界定。我们可以将这种解读理解为意识形态假面具和异化的一种形式。如同 J. B. 汤普森(1990)所说的那样,当某些社会关系在语言上得到掩盖时,异化才可以确立。当这一报纸被理解为私人娱乐的一种形式时,它就已摆脱了权力和政治的威胁。我倒认为,认同这一报纸属于工人阶级,则否定了其政治和体制上的定位。众所周知,《太阳》报是由鲁珀特·默多克的全球媒介帝国所拥有的,在整个 1980 年代,它对极右分子独裁式的民粹主义政治的构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珀斯豪斯的读者没有能力对这一报纸进行一种更具政治观念的解读,也许是因为这一报纸被看作私人享受快乐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公共关注事态的一条途径。菲斯克对受众的视野缺少解释学上的敏感性,使他自己对通俗小报的解读滑入受众的解读,尽管他本人认为这恰恰是相反。更具有解释学意义上的敏感性考察,应该为受众的各种反应开辟空间,同时又应该将受众置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可这恰恰是菲斯克所未曾做到的。

## 女性主义和肥皂剧：在快乐中解读

在女性主义对通俗媒介文化的探索里，其着眼点在于，将妇女的快乐从明显地带有男子气的体系和界定中拯救出来，这些研究强调了商业文化在为乌托邦式的解读和僭越性的同一性提供空间方面的重要性。我又想提出，这些凸显通俗文化自相矛盾特性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它们忽视了女性主义所关注的范围更加广泛的政治利益。

最近正在发生变化的女性主义理论的范式，对文化和媒介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影响。最近，文化和媒介研究的视点，已目睹了从关注对各社会结构的制约转向考察对同一性的社会构建的变化。米谢勒·巴雷特和安·菲利普斯(1992)对女性主义在企图“瓦解”先前稳固的男人体系方面所发生的理论嬗变，进行了一些引人入胜的反思。尤其是，巴雷特对当代的和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作了一些比较。她声言，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可以大致上被描绘为这样一种信念：确切地找到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可能的。根据巴雷特的看法，大多女性主义者提出，男人统治的实质可以在社会和家庭的结构里找到。这种倾向凭借以下的这种努力在媒介研究里得到表达：客观地确认以下情况：妇女被排除在媒介的就业结构之外，以及家长式的统治得到性别上的固定不变的肖像和表征的支持(塔奇曼，1978)。在此所提供的情形，是进步的女性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这些目标从属于由男性支配的媒介。在传统的女性主义者中，被人广为接受的设想是，变化的过程可以通过展示妇女更加正面的肖像来加快

速度。这种视点再生产出在遭受排斥的进步女性主义者的声音与主导性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的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但是,根据巴雷特的看法,这种一致性,现在已被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和围绕性别差异的诸种问题的发掘所打破。女性主义者与其他关注同一性问题的人一样,均力图建立具有性别特性的各种自我,这种自我应该像话语方面的构建一样具有不稳定性。这一目标是,富有成效地解构男女之间、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之间、女同性恋者与男同性恋者之间的简单的两极性,并揭示同一性得到真实构建的各种复杂的方式。同样,在文化研究方面强调同一性,已开辟了对通俗文化和公共领域进行不那么具有说教色彩的审视方式。在研究通俗文本的过程中,学术人员已失去了某种高傲和客观化的韵味。这种组织不那么严密的讨论氛围,使媒介研究人员有条件爽快地承认自己享受大众文化的快乐,同时能昭示受众的各种矛盾性愉悦。通过对妇女与通俗文化的阐释性关系的研究,文化研究已经探讨了先前受抑制的关于快乐和同一性的诸种问题。所以,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里的各个团体,已携起手来,力求描绘当代各种文化形式塑造自我的方式。我认为,在浪漫小说和肥皂剧的研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和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的融合。

### 女性主义、大众文化和收看《达拉斯》

103

对妇女与肥皂剧之间关系的经典研究,依然属于伊恩·昂(1985)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的研究。在昂进行自己的研究时,《达拉斯》正在90多个国家播放,而且已成为全球文化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确，据昂的说法，在她自己的国家荷兰，1982年春季，有一半多的人口收看了《达拉斯》。对那些从未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来说，这节目本身涉及一个家庭内的个人关系，这一家庭发迹于得克萨斯州的石油。昂的专著，通过对受众的快乐进行阐释性的理解，以及她自己对这一节目的明显欣赏，试图解释这一电视连续剧走红的原因。当时，荷兰传媒认为《达拉斯》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文化帝国论的主题。昂这样说的意思是，这部电视剧的描写表征了一种综合的美国全球文化，这种文化正在抑制各种更具真实的民族文化。在昂看来，这一论点的涵义，是制约商业文化中的自由贸易，以便实现文化生产的各种民族形式。根据她的表述，这种视点具有某种缺陷，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引起各民族国家作出廉价的努力，去模仿《达拉斯》中的虚饰性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视点并未解释受众缘何每星期都收看这部电视剧的原因。有一种相关的论点认为，《达拉斯》的出现，可被解释为是媒介骗局和文化业统治的结果。这一论点同样未被考虑，因为这一论点的言外之意，就是将受众降低为接受文化上的麻醉品。与莫利和菲斯克一样，这种研究的导向性主题，就是对平凡的快乐进行认真的解释学上的研究。

昂在荷兰的一份妇女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小广告，借此与《达拉斯》的其他观众取得了联系：

我喜欢收看电视连续剧《达拉斯》，但是经常听到对它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应。是不是有人愿意写信告诉我，你为什么也喜欢收看这部电视连续剧，或者为什么不喜欢收看这部连续剧？我想将这些反应吸纳进我的大学论文。（昂，

1985:10)

昂认为,大众的快乐界定于乐趣的直接感觉形式。菲斯克和布迪厄指出,大众的乐趣通常与一种更加放松的肉体态度联系在一起,因为享受娱乐的感觉能使人从社会的通常需要里解放出来。但是,从探讨受众的具体快乐这一角度来看,即便是这些意味深长的话,相对而言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昂对回信者的自我阐释进行了阐释,由此提出,《达拉斯》的热情观众认为,这部电视连续剧具有情感上的现实性。这一电视节目的语境远离于绝大多数受众的日常生活,为这样一个节目而作出这样一个论断,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太正常。的确,昂注意到,毁损者中最普遍的抱怨,就是《达拉斯》缺少人们感觉得到的现实主义。昂将这一论点归咎于媒介帝国论主题的文化传播,可这一论点错误地理解了大众反应的复杂性。

104

首先,抱怨一部虚构的作品不具有现实性,等于误解了象征性生产的特性。昂推想道,文本并不反映世界,但实际上生产了世界。《达拉斯》的狂热爱好者所确认的现实主义并不是经验性的,而是心理上的。《达拉斯》的“现实效应”的形成,并不是通过它与外部世界的对应,而是通过在受众中它所产生的直接参与的诸种情感。受众受到 J. R. 和休·埃伦、帕梅拉和博比·尤因等人物世界的吸引,是因为受众对“更为普遍的生活经历的自我确认,如倾轧、阴谋、困惑、幸福和苦难等”(昂,1985:44-45)。像其他的肥皂剧一样,《达拉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叙述,这些叙述在象征方面创造了一种围绕家庭的共同体观念。然而,作为一部情节剧,《达拉斯》在其家庭生活的结构中,体现了昂所称的一种情感的悲剧性构建。昂作如是说的意思是,家庭生活并不

像“经常性的破裂”那样浪漫化(昂,1985:69)。《达拉斯》中的人物与情感的悲剧性构建一致,几乎没有自我反省,缺乏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这与受众们所遇到的受难和痛苦是人际关系的家常便饭这样一种经历分不开的。某些群体的受众感觉到,《达拉斯》的世界是富有现实性的,因为它对家长式社会的运作已经司空见惯。情感的悲剧性构建,不仅仅在象征意义上开辟了幸福的庆典总是短暂的那样一个世界,而且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表征为最经常地装出人样的人。

除了情感的悲剧性构建之外,昂还发现了与《达拉斯》有关的其他情况。她发现,许多观众对这一电视节目形成了一种冷嘲热讽的心态。虽然这是分享《达拉斯》快乐的一种观视形式,但这是通过幽默来产生读者与文本之间社会距离的一种形式。昂认为,这种反应是为维护文本的快乐,以免将文化帝国论主题的话语标准化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性策略。根据这种解读,关于文化帝国论的观念,不仅压制了受众的文化生产能力,而且还充当了扼杀大众趣味的一种象征性暴力。然而,昂将这些关注点与乌托邦式的女性主义政治联系起来,试图为《达拉斯》所提供的普通快乐辩护。

女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它将一种想像的政治,建立于这样一种生活世界的未来可能性之上:男人不再凌驾于妇女之上。大多数女性受众的对话参与,表明了这一文本中由休·埃伦和帕梅拉所反映出的不同主体态度之间的一种基本矛盾。虽然昂认识到,休·埃伦和帕梅拉两人均受困于家长式的统治结构,但她们体现了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方式:在主观上表达这种关系。休·埃伦适合情感的悲剧性构建,对男人统治的不可避免性表



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认识，而帕梅拉却坚信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男女之间平等地保持持久的爱。这两个人物最终均遭受到同样的悲惨命运，女性主义者却居然没有为这件事分心，依然竭力揭示解读大众文化过程能开辟政治同一性新形式的各种途径。昂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幻想中所采取的这些想像性态度，并不一定能得到允许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然而，她在结束这一课题的研究时，的确呼吁女性主义者对实际存在的诸种社会关系领域和心理自我确认领域可能会彼此渗透的诸种方式，进行更为细密的审理。她这样做，意在指明以下两者之间的一条批判途径：将妇女的私人快乐统统归入意识形态的牢房（莫德兰斯基，1988）和对抵抗性家庭妇女发出民粹主义者的庆贺（菲斯克，1987b）。

### 心理分析、同一性和乌托邦

其他的女性主义者已力图阐发由昂所概述的各个主题。回顾一下昂的研究，人们可以发现，她的研究也许具有以下最明显的缺陷：对性别构建进行心理分析上的理解缺少关怀，并忽视了受众的社会语境。在这一方面，贾尼丝·拉德韦（1987）更早一些时期的研究，对寻求发展同一性、大众文化和乌托邦等主题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已被证明富有创造性意义（杰拉蒂，1991）。像昂一样，拉德韦通过对通俗文化的妇女消费者的解读行为的思考，来维系一种乌托邦政治。但是，她力求将性别化主观性的一种更加复杂观念与自我确认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此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除此之外，拉德韦非常关键性

地将解读浪漫小说的快乐与妇女在家长式家庭里的从属性地位联系起来。

贯穿拉德韦研究的主线的，是对浪漫小说解读的意识形态复杂性进行了始终如一的强调。她的实地考察的注意力，是放在一小群热切的浪漫小说读者身上，这些读者来自美国一个叫做史密斯镇的中西部小镇。她在晚些时候的一篇文章里声言，浪漫小说的研究将读者的世界陈示为“通过合作生产而成的由各色布片缝缀起来的一条被子，在这条被子上，各种各样的女裁缝在很长的时间里，将小的、分散（但也是集体）创作出来的图案缝合在一起”（拉德韦，1987：109）。同莫利和菲斯克一样，拉德韦对一种意义理论进行了批评，这一理论是以个体读者作为其出发点的。她的论点是，浪漫小说的社会意义是读者的各种文化生活世界、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产物。

浪漫小说幻想的生产者，基本上并不了解妇女读者的自我确认。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这种脱节，是由一位受信赖的挑选人（selector）从中斡旋，妇女们是从这个挑选人那里购得浪漫小说的。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一挑选人有能力缩小小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妇女业已表达的各种需要和欲望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因而，在判断妇女实际上阅读什么样的书籍方面，挑选人的作用远比浪漫小说生产者所采用的广告策略重要。一个类似于看门人的作用，也会提供关于其他文化活动的信息，如音乐报刊对新的出版物的评论、一位朋友对一本小说的推荐以及录像商店对某些片名的热衷等等。抛开这些不说，对妇女阐释性理解的考察，所明显表现出的是，许多读者将浪漫小说解读为女性胜

利的象征。这是因为最通俗的小说提供转换的叙述,在这一转换里,冷漠、落寞和孤立无援的男人,在故事的结尾却成为充满爱心、怜惜和被女性化的人。能解释浪漫小说成功的,是其抒发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之间的一种深刻人性理解的能力。背离于这种可预知型式的小说,常常并不能让读者满意。对于那些让人感到失望的故事,挑选人要么告戒其他读者不要去阅读,要么妇女们本人不会去阅读这种文本——一旦她们意识到这部小说并不以大团圆结局。

对妇女来说,小说解读实践看来是重要的,因为这种实践能使她们为自己的休闲消遣寻找某些社会空间,并且对家长制开展有一定限度的批评。与其他学者(格雷,1992)一样,拉德韦注意到,妇女对浪漫小说的享受,只有在她们成功地应对丈夫的文化嘲弄并消解自己内疚感时才得以实现。发生于阅读浪漫小说时带有内疚心理的快乐,在一个男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里具有情感上的持久性,这种社会秩序千方百计地将妇女驯服为将她们自己的需要服从于举足轻重的其他人的需要。她们的阅读以一种补偿性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的阅读通过文本的作用,向她们提供了在她们与男人的个人关系中受到否定的情感支持。然而,这种浪漫式的逃避也有赖于乌托邦式的接受能力:读者感觉到,她自己的需要以一种充满爱心和善于接纳的方式得到满足。极具悖论意味的是,浪漫小说既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利于维系妇女在家长式关系中的地位,又提供了保持更具怜惜心的人类关系的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拉德韦吸纳了霍多罗(1978)的心理分析著述中的观点。霍多罗认为,男性主体通过摆脱与自己母亲的同一

性这一过程来建立自己的同一性。拒斥自己初恋的对象，是在心理上将自我确立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必需的。男孩与自己父亲的认同将他导向对自主性的珍视胜过对依赖性的重视，对独立的珍视胜过对联系的重视。因而，尽管这一年年轻的男人能将他人认作独立于自我，可他常常在与他人的移情关系中遇到困难。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确立牢固的畛域的需要，常常伴随着被母亲再同化的忧虑。本杰明（1988）追随霍多罗的思路提出，这是理解男人支配女人的欲望的关键。对母亲躯体的焦虑导致想控制这一躯体的愿望，而且最终导致诋毁这一躯体。这也许从某些侧面解释了男人对通俗文本的反感，因为通俗文本支持感觉、情感和情绪。相反，女孩与母亲同一性的确认所具备的更为强烈的情愫，使得她不能表达自己独立的欲望。霍多罗认为，较之儿子，母亲们往往将自己的女儿感觉为更像自己。因此，女孩们并不能得到鼓励使自己独立，并通过她们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在心理上更容易地得到发展。在家长制对妇女自己需要的否定和对更具有关系性和在情感上具有持久性的人类关系的心理欲望这两者之间，浪漫小说具有折叠的作用。但是，就像拉德韦所透彻理解的那样，妇女所经历的乌托邦式的愿望实现，只能对妇女们诸种最亲密的关系提出质疑。文本的关系世界在意识形态上依然与由男人界定的公共世界相分离。

拉德韦对霍多罗的依赖，其难题是她无法很好地解释妇女对一个欣赏小说的单独的社会空间的欲望，不论这种欲望在妇女的心里会产生多大的内疚。如同埃利奥特（1994）、塞耶斯（1986）和弗拉克斯（1990）所已提出的那样，霍多罗的论点并没有解释在女性主义者中对更具自主性的社会关系的心理突现。

在拉德韦自己的研究中，妇女表达了她们在力图克服为阅读所需要的孤独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她们对这种空间的希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能碰到一种更具怜惜心理的男子气，而且是为了自己能积极地参与小说中所描绘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的定位，以便拓宽自己的视野。因而，她们产生了一种对分离的欲望。这种分离的欲望能实现更具情感意义的持久性自我确认。拉德韦对霍多罗的依赖意味着，妇女中的离散欲望在理论上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像拉德韦和格雷所指出的，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妇女自己对享受某种快乐的需求常常为男人所轻视，导致她们在与自己的男性伙伴协商时产生冲突。再者，尽管拉德韦研究的一个长处是提出了与同一性有关的一些难题，而这些难题一直被话语分析和媒介主流研究所忽视，可在这一方面，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然而，受众理论应该与诸种心理分析的视点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一论点是拉德韦著述的一个主要成绩。

## 女人看女人：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

108

在以往的10年中，对女性主义媒介理论家来说，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建立性别化的主体。这一问题极为复杂，涉及一些相关的问题。可是我认为，力图展示妇女享乐形式的这一正在兴起的范式，应该重新被整合进一个更为广阔和更具有批判性的媒介社会学。从女性主义和媒介研究的发展这一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重新以批判的态度，积极地探索较早时期阐发更具体制性系统的一些研究思路。虽然女性主义研究人员揭示了以

往被忽视的妇女对通俗文化的解读行为，但公用事业广播的非规范化已被广为报道，大众传播媒介也愈益全球化。这些结构上的变化，不应该孤立地从受众的收视行为来加以思考。在随后的讨论里，我的着重点是将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与对重新阐发公共领域的需要重新联系起来，但愿这样一种讨论会有益于一种更具实质性内容的乌托邦女性主义，这种实质性的乌托邦女性主义，超越了对肥皂剧和平装本浪漫小说的较为狭隘的研究视点，尽管这也无疑是重要的。

类似于《达拉斯》那样的情节剧，长期以来始终是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情节剧过分的雕饰、场景感和在善与恶斗争中对感情的支持等，已给民众以愉悦，尽管这冒犯了更加高尚的品味（巴韦罗，1993；布鲁克斯，1976）。巴韦罗指出，情节剧的文化形式，可被进一步追溯至17世纪特为民众生产的淫猥下流文学。西班牙的《细绳》和法国的《传播》文学，提供吸收了民众语言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结合体。这些通俗文本尽管传播了关于土匪和罪犯的英雄故事，可嘲弄了高雅文化。按菲斯克的话来说，现在被权力集团以霸权的方式加以结合并为大众的享乐而得到传播的，就是当时的这些通俗文风和习语。这似乎是，假若我们历史地重新追溯情节剧不断嬗替的霸权式联盟，那么将民众的快乐视为民众的一种颠覆性抒发，这样一种看法从来就没有遥远过。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昂对《达拉斯》的研究。情感的悲剧性构建，表达了置身于家长式社会里的妇女平常所关心的普通问题。我们已看到，昂甚至认为，由《达拉斯》传递的“个人语言”，提供了一种从女性主义者那里得到灵感的乌托邦式政治。昂告诉我们，那些

关注诸如文化帝国论等问题的理论家，实际上将自己等同于那些竭力维系正在衰落的民族文化的民族精英。然而，昂的分析与右派媒介巨擘的分析一脉相承，如默多克和贝卢索尼等。他们认为，商业文化在民众中具有一种自然的流通。为了发展这一论点，我拟对围绕媒介帝国论的一些讨论再作简要的追本溯源。

这些论辩具有悠久而复杂的历史，而且在别的地方也得到了广泛的探讨（里夫斯，1993；汤姆林森，1991）。费耶什对媒介帝国论的界定是我所知道的最佳的一种界定：

媒介帝国论将以一种宽泛而普遍的方式得到使用，以便描述这样一种过程：现代媒介借此来发挥作用，以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维系并扩展各种主导性和附庸性的体系。（费耶什，1981：281）

在博伊德－巴雷特（1977）看来，这些论点具有可以陈述如下的三个不同层面：

1. 西方资本所开发的传播技术，意味着这些技术能营建传播工具（广播、报刊、电视、录像、电影等）。这些技术借助殖民主义来出口，然后通过各种附庸关系，得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扶持。由于更具区域性的生产高得让人难以承受的成本，新技术大多均是从资本主义的西方购入，而并不是由“第三世界”发展出来的。

2.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金融和组织结构里，购买媒介技术，自然而然地牵涉到各个附庸民族。跨国媒介公司的发展，意味着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已被用于在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的民族国家建立传播体系。这导致了资本家对组织结构和组织控制的复

制。

3. 西方的职业准则(客观性、平衡)也明显地体现于媒介组织。然而,媒介帝国论最相关的形式,体现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和假设。这些信息和假设明显地表现于西方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无线电广播、报刊和杂志文化。这些文化形式既推广了某些西方价值观(解读消费主义),又窒息了更具批判性的视点。

这三种视点为对媒介帝国论的任何讨论提供了基础。首先,对这些视点,我不想作任何详细的批判性评价,希望能得到原宥。就像在依从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其他分支里所做的那样,只要说博伊德-巴雷特夸张了西方经济统治形式的意蕴就足够了。他过高地估计了西方特定媒介渗透的能力,过低地估计了民族国家将自己隔绝于某些全球化过程之外的能量。<sup>⑤</sup>

110 我在此所要强调的看法是,尽管这类论点具有正确性——当然需要重新阐发——可主要的焦点涉及全球传播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的主导性。

昂反对媒介帝国论主题的论点是,《达拉斯》是一个多义的文本,其构建仰仗于观众的社会语境和话语语境。与昂一样,卡茨和利布斯(1985)总体上说对《达拉斯》给其全球受众的意识打上了西方消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烙印持怀疑态度。他们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种族群体对这一节目的内容作出判断时带有他们自己的同一性。一般说来,根据昂的观点,他们发现,攫住受众注意力的,不是消费主义的亮点,而是叙事的情节剧特性。卡茨、利布斯和昂三人均认为,假如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受到受众阐释的颠覆,那么这会对媒介帝国论主题构成反驳。诸如



《达拉斯》那样的肥皂剧,所肯定和证实的,并不是全球资本的利益,而是当今和日常的重要性。

媒介帝国论主题漠视受众的文化复杂性,这一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不仅仅置换了这一论点的经济和政治方面,而且还将政治同一性与消费主义同一性混为一谈。在讨论哈贝马斯和威廉斯时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性可以被描述为具有消费主义(个体在市场上对商品的选择)和政治(对公共准则采取民主决策)话语的特征。民粹主义的研究方法与新右派的研究方法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因为这一研究方法所竭力推崇的,是消费主义同一性,而不是政治同一性。就像莫利、菲斯克和昂的看法一样,民众使用通俗文化的方式,可能会具备某种颠覆性的意蕴。在此我不想探讨诸如柯伦(1990)和埃文斯(1990)这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对多种多样的意义的符号学关注,构成了一种不具批判性的多元论。受众研究人员的价值观,被更加適切地描述为具有尊重各种大众实践的特征,而大众的这些实践在历史上被学院派边缘化了。这种来自下层民众的新历史,表露了“在他们的地盘上发展”我们“自己的空间的诀窍”(菲斯克,1993:70)。问题并不在于,正在涌现的同一性的形成只是无批判地庆贺差异性(虽然这种倾向无疑是存在的),而在于,它们的形成是以消费主义话语的方式进行的。

譬如说,女性主义者无疑是想获致一种公共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里,诸如强奸这类问题能以一种通达和民主的方式得到讨论。根据苏西尔和沃尔比(1990)的看法,英国的报刊始终将这些与性犯罪相关的问题同权力和男子气等问题分隔开。报刊更有可能通过对异常的粗俗人(通常被描述为类似于禽兽,即

“狐狸”抑或“黑豹”)进行耸人听闻的讲述来表征强奸,以致于在意识形态上认为罪犯具有变态心理。这样一种策略取代了对男人权力的关注,同时明确地告诉异性恋的男男女女:强奸是邪恶的产物。毫无疑问,阅读关于强奸事件报道的读者,也许会反对将强奸作公开的刻画。的确,最近的迹象表明,在观看虚构的强奸事件时,未曾经历过男性暴力的妇女较之那些有这种经历的妇女,更有可能责备受害人(施莱辛格等,1992)。就像施莱辛格及他的同事所谨慎地提出的那样,这不能被认为是媒介的直接结果。但是,针对强奸这一问题的一种更为通达的媒介讨论,可能会提出某些疑问、向传统的旧思想提出挑战、引发批判性的思考、接纳一系列更为多元的视点并以理应得到的公共尊重来对待这类事件。一个从民主角度得到重新阐发的公共领域会对以下方面进行探讨:处理强奸事件的法律程序、向给受害人以帮助的机构提供资金、保护受害人的身分、改造和惩治罪犯、更加安全的公共空间和男子气的社会构建。这样一种讨论,会将男人和女人的同一性当作一个在精神上已获得新生的公共领域中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成分来加以涉及。这种讨论不仅仅能以享受某些权利为依据,而且还会牵涉到以尊重人的心态关注他人视点的义务,并以适当的方式关心明显表现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各种权力关系。交流性理解的权利和义务,所要应对的并不是公民令人愉悦的和观淫癖式的自我确认,而是他们政治上的同一性。媒介文化不会千方百计地对性犯罪作轰动性的描写,而是会给表达协同性的通达对话提供男性暴力的受害者的例证,并对这一主题进行更加理性的探讨。

现在再回到昂的研究上来。很明显,对昂所刊登的广告给

予回信的大多数妇女，均是从快乐的消费主义权利角度来收看《达拉斯》这一节目的。昂表明，消费主义同一性的构建，在私人环境里可能具有抵抗性，因为这种同一性强调享受消费快乐的个体权利。就像昂、拉德韦和格雷所说的那样，这种话语可以被用来赋予在家庭环境中的妇女以权利。我们现在能够重新阐释对《达拉斯》的嘲弄性和对抗性的解读。那些担心《达拉斯》是文化帝国论的一种样式的收视者，作为消费者和政治公民，正在使自己的联合同一性负担过重。昂对这些解读的评估所存在的问题是，她在关注那些与她自己一样，对通俗节目抱有很大热情的人的文化复杂性的同时，将这些研究对象贬低为权势政治的政治傀儡。如果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加以理解，对媒介帝国论的关注，可以质疑在娱乐市场的美国统治和公用事业广播的日渐非规范化。这种视点也可以涵盖这样一种可能性：建立一种更具公共形式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政治，这种政治会弥补昂所概述的不足。女性主义毕竟在历史上已起到了两重性的作用，因为女性主义已竭力促进妇女在公共世界中的同等参与，同时它又希望将平等的各种观念扩展到人际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只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得到保证：交往的公共渠道是多元的并以平等的享受为基础，同时还不受金钱和男性权力的殖民化影响。这112  
需要有这样一种认识，民主的女性主义政治，会在公共和私人环境中质疑男人的各种统治形式。

昂的政治愿望是：文化的商业形式能维持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政治。实际上，她的这一愿望明显地相似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正像阿多诺(1991)和马尔库塞(1977)通过审美向度来力求一种乌托邦的超越形式一样，诸如昂那样的女性主义

者也正在寻找在文化的大众形式中一种具有反叛精神的主观性的勃兴。这不妨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虽然由于社会主义和学生运动的败落，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将注意力转向审美向度，但正当某些公共准则受到威胁时，某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消费文化正在作出新的评价。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不会携带某些乌托邦的痕迹，（甚至阿多诺（1974）也认识到）但应该强调，即令肥皂剧和浪漫小说体现了乌托邦的情感和视角，它们也不是激进化了的公共领域的替代物。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才可以认为，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者，均过分重视了艺术和大众文化。昂为《达拉斯》崇拜者积极参与他们所钟爱的电视节目的权利辩护，她对这一件事如此投入，以致于没有将自己的注意力与要有一个更加民主的公共领域的明显需要联系起来。她的担忧是，将摒弃快乐作为媒介理论的轴心，会导致 1970 年代女性主义的说教化政治和新的文化悲观主义。除了提供快乐之外，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使公民们投身于互相进行批判性会话的社会义务。就像民粹主义者所深刻理解的那样，这样一种替变不能凭借以高雅文化反对低俗文化来实现，而是要通过确保交往渠道力图增进政治的和商业的同一性来达成。

## 小 结

对戴维·莫利、约翰·菲斯克和女性主义受众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为建立关于受众活动的解释学进行了探索。尤其是在意义的符号学阐发与关于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起时，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尊重这些研

究方法的具体差异的同时,应该强调,关于受众理论的这些思想存在某些共同的问题。许多思想均是过分关注分布于社会各层次的观众、读者和听众的微观世界观。人们已注意到,接受实践 113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方面的构建,常常为更具区域性的研究所取代。将符号方面的研究重心放在意义的生产(编码和解码的诸项实践)之上,这没有足够地重视在晚期资本主义里消费者休闲活动的社会功能。这样说,是已充分认识到,某些形式的文化参与,会对现代社会的特征产生反思性的鉴别。通常的情况是,这种实践(昂的乌托邦主义和菲斯克的符号之争)在一系列范围更加宽阔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语境化。最后,我们已看到,受众理论是怎样竭力以尊重的心态来重新描述普通公民的诸种消费行为。我仍然重视这些研究给意识形态理论所带来的意蕴,这与媒介分析的某些形式格格不入。然而,对符号多元性的强调,在政治方面依然与后现代的拒斥形式联结在一起。媒介理论应该力求将消费者的权利与私人快乐以及权利和义务更为广阔更具公共性的诸种形式彼此联系起来。一种已经过民主改革的媒介,其宗旨就是要在政治上重新开拓这种可能性。公共空间诸种新形式,将会怎样预示娱乐业的全球性流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将对此作出我自己的简要阐述。

## 第四章

114

# 马歇尔·麦克卢汉 与文化媒介

### 地球村里的空间、时间和内爆

#### 技术媒介



种文化形式的现代播撒，已在根本上重构了时间和空间的参数。从各种日报的发行到最新的赛马比赛结果的电子传递，大众传播的各种技术形式正在改变着日常生活的经验内容。技术媒介目前能在全球始终以愈来愈快的速度重新确定象征效果。各国际新闻机构能够插入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这些机构竞争激烈，将全球各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新闻事件”是以所谓的本真时间(real time)传播的。这既使跨越各民族国家所有能够穿越的国界的信息重新得到语境化，又给人以即时传播(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的印象。不论其事实内容如何，所有事件在刹那间就能得到传递，这已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也使人类对时间的概念相应地缩小。然而，大众媒介对空间横

向关系的构建以及对社会生活时间方面的影响，长期以来始终未曾得到充分的探索。这一情况的理论问题，至少在分析方面仍然游离于与文化内容相关的并主导了大众传播某些学派的各种问题。在媒介的电子形式日益普遍化和全球化的今天，这类研究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传播新形式对空间、时间和人类感知等方面的根本性影响，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主导性主题。他的著述阐发了新的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一些最为深刻的变化，这一点至少在初期是为人们所广泛承认的。但是，虽然麦克卢汉在1960年代早期（他本人一度成了媒介界的知名人物）曾经产生过影响，但他时下几乎没有追随者和崇拜者。这无疑与他乖僻的写作风格和思想的实质性内容有关。在文化和媒介研究中，他的思想在开始时受到了热烈的赞颂，因为他在阐发正在崛起的电子文化的某些方面时作出了重要的突破。但是，热情的气泡不久就胀破了，麦克卢汉的观点因为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的一种反映而广泛地被人们所唾弃。文化主义的研究一直就是这种情形：将自己远离于各种技术解释，忽视对这种不同的文化媒介构建的分析。现代文化的大多信息源，是来自全球的电视网络，还是来自每周印刷一次的全国性报刊？可以想见，这对现代文化是很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如博德里亚提出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看法，已经修正了麦克卢汉的一些主要观点。博德里亚为之辩护的，是遭受到文化批评早期浪潮反驳的麦克卢汉的描写性关联和对技术决定论的强调。尽管我将回过头来探讨阐释的诸种问题，可在此我的意旨是，故意违背最畅言无忌地贬损他的人的意愿，强有力地提出，媒介研究人员需要对他的著述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评

估。我将为对麦克卢汉著述的一种看法辩护，这一看法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就是：麦克卢汉对技术媒介的强调，对区分文化传播不同模式（口头、文字和电子）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而且技术媒介构建了主体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可是，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我将在揭示他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探讨他在研究方法上的问题。

在概述麦克卢汉对大众传播社会理论的贡献之前，有必要绕一道小小的弯，看看他的加拿大同胞哈罗德·A. 英尼斯的著述。这特别有必要，因为麦克卢汉和英尼斯均有类似的思想背景，并使大众传播研究成为现代性本身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此，大众媒介的技术手段对当代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被认为是要素性的，而不仅仅是附带性的。尽管麦克卢汉与英尼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这一视点显然不同于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书所看到的各种研究方法。

## 英尼斯、麦克卢汉和加拿大社会理论

英尼斯（1950, 1951）是一位经济学历史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 10 年里，他发表了关于人类传播的两部作品。对英尼斯来说，从各传播网络所负载的信息和它们对各种社会组织形式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影响角度来看，传播网络是重要的。任何特定的传播媒介与讯息相比，不论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均有其偏倚性(biased)。在人类历史上印刷时代到来之前，诸如羊皮纸、陶土和石块等主导性媒介，是偏倚时间，而不是空间：它们很难借助空间来传递，但最后证明是一种能经得住时间消蚀的媒



介。由于偏倚时间的媒介能与具体地方的物质在场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相对来说是稳定的社会现象,能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在一起。相反,那些轻便和不那么持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等)却是偏倚空间的,因为它们可更加容易地被重新置放在别的地方。便于运输的媒介,更喜欢跨越空间的各种行政关系的发展,以此来促进世俗制度和政治权威朝着非集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具有时间方面长处的媒介,有利于维系传统的集权化宗教形式。詹姆斯·W. 凯里(1969:275)指出,“从文化角度来看,时间意味着神圣、道德和历史;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

英尼斯通过对口语社会和文字社会两者之间的比较,试图扩展他关于偏倚时间和偏倚空间的媒介之间彼此相异的关联性。在口语社会里,传播的主要媒介是言语,虽然英尼斯承认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依靠言语作为传播手段,这在口语社会里促使寻找一种明显偏倚时间的媒介。这是因为言语的传播只能是短距离的,这对信息的储存并不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根据沃尔特·翁(1977)的看法,这从某一个侧面说明了明显表现于大多口语社会里的各种体制性安排的保守特性。因为没有书面的传播形式,传统只得通过重复性强并且是程式化的仪式和实践来得到仔细的保存。翁和英尼斯两人都认识到,由于书面媒介的不在场,这促使人类社会朝着明显偏倚时间的媒介发展。英尼斯认为,各种文字传统更有可能受到空间的束缚,因为比起过去来它们往往更喜欢未来。文字的发明,不仅仅使口语传统具体化,使其成为考察未来社会的“对象”,而且还使不同的传统和文化摆脱乡村的空间限制。根据英尼斯的看法,看待时间和

空间的最佳办法,也许是将它们看作是一种辩证法:继续不断地消除一极,会引向另一极的统治。凯里(1989)认为,英尼斯的研究方法也可能有更具当代性的关联。因而,人们可以提出,报刊使延伸成为可能,所凭借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报刊受到事件的驱使,这一特性常常意味着,昨天的报刊新闻标题很快就会被遗忘,而报刊的同一性则更有可能从空间角度(区域的、全国性的和國際的)得到重视。作为现代一种可运输的媒介,报刊按英尼斯的话来说,可以最佳地被概念化为偏倚空间,而不是偏倚时间。

传播媒介对与时空有关系的诸问题具有意蕴,虽然我相信英尼斯作如是说是正确的,但我认为,他将时空描述为必定具有某种偏倚性,偏倚于一极就意味着对另一极的部分排斥,这走入了歧途。譬如说,可以这样认为,民族主义既偏倚时间,也偏倚空间。人们通常认为,民族主义表达了民族国家过去成员和现在成员之间的一种历史联结,同时通过某些仪式和传统也提供了一种空间联系的感觉。假如我们考虑一下,民族情绪和文化在历史上一直仰赖于各种各样的媒介,包括影院、杂志、报纸、广播和理所当然的电视,那么这一论点就更加复杂化了。这表明了英尼斯的“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性,虽然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文化研究的某些学派夸张了。然而,虽然英尼斯正确地呼吁我们去注意技术媒介对文化的社会组织肯定具有影响这一事实,但他对技术媒介、空间和时间这三者之间的分界面的概念化,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加以考虑,以解释更具当代性的过程。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马歇尔·麦克卢汉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发。

## 媒介即讯息

马歇尔·麦克卢汉最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观点：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植根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媒介。麦克卢汉声言，媒介就是讯息。根据他的观点，比方说，关注今日报纸里一篇文章的意识形态构建抑或符号构建，是不得要领。麦克卢汉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认为，探究技术媒介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构成了面对今天媒介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他所提供的关于这一过程的最佳例证，涉及在对各种社会关系重新语境化时电灯的重要性问题（麦克卢汉，1994：52）。每天早上我在办公室里打开的电灯，它不负载任何讯息，但转换了时空关系。譬如说，电灯能使我在晚上工作得很晚，或者在早上工作得很早。这影响了我构建自己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式。当然，电灯具有更加广阔的用途，在各购物中心、娱乐场所和工作场所等，电灯每天24小时照明。再者，正是因为电灯重构诸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感知的能力，才被赋予了分析的优先权。

然而，麦克卢汉并不总是具备这种特定的心态。在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机械的新娘》（1951）一书里，他对由媒介各种新兴形式所开辟的操纵和控制机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虽然促使麦克卢汉得到更加广泛的公众承认的许多主题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但他的著述与雷蒙德·威廉斯和法兰克福早期学派的文学情感，有许多共同之处。<sup>①</sup>他认为，消费社会与更为人熟知的大众媒介研究方法相呼应，将一种被动的形式强加于这样一些

主体：他们以唱片音乐和整套的新闻节目这样一些无实质性内容的饮食为生。在此，当代文化仅仅提供了虚幻的多样性、促进了生产大众式的一致性并加剧了对优秀文学的社会基础的腐蚀，麦克卢汉对此作了批评。他对后现代主义和符号学的今后发展作了预测，提出“在美国，消费者等级只有三种：低级、中级和高级，不可能还有别的等级”（麦克卢汉，1951：59）。广告助长社会差异，以便在意识形态上遮掩买卖的各种商业实践，同时，广告对业已卷入这一过程的人具有丧失人性的效应。人类最亲昵的诸种关系的商业化，将性的表达降低为“一个技巧和卫生的问题”（麦克卢汉，1951：99）。人体表征的机械复制抽象于人类经验激发美感的特性，同时又提供了一种性虐待狂的欲望和幻想的滋生地。因而，现代传播诸形式的异化效力，既产生了病理学上的副作用，又作为一种主导手段而起作用。但是，在麦克卢汉随后的著述中，他摈弃了可以被称为一种消费文化的批判—文学倾向，以提倡一种更具庆贺性的模式。

麦克卢汉后期的一系列著述，热衷于发展一种有悖于他前期许多思考的媒介理论。首先，麦克卢汉不再将文化内容看作是他研究的重点。这大致上归因于他对文化传播诸种技术的关注。在此，各种现代技术不再被视为具有异化作用。这是因为这些技术最佳地被表征为人体的延伸，或者就像麦克卢汉偶尔所称的人体神经系统的延伸。他这样说的意思是，轮子是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技术投射。作为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并且根据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思想观点，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书被概念化为眼睛的一个派生物，而广播则被表征为耳朵的技术表达。

在欧洲的现代初期,出现了谷登堡《圣经》\*,自这以后,印刷文化占据统治地位,这对理解这些过程是至关重要的(麦克卢汉,1962)。麦克卢汉接受了英尼斯的思想观点,提出印刷媒介的可携带性,使各种理念和观点超越空间得到流通成为可能。从时间这一角度来看,一种文字文化的主导性缩短了人类的记忆,因为信息现在可以储存在书这一经久耐用的媒介之中。然而,就像B.安德森(1983)也已表明的那样,书籍的可携带性使民族主义的文化表达摆脱了宗教权威既定形式的控制。安德森认为,1500年至1550年这一段时间兼收并蓄了印刷资本主义寻找新市场的需要、印刷报刊的技术发展和除了能被印刷的拉丁文之外的语言表达。这些因素生成了新语言的权威,张扬了民族的合法性,并削弱了封建教会的中心权威。尽管麦克卢汉发表了相似的观点,可他的着重点在于别处。将语言变为印刷文字,这是很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造成了一种空间的倾向,而且是因为它促进了人类感知中的一种倾向。麦克卢汉提出,“字母的发明,如同轮子的发明,是将各种空间的一种复杂而有机的交互作用转变或还原为一个单一的空间。音标一次性地将所有感官的用途,即口头言语,还原为仅仅是一种视觉代码”(麦克卢汉,1962:45)。

在中世纪,手稿固定地处于物质空间,极少使用标点符号,而且在大多情况下均是被高声朗读。按麦克卢汉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学问,与其说是视觉学问,倒不如说是听觉学问。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文化的发展,人类的所有感官日益得到划分而

\* 德国印刷商谷登堡在15世纪中叶首次成功地用拉丁文印刷出版的《圣经》。——译注

变得专门化。尽管口语文化容许一切感官极为频繁地相互作用,可印刷文化从言语中抽象出文字,促进了人类生物体视觉部分的发展。交往中文字形式的主导性培植了一种理性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呈线性和一致性,而且可以无限次地重复。印刷文化以一种可预知的和标准化的思维模式,取代了口语文化给人以美感的作用。再者,印刷工艺的霸权不仅仅凭借语法、拼写和意义的统一化来“阻碍口语所发挥的各种细节性作用”(麦克卢汉,1962:158),而且形成了个人价值主义的现代形式。书本文化要求:阅读行为要安静和全神贯注,文本要有作者,将集体所共享的文化转化为一种仰仗于个人表达形式的文化。麦克卢汉评论道,“印刷是个人价值主义的技术”(1962:158)。印刷为民族的统一形式提供了文化资源,而在此同时又催生了各种个体观念。谷登堡印刷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将空间和时间转换为一种能计算、可预知和理性的东西。文字对线性和逻辑的强调,昭示于钟时的统一和标准化。印刷机的理性化影响,为地图、火车时刻表和透视画观念铺平了道路。根据麦克卢汉的看法,印刷文化的到来,尤其明显的是发展了人类的某些感官(视觉),同时形成了人类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然而,所有这些嬗变,是随着电子传播形式的到来才发生的。

转向电子传播的变迁,可以与现代性的经验属性的嬗变联系起来,其最佳表征就是凭借冷媒介(cool media)逐渐替代热媒介(hot media)。麦克卢汉作如是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一种热媒介,就是不允许参与并具有丰富信息内容的媒介。相反,冷媒介能给受众的参与留下更多的空间,并表现出较低的信息强度。麦克卢汉解释说:

口语是一种缺乏界定的冷媒介，因为这种媒介提供的信息甚少，留下许多空白让听者去填补。然而，热媒介就不会留下这么多的空间让受众去填补或完成。因而，热媒介所要求的参与程度就低，而冷媒介所要求的参与程度高，受众完成的信息也多。（麦克卢汉，1994：23）<sup>120</sup>

冷媒介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电话。电话是一种对话媒介，传播中通常需要至少两个人的参与。相反，印刷文化依然是一种热媒介，因为从影响信息流通角度来看，阅读活动对主体没有什么要求。按麦克卢汉的话来说，电话需要“完全的参与，这不同于书写和印刷文字”（麦克卢汉，1994：267）。麦克卢汉还意识到，电话总是有其使用者，还有改变各种权力关系和公众与个人概念的效应。在以往的传播媒介中，书本文化仰仗于发生在私人空间而不是公众空间的阅读活动，而且知识的生产是由少数作者来完成的。类似于电话那样的冷媒介，消除了知识生产的集中化，因为冷媒介牵涉到更广泛的参与者，从而使观点的形成民主化。饶有趣味的是，麦克卢汉认为，“书呆子”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就是希望将所谓的启蒙性视点扩展到更加落后地区的各个社会里。假如人们接受这一论点，那么这就是一种日益过时的传播形式的效应，这种过时的传播形式取决于知识生产的集中化形式。诸如电话这样的新媒介，已结束了传播关系中的各种支配关系，而且在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没有任何中央权威能够统治的体系。

同样，麦克卢汉提出，电视是冷媒介，而电影却是热媒介。坐在电影院里，实际上是孤立于受众的其他成员，这样一种社会活动不允许受众的各种参与形式。根据麦克卢汉的看法，人们

可以预料,看电影这样一种活动酷似书本阅读强加给受众的那种被动性。电影媒介是集中化和权威性的,需要电影制作人将受众转换到另一个世界(麦克卢汉,1994:285)。相反,尽管像电影这样的热媒介能将意义说清楚,可收看电视这种较冷的实践给受众留下更多的事情需要完成。电视较之电影,是一种更加非集中化的媒介,给区域性的方言提供了表达的机会。因为在麦克卢汉写作的当时,大多数电视机的图像并不逼真,所以他认为这使受众在意义产生过程中成为更加平等的伙伴。就这一方面而言,电视促进了麦克卢汉所称的“深度参与”(depth participation)(1994:321)。

媒介向电子传播形式的转变,对时空的调整也具有意蕴。麦克卢汉在以往是基本上遵循了英尼斯的思想观点,提出虽然口语社会偏倚时间,但文字文化却是偏倚空间的。然而,电子传播对印刷的取代,致使英尼斯的早期思考显得多余。空间和时  
121 间已不复存在。为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看法。印刷文化隐含着个体化的接受模式,同时也促进了个人价值主义。如果一个个体希望阅读一本书,他就会积极地去寻找这本书。但在麦克卢汉看来,在现代条件下,各种文化形式“即时并继续不断地向我们铺天盖地而来”(麦克卢汉和菲奥里,1967:16)。现代各主体与传播网络之间的互动作用,不再局限于就寝前的单独几个小时。今天,全球公民的生活,被包裹在与物质的和象征的传播模式的似乎是无休无止的接触之中。人们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看各种各样的报纸,用汽车收音机接收早间新闻,慢跑者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听书刊录音唱片,人们在电视前面做爱。现代性的传递信息的经验是一种“旋转而变幻



不定的情景”(麦克卢汉,1951:v)。在麦克卢汉看来,描述现代性的最佳途径,就是将其看作在时空上永不停息地对信息进行重新定位。在此,各传播系统使我们与各种不同的视点保持经常和直接的接触。时间和空间的彼此协调已经消失,迎来了这样一个世界:书本文化所培植的个体化独立感,被人人都“深刻地牵涉到每一个他人”(麦克卢汉和非奥里,1967:61)的感觉所取代。诸种新媒介的迅猛发展,破坏了文字传播形式对视觉的偏倚,使全球公民都回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与口语社会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全球村已将等级、统一和个体化的印刷制作文化横扫于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可触知的同步文化。

麦克卢汉对当下所谈论的关于民族国家消亡的许多方面作了预见。他评述道:

在电速的诸种条件下,学科主权的消失同民族主权的消亡一样的快速。沉溺于从中心到边缘的机械而单向的扩张这样一些更陈旧的型式,与我们所处的光电世界已经是格格不入。光电不是使事物集中化,而是使事物非集中化。(麦克卢汉,1994:35-36)

就像福柯(1980)和现代女性主义运动提出权力到处存在那样,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的影响也是如此。由电驱使的文化,并不是发展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或处所,而其实是组织成没有联系中心的各种网络。因而,传播技术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扩展到与其他人类的能激起美感的全球性融合之中。这使时间(过去和现在)与空间(近处和远处)之间的区别变得多余。那些与新的电子环境接触最多的人,已经摒弃了由业已过时的印刷

文化所提供的陈旧的感知方式。麦克卢汉将这些新媒介表征为与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最怪异的典型事例相一致。这种新的感知模式，对那些对此已经有足够的接触而不致于落后的人来说，消除了社会的差别，并将人类带入了一种如痴如醉的极为融洽的怀抱之中。

以上所述的观点是重要的，我将回过头来探讨这些观点。我现在暂且表明，对麦克卢汉来说，时空差异的消失是与大众传播的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我们看一下我们早上的报纸，我们便可发现，它与传统的小说样式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我们看到的，不是叙事的线性发展，而是麦克卢汉所称的一种“公共大杂烩”（麦克卢汉，1994：204）。一份报纸有各种各样的作者，有多种多样的新闻特写和版面（体育版、时装版、国外新闻和社论），这对抗着明显表现于书籍中的观点的单一化。现代报纸这种类似于大杂烩的布局，还包含了传自远离报纸的读者或生产人的语境的一些内容。新闻采集活动的迅疾性和全球化，意味着在报纸内容控制方面时间和距离已日益变得无关紧要。再者，麦克卢汉明确地提出，至于内容，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拥有和控制编报方式的人，而是消费者（麦克卢汉，1994：216）。因为空间和时间以及所有制形式这些因素，对报纸的内容来说已变得毫不相关，所以影响这一过程的，是受众对参与的需要。现代的传播形式能使受众遨游时空，这滋养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出现照片的批量印制之前，旅游活动就是去“接触陌生和不熟悉的事物”（麦克卢汉，1994：198）。现在让我们回到早上的报纸这一话题上来。浏览一下旅游版，我们便可了解美国的大峡谷抑或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但是，正因为空间已被消除，所以时间

的线性概念也已不复存在(麦克卢汉, 1969: 122)。在具备电子传播形式这样一个形势下, 全球在历史上和空间上均具有可视性。我们浏览报纸时, 可以扫视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故事和发生于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事件。一份单一的报纸, 可能会包容各种各样的文章, 探讨一部关于俄罗斯革命的新电影、关于我们所处的城市在 1920 年代容貌的各种照片或者是关于青年文化试图复兴 1970 年代的一篇新闻特写。这就是缘何麦克卢汉认为, 读报活动能使我们足不出户而照样遨游时空的道理。

这些思考导向了麦克卢汉关于内爆的概念。他提出, 在文字出现前的文化里, “不存在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艺术, 但是整个环境都被体验为一元性的”(麦克卢汉, 1969: 31)。我们已经看到, 口语社会的在社会和感觉上均已被整合的世界被印刷的理性化冲击所彻底改变。这导致了一种少数、等级和专业化的精英文化的产生。哈贝马斯(1989)已经表明, 18 世纪公共领域的兴起, 是与文字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的。但是, 尽管哈贝马斯以一种矛盾心理凸显了文字生产形式的传播潜能, 可麦 123  
克卢汉将这一嬗变看作是创造了一种集中化的自上而下的文化, 这包括了严格的界限区分。印刷的专业化, 划分了美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公共和私人各领域。然而, 这些领域的纵向和横向联系, 已因电子传播的影响而得到根本性的修正。这种新的媒介技术已重构了社会生活, 以致我们没有必要必须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去参与。我们现在生活于一个重叠性的世界, 这个世界消除了文化等级和各领域之间的分离。全球已在纵向上、时间上和横向上内爆。麦克卢汉接着说, 人类已自我崩溃, 回归到具有口语社会那种乡村式的特征。

政治学领域,已不再十分容易地与传播领域相分离,因为政策是依靠传播而得到宣传的。现代性的文化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并不等于说,这扩展了一种政治组织的权力,能使公共话语殖民化。相反,大众传播媒介内爆为政治领域,这造就了这样一个社会:媒介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媒介。法国总统最近飞往前南斯拉夫时,他并不是去参加一个政治上非常重要的条约的签字仪式,或者参加与内战领袖们的讨论。密特朗的访问的意图,是想让世界舆论聚焦于那些陷于战争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很明显,他坐车通过遭受战争蹂躏的街道,受到了全球媒介的跟踪,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麦克卢汉和菲奥里(1968)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政治代表人物的的确确能制造或创造新闻。再者,公共领域相应地内爆为私人领域,这使公共领域走向消亡。具有批判性反思的私人领域,不断地被需要人们注意的新媒介所攻破,从而将人类的有机体哄骗到观念形态的全球性浪潮里。文化的内爆已将理性的公众转变为一种互为作用的质量,或者像麦克卢汉偶尔所说的,转变为能量的一种电子回路。

不仅仅是媒介内爆为政治,娱乐性行业也内爆为教育。我们可以认为,年轻人时下沉迷于视频产品,这使与传统的教育方式相联系的书本作品显得单调乏味。教育体制目前正在使用电影、电视和录像,以此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麦克卢汉的看法,这最终将会产生既有娱乐性又有教育性的混合型文化形式。关于混合的观念,对麦克卢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概念。这是因为它鼓励我们出于对空间群体的考虑而放弃线性发展的型式。依照麦克卢汉和鲍尔斯(1989)的看法,杂志的生产

已被彩电所改变。由于杂志生产的手段响应了电视的技术发展，光滑的封面、彩色图片以及对读者更显友好的布局已经涌现。假若我们的分析仅仅满足于对杂志生产线性发展的勾勒，那么这一点就会被疏忽。麦克卢汉富有成效地提出，媒介某一特定领域的历史发展，应该与文化生产的其他领域相联系。媒介形式的技术上的混合化已产生了根本性的效果，重构了生产的各相关领域。为强化这一观点，我倒希望人们去注意这些现象：将音乐带和小说混合为书刊录音唱片、将电视和电脑结合为个人电视（Me TV）的发展、将电视和录像带整合为音乐电视，以及麦克卢汉（1994：231）自己的例子：电影很高的生产价值已改变了广告的特性。以上的这些评述融入了麦克卢汉对媒介的这样一种总体看法：媒介仿佛是一阵飓风，摧毁了时间和空间这两者之间的各种稳定关系，尽管后文字（post-literate）社会的混合化和内爆了的文化始终改变着现代经验的特征。

信息一旦被获取，它很快就会被更新的信息所取代。我们这个由电子构成的世界，已逼迫我们从数据分类的习惯转向型式识别这一模式。我们再也无法系列地、一块一块地或一步一步地从事对事物的构建，因为快速的传播确保了环境和经验的一切因素在积极的互为影响的状态中共存。（麦克卢汉和菲奥里，1967：63）

## 空间与时间：技术和文化研究

对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当初有些人是持欢迎态度，而另一些人却是加以批评。我并不想在此为他的观点作毫无批判

的辩护,虽然这些观点在大众传播理论方面依然是恰切的,因为这些观点所关注的是与时空相关的诸问题。在媒介和社会学的许多理论方面,目前人们对这些观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因而这些观点仍然重要。我与亚当(1990)一样,认为围绕社会的或媒介的时间问题,应该避免假定理论上的二元论。亚当的意思是,业已构建的社会时间不应该与所谓的本真的或自然的时间对立。亚当发人深思地提出,看待时间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其看作一个多方面的概念,在这种概念里,象征性时间和自然时间之间不可能作出绝对的区分。亚当总结性地说,“这既不是冬天,也不是十二月,也不是乌龟冬眠的时间;这既不是一点钟,也不是圣诞餐的时间。这同时既是地球时间、生物时间、钟点和年历的时间,又是自然的和社会的时间”(亚当,1990:16)。

如果对媒介给时间的经验提供有关信息的方式作阐释性的关注,并规避主体-客体的二元论,那么这应该致力于考察时间构建社会行为的途径。然而,尽管就时间问题而言,社会理论具有合理的根源,这一点至少是可争议的,可这不能适用于各种空间关系。爱德华·苏贾(1989)已表明,社会理论对社会存在和时间的考察的钟爱,始终胜过对空间的考察。以同亚当相类似的理论倾向,苏贾提出,如果考虑了空间这一问题,那么空间就常常被概念化为一种具体化的、客观的产品。就像时间交织着人类的各种行为和意义,空间也不仅仅是作为人类互动的一致性背景而起作用,面是通过这种活动得到社会性的创造和改变。空间和时间并不是社会活动空空如也的集装箱,而是既使人类的行为成为可能,同时又对其起着约束的作用。再者,如同麦克卢汉所透彻理解的那样,空间和时间之间的诸种关系并不

游离于社会诸种实践，而是通过这些实践得到生产和再生产。当然，这样说，并不要求我为麦克卢汉依照其媒介理论来表征空间和时间转换的具体方式辩护。但是，鉴于麦克卢汉专注于联系媒介来讨论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并且承认这些主题在文献中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表征，现在需要提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在文化和媒介研究领域人们反对他的著述的现象？

人们通常有两个相关的理由，用来反对麦克卢汉的观点。第一个理由是雷蒙德·威廉斯(1974, 1985)长期以来所概述的，那就是这样一种反对意见：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是为主导性的各种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威廉斯声言，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分析，脱离于各种更为广阔的社会学的和文化的语境之外。实际上，这使媒介分析非社会化，因为麦克卢汉使各主导性的权威关系构建文化生产、内容和接受的诸种方式不明朗。其实，麦克卢汉使这类问题变得毫不相关，因为文化技术的社会影响被抽象于对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分析。麦克卢汉主义对全球的各种资本主义关系置若罔闻，这一指责一直是麦克卢汉的一些最严厉的批评家的话题(芬克尔斯坦, 1968; 奈恩, 1969)。这种分析脉络可以与斯图尔特·霍尔(1986)的论点相联系：麦克卢汉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意向，与不抱批判态度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有许多共同之处。<sup>②</sup>麦克卢汉的著述，从明显表现于他早期作品中的批判—文学视点转向一种更为欣快的立场。这种立场可以与明显表现于法国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嬗变相媲美，因为法国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嬗变提倡对文化批评的抛弃。在此，批评家被指责为缺乏足够的严肃性，而且鼓吹一种消费主义形式，闲逸地享受全球村里丰富的话语。这些指责是有

认识媒介文化

其充分的道理的。譬如说,麦克卢汉几乎没有涉及使全球村变得可能的各种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化。再说,传播技术的跨国性发展,可以结合进资本主义的组织、控制和生活方式的培养,可这种结合的程度也被人所忽视。就像马特拉特们(1992)已经提出的那样,公众空间的不断商业化,已意味着霸权的各种主导性模式可以和从公共经营者向私人经营者、从国家经营者向跨国经营者转变这一现象相联系。这些问题也可以联系的对象,是时下由全球化诸过程所促成的文化混合样式的实现,而不是技术混合样式的达成。假若在一个层面上,我们正目睹同质资本主义文化的国际性传播,那么在另一个层面上就已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同一性的爆发。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在消费者身上营造出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倾向,并提供各种复杂而不稳定的同一性所表现出的象征能力的迹象,以便这样的同一性通过全球的一种间接影响来改造自己(罗伯逊,1992)。在民族国家的惩戒性话语的影响下,各种混合性的种族同一性已在政治上勃兴,尽管这明显地表明了与一种更有全球倾向的商业文化相关。因此,在区域性这一层面上,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现代性的易变性转向各种更加明确的社会同一性,并对差异具有一种更加解放而又缺乏反应的认识(霍尔,1991)。

威廉斯和霍尔的批评引起了我们对这种情况的注意:麦克卢汉理解传播网络的企图,明显具有技术上的特性。他对探究技术传播媒介的关注表明,由全球、全国和地方的彼此联系的交叉所生成的各种意义,借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只有通过其易变的意义之比才能得到区别”(威廉斯,1974:127)。这一点与米勒



(1971)在对麦克卢汉的经典性研究中所持的观点相似。米勒声称,意义并不受制于各种意义的技术派生物,而是取决于语言实践。根据索绪尔的看法,我倒想提出,语言意义并不取决于各种技术条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是取决于语言的主体间性。比方说,电视节目的互动特性同以下两种情况更有关系:电视节目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还是一个封闭性的文本?抑或电视节目是否被受众赋予了关联性?所以,电视的传播特性并不取决于技术媒介。再者,与接受索绪尔思想观点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麦克卢汉转移了人们对权力与力量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历史世界中的影响的注意力。他在理论上忽视大众传播对象征意义的生产和对各主导性社会关系的维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种情况排斥了与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组织相关的各种批判性问题。

然而,尽管这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正确的,可我却有这样一个印象:在倒浴水时连同婴儿也被倒掉了。虽然文化批评家指出麦克卢汉分析的局限性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自己的研究也含有某些幻想。大众传播领域里的批判分析——自麦克卢汉以来——几乎没有顾及那些对麦克卢汉的研究极为重要的问题。为127  
方便起见,这也许可以被压缩为一个单一的问题:传播媒介的发展在当代社会里已怎样重塑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在技术决定论的影响下,这一问题已被排除于主流文化的理论之外。麦克卢汉探究这些问题的方式,无疑是值得商榷的,而且在这方面,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具有很大的批判力。然而,我与凯里(1989)、梅罗维茨(1985)和 J. B. 汤姆森(1990)一样,倒想提出,不论文化媒介的实际内容如何,它们对社会生活的特性已具有

根本性的影响。同麦克卢汉一样,以上所提及的几位学者认为,传播媒介重构了时间和空间,从而有益于主体间性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就这一方面而言,即使将麦克卢汉的著述看得不像他本人所常常陈述的那样具有决定性,那么他的著述依然富有深刻的见解。

电报的引入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了人类各主体间性的关系?麦克卢汉对此作出了引人入胜的剖析。他提醒我们,电报与电话一样,使我们频频在场,并有机会接触具有交往关系的其他人。譬如说,电报的技术媒介使我们能够维系跨越时空的各种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也构建了这些关系。总而言之,虽然电报并不控制我们个人讯息的文化内容,但在有利于形成个人讯息的文化内容方面,的确发挥着一些作用。麦克卢汉(1994: 256)提供了一个有关几位牛津大学学生的例子。鲁德耶德·吉卜林\*每发表一个词,有人就会付给他十个先令。这几位学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就发电报给他。他们的电报包含了十个先令,要求吉卜林送给他们一个最好的词。吉卜林迅速作出答复:“谢谢”。我们可以明智地提出,就像麦克卢汉所暗指的那样,尽管技术媒介并不决定文化意义,可它们在有益于形成现代性所独具的生活世界诸联系方面,的确起到了某些程度的作用。J. B. 汤姆森(1990)注意到,在一个受大众传播途径支配的社会里,文化传播的发生,并不依托于日常谈话所特有的永不间断的反馈形式。然而,电视单向的互动性流通,在受众身上会产生各种新的抵抗形式,因为受众远离于讯息的发出者。尽管电

---

\* 鲁德耶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写了不少以殖民时代的印度为背景的诗与小说。——译注

视使那些在电视上露面的人的后背都历历在目，可我自己的各种反应却是不在场的。乔治·布什一头栽在自己所喝的汤里时，他的动作即刻就被那些正在收看电视的人看到，但人们看不见的是电视受众的欢笑和快乐。日常生活的各种文化技术和媒介，已起到了重构许多现代经验的作用。这种论辩应该提防后结构主义里的这样一种倾向：将社会和技术和各种关系视为在根本上分离于意义的产生。再说，尽管昨晚六时新闻的意义并不取决于某些技术装置，可以下情况却可能会对意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影响：有关的信息是从电话间接得知，或为了及时掌握《星际旅行》\*故事情节的进展情况时在不同频道的电视上得到的，还是在哄孩子上床睡觉时从收音机上听到的。为进一步说明这些论点，我将扼要地概述类似于麦克卢汉的其他两位思想家的贡献。杰克·古迪和安东尼·吉登斯均将传播媒介的研究放在他们对历史性演变进行分析的中心位置上。可争议的是，他们对这方面的探索方式，规避了我们在探讨麦克卢汉时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 口语的、印刷的与现代的文化： 杰克·古迪和安东尼·吉登斯

我将检阅的古迪(1977;古迪和瓦特,1968)著述的诸方面，涉及他对文字社会和口语社会之间所作出的明确区分。古迪研究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坚持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主要差异存

\* 美国一部星际旅行的科幻电视连续剧(1966—1969)的名字。——译注

在于具体的传播媒介。与麦克卢汉相似的是,古迪认为,对这些技术因素意蕴的判断,可以独立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代表口语社会和文字社会的各种交往行为的诸种差异,对各自文化的社会学特性具有深远的影响。一般说来,与通常明显表现于文字社会里的现象相比,口语社会更加具有非常实用性的语言意向。如同人们可以设想的那样,文化的社会传播主要发生于面对面的交往,在这种交往里,知识主要适应于对现有一整套社会关系的维持。维系跨时间而不是跨空间的传统如此必要,以致不具备这种作用的知识很快就会被扬弃。从以口语为主的文化向文字/口语文化过渡,这需要书面形式的知识的储存。这一过程促使了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意向的兴起,因为各主体解脱了以知识的口语传播为中心的羁绊。在文字方面对文化的客观化,也营造了各种批评的条件,因为读者能更容易地感知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假如我决定连续几天向一批集中在一起的听众朗读一本书,那么让这些听众意识到书中一些没有充分理论依据的问题,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相反,就像评论家和时下的一些读者已显然认识到的那样,由于人们可以借助书面语来讨论问题,详细地提出各种批判性的理解,尤其是对许多论点的复杂性的理解,就有了提高。再者,因为坐下来阅读这本书的大多数人不认识原作者,这也增加了批判性接受的可能性。古迪说,书面语的使用,使明显带有现代官僚特征的评估方法更加非个人化。书面语使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于原作者的人,能开展对一些论点的讨论,而不会自动地向文本的生产者反馈信息的结果。这可能会在原作者的心里产生某种焦虑,但这也显然摆脱了明显表现于口语文化里的更加个人化的交往形式。

因而，古迪消除了在传统上与文字社会和口语社会里的生活对照形式有联系的文明与非文明之间的对峙，而没有提倡文化相对论的一种形式。根据他的看法，能解释口语社会相对封闭特性的，是明显体现于传播手段的各种区别，而不是具有根本性差异的思想形式。

这些颇为简括的思考，对麦克卢汉的著述作了引人入胜而又批判性的昭示。与其他学者（沙尔捷，1989；汤姆森，1990）的看法一样，古迪提出，从主要的口语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比麦克卢汉所设想的更具有不连续性。古迪与麦克卢汉的共识是，印刷对文化具有个体化和专业化的效应，但是这也铸就了知识的等级性和社会的封闭性。然而，这些文化的演变，是与口语传统持续不断的重要性共存的。书面语与其说取代了口语，倒不如说是对它进行了改变和修正。父母亲仍然将民间传说传给子女，其他的群体对过去感觉的维系，所凭借的手段是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而所有这些均不是靠书面语言流传下来的。尽管麦克卢汉声言要摆脱印刷对现代心理的线性影响，可他对传播模式（口头、文字、电子）嬗变的各连续性阶段的讨论，保持了一种离散的形态。印刷补充了口语文化，而不是取代了口语文化。

古迪强调由印刷所开辟的各种传播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麦克卢汉往往消极地认为，这种演变在感觉上产生贫乏、统一和同质的各种生活形式。对印刷文化的这种苍白的解读，不一定看轻了继书面语传播以后所勃兴的各种更加解放的机会。古迪丰富详实地说明，将话语通过印刷固定下来，有助于理性和批判意识的形成，否则就难以想像当代的生活。我们的断语也

认识媒介文化

许对立干麦克卢汉的观点，可表征印刷文化的最佳方法就是辩证法。尽管印刷文化对知识的产生显然具有理性化的影响，可它也确保了给逆事实性的高度参与提供了反思的根据，因为这种形式的高度参与已改变了现代文化的轨迹。

安东尼·吉登斯(1990,1991)关于激进化现代性的理论，反映了对发生于现代世界的一些变化的沉思，而这种尝试性的沉思是最为独特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一理论探索过程中，他将现代性表征为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凡是想要规范其发展轨迹的任何企图，都会产生不同于预想的结果，只会使它的发展愈  
130 发难以控制。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永远无法获致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出于这方面的思考，吉登斯提出，现代性的嬗变速度远远快于以往任何社会的变化，它扩展了它在全球的影响，而且它对传统的社会行为已具有了深刻的改变效应。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展开来探讨由这些观点所引发的种种更为广泛的争端。在此，我拟聚焦于对由各现代体制所肇始的两个方面的讨论，因为现代体制在吉登斯的论辩里十分重要。

首先，当代社会已目睹了时空分离的演变，而这种演变在前现代社会里是不明显的。吉登斯说此番话的意思是，在前现代社会里，时间和空间总是从物理角度来得到明确的确定。昼夜的更替抑或季节的转换，均被当作时间和空间具有明确位置的标志。自钟时发明以来，我们可以说，时间已分离于空间，而且时间和空间已变得虚空。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可以在年历、火车时间表和地图上得到昭示。这些图表能使时间和空间得到协调，没有必要参照具体的位置观念——它们是使社会活动有序化的抽象手段。庆祝一个生日，不需要当事人直接在场。年历的

使用,有助于我们记录重要的社会节日,其方式并不依赖于具体的区域因素。

这引发了我想要考虑的吉登斯所作出的贡献的第二个方面——社会体系的分离。根据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post-traditional)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里,时间和空间的“成空”(emptying out),使社会诸关系的延伸成为可能。假如我们暂且思考一下电视网络的全球化这一问题,这应该是于分明了的事。尽管全球性并不意味着普遍性,国际上的各媒介组织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地传播各种影像和表征,并将这些影像和表征传送给全球的电视观众。让人难忘的是,这使得海湾战争转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冲突。按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全球已自我内爆,消除了时间和空间。在吉登斯看来,从区域化的语境中重新定位信息,这明显地表现于现代各传播网络,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借助了时间和空间的分化,以及诸如技术媒介等机制的分离。这些手段涉及社会诸关系与“区域性交往语境及其跨越无限时空”的分手(吉登斯,1990:21)。譬如说,吉登斯认为,专家体系体现了许多这方面的特征,因为这些体系所应用的知识具有一种独立于使用者的效度。专家体系是日常生活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拓展各种社会关系。每当我阅读一篇关于健康保养方面的通俗文章时,专家参照体系从我可能会选择的某种生活方式上得到重新语境化。停止吃肉这一决定,可能是受到我在妇女杂志上读到的某一篇文章或攻击麦当劳快餐店的宣传单的影响,或对国家雇用的科学家所作出的保证持不信任态度所致——所有这些例证充分反映了技术知识在现代性里怎样通常得到重构的方式。③

吉登斯(1991:24-27)在对报纸的文化结构的简短讨论中,明确地承认了技术媒介所起到的作用。正是电报的发明,使得早期报纸将空间与地点观念分开。在此之前,报刊的内容取决于新闻内容是否能就地取材。电报使信息摆脱社会处所的能力,意味着媒介内容较少地取决于空间和时间的接近,使报纸愈加变得受事件的驱使。由电报的技术媒介引发的嬗变,改变了报纸的性质。吉登斯十分明显地接受了麦克卢汉的观点,提出时间和空间的重构,使得发生于远处的各种事件变成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将现代媒介的内容改变为一种拼贴效应(a collage effect)。

现代性具有处于不断变化的特征,这种长期性的影响,既具有统一又具有分离的效应。譬如说,报纸的大杂烩特性(mosaic nature),既鼓励了人类共享一个单一世界的观点,又使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再者,与麦克卢汉的思想脉络极为相似的是,吉登斯认为,全球性生活方式的内爆增强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目前分享着一些机遇和难题。然而,我与吉登斯的看法一致的地方是,社会统一的力量也伴随着离散的过程。如同吉登斯(1991:188)所提出的,阅读报纸这一行为,也许在一个层面上使我们意识到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种争端,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果具有一定数量的新闻印刷,那么这就会涉及在许多信息形式中对某种信息形式的有意识选择。麦克卢汉强调了传播技术的统一意蕴,以及这些意蕴所促发的意义的相对次要性,这使得他忽视了这一要点。

在其他方面,吉登斯的评论与古迪的看法相似,均表明了对麦克卢汉的批判。古迪和吉登斯将口语文化描述为受传统生活



方式的影响，而传统的生活方式整合了乡村的时间－空间组织。在占迪看来，书面语的引入使批判性反思成为可能——而根据吉登斯的看法，书面语的引入具有类似的效应，因为它有助于时间－空间的疏远：这使得知识的生产被排除于对传统代码和行为进行重新阐释之外。将时间/空间分离于地点，以及对传统知识的批判性占用，这给现代性的反思特性创造了各种条件。我们已经看到，专业知识形式的通常性分离，有利于维系各种批判性的实践。吉登斯写道：“在一切文化里，各种社会实践的通常性改变，是以给社会实践提供信息的各种新发现为基点的。但是，修正习俗，使其激进化地应用于（原则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唯有在现代性时代才有可能”（1990：38－39）。<sup>132</sup>

现代性的反思之门，迎来了这样一个世界：最终没有任何东西是肯定的或毋庸置疑的——包括理性。反思，抑或从新知识的角度改变人类的行为，已深刻地渗透于各种现代体制。再者，应该受到质疑的是，麦克卢汉对传统衰落的反应性解读，以及在电子传播形式的影响下传统的准回潮。大众传播的新媒介尚未使现代社会回归到明显体现于前现代时期乡村式的理性形式。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著述具有无可弥补的缺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构筑了新的参与形式并形成了空间上的联系，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将文化媒介和反思性的质疑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假如我们接受吉登斯的观点，那么我们倒可以提出，使人人能够享受新知识的一个主要机制，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使受众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视点，而这些视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摆脱了原先的地点。毋庸置疑，对现有各种社会实践批判性的检验，是与传播的网络相

联系,这种网络传递着业已修正的知识形式。因而,在占迪和吉登斯看来,文化批评的观念与传播的技术媒介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文化媒介既是信息储存的手段,又是信息穿越时间和空间重新确定地点的途径。

这些视点的潜在意思是,技术媒介在促进更具反思特性的现代性文化方面,已起着重要的作用。譬如说,美国的电视访谈节目常常涉及一些现代生活中人们最为熟悉的各个方面。不论这些节目谈论的是虐待孩子、不适宜的性伙伴抑或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它们均具有这样一个作用:使社会大众开始关注最近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常常以夸张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激烈的网络竞争意味着想尽办法去吸引受众),电视座谈已使公众与个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重新得到语境化。这些座谈可以被储存于录像带,这使得专家们能够了解反映性和种族问题的方式。当然,假如人们对这个节目只看过一次,那么这样做是困难的。在全球性的电视市场上,文化的可传送性意味着这类节目能让广大的受众收看。如同吉登斯所表示的,电视访谈节目提供了专家观点和受众参与这样一种通俗的混合物。这能使处于完全不同于美国语境的观众,看到也许在自己的民族语境中受到更多压制的各种问题的讨论。对“怎样才能构筑健康的关系”这一问题重新语境化,在某些方面是将专家手头研究的问题推出来,供大众思考。然而,这种分析的主要困难是,技术媒介在现代性里怎样使反思民主化,探索这一问题,明显脱离于在电视座谈背景下产生的会话质量。就像我所表明的,为引起受众共鸣的需要,会使这种讨论受制于虚妄的制作价值以及出于噱头的考虑。这些问题不是本章所能详细

论述的,但应该清楚,尽管技术媒介具有某种民主化的效应,可技术媒介本身不能保证通达的论辩层次。这并不否认古迪和吉登斯所观察到的问题具有相关性,可对本书的意旨极为重要的,是需要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为批判地重新思考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符号文化,理应得到某些规范性的考虑。

与麦克卢汉和英尼斯一样,古迪和吉登斯使得传播体系的演化成为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重点。我倒认为,传播媒介的发展是与大众社会的兴衰紧密相联的。最近,人们将大众社会的衰落与发生于战后社会里的一些文化嬗变联系起来。这些文化嬗变包括工作实践的改变、传统政治党派的衰败、民族传统的衰微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如同麦克卢汉所意识到的那样,技术媒介性质的变化,对某些文化联系也具有意蕴。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所经历的文化整合程度,常常被用来与更为离散的现在相比。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勃兴而产生的传播体系的集中化和民族性质,明显地体现于将公民整合进纵向的体系。发生于传播结构引力中心的变化,已相应地影响了在今日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各种主观性。有线电视、卫星和更为全球性的广播的使用、多样化的杂志市场的迅速崛起、电波的商业化和录像设备在一些家庭的增多等,均已改变了文化生产的轴心。消费者现在具有更多的选择范围,并且对他们也许想要购买的文化形式也有更多的控制权。这使得消费者能够规避文化生产的传统形式,享受着符号资料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媒介技术的发展已不仅仅离散了受众,而且还限制了传播媒介可能被用于国家操纵和控制的程度。由于传播网络时下超出了民族国家规范信息流通的能力,这制约了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强加。然而,大致说来,媒

介体系仍然具有民族性,而且这种论点错误地假设,商业体系不能平等地被用于灌输思想的目的。能更有把握地说的是,媒介输送的激增,使这种策略比先前存在的传播模式更加复杂。这就是说,较为陈旧的社会整合型式的衰落,可能与时下广泛的民众能够享用的技术体系有关。

这些研究,会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们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著写关于现代性历史的文章。这种研究计划会力求规避明显表现于英尼斯和麦克卢汉著述中的技术决定论,但也会批评将传播结构还原为其他形态的功能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还应引起同样注意的是,不要夸大传播媒介的力量。的确,就像古迪、吉登斯和麦克卢汉所表示的那样,更加全面地重视大众媒介在促进现代社会的形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会包括围绕传播媒介的各种问题。然而,麦克卢汉误入歧途的是,他竭力想用技术的交叉点来取代对意义和体制交叉点的研究,在这方面,英尼斯也是如此。在此所提供的分析会表明,媒介理论应该力图维系分析的不同层面和相关层面之间的张力。

## 更多的批判意见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迄今为止已受到具有相对共鸣性的高度参与。然而,欲复兴麦克卢汉的思想,而又不提出一种更加有力的批判分析,这不是我的本意。与大众传播研究相联系,充分地重视麦克卢汉的著述,必须认识到至少有四个其他的批判层面:(1)他对时间和空间特性的误导性思考;(2)明显表现于统一化和离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3)媒介技术能为监督策略所

利用的方式；为铺垫下面的讨论，我将探讨（4）麦克卢汉的理论对特定的公共空间的未来所具有的意蕴

1. 在麦克卢汉看来，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的全球内爆，已瓦解了作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信息的传播，导致了所有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的各种联系。这种评述既具有实在论的特性又是一种极度的夸张。如果我们接受麦克卢汉的空间观念（虽然就时间方面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论点），那么亨利·勒菲弗（1991）的著述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分析。

根据勒菲弗的观点，空间是物质实践和象征性社会实践的产物。<sup>④</sup>我们可以谈论三个不同层面的空间实践。首先，有一些实践直接涉及特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现代的民族国家可以从这方面得到概念化，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通常通过实施某些入境标准，试图规范公民的入境。这些实践具有相对的持久性并能跨越时间，这有利于再生产关于公民身分的某些观念。<sup>135</sup>其次，勒菲弗提出，这存在着直接与空间生产交错在一起的某些空间表征。当代建筑学的表征性实践可以从这一方面来加以考虑。尽管金钱（资本）和权力（国家）的联合机构正在继续不断地改变着城市的景观（空间实践），可这些机构反过来又仰仗于建筑师的绘画和设计，以便考虑如何去改变市景。的确，从具体的西方技术和体制实践的全球化这一角度，勒菲弗提出，资本主义已迎来了他所称的抽象空间。抽象空间受制于理性的技术形式和能削平差异和不同的帝国论内驱力。戴维·哈维（1989）补充说，处于劳资之间关系的空间轴心依然十分关键：尽管资本的流动性已逐渐支配空间，可在目前劳方更擅长于借助地方来组织抵抗活动。最后，这还存在着勒菲弗所称的表征性空间：诸如艺

术的复杂性象征性标记，维系了对主导性生产关系的相对自主性。

首先，勒菲弗的分析至少使我们意识到，空间实践存在着不同的层面。麦克卢汉已将空间分析彼此联系的层面内爆为电子媒介的改变效应。勒菲弗还使我们注意到，空间实践通常在时间方面具有某些持久性。这不仅表明麦克卢汉关于空间终结的观点具有实在论的特点，而且这些观点还对后结构主义学者起到了矫正的作用。在此我想起了霍尔早期的一些观点，那些关心混合的同一性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忽视了对更加稳固形态的维护。可以具体定位的全国性报刊的持续性发展，具有教育意义。可争议的是，购买一份全国性报纸这一社会实践，表明了能束缚时间和空间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同一性。再者，按勒菲弗的话来说，我们能重新将由大众媒介引发的一些空间嬗变与诸种体制过程联系起来。这回到了前面已经涉及的一个论点，即以技术为基础而模拟的全球村，不能脱离这样一种探究而概念化：对那些辩证的各種社会关系的探究，在使公众空间商业化的同时，又使它个体化。勒菲弗更具物质性的关注提醒我们：空间的嬗变仰仗于体制的参照系统而不仅仅是技术参照系统。诚然，若要想像勒菲弗的理论以何种方式给麦克卢汉所明显强调的技术媒介的一些能力留有余地，这是困难的。勒菲弗的唯物论参照系统，理应大致上包容电视从资本利益出发跨越时间和空间重新使信息语境化的能力。我们或许处于更加牢固的理论基础，假如我们认为，尽管电子媒介的全球性传播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可由这些发展所强化的一些文化意蕴被最佳地概念化为某些技术媒介的特性。

但是，麦克卢汉将时间和空间表征为即时传播形式的方式又是怎么样呢？玛乔丽·弗格森(1990,1991)已经指出，即时传播的出现能作为模糊各种选择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操纵形式而起作用，而这些选择关系能确保对某些优秀表征的选择。再者，阻碍麦克卢汉对大众媒介进行更加社会化思考的，是他那种排他性的技术范式。从这一角度出发，弗格森指出，影像生产的某些社会关系，能与影像的选择和对其他影像的表征联系起来。譬如说，现代国家一直陷于对大众媒介向公民们传播的信息的监控。这一现象尤其是在紧张的社会冲突期间，会导致各种审查措施、有效的压制或对敏感信息传播的竭力遏制。所有这些均是恰当中肯的例子。也许更为合适的是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虽然媒介尚未消除时间和空间，可基本上对其进行了压缩。戴维·哈维(1989)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蔓延以他所谓的时间—空间的压缩为手段，已加速了日常生活诸过程的发展。如同哈维的论点一样，这样一种论点应该强调诸种体制在分离某些影像和印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这些体制不囿于技术范式所固有的各种局限，跨越全球、跨越国家或跨越区域，对各种影像和印象进行传播时所起到的作用。我已表明，唯有在媒介相对稳定的空间网络里不再可定位时，人们才可以提出空间已经被消除。虽然今晚六时新闻里的主要新闻内容，可能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但它仍然最有可能是涉及西方世界抑或涉及本国的。再者，尽管在文化方面民族的凝聚力已经削弱，可在欧洲的语境里，新闻节目在多数情况下仅在民族国家的境内广播，而且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些节目仅反映这一民族国家所关注的各种具体问题。从时间/空间的关系角度来看，即时传播与其说是我

们的关注点，倒不如说是体制的母体和技术的母体与维护或破坏区域的、全国的或全球的同一性相交叉的方式（施莱辛格，1991）。

2. 麦克卢汉的值得仿效的一条推理脉络是，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新闻媒介与凸显的印刷文化不同，具有民主化的效应，因为新闻媒介没有那么多的入门等级层次。这起到了培育一种业已内爆的全球感的作用，因为全球就是密切联系之地。这些观念已得到了乔舒亚·梅罗维茨（1985）引人入胜的发展。在梅罗维茨看来，收看电视是一种个人行为，这并不牵涉到或许与购买一本书、一张唱片或一本杂志有联系的公众介入（public commitment）这一层面。譬如说，他认为，虽然人们可能不愿意购买一本关于异性模仿欲的杂志，但他们可能并不反对收看关于这一话题的电视节目。电视可能并不深化我们对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的理137 解，但这至少使我们在表面上熟悉了那些与我们目前的社会定位没有关系的人。梅罗维茨认为，电视是公众交流的一种形式，它超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领域，并重新界定社会相互作用的畛域。实际上，电视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并混淆了戈夫曼（1971）所称的台前和台后的区域。一名政府部长被问及他与秘书的不正当关系时，他闪烁其词，这就是这种情形的结果。电视使得这名部长的尴尬人人可见，这样一种情形他倒愿意在更为私人的情景里进行。我们能够瞧到他的窘迫，这一事实具有破除那些原本是有权有势的人的神秘感的效果，使我们意识到他们同我们自己一样，也是常人。政客们为人所感知到的普通性，也可能与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中已经受到许



多评论的崇敬心理的消退有关。当然，政客们会设计出种种新的策略，以应对他们与选民的各种“可视”（visible）关系；同时，他们会齐心协力，隐藏差异，寻求重塑各种距离关系的途径。

根据梅罗维茨的观点，电视不仅仅能调整民众与政客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也会改变男人与女人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上文的探讨一致的是，他认为电视媒介已统一了以往明显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电视已有效地消除了工作和政治这些公共领域的神秘性，而在传统上妇女却被排除在这些公共领域之外。历史上，由男人定义的印刷文化被用来在意识形态上掩盖这些社会经验领域，富有成效地压制了妇女的言论，并将她们隔离于家庭之内。同样，电视也给现在的孩子提供了了解成年人世界的机会，而这一世界要是在以往从社会角度看却是比较遥远的。孩子们通常收看肥皂剧，而这种剧目所反映的，往往却是成年人平常遇到的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许多公众问题和私人问题。梅罗维茨的这些思考与波斯特曼（1982）的思想相似。波斯特曼认为，印刷报刊的发明将成年人和孩子区分为识字和不识字的人。孩子进入成年人世界的部分权利，是依凭不断地熟悉成人书本文化来取得的。在波斯特曼看来，这种情形已被电视的技术媒介所改变，因为这种媒介往往消除了关于具体成人世界的观念。我们现在居住于一个大众无所不知的世界，没有几个话题是没有作公开讨论的。

梅罗维茨和波斯特曼的论点与麦克卢汉的论点一样，均存在着有关技术决定论的类似问题。同麦克卢汉一样，他们过分强调了技术促进社会统一化诸种形式的力量。这并不是说，电视不可能具有麦克卢汉所概述的一些效果，而是表明，表征电视 138

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统一化和离散化的辩证关系来取得。斯蒂芬·克兰认为(1993),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玩具制造商以电视广告为手段,明显地将主要目标瞄准了儿童。在整个1980年代,儿童文化的商业化进一步加剧,电视节目本身愈益明显地充当了商业产品的广告。广泛的心理调查、各种促销活动和大众营销等手段,已被资本主义企业所利用,以便创造容易辨认的品牌。商业机构对儿童的玩耍、想像和幻想的殖民化,是审美情趣和商品生产的整合造就的。当然,精心的营销策略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成功,或者受到儿童及家长们的抵抗。然而,假如人们想要发展马歇尔·麦克卢汉更有成效并很有见地的一些思想,那么,将目标明确地瞄准离散的受众,这会引导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种更具辩证关系的分析框架,即对统一化和离散化诸过程进行概念化,是很有必要的。克兰的论点,不仅仅是说,电视是被儿童用来熟知成人世界的一种手段,而且是说,儿童本身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市场部分,被各种资本主义策略用来扩大竞争异常激烈的玩具市场。

3. 最近,有一些大众传播理论家已表明,传播网络使社会越来越具有可视性。J. B. 汤普森和梅罗维茨追寻麦克卢汉的思想脉络,认为这些发展已开辟了各种更加民主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想法具有实质性的盲点,因为它们未曾探讨与监督有关的各种问题。汤普森(1994)和梅罗维茨(1985)认为,政客通过其公众可视性来表现自己,这是危险和机遇并存。这一观点引人入胜地发展了麦克卢汉关于内爆的各种论点。然而,尽管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和汤普森注意到了使各主导性集团的行为具有可视性的手段,可他们忽视了这样一种途

径：传播技术可被用来监督不那么有权势的人的行为。米歇尔·福柯的著述在此可能是重要的，虽然人们都认为在传播系统的历史性演变方面他没有什么发言权。

福柯(1977)将惩戒性权力称为体现现代各种体制的权力和知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前现代社会里，如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使自己具有可视性的是国王，尽管人们始终看不到权力的行使对象——臣民。在福柯所描述的现代卡索\*式社会里，这种情形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在这种社会里，那些受到惩戒、观察和判断的人，是臣民，权力的行使使这些人最具有可视性。现在，力求无可视性的，是权力本身，尽管那些成为控制对象的人通过体制空间的重新组织而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当代的 139 背景里，国家依靠监督技术的巧妙传播，监视公众的个体行为。公众通过允许一系列先进监督技术的使用使自己在场(present)，并记录自己的各种行为，尽管那些监视他们的个体行为的人却往往藏而不露。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像银行里的排队、商场里购物或观看某些体育比赛一样丰富多彩，但这些活动在日常均涉及对人群的监视。这些考虑应该会说服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传播技术不仅仅内爆社会生活的诸种领域，而且还使监视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成为可能。

这种考虑是以怎样的方式冲击了大众传播的社会理论？可能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由于大多媒介产品是在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消费，受众的活动并不常常受制于福柯所描述的各种机制。也可以表述这样一个论点，而这一论点是福柯所

\* 旧时法国的光度单位，以 19 世纪法国发明家 B. G. Carcel 的姓命名。——译注

没有涉及的,即随着国家规范监督的扩大,某些隐私权也随之而来。这些观察角度削弱了福柯及其追随者对卡索式社会的普遍性所作的一些更为夸张的提法。汤普森、梅罗维茨和麦克卢汉对大众传播迎来的更加民主的生活方式所作的思考也说明了这一点。诺尔贝托·博比奥(1987)根据福柯的观点提出,现代权力的宗旨,就是使自己成为不可视的。权力的隐匿特性违背了表征和非集中化的民主观念。在博比奥看来,民主这一观念,就是想使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表露无余,处处在场,而不是藏匿不露,处处不在场。现在回到福柯的观点上来,尽管权力的行使在前现代社会里可能是可视的,可作出某些决定而舍弃其他一些决定的缘由却是不可视的。在博比奥的分析里,福柯对其持怀疑态度的启蒙运动传统,寻求正确性以及先前秘而不宣的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大众化。在现代语境里,福柯往往错误地将权力的可视性与征服相提并论,而并不是将可视性等同于有说明义务的各民主形式。与其说福柯在关于惩戒性权力方面是错误的,倒不如说他在论及汤普森(1994:41)所称的全球性监视所开辟的各种民主可能性时起到了误导作用。汤普森这样说的意思是,政治权力的行使愈来愈多地发生在一个可视的世界舞台上。大众传播媒介使暴虐国家的各种行为,对全球的公民来说变得非常具有可视性。

然而,我倒认为,福柯的描述对媒介研究者来说依然饶有趣味。譬如说,通俗的报刊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描述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通俗小报报刊的许多内容,就像同大众性的各种民主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与普通民众私人生活的规范化监督也密切相关。在此,尽管人们常常提出一些论点为这一观

点辩护,可将强奸受害人的确认和罪犯亲属公之于众,而且对骚乱常常作带有种族主义观点的报道,这些与其说是同民主舆论的流传有关,倒不如说是与权力的规范性有联系。发表于1993年10月20日《太阳》报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两个类似于这些情况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涉及一群密探型记者,他们发现了由大学生们组织的所谓性放任聚会。发表这篇报道的意图,是想为关于大学校园里约会强奸的讨论提供背景。这家报纸不仅错误地表征了所有对这一主题作复杂的探讨时都肯定会遇到的关于性征和权力的诸种问题,而且还对性行为不正常的学生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描述。在这同一篇文章里,还报道了一名邮递员向一个反种族主义的游行队伍投掷砖块时被一名摄影师抢拍了下来,然后遭其老板解雇的情况。这篇报道声言,这一情况出现的直接原因,是这家报纸发表了那幅照片,并希望读者去辨认那个投掷砖块的人。关于这两件事情的报道均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信息技术可以被用来制造广大民众所不允许的道德犯罪的个体化情况。按福柯的话来说,这些报道是试图通过提供不正常行为的清楚例证,将规范化的行为准则强加于大众。这类任意选择的例证十分显然地表明,尽管福柯具有局限性,可他对规范化实践的分析,不应该归入仅仅接受大众媒介在有助于使公众生活民主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样一种表述。一种关于公共媒介的更具实质性内容的理论,会力求阐发传播技术的这样一种潜能:引发公共的和批判的反思以及明显表现于各种惩戒性机制里的各种危险性。

4. 麦克卢汉的阐述,引起了我们对信息技术与公共领域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注意。哈贝马斯(1989)所概述的关于对公共领

域的看法,是受印刷技术支配的社会的产物。麦克卢汉认为,印刷滋养了为个体化反思和理念的形成所必需的私人空间。因为同样的原因,电子传播形式由于社会诸领域的内爆和更具相互作用的空间的成长,消除了批判的反思领域。在此,麦克卢汉的诸种论点已被波斯特曼(1985)以一种近乎于保守的方式加以阐释。波斯特曼同意麦克卢汉的这样一种观点:电子传播媒介已削弱了理性的公共领域。印刷的逻辑世界已被电视媒介所取代。这一媒介没有能力提高理性民主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视觉媒介,电视几乎不需要具备什么技能来收看它,所促进的是对时尚的关注而不是对内容的关注。再者,就像詹森(1990)所指出的,波斯特曼已从麦克卢汉那里继承了技术范式,这种范式假设电视的意义取决于传播媒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传播技术与公共领域之间不需要建立一种联系。

141 大致说来,我认为麦克卢汉关于公共领域的各种论点是被错误的思想引入了歧途。在建立传播媒介与一种促进批判的讨论和论辩的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他的分析明显地轻视了我所假定的重要性。如同麦克卢汉所透彻认识到的那样,电子传播形式已彻底重组了公共领域。信息量的增加和我们文化在总体上的加速发展,已使批判反思更显困难。人们越来越热衷于麦克卢汉所描述的冷媒介,人们可以从录像、计算机游戏,以及最后更具互动性的电视的发展中感觉到这一现象。这不仅仅改变了信息提供者与受众之间的平衡,而且还对瓦解公众观念具有深远的个体化效应。这些过程对公众文化的民主形式具有作用。如同麦克卢汉所认为的那样,仅仅认为诸如电视那样的媒介才是民主的,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媒介相对来说是非集中化的,

并且还容许参与。民主的概念是一种共享的语境准则，囊括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譬如说，任何自认为是民主的文化，都需要为多元的视点和戏剧或论辩的挑战形式提供体制上的基础。这些问题，是不是那些目前正在宣传新的互动性未来的人的主要关注点，这至少是可以怀疑的。

齐格蒙特·鲍曼（1993）最近提出了通验（telecity）这一观念，用来解释以上的一些变化过程。鲍曼认为，通验就是客体和主体仅仅作为快活和娱乐的形式而出现：

人们现在可能会坦然和毫无畏惧地盯着陌生人——很像观看动物园里的狮子，咆哮着的野兽的冷漠和战栗，其尖牙从不曾有机会接近观看者的皮肤。人们也许会观看陌生人在电视匪警剧无休无止的重播中进行抢劫、残害、枪杀或彼此勒杀抢劫（这些事情是人们会预料陌生人作为陌生人去干的事情）。或者人们会兴高采烈地看着陌生人兽性大发。或者更好一点的是，陌生人可能到处奔波，扮演电影脚本里的角色，抑或由于导演小小的失误而失去了精湛的表演能力。这些陌生人非常接近于客体，但他们注定——幸运地——远离行为的主体。在通验里，陌生人得到了净化，并且很安全。（鲍曼，1993：178）

电视屏幕可能会让我们可以呆在家里周游世界，但是，将电视整合进个体化的休闲模式里，这意味着唯有他性（otherness）没有提出严肃的义务感，他性才会与现代主体相遇。虽然有一些夸张，但由于很难想像人类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义务感和协同感这样一个未来，通验这一概念凸显了在虚拟现实和个人电视的未来技术发展中某些文化的活力。在这两种情况里，影像和

表征受到了选择，以适合主体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品味和喜好。由通验开辟的空间是建立于个体快乐的基础之上——允许主体在丰富多彩的媒介文本里无拘无束地畅游。这是一个向着他者的意向。譬如说，目前正在美国得到开发的关于个人电视的理念，会在技术上使收看者有能力从观众的角度选择电影、记录片或戏剧表演等。这对观众来说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技术，因为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随着人们可以预想到的电视网络和频道的爆炸，观众在节目的各种喜好方面要作出明智的选择，会是很困难的。但是，更具负面效应的，可能会是预先选定的节目对积极挑战受众的先人之见起不到什么作用：电视观众对自己平常不太看的节目，可能会不那么容忍，他们从电视文化中吸收了惊骇和对抗的某些因素。

这种负面投射会目睹公共空间的终结和原子化快乐文化的升华。然而，这种思考仍然是前瞻性的，并且电视频道的激增具有潜在的积极效益。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想法：新技术不会促进通验，相反，新技术将会充分调动各种不同的节目，为受忽视的那一部分受众服务。恰如廉价的技术（允许女性主义杂志、黑人报刊和其他激进刊物的发行）已使报纸和杂志的生产革命化，电视的开拓也将会提供同样的作用。尽管这种投射或许过分地乐观，可尤其是在印刷文化的发行量具有限制的情况下，就像以往一样，十分有把握地对未来的发展作出预见是困难的。但除非关于公众和传播的研究得到更强有力的支持，我的这些乐观性解读会是难以维持的。

尽管我并未竭力去为麦克卢汉关于公共空间崩溃的观点辩护，可表明这样一种想法似乎是可行的：信息网络的全球化给民



主文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风险。因而，任何想重新考虑公共空间的企图，都将需要保持对空间的强调（区域的、全国性的和全球的）。假如这些领域需要重新得到阐发，那么传播媒介、内容以及体制性组织的各个方面都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这些观察并不完整，但应该清楚的是，麦克卢汉的著述，对那些关注我们文化特征的人来说，将继续提供具有挑战性的视点。

## 小 结

麦克卢汉的分析通过将空间和时间、内爆以及混合性等问题引入媒介研究，保留了当代的相关性。他的著述生成于加拿大社会理论的语境，因被指责为技术决定论和政治保守主义而常常受到忽视。这些论点带有许多分析性内容，但其旁证性资料却言过其实。与古迪和吉登斯的贡献一起，麦克卢汉的贡献<sup>143</sup>对于传播媒介在现代性的发展中已怎样起到了中心的作用，依然发人深思。古迪和吉登斯与麦克卢汉不同的是，他们表明了文化媒介的某些技术能力与明显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反思性高度参与之间的联系。麦克卢汉坚持认为，我们已回复到明显具有口语社会特征的状况，这种想法被认为太片面，并且具有误导的作用。在最后一节里，我们看到，麦克卢汉的著述较之出现于前面讨论里的，更具实质性的缺陷。尽管他对空间和时间的思考仍然具有价值，可这样的思考需要不那么具有实在论的研究方法和更以体制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来补充。除此之外，麦克卢汉关于电子传播形式的统一性和民主化影响的著述，需要考虑相应的文化离散和监督。尽管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

可那些未来更具民主色彩文化的支持者，将需要重新考虑为公共领域的未来所勾画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技术图景所蕴涵的意义。我们现在需要更加仔细地审视这种观念通过后现代性的发展是否已经销声匿迹。

## 第五章

# 博德里亚的暴风雪

144

### 后现代性、大众传播和象征性交往

#### 作为一个异质场域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旗帜下通常得到探讨的各种问题是多元的，而且不能在一个统一的话语里得到概念化。的确，人们会指望一个哲学信条，告戒人们防止隐藏于对统一化和分类化的欲望的背后从而

对知识领域命名的企图抱怀疑态度的独裁主义冲动。然而，虽然在内部千变万化，后现代主义在与一些批判性问题的联系中已获致了某种凝聚力。就一些关键性的主题方面，一个需要奋斗的领域已被勾勒了出来。这些主题包括（1）诸如客观性和语言的所指功能等哲学问题的争端；（2）现代主观性的离散；（3）保留差异性，以防止同质化的冲动；（4）拒斥各种概括性的视点（这明显表现于许多古典的社会理论），这些视点力求规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特性，抑或凭借一种理论模式来把握社会的一条途径；（5）否定社会变化的目的论（teleological）观念；和（6）对预示终结社会对抗形式的一切乌托邦式的政治倾向抱怀疑态度。

所有这些主题将在此得到论述。然而,并不奇怪的是,即令作出了广泛的高度参与,这些被讨论的理论家也只是不确切地实现了这种理想的模式。这告戒人们要防止知识上的懒惰性尝试——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左证——要不就是断然拒斥后现代性的质疑,要不就是没有潜心探究主要论敌所持的各种具体立场。

让·博德里亚对时下已有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最为精辟的后现代批评。传播技术、瞬息万变的服饰、主题公园、涂鸦以及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已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经验。博德里亚对这些方面作了探讨。在他看来,消费文化的到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通常性区别提出了深刻的疑问: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深刻的思想与肤浅的思想、能指与所指和将要在下文详细讨论的有关人类需要的观念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目前出售物。与这些主题有关的是,在各种理论视角的语境里,博德里亚在大众传播研究方面的思想,已力图发展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学术观点。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博德里亚在恰如其分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传播媒介的同时,对内爆和即时传播的各种概念作了激进化的处理。博德里亚所强调的重要性是媒介的,而不是讯息的。麦克卢汉对电子传播使其成为可能的各种新颖和全球性的相互联系方式作了乐观的解读,对此,博德里亚和麦克卢汉两人之间产生了分歧。博德里亚对这种情况甚为悲观的解读,给人对后现代的信息浪潮以这样一种感觉:消除主体,从而滋生麻木不仁的意识而不是参与意识。根据博德里亚的分析,后现代性的主导文化不具备批判的内在性,惟独需要极为愤世嫉俗式的高度参与。

下文将以尊重的态度恢复博德里亚的学术语境,然后在继

续论述过程中,我将颠倒他的许多关键性假设。但是首先,值得提一两句关于博德里亚的著述给批评家带来的一些晦涩的写作方式。博德里亚常常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的情绪尤其明显地表现于他的后期著述,这使他的作品让人难以总结。加之作为一个先锋派的策略,这意味着博德里亚的话语力图规避在诸如本文那样的文本里的融合。但是,不论我与博德里亚的策略有多大的不合,我的论辩策略表明,假如评论家要回应他的理论抨击,博德里亚自身媒介的话语语境必须在解释学上得到揭示。需要注意的是,我自己的阐释方法,对博德里亚来说,是存在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 博德里亚、阿尔都塞和德博尔

迄今为止,业已出版的论述博德里亚的三部主要著作,均强调了他与巴塔伊、马克思、毛斯和尼采等作者的密切关系(甘恩,1991a,1991b,凯尔纳,1989)。这些作者将会为我自己的讨论提供背景情况,但在开始时我想将着重点放在别处。在1960年代后期,博德里亚在法国的南泰尔执教期间,曾向一种名叫《乌托邦》的杂志投稿。该杂志提供了一种环境决定论(situationism)和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在这些方面的理论实践中,有两名最重要的理论人物是德博尔和阿尔都塞。如果要想正确地评价早期和后期的博德里亚,了解这两位作者是有必要的。

博德里亚的初期理论阐发,可以被解读为是与人道主义者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论辩。1960年代后期,在法国的思想

146 舞台上，阿尔都塞的研究思想主宰了这些论辩。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就是他摒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独创性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在阿尔都塞看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衍生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它既具有实在论的特点又具有目的论的特性。这种哲学信条将工人阶级表征为享有特权的历史主体。借助革命行动来实现人类的基本特性，这是历史赋予这一主体的任务。之所以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实在论的特点，是因为这种主义对人类的特性和在认识论上享有特权的工人阶级具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界定。在这种黑格尔式的图式里，为异化的克服和工人阶级的自我实现，这种历史循环论的转折赋予了历史一个终点。相反，阿尔都塞认为，人类并不是支配那最终可操纵的现实的要素。实际上，他们是以社会生活方式组织在一起的主体，在业已存在的社会结构中各得其所。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论错误，在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具有一种不受现有社会实践决定的特性（阿尔都塞，1977）。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力图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各种主导性体制关系的方式。满足劳动力经济体制的各项要求，不在于主导性生产方式，而主要在于诸如教育体制、家庭和媒介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征服的情况下，劳动力才得到再生产。假若遵循阿尔都塞的观点，那么意识形态将人类转变为主体。意识形态使我们错误地将自己认作具有自主和自我决定的代理者，而实际上我们是通过社会和心理诸过程而形成的主体。因而，意识形态并不是现实的倒影，而是与我们共享的生存条件的想像性或象征性关系。阿尔都塞的优点在于，他坚持，从前瞻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是与主导性社会秩

序的作用紧密相关。收看关于最新款式的利伐牛仔裤\*广告时,我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激情和欲望的消费个体。这种广告的意识形态效应,与其说在于其具体的文化内容,倒不如说在于以这样的方式向我提出质问的能力。在主体所碰到的错误识别过程中,意识形态并不是与错误地反映现实紧密相关。它不是虚假的意识,相反,它是由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所生产出来的一种物质实践。因而,利伐广告热情地把我当作一名享乐主义的消费者,而不是一个被剥削的社会阶级的一名集体成员。这使我考虑到,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消费者,而不是意识形态诸过程的效应(阿尔都塞,1984)。

众所周知的是,尽管阿尔都塞对虚假意识作了评述,可他是通过科学和意识形态两者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才提出这一思想观点的。他将社会切分为四种主要的实践: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作为一种科学实践的理论实践,具有三个可区别的层面——原材料、生产资料和最后的产品。如同工人利用其劳动力将自然转换成商品,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概念与事实的混合,以生产出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有赖于成年马克思的著作。一般认为,这时的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消除了诸如需要、异化和类存在物等人道主义范畴。阿尔都塞的这些观点时下并不受人青睐,乃至在具有思想共鸣的评论家中也是如此。譬如说,佩里·安德森(1980)提出,阿尔都塞的结构功能主义表明,他没有能力说明阶级斗争的观念。如同 E. P. 汤普森(1978)曾经指出的那样,阿尔都塞的阐述将人类的机构还

\* 利伐牛仔裤(Levi jeans)因旧金山利伐-斯特劳斯公司生产而得名。——译注

原为事先设定的诸种社会结构的层面。代理者可能不是在自己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行动,或者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可能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行动,但是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人们必须承认,人类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环境,有能力带有反思性和创造性地去行动。其他的评述人,如本顿(1984)和埃利奥特(1987)等对此也作了评述。他们指出,阿尔都塞关于理论实践的观念既是独裁主义的又是循环论的。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只是因为阿尔都塞告诉我们是这样,而且工人阶级被有效地还原为制度的文化受骗人。如果抛开这些问题不论,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于博德里亚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理论的研究而形成的学术气候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博德里亚强调了离散性的主体、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破产,所有这些看来其根源就在于此。

德博尔(1987)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明显有别于阿尔都塞的专业理论成果。德博尔是环境决定论国际协会(创建于1957年)的一名成员。这一协会竭力将先锋主义的艺术煽动(artistic agitation)融合于马克思主义。在此,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要提出科学的理论实践,而是想拓展马克思对经济生产的分析,以包容文化和媒介的生产。着眼点被置于早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著作。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工人异化于自身、异化于同胞并异化于自己劳动产品的根源。由于商品与劳动相分离,商品就成了一种客观化的存在,从而使工人异化于自己真正的自我。德博尔声言,这些过程的强化,不仅仅使工人在公共场合受到异化,而且在个人生活方面也同样受到异化。媒介和文化的商品化铸造了在表面上看起来同样像物的各种影像和表征。我们每



大晚上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各种图像已呈现出一种自主性的表象，这种表象看起来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多少联系。德博尔会提出，这就是我们能在收看反映海湾战争的密集轰炸方式时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效果的原因。问题是，场景给人类的苦难和遭遇以一种非现实的表象。场景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为民众远离于影像制造的方法，并且被迫进入一种麻木的被动形式。他们生活于强制性的消遣娱乐，这掩盖了决定现有诸种社会关系的各种权力关系。由于这种场景的无孔不入，环境决定论者竭力发展各种反叛的艺术形式，以免融入影像制造的主导体系。这包括了一些震撼人心的技巧的使用，意在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他们要求艺术应该走出美术馆，通过街头艺术、广告招贴、墙壁诗歌和富有想像力的涂鸦来发展一种与日常生活更为互动的关系(普兰特,1992)。

德博尔(1990)更为近期的著述，就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有益地扩展了这种分析。他写道：

气魄宏大的统治首先所考虑的重点就是要消除一般性的历史知识；着手传播关于近期历史的几乎所有的理性信息和评述。这种现象的根据极为显然，基本上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由于具备登峰造极的技能，场景的设计漠视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随即就忘却了业已理解了的事物。某件事情越是重要，也就被藏匿得越深。(德博尔,1990:13-14)

资本、民族国家和媒介专业人员之间的全球性联盟，已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对历史知识的废除。采访录音器、速时新闻、千变万化的时装和三分种的通俗录像泯灭了我们的历史感。媒介话语动

荡和变幻的特性，在话语继续之前对极为重要的事情只能给予几秒钟的时间。以印刷文化和面对面的交往为基础的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已经被不给回应留有空间的瞬时的单向话语所取代。现代传播系统惊人的速度就是如此，使主体不再有能力对过去构建起一种稳定的看法。在媒介胡言乱语的白色噪音里，历史和社会语境已销声匿迹。德博尔有力地提出，对社会概念的物化和离散化，还有对批判论辩和历史知识的消灭，都是为跨国资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德博尔富有思辨的著述，展现出博德里亚的许多特征。我暂且希望读者注意两个相同点。第一点是他们都强调传播媒介。在德博尔和博德里亚看来，万花筒般的混乱无序状态，明显地表现于众多的媒介渠道和媒介话语，这为媒介分析提供了天地。然而，博德里亚没有考虑诸如异化和物化这类概念，尽管这些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更具人道主义的形式有联系。相反，他从德博尔那里所吸取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媒介讯息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才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博德里亚和德博尔均被这样一些爆炸般的声音所困惑：这些声音只是要求有人倾听但不需要149 要有回应。第二，德博尔和博德里亚彼此都提倡一种先锋派的政治策略。这回避了这样一些正统的政治企图：为更具思辨和更具爆炸性的策略而耐心地建立联盟。对于那些感到震惊并将自己的所见嘲笑为天真地持有的人道主义信条的读者，博德里亚较晚的著述并没有与他们很好地进行交流。

## 后现代主义、象征性交换 和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部分，我拟专注于我认为是博德里亚理论著述的几个主要主题。根据凯尔纳(1989)的观点，我认为将博德里亚的著述分为两个各具特色而又彼此相关的阶段，是很有裨益的。第一个阶段涉及博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发人深思的评判以及他关于消费社会发展的论辩。在此，虽然博德里亚引人入胜地改写了阿尔都塞的一些主要假设，但阿尔都塞的影响依然十分昭著。《象征性的交换与消亡》(1993a;首次出版于1976)一书发表以后，博德里亚一如既往地抛弃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所以内爆、模拟、大众媒介、缘分策略(fatal strategies)和象征性交换等主题逐渐替换了一些传统的理论范畴，正是肇始于这一点。依凭一种更加了然的具有后工业时代特色的分析，博德里亚提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真正关系已被一种符号系统所替代。

博德里亚向符号分析的转变，其根源可以在他发表的头两本著作中找到：《客体系统》和《消费社会》。<sup>①</sup>依据博德里亚的看法，消费社会的到来需要对批判理论有一个根本性的重构。消费社会已有效地取代了那些诸如以尊敬和节俭为基础的道德范畴，而且是带着对满足的享乐主义追求心理来替代这些范畴的。但是，如果市场具有某种民主化的效应，那么它也能通过博德里亚所称的“客体/符号系统”，起到构筑社会排斥的新障碍的作用(博德里亚，1988a:23)。博德里亚认为，商品(客体)能得

到消费之前,必须先成为符号。客体的意义的建立,是借助于将符号组织为代码。唯有通过这些代码,人类才会逐渐意识到他们的自我感以及他们的需要。代码本身是按等级排列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地位和声望的差别。如同博德里亚所认为的那样:“与其说一种需要是对某一特定的客体的需要,倒不如说这是对表明差异(寻求社会意义的欲望)的‘需要’,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理解满足是永远无法达成的,因而,对需要作出一个界定是永远不可能的”(博德里亚,1988a:45)。

如果一个主体的各种需要是由普遍的人类特性或人类生活规律和现象所决定的,那么客体是不会被这样一个主体消费的。假如我们赞同这一论点,那么消费也不是被分离的主体对客体的事先指定的欲望的结果。社会商品的消费,并不是为了  
150 满足事先存在的需要,而是为了昭示社会差异。这一论点必然使关于真实需要与虚拟需要和主要需要与次要需要的批判性阐述变得陈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这种二元性的范畴形成了主体-客体二元论的一种形式,同时也生成了主体在一方面具有文化属性而在另一方面又具有生物属性的观念(博德里亚,1981a:68)。这些哲学上的二元论以及受人怀疑的人道主义被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所取代:这种分析方法将人类的需要视为社会制度的效应。所以,博德里亚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观点,认为主体是通过各种社会分类和意识形态诸过程而构成的。但是,与阿尔都塞不同的是,在博德里亚看来,意识形态的主要机器就是消费资本主义,它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而起作用。首先,与客体相联系的分类型差异对消费者具有原子化的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关于个体被电视广告转化为主体

的例证。博德里亚会提出,依附于产品的被编码的话语与现实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波斯特(1994:178)提出,在博德里亚的眼里,“语言只有从其结构的角度才容易被人理解;那么语言构成了主体,反之,情况就不是如此”。波斯特(1990)在别处还声言,在博德里亚的词汇里,电视广告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其结果是会产生新的主体立场。假若广告是描述一个身穿利伐牛仔裤的年轻人,那么这则广告的目的可能是想将产品与年轻、性感、男子汉气概和时装意识联系起来。在博德里亚看来,提出这样一种想法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牛仔裤的象征性联想表达了伪造或虚假的需要。相反,批判性分析应该考察广告借以利用的文化内涵意义。广告的意识形态效应在于文化的差别得到清楚表达的方式和消费者被当作具有自主性的主体的方式。消费社会维系各种主导关系的其他方式是借助对消费公众的个体化。博德里亚提出,商业文化的个体化了的消费者,通过个体化的休闲活动被彼此分离。在这一点上,博德里亚想到,收看电视的孤立特性,使人难以想像以集体的形式来抵抗电视广告。这种体系陷于这样一种基本矛盾:要形成个体化了的消费主体,又要培植官僚控制的形式,以保证公民们收支平衡。虽然博德里亚没有发展这一观点,但他的评判在这一点上具有足够的辩证性,以致于能重视这样一个事实:消费社会充斥着体系上的矛盾和冲突。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博德里亚批评马克思主义历史遗产时最为连贯的研究。《生产之镜》(1975)一书提出,马克思主义复制了反映资本主义想像的一种社会想像。强调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使意指的各种观念理论化,在理解其他社会时这具有

151 民族中心主义，而且将社会的各种实践还原为富有生产力的各种实践。博德里亚的出发点是，当代哲学向语言转变，已消除了能指与所指抑或真实的事物与象征性事物之间的区别。现在再也不存在这样一种额外的话语现实：我们能够假定的语言能具体表征的现实。语言实践能积极地构成真实的事物，可不能反映这些事物。到目前为止，这些论述一切顺利。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隐含的假定：真实的事物能充分地使政治经济学领域文本化。如果说语言并不回指任何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一假定现在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提出的，是对人类潜能的想法和对过分取决于政治经济学代码的历史社会的看法。博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象征性代码是将男女的基本同一性确定为生产者的同一性。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人们做爱，只是为了生儿育女，而不是为了给彼此提供快乐或者建立亲密关系。因而，尽管马克思的确提出了关于经济生产的理论，可他无法解释不反映生产规律的各种社会实践。语言本身并不是由一些人生产，而由另一些人消费，而是凭借相互的社会实践得到交往。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逻辑尤其明显地反映于它对各种历史社会的考虑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考虑。由历史唯物论生成的象征性代码推定，半自主的经济生产领域在其他的社会里具有类似的分离程度。所谓批判理论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遮盖了经济常常深藏于文化生活世界的种种情况。在1960年代的法国左派中，这一思想相当流行（卡斯托里亚迪，1987）。这种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无视其自身的文化偏见，故而常常以其他的社会为参照。

博德里亚所称的符号革命，被赋予了与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均往往将一系列的活动从属于经济活动，并对恰当的活动提出了规范化的代码。因此，马克思主义无法将正在显现的并主要以象征为特性的社会斗争联系起来。20 世纪后期最为紧迫的政治争端，并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而是将一套排他性的主导代码强加于人。与其说女性主义和黑人政治关心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倒不如说他们是想摧毁白人男人的意识形态统治。马克思主义往往将这些问题还原为一种物质基础的作用，这在象征意义上强化了民族中心论和大男子主义的代码。再者，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文化统治，将工人自己奴隶身分的符号提升到一种有价值的地位。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将工人贬低为它的劳动力，这反映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工作不纯粹是压迫的场所，而是会对将来获得更加解放的人类作出界定的必要活动。 152

博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论的评论，在新左派那里具有许多相似点。众多的学者，如威廉斯、戈尔和哈贝马斯等，都已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看法，以便再生产经济理性的统治。这些学者均为这样一种已获得新生的批判理论辩护：力求对经济殖民化力量的一些更具破坏力的方面进行社会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生产力，这对人类的多种能力形成了极为贫乏的看法，而且对经济理性的文化局限性没有作出具体的说明。相反，使博德里亚的贡献显得十分卓越的，并不是他对经济理性的批评，而是他对代码的强调。博德里亚的论点并不完全是企图重新考虑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实践之间的关系——前文提及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是试图表明，对文化代码的这种分

析已成为批判理论的中心课题。这给博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出了道难题。批判理论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将社会还原为政治经济学符号的倾向,在他的这一论点里,他接受了自己竭力否定的东西。假如博德里亚不能在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两者之间作出理论上的区分,那么他就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地反映某些社会斗争、语言交际和历史。这就是说,博德里亚仍然认为,语言可以表现真实。遗憾的是,他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是通过他对这一主张的强化:真实和符号现在已内爆为象征性的事物。正像如果没有弗洛伊德主义就不存在无意识一样,马克思主义在象征意义上生产了无产阶级。博德里亚充满信心地得出结论:语言根本没有所指,它生产了真实。

以上这些观念形成于《象征性的交往与消亡》一书(1993a)。虽然生产方式已经是批判思想的一个参照点,但博德里亚坚决主张这已经成为过去。他以往的思想暗示了重新思考文化政治经济学与消费结构关系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形式的分析已被博德里亚关于符号现在已从任何参照系统解放出来的主张所摒弃。博德里亚并没有检视生产与消费、经济与文化和物质与象征之间的各种关系,而是提出我们应该聚焦于代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劳动力不再是能力的一种形式,而是其他符号中的一种符号。博德里亚评述道:“劳动力起先是一种状态,是服从于代码的一种结构”(1993a:12)。资本主义已从劳动力被剥削的阶段过渡到劳动被设计、被销售和被消费的阶段。生产的时代终结于1929年华尔街的股票暴跌,自这一时期以来,生产和消费陷于一种不断的螺旋上升状态,这种状态的目标既不是利润,也不是需要。那么,与其说资本主义涉及物质的社



会诸关系，倒不如说它是关于为制度起作用所必需的某些同一性形态的规则。如同所指和被指已经分离一样，商品生产、利润和工资水平也是如此。货币已成为一种投机现象，可以在交易市场抑或轮盘赌桌上赌博而不显示出货币之外的任何东西。

在此，博德里亚无疑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通过货币市场的国际化，货币正成为一种自由漂浮的所指。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货币市场的无规则不断地削弱了资本固定于一个地方的倾向。货币越是脱离于其过去常指的各种真正的过程，它便会借助买卖的特权、交易和期货，生成越来越多的货币（拉希和厄里，1994：292）。在博德里亚看来，货币越是脱离于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就越会成为一种冷淡的现象。货币不再是关乎商品的流通，而基本上是关乎它自身。

然而，博德里亚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他使资本主义象征化有余，物质化不足。当然，商品生产现在涉及在成批生产和更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中所没有的标示性考虑。可是，博德里亚就这一想法走得太远。后工业时代的经济所生产出的物体，其消费既是物质的又是象征的。我的烤面包机的最重要特征不在于其式样，而在于其烤面包的功能。尽管真的情况是，晚期资本主义已目睹了所有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具有不同式样的一些烤面包机的出现，可这一因素并不超越其功能性用途。我倒想，大多消费者是希望他们的烤面包机性能可靠。这一论点可追溯至博德里亚早期关于人类需要的看法。假如需要受到生活方式差异的质疑，那么博德里亚关于代码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可以认为，人类具有物质和象征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差异系

统。

在博德里亚看来,正视后工业时代经济里工人运动的后果,并不是取代资本,而是其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为了获得“正常”人的地位,而他们一旦达到这一目的,就会站到资产阶级一边,排斥异己人物。按博德里亚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其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对生命和死亡起到了象征性的主导作用。博德里亚作如是说的意思,就是作为富有生产能力的工人的地位,标志着后工业时代社会里的公民义务和权利,也象征着社会的基本法则,而这种法则就是力求占领“所有生活间隙”的规范性代码(博德里亚,1993a:34)。

154 在这样一种制度里,统治来自于不受礼品交换的规则和过程的约束。在博德里亚的理论里,工人阶级处于一种相互矛盾的地位,因为工人阶级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正常化概念的界定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可同时它又受到了由资本主义确立的象征性交换形式的控制。博德里亚追随毛斯(1990)的思想观点宣称,礼品是一种互惠形式,牵涉赠送人和受赠人的敬意。毛斯研究了一些古老社会(波里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美洲的西北部),在这些社会里,社会商品的交易受到集体义务形式的约束。尽管存在着文化上的多样性,可所有这些社会均表现出互惠交易或互赠礼物的特征。关于互赠礼物的观念具有三种相互联系的社会义务形式:赠送、接受和互换。这一相互认可的链条,通过义务关系的建立,象征性地约束小规模等级制度。毛斯指出,部落首领借助赠送多于回赠的行为来巩固其地位。部落的其他成员既有接受又有回送礼物的义务。假若有人没有这样做,这

通常意味着这一群落的这名特殊成员将失去其地位和作为一个自由人的等级。互惠性的礼品交换是维护社会协同性的行为。毛斯提出，象征性交换的各种过程能给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协调商品交换冷抽象(cold abstraction)的有机协同性形式。<sup>②</sup>在借用毛斯的人类学思想时，博德里亚既悲观又怀旧。资本主义并不是通过剥削工人，而是通过提供不能回报的劳动礼物来维系对工人的统治。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博德里亚宣称：

倘若统治来自制度仅仅维系礼物的赠送而不是礼物的回赠——劳动礼物假如不是通过消费，那只能通过破坏或牺牲来得到回应，而消费只是过剩报酬制度的延伸；倘若由于对规则的垄断，没有任何东西被允许用来回报媒介和讯息礼物；倘若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再被允许作为难以回避的社会礼物和出于对保护机构、安全和乞求社会的感激之情的礼物——那么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使用权力的原则来反对制度本身：回应或回报的非可能性。

利用对此不能作出回应的礼物来蔑视制度，除非制度自我崩溃或消亡。（博德里亚，1993a:36-37，着重号引自原文）

我作详细的摘引，是因为这段话进一步说明了博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并凸显了他的社会理论的未来倾向。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剥削的关系，而是不平等的礼品交换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遇到的困难在于，工资水平不再与生产过程相应，所以劳动不再是一切价值的来源。然而，工人没有能力回报礼物，这一说法意味着工人处于从属性的地位。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慈善事业这一例子，我们便可明白博德里亚和毛斯的意思。慈善事业是一种可争议的单向礼物，对此，受赠人不能

155 提出要求,赠送人也没有义务。从价值的分布角度考虑,慈善事业往往贬损受赠人而抬高赠送人。因而,劳动礼物、电视影像、无线电信号抑或面包是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除了不平等的礼品交换之外,资本的规则有赖于工人死亡的延缓。这样,主导性的规则就会迫使公民们去工作和消费;如果发生早死或野蛮的自杀,这都会使这种情况发生短路。由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在物质上被推翻,能消除这种主导性规则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对其操作原则的象征性否定(博德里亚,1993a:123)。③

在此,凭着他对礼仪性毁灭(ritual death)的爱好,博德里亚提出了一种类似于环境决定论者的策略,这种策略无法重新融入这一系统。④博德里亚提出民众应该涌入巴黎的博布尔格艺术中心\*,直至将这一中心压塌。我们现在终于能够明白他这一想法的理由。博德里亚宣称,真正的文化是“充满神秘、诱惑、独创和象征性的交换”(1982:3-13)。博布尔格艺术中心的官方文化却不允许这样做。它向民众展示官方文化的礼物(这种文化始终蔑视普通民众)。由于民众没有能力偿还这种礼物,唯一合适的革命口号就是“关闭博布尔格”。博德里亚(1993a)在其他地方对遍布于纽约而毫无意义的涂鸦形式表示了赞赏。他似乎被这种文字的形式所吸引,因为这种文字允许回应,而这种回应能摆脱官方许可的表达方式。这些无意义的墙上形象性符号,既抵抗了资产阶级艺术世界的融入,又给象征性的交换创造了条件。同样,他自己的著述实际上并未提倡民众应该接管博布尔格艺术中心。他的宗旨是想表明一种更加微妙的文化逻辑。

\* 博布尔格艺术中心,即巴黎的蓬皮杜现代艺术博物馆。——译注

譬如说,实用性原则也被时装所削弱,因为时装短暂的生命循环促使了一种“表演和无用”的气氛(博德里亚,1993 a:95)。如同博德里亚自己的文章一样,新商品的循环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东西会持久,可每一样东西都有机会获得新生。对音乐、书籍、服装、报纸的各种新样式的不断抛弃,表达了对毁灭的一种受压抑的欲望。博德里亚试图对这种欲望进行重写,这是一种调和了的欲望,因为这种欲望通过禁止交换的无休止延续而得到连续不断的延缓。

除了毛斯和德博尔之外,博德里亚对巴塔耶的接受反映了他自己的立场(博德里亚,1987a)。博德里亚从巴塔耶那里所吸取的,是抵抗实用性原则的需要、而这种原则已被资本家阶级所欢迎。这项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在关心维护使用价值时所认同的,巴塔耶在反对这项原则时,以牺牲的观念(the notion of sacrifice)的形式提出了一种贵族式的批评。因而,巴塔耶和博德里亚凭借浪费、牺牲和破坏的反功利逻辑来为资本的颠覆辩护。一切先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只不过是对于理性的工具性的扩张有益。博德里亚将巴塔耶和毛斯联系起来,提出了与资本逻辑的主导性相脱离的一种交换形式,并提出了另外一种道德经济。这是一种显著的怀旧策略和先锋派策略,而且博德里亚并没有提出,资本主义可以从这些方面得到重新阐述。他的策略是永久性边缘(the permanent margin)的政治。尽管人们都承认这样的事不大可能会发生,但假如他的思想被某种社会运动所采纳,因此会冒着被融入主导性规则的危险,那么他极有可能会打点好自己的理论行囊,继续往前迈进。

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博德里亚这样一种观点的需

要：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日常生活这一层面上营造出依从性的思想。再者，这可以从负面角度与哈贝马斯和威廉斯的贡献相对照。尽管这些学者关注明显表现于资本主义的各种理性形式，可他们感悟到，社会制度包含了一种更具解放性的逻辑。不论这体现于言语行为、自主性的需要抑或集体性的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均得到了辩证的表征。博德里亚关于规则的夸张的断言，阻滞了批评内在形式的前景。当代社会脱离了各种彼此对峙的理性观念，这没有引起博德里亚的高度重视。在这样一种语境下，要弄明白博德里亚是以怎样的方式，解释能提供另外的方法来物化思维模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抑或绿色运动\*，是很困难的。这些备受关注的热点，在传统上已力求通过建立与他人协同性的各种交际关系来削弱纯粹是计划的理性形式。这些热点还探讨了时下面对人类的一些重要的存在问题和社会问题。记住了这一点，我将在下文提出，博德里亚的话语辩论术与其说是企图建立互惠的关系，以反对统治，倒不如说与新右派的某些方面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博德里亚更为晚近的著述，围绕他所称的宿命理论（fatal theory）发展了一种不同的象征策略（博德里亚，1990a）。博德里亚宣称，基本上有两种社会理论。有一种是陈腐的理论，在这种理论里，理论家声言有能力把握并提供对社会的一种稳定的表征。博德里亚稳重地提出，实践者能够接触到的另一种理论就是他自己的特定的宿命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完全是作为意向的

---

\* 指农业生产方面的改革。——译注

一种方法。博德里亚解释说：“较之主体，客体被认为更狡黠、更玩世不恭、更有天赋，并潜伏着等待主体。客体的变形、诡计和策略超越了主体的理解”（博德里亚，1990a：181）。博德里亚改变立场，转到客体的一面，认为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已不复存在，这明显地体现于他论述美国文化的著作中（博德里亚，1988b）。类似于凯尔纳（1989）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博德里亚的观点之所以会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似乎在欣赏美国的景致时完全忘却了在那里存在的苦难、剥削、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甘恩（1991a）对博德里亚作了较有同情的刻画，他说，这不是一种深刻的解释学上的发挥，而是针对他自己正在描述的文化试图说点什么。斯马特（1993）和特纳（1993a）两人与甘恩持同样的看法，但指出，博德里亚忽视了美国文化的阴暗面，并漠视这种文化在全球的主导性。特纳（1993a）接纳了甘恩早期的观点，认为接触博德里亚文本的读者的体验与旅游者的体验类似。特纳并没有因博德里亚缺少严肃性而责备他，认为我们是将他当作体现一种漫游或短途旅游文化来加以阅读的。读者有能力畅游于博德里亚的文本，就像一名游客漫步于一个主题公园或一个购物中心。这就是说，博德里亚忽视美国的其他一面，是因为他想引起读者的注意，去重视有关距离的诸种批判形式已销声匿迹这一情况。

在博德里亚（1983）看来，主体不再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客体上；相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已经内爆。最终的结果是，主体占据了这样一个世界：文化的信息流通已吞噬了个体空间。我们各种最隐秘的事情通过媒介技术像举行仪式一般被公之于众。不再存在涉及禁忌的主题：每一件事情都被曝光，而且

每一件事情都被议论，不论这些事情是多么的琐碎。日常生活  
在媒介里的内爆被博德里亚描述为一种色情作品的形式。现代  
文化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一种海淫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世界  
已成为直接而透明的，因为它缺少隐秘。电视屏幕的封闭世界  
已排除了批判反思的前景，因为主体已被还原为一种平淡无奇  
和瞬息万变的文化的极限。文化的过剩生产，意味着被生产出  
的信息量超出了主体的阐释能力。客体已使主体灭绝。如果我  
们想像一下一个人坐在一间酒吧里，周围是一台台电视机、广告  
牌、全球性的报刊和收音机喋喋不休的声音，那么我们便能理会  
博德里亚的话的某些意味。这个人啜饮着啤酒，注意到媒介技  
术的永久的电刑，而任何媒介都不会引起他的全神贯注。这位  
饮酒者冷漠的玩世不恭已成为一个习惯。在全球性信息流通的  
不和谐的声音里，他始终是“在极低的温度下冷冻着”（博德里  
亚，1993b：32）。尽管这种描述具有某些共鸣，可这也完全与博  
德里亚早期关于主体内爆为客体的断言相悖。现在看来，博德  
里亚想要表达的是，随着客体的加速，主体就会减慢。假如情况  
果真如此，我们可以分别探讨主体的阐释能力和客体的阐释能  
力。但是，情况并不是如此，在博德里亚如诗一般的理论里，这  
只是许多自相矛盾中的一个矛盾。况且，在任何情况下，传播世  
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在每一个人都在说话的同时，任何人都用不  
着去听。因而，在纽约漫游时，针对城市穷人的苦境，博德里亚  
无法向我们中的激进批评家提供任何安慰。如果要想这样  
做，那就意味着批评仍然是可能的，主体具有这种制度没有给予  
158 满足的需要，我们没有能力准确地表征社会以及主体毕竟还没  
有受到客体的支配。



最后,博德里亚(1993b)最近对自己文化理论的补充,已力求发展一种邪恶的原则。我们已经看到,规则热衷于对激进的他性的消弭。这类他性现在只能借助传播的形式得到表达,而这些形式不可能有理性,也不可能将人类的善良理想化,同时也不可能坚持理性和民主的价值观。邪恶原则的意旨,在于清楚地阐发不落入随意性社会软文化(soft culture)窠臼的象征主义形式。博德里亚(1993b: 83)借助于一个例证,为自己将一个跛子叫做一个跛子的权利辩护。再者,这种故意伤人的策略受困于博德里亚的自相矛盾之中。这种阐述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前提的:批评只是我们中的超级理论家才有可能做到。他自己的著述类似于现代的许多广告,其意旨是通过将自己标新立异于大多文化产物的严肃格调,以达到招引受众的目的。与最新的啤酒电视广告节目一样,它们越是令人憎恶,在过剩的生产领域就越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 法国的麦克卢汉:模拟、超现实和民众

博德里亚对具体地探讨媒介所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更易于归纳。尽管对媒介和传播的关注在他的著述中随处可见,可他很少将自己的注意力仅仅聚焦于不同媒介的作用。我能够找到的最早翻译过来的文章,是他研究消费社会里象征爆炸的产物(博德里亚,1990b)。⑤博德里亚主要聚焦于对电视的分析,这一重要性体现于两层意思。第一,作为消费社会的一种产物,电视是一个客体,它是“社会地位代码化的一个因素”(博德里亚,1990b: 73)。电视的文化内容在这一客体表明不同的阶级集团

的文化差异的作用方面是次要的。在别处,甘恩(1991a)通报说,博德里亚认为电视在家庭环境中的物理位置表明了某些地位差异。在下层阶级的家庭里,客厅或起居室是围绕电视机来布置的,因为电视机通常被当作一个主要特色。相反,资产阶级往往隐藏或伪装自己的电视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电视机被看作是粗俗和大众文化的象征。第二,博德里亚从麦克卢汉那里继承了掌门人的地位,将传播媒介看作媒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假如说考虑家庭氛围中电视机的放置位置,那么便会出现博德里亚谓之“滑稽珍品”(1990b:79)的表面作用形式。电视提供了一种肤浅的参与形式,它将世界转化为社会“现实”容易消费的一个个部分。在我对广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媒介的主要意识形态效应,在于它提供了直接占有社会领域的幻觉。媒介使象征分离于社会语境的能力,给予受众这样一种印象:受众在客厅里就能看世界。因而,受众只消想一想博德里亚的阿尔都塞式的遗产,便会将社会领域错误地认作一个透明的现象。电视不是关于主体与一个真实的客体世界的交流,而是通过各种意义的连接,将主体与客体衔接起来。

随着博德里亚对媒介论述的发展,他越来越不太关注媒介的象征功能,而更关注技术媒介本身。这是因为接触大众媒介不再是地位上的一种便利,而是已经内爆为一种大众文化。博德里亚(1981b)在这一阶段,竭力想通过对恩岑斯贝格尔和麦克卢汉的讨论来发展一种媒介理论。他声言,由于生产规则的主导性,马克思主义从未充分地解释传播媒介。恩岑斯贝格尔尽管提出了一种比大多数人更加成熟的理论,可同样没有将大众媒介看作一种被扭曲的象征性交换形式。大众媒介的这一主要

问题,并不在于统治讯息生产的各种权力关系,而是在于媒介的“单向特性”(博德里亚,1981b:170)。博德里亚对象征性交换的强调意味着,恩岑斯贝格尔将生产的技术方式放到普通民众的手里的这一民主冲动,最后以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形式而告终。就像博布尔格艺术中心的官方文化一样,就受众而言,现代媒介技术不需要任何答复。针对那些会坚持受众常常参与媒介的生产(无线电热线电话和播音室的论辩)和消费(对电视话语的阐释性回应)的人,博德里亚认为,这些是边缘现象。媒介不能被民主化,因为传播系统的技术能力始终是单方发言的。博德里亚从消极角度出发,将传播的印刷形式和电子形式与诸如涂鸦的具有更加互惠性质的交换形式进行对照。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涂鸦是侵越性的,因为它允许公众方面的社会回应,因而打破了媒介的基本规则。

以上的讨论具有这样的意味:博德里亚的宿命理论始终处于修正和改良的状态。博德里亚(1993c)说,宿命理论没有任何教条可以用来辩护,唯有各种策略。从博德里亚关于技术媒介的观点来看,类似这样的一种策略已经将论点推向极端。鉴于这些考虑,博德里亚欲进一步推翻麦克卢汉和恩岑斯贝格尔关于媒介的一些更加乐观的看法。媒介实际上杜绝回应,这种论点意味着在他看来是一种反媒介的斗争(博德里亚,1985)。为了与他先前的看法一致,他提出,媒介理论家再也不能坚持这样 160 一种假定:人性的某些方面在媒介里得不到表达。的确,麦克卢汉本人声称,新的媒介技术容许更广泛的参与和统一形式,这一观点被认为不切实际而不予考虑。信息的激增和大众的沉默已导致了意义的完全消失。在博德里亚发人深思的分析里,以往

表示社会差异的诸种文化形式，已在传播的杂乱蔓延中匿迹。符号科学已被社会的“液化作用”的科学所取代（博德里亚，1993c:84）。

假若我们以民意测验为例，那么这些测验实际上是在公众已经消失的时代才会造成舆论。这不是一种操纵形式，而是民意和个人意见内爆所特有的。自印刷文化衰落以来，个人意见形成的空间，已被通过民众而传递的诸种过程所吞没。这种阐述方式原发轫于麦克卢汉，其意思是我们再也没有能力确定是投票影响了民意还是民意影响了投票。从某种二元逻辑的角度来看，民意测验只是需要一种事先经过安排的回应。因而，大众传播的主导性规则与民意测验的主导性规则相类似，是一种是抑或不是，以及赞成抑或反对的规则。我们被人去要求购买一册最新的畅销书、赞成保守党的宣言、给我们所钟爱的电影投赞成票抑或保持沉默。博德里亚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提出大众的力量在于他们对意义和参与的拒绝：

这种沉默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答复。沉默是借助于退却的一种具有巨大力量的答复，沉默是一种策略。它不纯粹是一种被动。它完全是终结意义的一条途径，也是终结庞大的政治和信息操纵制度的一条途径。（博德里亚，1993c:87）

这种力量与斗争的政治形式相类似，不是热烈的，而是冷静的。这种忧郁的文化轻蔑形式，似乎昭示了博德里亚自己对通俗文化的概念。有些文化理论家希望认为，是普通民众形成了对通俗文化的复杂的解读和复杂的理解。与这些文化理论家恰恰相反，博德里亚认为，普通民众是老泡在电视机前的人。如同我们

已看到的那样，媒介讯息的加速发展，已切割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经验。由于受到悲观的理解，这些过程已愈来愈给人们以这样一种感觉：现代文化具有肤浅和可任意处置的特性。假若没有任何事物会永恒地存在，那么没有任何事物值得相信。这些信息的螺旋式上升，已随之留下了被民众占据的诸多黑洞。

博德里亚(1988a)媒介理论的另一个主要部分，就是他对模拟和超现实的关注。模拟的现代发展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根据博德里亚(1993a)的观点，介乎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间的时期，可被描述为仿造品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符号表示了阶层、级别和声望。这种现象首先提出了关于隐藏于假面具背后 161 的人的真正特性的问题，这明显地体现于莎士比亚的剧本中。第二个阶段就是生产秩序，它伴随着资本主义，使客体无限的两重性成为可能。沃尔特·本雅明(1973)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破坏了艺术品的韵味。本雅明认为，在电影和摄影时代，谈论原版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可以不断地被复制。第三个时期就是当今的模拟时代，博德里亚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推进了以上这些深刻的思想。由新的媒介技术所开辟的各种可能性坚持这样一种想法：文化不再复制真品，而是生产真品。真品是电视、电脑屏幕、虚拟现实和立体声耳机的效果所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电影，现在是互文性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从通俗音乐、低级黄色小说、一流的电视系列片和别的电影故事等其他艺术风格中汲取灵感。这些艺术样式显然没有反映一种业已构成的现实，但对许多后现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模拟导致了对真实的某种怀旧之情。这出现于真实的生活故事、自传和所谓的信息娱乐片(infotainment)的流行。对真实的模拟产生了超现实。博德里亚提出了这样一些例子：肥皂剧电视迷将演员当作是自己性格的化身，或者犯罪小说将受众吓得在晚上呆在家里不敢出门。我们不妨再补充一个例子，即1993年的电影《以父之名》。这部电影叙述了伯明翰六人组中的两名成员被冤枉地指控为犯有恐怖罪。这一故事是以其中的一名被告格里·康伦的自传改编的。随着这部影片的上演，就这部影片的真实性问题在报刊上引发了许多争议。有些人宣称，所谓的真实事件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因而这毁损了这部电影暴露明显表现于英国现存体制中的腐败和种族主义的宗旨。如果说博德里亚对这场争论有什么议论的话，那就是他会指出，我们不可能在电影评述里对真实的事件与电影本身这两者之间作出这种区别。他会提出，在影像与现实之间没有辩证关系，而只有示意性的诸种实践(博德里亚,1987b)。使另一部电影更接近于所谓的真理会有什么用途呢？这只会提高这部电影的现实效应，并增强错误认识的各种过程。相反，最好还是去注意那些声称阐明现实的特定类型，从而使分析超越真理和谬误。

## 博德里亚和詹姆森

宣称博德里亚根本不是一名后现代主义者，这种看法在时下非常时髦(甘恩,1991a,1991b)。这类看法充其量只不过是置换。当然，他的著述受到了各方面的理论家的影响，可我倒不愿意给这些理论家中的许多人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但是，对

规划了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主题，博德里亚均作出了某种贡献。博德里亚对意识形态、真理、表征、严肃性和主体的解放的排斥，具有与后现代主义昭然的一脉相承之处。为推进这些主题，我将在博德里亚与我认为是当今最成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森之间提供一次对话。这种批判性的比较，将力求凸显共同的主题和困惑，同时清楚地提供我为何认为詹姆森的著述胜人一筹的道理。为了提供这些反思的背景，我将强调詹姆森对文化和媒介理论的最新贡献。我将聚焦于詹姆森迄今为止最主要的一部作品：《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

如同詹姆森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的文化表达，抑或他所称的逻辑。众所周知，较之于博德里亚的“后现代工业主义”，詹姆森更喜欢“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这是因为詹姆森将文化全球性地崩溃为经济生产形式当作自己分析的出发点。市场运作使文化领域殖民化，这已成功地消除了高品味的现代主义和大众商业文化。将审美的生产融入商品生产，这已提供了文化上新型的主导性后现代主义。古典的现代主义的宗旨，是凭借文化的生产来震撼和嘲笑资产阶级。在后现代时代，现代主义的形态在大学的院系已成为教典，因而失去了其颠覆性的特征。同时，诸如竭力颠覆制度的低劣的摇摆舞这些当代艺术样式，通过将其商品化，人们便很快将其驯服。大多艺术性生产现在已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将其成绩与商业的成功相提并论。在詹姆森看来，许多现代文化肤浅的多变性，是多民族资本主义的影响所致。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呢？解释这一问题的—

个方法，就是将其与艺术生产的其他形式相比较。詹姆森将梵高一幅著名的名为《一双长统靴》的画与安迪·沃霍尔的版画《菱形的尘鞋》相比较。梵高的作品采用了一种传统的阐释方法，这种方法借助于做画的语境和可能的超然瞬间。这幅画鲜艳的色彩呈现了乌托邦的格调，而其内容则表明了物质的剥夺。对沃霍尔的作品却不能作出这种阐释。在人们看来，版画中的鞋子是任意收集的客体，而这种客体不受任何更大语境的制约而自由流动。詹姆森揣摩，鞋子或许是在舞厅失火以后遗落的，或者是某个集中营幽灵似的遗物。詹姆森认为，我们无法弄明白这些问题，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沃霍尔的艺术倾向中，他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无缘无故的轻浮”（詹姆森，1991：10）。这些研究映现了已对深度阐释模式抱怀疑态度的当代理论。能指与所指和符号与指称对象的观念，已被对话语和规则的关注所取代。与梵高的作品明显的不同的是，沃霍尔的鞋子与现实领域没有稳定或明显的联系。有一种阐释方法会对这双农民的靴子用沃霍尔的作品中所没有的整体观念来加以讨论。使意指的方法摆脱原有的物质语境，这是全球性后现代文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市场肤浅的文化，已同样消除了个体风格的观念。其次，关于主体消亡的现代理论的发展已与现代主义“不可模仿”的风格消逝同步。社会领域的商品化已导致了社会规则的激增和离散。因为话语的异质性已成为准则，表征现代文化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其看成“空虚而拙劣的模仿”抑或东拼西凑的模仿。詹姆森说东拼西凑的模仿，其意思是社会的规则再也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拙劣模仿的主题。根据定义，拙劣的模仿意味着批判



地接受被文化生产者所利用的社会规则和准则。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因为文化风格的离散不仅已省却了个体创造性天才这一观念,而且还免除了语言规范的观念。东拼西凑的模仿“没有讽刺的冲动、没有开怀大笑、没有那种依然隐而不见的感觉:存在着某种正常的东西,与此比较,被模仿的东西就颇为滑稽”(詹姆森,1988a:16)。

假如我们回到《以父之名》这部电影上来,詹姆森便有可能会表明被用来指明文本里 1970 年代的各种各样的语言、风格和音乐代码。这些代码时下正通过对 1970 年代的怀旧性重演而被一些通俗的文化形式所借用。表征的手段已脱离了它们原先的社会处所(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这生成了文化上的人工制品,而文化的人工制品招来了暂时性的衰落。根据詹姆森的解读,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关于英国的非正义,倒不如说是对代码的相互矛盾的排列的关注,因为这些代码不再有能力将过去表征为现在的另一方面。1970 年代成了过去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通过某种“想像的和刻板的虚构事物”得到了传达(詹姆森,1991:19)。在使人联想起博德里亚的思考中,真正的 1970 年代通过竭力在象征方面模拟这一年代的代码互文性的作用,已在象征意义上受到了擦抹。历史性遭受擦抹,因为看电影乐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对音乐、长头发和花哨裤子的解码。由于这些时尚在时下的复兴,要表现过去和现在是困难的。这部电影的过去性受到了文化代码现在性的抵触。目前席卷英国的 1970 年代的复兴现象,已瓦解了艺术风格的明确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可以以年代为基础的。譬如说,从音乐角度看,我们时下正在同一个时间里,体验 1970 年代的灵魂、朋克乐队(punk)和阿巴乐队

(ABBA)\* (包括模仿它们的乐队)的复活。旧风格的不断循环和模仿,已成为团体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詹姆森的看法,明显表现于这一过程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意味着我们现在正生活于一种永恒的现在之中。

詹姆森(1988a)在其他地方提出,电子媒介通过其对新闻和事件的快速传递,通常很快地将近期的经验变成遥远的过去。与德博尔的方式相似,詹姆森提出,媒介的意识形态效应源于其形式而不是其内容。将现实转变为意指的自主领域以及信息传播的电子速度,剥夺了主体的历史过程感。然而,作为一名辩证学家,詹姆森声言,现代媒介文化也内蕴着一种更具批判的潜力。他欣然接受:由传播技术引介进来的新的公众可视性形式,已约束了某些抑制性的领域,尽管像肯尼迪总统遇刺这样的媒介事件保持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新的传播技术,对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健忘和偶尔对更具集体形式的思想交流,均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与哈贝马斯不同,詹姆森没有借助语言的结构而是通过集体的象征性表征来预想乌托邦。《以父之名》这部电影通过爱尔兰天主教工人阶级的抵抗,包含了对协同性的集体性表达;在剧终之前的一幕里,囚徒最后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这表达了欣快的乐观主义时刻。这种表征提供了一种更具集体性情感的乌托邦式可能性,而这种情感在使商品资本主义得到物化的文化里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

在阐明超然瞬间的同时,那种流动而离散的电影制作文化,

---

\* 阿巴乐队(ABBA)其名取自四名队员名字的首字母。这些队员分别为Agnetha, Bjorn, Benny 和 Anni-Frid。这一乐队原是瑞典的迪斯科通俗音乐乐队,20世纪70年代几乎风靡全世界。1983年分手各自组建不同的乐队。——译注

没有能力表征全球的生产方式。客体各种复杂的离散部分具有如此的主导性,以致主体在外部世界不能充分地明确自己的位置。正像艺术品再也不能对整体进行概念化一样,主体的现象学经验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协作中没有能力找到自己的坐标。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我们的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更加两极化。系统分析层面的日益复杂化,已意味着主体“局限于社会领域的一个小小的角落”(詹姆森,1991:411)。根据这一思想脉络,詹姆森将以洛杉矶的博纳旺蒂尔酒店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描述为“一个排斥周围市容的整体空间”。詹姆森的要点是,这一酒店是奉行民粹主义的,因为它否定了现代主义的 165 高雅语言,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一酒店的空间安排使主体迷惑不解。这一酒店的设计如此离散,以致它甚至使顾客难以找到商店的位置。这种区域性的例证表明,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已开始践踏更具工具性的积累焦点。在空间上混乱不堪的资本主义,需要一种新的激进政治形式,詹姆森称之为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这样一种冒险之举会表明,尽管现实不能得到直接的表征,可它可以得到图绘。人们需要新的文化形式,它们能表征多民族资本主义的空间维度,也能帮助构筑一种新的阶级意识。在一种空间上混乱的文化里,这尤其有必要,因为这种混乱的文化已目睹了对批判距离的压制。与麦克卢汉、德博尔和现在的博德里亚一样,詹姆森承认,现代传播的信息倾泻,已瓦解了批判反思的个人空间。然而,尤其是在这一群学者里,使詹姆森的阐述别具一格的是,他坚持认为,这是经济粉碎文化的结果。鉴于全球资本的普遍性,文化的自主性和审美的协调作用已最后分崩离析。唯有借助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富有潜

力的激进艺术,这种形势才可以得到控制。区域、全国和全球的相互关系,只能在这个层面上加以考虑,尽管主体依然是断裂和孤立的。对博德里亚和詹姆森来说,似乎有许多共同的参照点,如真实的消亡、主体的语言形态、消费文化的重要性的和深度的腐蚀等。就文化的历史时期划分和迥然相异的空间形式这两个问题,他们也有类似的论点。<sup>⑥</sup>博德里亚与詹姆森阐述问题的重要差异,在于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詹姆森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关系在组织和控制文化生产方面已变得日益重要,而博德里亚却将此看作是主导性规则的符号。从表象上看,博德里亚将生产逻辑区别于象征性交换逻辑的需要,以及他想用规则来置换真实和象征的欲望,使得他无视前者已重新评定了后者的情况。所谓的经济关系与象征性表征的结合,意味着詹姆森有能力探索这两者之间日益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形式。詹姆森正确地评述道,消费资本的全球化,已促进了社会控制与国际化的阶级统治之间的各种新的关系。

然而,与博德里亚一样,他也提出,新的生产方式和超现实空间的发展,已超过了社会主体的能力,也超过了古典社会理论充分地表征它们的能力。按詹姆森的话来说,这使重新制定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为必要,尽管博德里亚错误地将这两者相提并论。实际上,尽管詹姆森的文化理论博大精深,可他在某些方面依然是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性取决于无产阶级心理离散的论点,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卢卡奇。这一方面之所以得到强调,是用来与那些批判理论家抗衡。这些理论家从格拉姆希那里汲取灵感,提出由资本主义生成的真实意义确保了其主导性。然而,詹姆森坚持,确保多民族资本

主导性的，是文化和物质的分离形式。正像文化离散的重要性一样，消费和生产实践的根本性分离，就在于这种参照系统方面（詹姆森，1991：315）。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物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将不富有的人排除于主导性社会群体。尤其是在业已失去表达历史性和总体性能力的文化方面，这实质上阻碍了区域性协同性关系的发展。

与博德里亚对内爆的研究相比较，詹姆森强调物质与象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能力是一种进步。博德里亚没有看出抛弃所有这些差异的危险。在他看来，詹姆森对文化殖民化的批评，无非是对已陷入生产反映论的那一群人的学术观点的另一种补充。与博德里亚的还原论不同的是，詹姆森更具空间意向的理论，保持了将资本主义的持续的重要性与文化生产衔接起来的抱负。詹姆森与博德里亚在这一方面的区别，就是博德里亚拒绝承认关于世界的理论层面与发生于世界内的实际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

诚然，詹姆森的阐述遇到了自己的难题。我在此仅举几个例子。阅读詹姆森的文章时，我几乎总是有这样一种印象：他的思想观点来源于美国。他对文化领域的经济主导性的强调，在其他社会语境里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詹姆森（1991）曾一度宣称，哈贝马斯关于传播行为的理论在某个全国性的语境里只不过具有区域性的意蕴。这是因为在德国社会里，自由民主的各项原则仅仅具有虚弱的体制基础。我在此的看法是，詹姆森自身的理论，与其说是关于全球文化，倒不如说是关于美国文化。赛义德（1993）已声言，认定自己的民族是全球的中心，这是美国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典型幻想。尽管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詹

姆森的许多信心，通常是与帝国眼光相联系的。尽管他心存偏见，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反对意见的抨击，提出后现代主义尚未完全到来，可他的理论对制约经济的某些文化协调和体制协调缺少重视。在欧洲语境里，这样一种研究会探讨用于传统艺术活动的国家基金、公共文化政策的发展和公用事业广播的共同传统。这些体制形态在一个相对非商品化的地区发生作用。詹姆森无视这些体制层面，这就像他说明哈贝马斯一样，说明了他在那里工作的文化。固然，赛义德(1993)令人折服地提出，在海湾战争期间证明如此关键的，正是缺少民主的公共领域。在美国语境里，对业已建立的公共对话的严密控制，在确保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方面是工具性的。詹姆森漠视这些层面，可争议地迷恋于对抽象概念的物化。其他的决定因素和晚期资本主义的霸权特征，对公共文化生产所起到的作用程度，从未全面地受到詹姆森的分析。

我想指出的另一个特征，是詹姆森表面上的未经重构的阿尔都塞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能够为自己作为一门科学而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地位辩护，对此人们从未搞清楚过。这种关注在詹姆森的著述里尤其明显，因为他希望维系意识形态批评的观念。假若我们接受詹姆森论乌托邦的著述，那么集体的任何影像似乎具有积极的内涵。特里·伊格尔顿(1990:404)声称，詹姆森如此依恋于人类协同性影像的超然特性，以致于我们可能被迫去关注种族主义集会的乌托邦潜能。其次，即便詹姆森强调了自我离散的重要性，乌托邦冲动的源泉是什么，抑或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能够声称对消费资本方面的历史性发展提供一种稳定的分析，这仍然不明了。詹姆森作出这类评述，并拒绝

充分地考虑他评论的依据，这有悖于许多批判理论。威廉斯和哈贝马斯已表示规避那些声称自己的思想比其他的思想更具有科学优越性的理论。使更具民主的传播形式变得一般人都能享受，这是威廉斯和哈贝马斯的计划。这会使意识形态批评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项实践。公共体制的民主复兴，会在表面上让博德里亚的大众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善于交流地重新思考他们的兴趣之所在。在此，兴趣对行为者抑或享有特权的美国教授来说，并不是马上就会自我显现的，但只有在各种各样的民主环境里经过全面的思考以后才能开始出现。因而，詹姆森的理论没有看到这样一种具有紧迫性的需要：发展一种更规范的有关媒介生产和接受的民主理论；他的理论依然是明显地围绕消费主义的物化诸方面来构建的。<sup>⑦</sup>

## 博德里亚的非理性主义

自尼采以来，对启蒙运动理性概念的抨击已变得非常普遍。在最近几十年里，这些抨击已通过法国的社会理论而变得家喻户晓。在此，我想起了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尔，当然还有博德里亚。这些知识分子已指出了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分离性主体的荒诞说法，强调了工具主义理性的局限。与其匹敌者相比较，博德里亚似乎已更进一步地推进了这些思潮。他不但强调了主体的特定性，而且还强调了主体完全消失在客体中的情况。在批评现代哲学认识论方面的焦点时，他完全忽视真理的概念和对正义的要求。博德里亚的先锋派的宿命理论策略，不仅将媒介的作用还原为媒介的技术功能，而且还明显地

168

否定了受众内省的可能性。他极端的反理性主义和反阐释偏见,如果被人接受的话,会终结批判理论与我正在本书力求发展的大众传播之间的联盟。在此,我将强有力地倒置博德里亚对诸如在这本书里得到辩护的批判人文主义视点的持续性攻击。我已经提及的四种分析是至关重要的:(1)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真理要求的必要性;(2)语言的文化唯物论方法的重要性;(3)我所称的博德里亚对媒介的先锋派的和技术的方法的理论局限性;(4)文化分析的人类需要概念的持续相关性。尽管我自己宣称对博德里亚研究的整体强调缺少共鸣,可如果是合适的话,我将因为他至少提出了在媒介社会学里以往被规避的重要问题而感谢他。在此,我想起了博德里亚对主观性形式更有见地的一些评述:互为作用的媒介技术和受众言过其实的阐释活动,很有可能会发展主观性的形式。博德里亚对传播媒介的聚焦也有某种效度,虽然我的总体感觉是,对麦克卢汉更具创造性的贡献,他接受得很少,补充的也很少。

1. 我已表明,博德里亚对理性的抨击,其根源在于尼采的反人道主义。在当代的法国社会理论里尼采对马克思的取代,显然已开辟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视点——在福柯那里这看起来尤其是这样——但诸如博德里亚的视点现在就唾手可得,这被用来使一种更具有反应性的计划具有合理性。博德里亚(1993c: 209)关于他反人道主义和反女性主义的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议论,其根源在于这种哲学资源。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萨比娜·洛维邦德(1990)提出,后现代主义的许多理论继承了尼采的衣钵,可我在此倒认为这还包括了博德里亚的衣钵。这些理论以一种顽固不化的男子主义为基础,反对理性主义。尼采将理性



主义典型地描述为奴隶德行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怨恨大众的文化表达。洛维邦德与尼采的更具热情的支持者格格不入，她断言，尼采的贵族式社会理论排斥了各种民主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对所谓的自然级别次序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宗旨，在传统上就是开创对统治的理性批评。洛维邦德很有见识地推想，批判理论感兴趣于借用富有交流的理解<sup>169</sup>和真实性的力量来取代各种暴力关系。在尼采看来，而且我们也不妨说在博德里亚看来，在一个已废除了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并已排除了道德基础的世界里，社会有待于强有力的干预。根据博德里亚和尼采的看法，社会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混沌，这使批评家能自由地创造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一个空虚的宇宙面前，尼采提倡了一种凭借权力意志来行使的男子气概。同样，博德里亚提出，借助新的媒介技术来模拟社会，这已内爆了有关真理的诸种问题。博德里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连米老鼠都变得像乔治·布什一样真实的世界里，何种效用才是真理？他传达这些思想的话语策略，同样仰仗于他自己对主体的看法显然否定的那种强有力的动因。博德里亚从尼采及其一些信徒那里已明显地继承了对主体的这样一种看法：主体包容于客体，可占据的中心位置足以提倡更加缺乏女性色彩的理论化形式。

暂且抛开这些困惑不说，我想探讨博德里亚关于真理观的评论。根据博德里亚的观点，真理的诸观念可以被丢弃，因为能指和所指业已决裂。这意味着具体事件与阐释方法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联系。博德里亚似乎无法作出这样的判断：是真实的世界变得像电影，还是电影变得更像真实的世界。因而，在探讨

有关越南战争的影片时,博德里亚(1987b)能够宣称,这场战争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截然不同于詹姆森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述。在这些著述里,詹姆森更有可能提出,我们只能凭借某些意指的方法接触真实的事件。根据我的理解,这并不力求否定,我们或许称作越南战争的一系列行动,对关于战争的影片来说具有类似的本体论地位。虽然博德里亚的观点是,战争影片完全跟战争本身一样是模拟的,但詹姆森的看法是,真实事件的历史性因漂移不定的能指而变得像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必须指出的是,博德里亚显然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流行的录像、好莱坞电影和犯罪侦探小说没有反映真实事件。所以,这些东西凭本身的质量应该被看作是意指性生产的诸种形式。他的论点看来不那么貌似有理——我们甚至敢说是荒唐的——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关于单亲家庭的记录片。假若这类影片声言,所有的单亲家庭都会培养出犯罪的子女,那么我们就颇有理由认为,我们为这种虚妄的观点而感到愤慨是不无道理的。这并不是争辩,记录片像电影制作的其他形式一样,并不是根据某些规则来运作,但它们能提出各种真理要求。再者,关于越南战争的影片也能表达真理。奥利弗·斯通关于越南的电影三部曲,叙述了由现代技术战争生成的毫无必要的人类罹难这一普遍性主题。可争议的是,这三部曲对这场冲突的反映,较之随便举一个

170 例子的美国官方在战争期间所作的宣传,来得更加真实。克里斯托弗·诺里斯(1990)提出,若要证实这一情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意识形态批评的形式,在这种形式里某些表征被认为对现实会作出错误的反映。根据博德里亚的解读,奥利弗·斯

通的影片与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式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宣传声言更具真实性。在博德里亚看来，这类观念始终是对象征性生产的特性的错误理解。这规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一切电影和记录片显然具有社会构建，可有些影片或记录片较之其他的更具真实性。如同博德里亚所做的那样，总是将这类阐释还原为错误认识这一层面，就是否定了通俗电影、记录片和实况广播报道的颠覆性力量。

2. 关于模拟和超现实的思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博德里亚是否能充分地说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假若文本仅仅具有现实的效应，那么我们怎样去评估博德里亚自己的见解的真理性？如同博德里亚宣称的那样，可能的情况是，语言并不反映现实，但积极地构建现实。其次，这一事实是不是意味着诸种文化形式不能开启对社会领域的阐释？显而易见的是，博德里亚背离物质世界的参照物越远，这些问题在他的著述里便越发受到压制。在此，我不敢苟同博德里亚的这样一个论点：真实事物的消亡，只能被其象征性的哀悼所取代。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沃洛希诺夫(1986)和雷蒙德·威廉斯(1979b, 1980, 1982)的著作，我倒想提出，语言和文化形式在本质上既是物质的又是象征的。这也许看起来是一个边缘性的观点，可一种文化唯物论的视点会提出有别于博德里亚所坚持的关于主体的观点。文化唯物论的应用，对我们阐释文化的方式和对人类需要的修正概念也具有意蕴。既然如此，这一讨论将自然进入对加达默尔(1975)和里克尔(1981)的一些评论的探讨。他们对文本的指称性要素作了评述，而这恰恰是博德里亚和詹姆森的著述所模糊的。

- 沃洛希诺夫和威廉斯提出，语言是一种物质和象征的社会实践。符号的复制是人类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界面的产物。这两位作者均批评了索绪尔的这样一种观点：语言的结构任意地与语言在社会环境中得到再生产的方式相分离。索绪尔赋予语言一种固定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是抽象于人类活的言语。文化唯物论的辩证的着重点表明，语言生产不能被还原为一个孤立的代理者的主观性抑或语言的预定结构。语言是主体间性社会关系的集体产物。沃洛希诺夫(1986: 26)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观点：心理通过语言形成，因为语言处于生物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上。这些语言过程既不能被还原为人类生物学，也不能被还原为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换言之，语言的能
- 171 动结构作用，不能通过指明人类的生物基础抑或语言封闭的客观系统来加以解决。人类主体的创造能力得到强调，这种能力借助对以往存在的结构的修正，达到集体地修正语言的目的。这样，人类行为并不对立于一部具有制约作用的语言结构，因为语言规则是这类活动的先决条件。我已表明，这些实践既是物质的，又是象征的。符号必须通过发音，或者在纸上留下记号，或者通过某些身体的运动来得到物质上的生产。通过一系列的符号而生成的象征特性或意义，具有多种明显的特点。符号是符号学战争的主体，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特征赋予不同的意义。威廉斯(1979b)和沃洛希诺夫(1986)都提出，主导性群体往往坚持，符号特点是单一的。霸权形态将把符号表征为一种已物化和固定的特性，而这种特性不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使这两位作者感到乐观的是，人类具备通过某种物质形式投射各种新的意义的能力。

这种阐述与博德里亚的观点具有实质性的不同，因为语言被看作为语言之外的社会力量而斗争的场所。博德里亚坚持认为，如果符号不具备所指的对象，那么这就意味着诸如电影、报纸、电视节目和杂志等物质形式的生产，不是被恰切地理解为霸权斗争的一个方面。然而，威廉斯和沃洛希诺夫均没有自觉地认定，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对语言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预先决定的抑或可以忽略不计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威廉斯往往强调公共机构的作用，而沃洛希诺夫与布迪厄颇为相似，将象征性衔接与阶级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尽管这些主题需作进一步的详细讨论，可从这类阐发可以弄清楚的是，被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符号生产，必须与外部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如同博德里亚所作的那样，对象征与真实的不衔接作出这类极端性的强调，并不能说明这些关系。语言与文化始终是社会实现和社会消费的某些关系的结果。博德里亚的著述有许多令人感到懊丧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回避了对这些特征的认识。那就是说，象征可能并不取决于真实，但真实无疑对象征的生产和接受具有冲击的作用。

现代的许多媒介文化继续具有指称的特性，可詹姆森和博德里亚通过对互文性规则和传播媒介生产的强调，对媒介文化进行了分析。然而，《以父之名》这部影片，不是像詹姆森和博德里亚可能会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互文性的一个例证。尽管这些视点依然重要，可这些视点似乎忽视了更加传统的阐释性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由文本在话语方面所开辟的世界视野。换言之，我们讨论中的这部电影可被认为是对不公正形式的一种评述，<sup>172</sup> 在英国的法律里，这种不公正的形式在历史上已被认定为具有

爱尔兰嫌疑犯的特征。这一文本所开辟的各个方面，对真实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潜在性的批评。与那些希望解构文本抑或那些像博德里亚和詹姆森那样主要将文本看作一种文化形式的人相对峙的是，一种更具阐释意味的评述会竭力考察批判的视野，这些批判的视野是通过关注文本正试图说些什么来开辟的。博德里亚无法对文本生产的这种批判特征作出回应，因为他将对世界诗一般的评述内爆为各种真实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加达默尔（1975）和里克尔（1981）对文本的指称要素的提法，既对评述受众与各种各样的文本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又对文化政治添加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角度。当然，消费社会的诸种结构现在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鼓励并融合符号学的多元性。但是，假若我们考虑有保留地融入女性主义视点的主流文化，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无需如此悲观。女性主义出版社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纷纷涌现，在通常情况下已改变了将矛头指向妇女的各种各样的通俗文本（巴拉斯特等，1991；麦克罗比，1994）。由各种妇女杂志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形态已受到了女性主义影响的挑战。情况显然依旧存在的是，将目标指向妇女的范围极广的各种杂志，大多是将它们的目标群体的作用描述为消费者和家庭的主要看护人。但是，这已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有些杂志至少在口头上关心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包括对性征问题更加解放的界定到健康和妇女的就业问题。这些物质文化提供了新的同一性和主观性的可能性。如果不注意文本内容与文本之外的各种运动和关系之间的联系，那是不可能理解这种可能性的。尽管这类文本很少力求将性的支配地位的各种关系政治化，可女性主体已成为一种更不稳定的构建，同时也已因此开

辟了更具自主性的发展形式的空间。我想再次强调指出，不应夸大这种发展——虽然在这种语境里重要的是博德里亚和詹姆森的研究使这些争议保持了开放性。<sup>⑧</sup>

3. 如果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博德里亚关于媒介文化的观点，对有些方面是言过其实，而对其他方面则起到了损害的作用。博德里亚的课题零乱地堆满了论辩的夸张和漏洞百出的断言。再者，在我看来，作为他宿命理论概念基础的，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先锋派观点，这种观点蔑视人类的任何同情心，可这种情感或许能培养生活世界中的各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1989c)追溯了贯穿于早期现代主义运动到新右派的类似情感结构。他对斯特林德贝里和尼采进行了分析，认为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化，强调了对资产阶级的个性化反叛。现代主义对异化、离散和流放等诸种情感的研究，现在已173  
交织着右派原子化个体的话语，这种话语竭力否定更具同情心和凝聚力的联系。博德里亚的著述所采取的立场，就是提倡作者的个性化主义的形式，可现代民众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作者。从表面上看，这与威廉斯所概述的现代主义先锋派的一些更具精英色彩的方面如出一辙。

大众传播的技术手段将民众变为一群毫无责任感的大众，人们可以看到，博德里亚对此研究的基础就是类似的假定。鲍曼(1992a)、霍尔(1986)和凯尔纳(1989)均认为，博德里亚的著述内涵着一种反解释学的偏见。可争议的是，博德里亚将大众表征为一个缺乏情感的同质群体，这一群体拒绝诱导参与和自我确认的媒介策略。依照这些视点，他对通俗文本的符号学多元性缺乏重视，因为各种不同的主体角度对通俗的文本具有各

种歧义性的解读。在此,我想起了威廉斯(1965)的一些相关的评述,他的评述涉及这样一些人,他们力图将民众在文化上的各种不同群体还原为一种类似于大众的统一范畴。在威廉斯看来,大众一旦离开某些知识传统和艺术形态的象征性生产,便不具备所指对象。这类表征与那些独立于人类关系之外的已获得具体化的个体存在一样,对现代生活的真实复杂性提供了一种还原性的分析。按威廉斯的话来说,博德里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论辩策略,将普通行动者孤立于主体间性的语境之外,并构成了纯粹是技术决定论的一种形式。这些反对意见具有明确的相关性。然而,斯马特(1992)为博德里亚辩护,提出博德里亚的观点在于一种单向特性的技术使大众变得沉默缄言。斯马特倒会同意威廉斯的这样一种观点:大众在任何情况下是对博德里亚自己著述的一种模拟。那些将博德里亚描述为精英分子的人,他们所欠缺的是对他话语策略的重视。就这一意义而言,博德里亚已发展了关于主导性规则的霸权的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鼓励受众的活动和参与。博德里亚阐述问题的这种方式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大众本身纯粹是一种模拟,那么我就有理由提问,我为什么要接受博德里亚的思想观点。与媒介社会学有联系的是,博德里亚深度的悲观主义对一些受众理论家在符号学上的悒悒起到了一种解毒药的作用。就这一意义而言,他的著述对通俗文化的消费者的看法,的确保留了某种描写的相关性,而通俗文化的消费者越来越变得迷惑和玩世不恭,可也意识到明显表现于通俗小说、电视系列片和电影里的互文性参照。但是,他的思考依然是印象主义的,而且如果根据这些思考的主张,那就有必要抵抗我在此表明的经验性指称对象。



博德里亚的另一优点与麦克卢汉的类似,强调了技术在各主体间性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又与麦克卢汉相类似的是,他迷信媒介传播的技术方面。现代传播体系已建立了对传播一种特别的单向看法,这依然是一个重要洞见。在媒介研究领域,围绕民主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关注,均建基于这一假定,虽然在大多数方面这尚未得到清楚的认识。所谓大众社会的建立,过去是以文化霸权特性的某些民族形式为基础的,而这些形式反过来又通过集中化的传播技术发挥作用。今天,随着随身听、卫星接收站和录像录音机的到来,技术具备了个体化的效应。由这类发展引发的社会控制的各种新形式,与其说是被整合进一个大众社会,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离散。青睐意识形态融合观念的格拉姆希范式,当然仍然具有相关性,可任何对通俗文化霸权效应的关注,都需要借用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正在崩溃的社会空间的研究来得到协调。当然,博德里亚并没有进行在此指明的各种联系;他对自己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许显得更加重要。

譬如说,麦克卢汉和博德里亚坚持认为,即时的或污秽的传播,已使公共领域变得陈腐,这保留了一种分析性的价值。大凡想修正公共领域的企图,如威廉斯和哈贝马斯的企图,均需要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现代的信息流通和绝大多数民众的缄默,反倒引发了某些局限性。博德里亚和麦克卢汉合理地将从印刷到电子文化的演化,描述为在这一方面具有某些意蕴。具有现代性典型特征的模拟的信息风暴意味着,受众的反思性回应陷于日益个性化的速度文化(speed culture)。但是,如同麦克卢汉和博德里亚所隐含的意思,这并不一定会消除主体在善良和正义方面的批判反思能力。似乎是,德博尔和詹姆森关于历史性叙事

的衰落的提法更具道理——虽然这类关注需要解释现代民族主义的复原力。然而，这样一种看法对仅仅借助于媒介来形成理性交往的共同体之企图，的确产生了各种制约的作用。公共领域的辩护者可能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博德里亚对技术的沉迷，保守地将关于技术的民主体制问题排除在外。我们不妨提问一下，我们怎样才能确保公共相关性的诸种问题会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得到广泛的讨论？再者，在公众已经离散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我们时代的各种最重要的问题，会抵达民众工作、照看子女、休憩和表达意见的空间？这类问题既预设了对我们文化的一种民主阐发，又导致了与其说是社会的媒介中心论，倒不如说是麦克卢汉和博德里亚提供的那些观点。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媒介影像快速流动的世界所得到  
175 的阐释，既过于乐观（麦克卢汉），又过于悲观（博德里亚）。我自己的意向与詹姆森的相类似，虽然我在以往提出，他的言论构建过于紧扣商品物化这一问题。这样一种辩证的看法会接受博德里亚的这样一种观点：媒介方面独特的事件的传递，使人产生一种短暂感和肤浅感。在这一方面，现代性有助于培育一种浅薄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具有持久的价值。但是，符号学文化的爆炸，已相应地目睹了在主导性商业文化的内部和外部对深度和意义的一种新的探索。全球传播的发展，已培养了与那些在时空上比较遥远的人形成协同性的各种新型的关系。这样一种辩证法——而且这将我引回到我对公共领域的热心关注——使自由传播系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紧迫性。面对全球公民的各种机遇和危险预设了这样一种必要性：使人们能有机会接触高品位的信息、促进批判性反思的戏剧

和引起公民反应的电影评论。很明显，公民需要对其生活和死亡于其中的日益复杂的社会诸条件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识。这使一种基本的民主和一种开放并富有交流的交往体系成为必要，这种体系需尽可能地摆脱金钱和权力统治的羁绊。遗憾的是，博德里亚的虚无主义社会理论，与其说是关注社会领域，倒不如说是注重其自身的姿态，这使得这类争议变得没有多少意义。

4. 我是以考查博德里亚反人道主义的根源开始撰写这一章的。我们已经看到，其根源肇始于阿尔都塞对早期马克思的批评，以及许多时间以后，他对尼采和巴塔伊的兴趣。贯穿博德里亚社会理论的一条连接线，是他坚持主体业已消失于客体这样一种看法。况且，博德里亚声称，对人类需要的关注在冷漠的电子文化里，从哲学角度看既是枯竭的又是时代的错误。然而，我倒想坚持，关于人类需要社会协调和历史协调的思想，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否则，如果博德里亚的思想为人所追随，那么人们就永远不能提出，各种社会制度没有满足其公民的需要。的确，除非对人类需要的某种看法得到辩护，欲明了我为何想要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这无疑是困难的。超级市场或许充斥着消费商品，可这并不意味着超市的食品没有毒性，抑或人人都有能力购买。与这一点更相关的是，我们的广播电台或许有表达自己思想的社会名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善于挑战我们对爱滋病抑或贫困的感知。尽管有点不合时宜，可我在此将坚持，20 世纪后期的人类既有物质的需要，又有象征的需要。这些论点与大众传播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这将在本章的小结里重新提及。

博德里亚排斥关于人类需要的思想，主要有两个理由。第 176

一,博德里亚正确地总结说,这一观念与关于人类本性的理论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博德里亚看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思想与主导性规则的规范化运作纠缠在一起。对人类作为主要的具有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相似的观点,这强化了这样一种形式:种族主义蔑视那些没有获得这一地位的人。博德里亚的另一个批评是,关于需要的各种观念有赖于对不适合社会性的人类主体的看法。博德里亚提出,需要仰仗于主体与其他消费群体的区别,而且是主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结果。因而,需要的话语(needs discourses)是意识形态的——这不是博德里亚所钟爱的一个术语——因为需要的话语复制了规则的排他性,而且将主体分解为自然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我认为这两种假定都是被误导的。

人类需要和本性的概念一定是排他性的,这第一个论点显然是虚妄的。我们或许同意,某些阐述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但情况并不一定就是如此。譬如说,诺曼·赫拉斯(1983)已提出,马克思与阿尔都塞的见解相反,从未拒绝过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而且他这样做是正确的。马克思通过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理论来捍卫关于人类的普遍性概念。除非对食、住和健康的需要得到满足,人类不可能活得很久。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他们也有对人类交往、创造性的劳动和各种各样的社会追求的各种社会需要。这些需要在不同的文化里可能得到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在本质上具有普遍性。尽管我并不一定感兴趣于捍卫马克思关于人类需要和本性的理论——要了解他的观点的内在的种族主义成分是困难的。博德里亚本人大概需要食物以获得继续生存,并且认为写作生涯比起单调的体力劳动,给予他更大的

创造能力。我已表明,就传播理论而言,人类有社交、知识和创造性表达的需要,如果这一思想可以辩护的话(而且我相信是可以辩护的),那么这将对传播的主导性手段的组织具有丰富的含义。

博德里亚的另一条反对意见同样带有纰漏。尽管这样说,可这样一种观念,即关于人类需要的理论有哲学二元论的倾向,毋庸置疑地具有某种共鸣。马克思显然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人,因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难题是,它将工厂的工人还原为退化的动物状态。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野蛮状态,阻止工人对他们自己固有的人性有全面的认识。这样一种观点非常接近于这样一种物种思想:它将动物的需要认定为低微的需要,而将人类的需要认定为高尚的需要。然而,在我看来,说马克思阐述人类需要的方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需要完全排斥人类需要这一概念。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同样具有普遍性的物质需要,这一观念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指出了对博德里亚思想中的本体论的深度偏见(巴斯卡尔,1991)。假若这类需要受到制度的控制,那么我们便不能提出,一个使其公民饿死的社会不能满足其公民的需要。关于哲学二元论这一问题,特德·本顿(1993)认为,如果我们考虑每一种物种均具有某种历史赋予的潜能,那么这一问题就可避免。人类和猫都具有某种生物条件(有限的寿命、与其他动物的联系、性活动等等),却具有不同的物种潜能。譬如说,唯有人类才有能力通过业已建立的媒介机制,在语言方面分享自己所需要的各种阐释。这种物种潜能显然有赖于历史发展的某些层次,不能被恰当地概念化为他们生物上的一种表达。然而,关于需要的这类看法避免了将人类的各種能力简化

为特定的社会制度，也敢于承认社会的存在也是生物的存在。博德里亚的反唯物论哲学，显然是将人类对苦难和死亡的共同承受力简化为电视屏幕上的电子粒子。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关于需要的观念对大众传播理论具有重要性，我想在下一章里再涉及这些主题。

## 小 结

博德里亚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大众传播的技术特征。模拟文化的普及性、他自己的反人道主义和不肯妥协的辩论，这些均是本章的重点。但是，同麦克卢汉一样，博德里亚在用更加抽象的分析形式将具体的技术媒介揉合在一起之前，首先展示了对它们深切关注的前景。博德里亚对新的传播形式的影响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可是，鉴于他对公共政治经济学的诸种观念的嘲笑，以及他对媒介文化所作的仅凭印象的分析，他的观点需要更具实质性的支持。这里的问题是，博德里亚极端的反经验主义削弱了这种可能性。

## 第六章

# 媒介文化和社会理论中的各种视点

178

### 大众传播研究的三种范式



介理论的遗产，为社会理论家提供了关于媒介实践的复杂视点。目前新技术的爆炸和媒介文化的迅速全球化，使这类问题越来越有关联性。如同受检阅中的大多数学者可接受的那样，媒介印象的交换现在为 20 世纪后期提供了永久性的背景。不论我们始终生活于我们出生的村庄里还是在全球到处旅游，各种媒介文化几乎无处不在。这些媒介文化是一张微观的网，编织起我们称为全球化的杂色布。如果说得节制一点，这些媒介文化有利于开辟、维系并偶尔也转换跨国的、全国性的、区域的和地方的同一性。由传播的诸种技术促成传递的各种文化，其喧闹的不断变化提醒我们：原教旨主义和离散主义的抱负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大众媒介无处不在的触角表明，人类永远是合成一片的。的确，我们接受人类存在的在象征意义上超越民族和无可改变的物质特性越快，那就好。纵览晨报的第一版——麦克卢汉

(1994)将此比作一个拼贴——我们就会渐渐地意识到国际新闻机构在全球无所不能。各种不同类型的新闻事件的拼凑，就是在现代性里可以看到的习惯成自然的文化联系诸种形式的一个例证。这些文化形貌，如果抛开戏剧性的倒置不说，看来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伴随着我们。

对那些力图以一种范式来解释社会生活的人不利的是，信息的全球性流通永远会使主体偏离中心。传播体系过于庞大，不可能依附于一种控制机构。对抗性意见的泄露、矛盾形式的传播和消息的相互抵触，均会促成这种情况的产生。媒介诸文化在其所有制、技术、消息、形式和接收方面的多元性是无可改变的。假若这是正确的话，大众传播体系也是蕴藏着过于巨大的力量，以致不会处于管制状态，也不会落入几个大联合企业的手中。媒介文化是霸权策略和意识形态实例的猎物。我们没有必要在现有这三种范式之间作出一个选择。诚然，我们讨论的许多作者至少将现成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譬如说，詹姆森(1991)将批判的方法与对现代文化的技术特性的理解融合起来，斯图尔特·霍尔(1986)在对受众进行批判性的解读的同时，对霸权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可以保险地作出这样的总结：这三种研究方法对我们理解现代电子文化、印刷文化和口语文化均有裨益。这些研究方法的持续性关联，有赖于这些研究方法将得到应用的经验性语境和我们试图提出的诸种问题。

我在这一章的宗旨，是概观前面几章所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然后我将继续探讨我所认为的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的中心问题——为何大众传播的研究对那些希望认识社会领域的人来说很重要？我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将牵涉到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实



际文化诸过程。引导这一讨论的意向类似于批判解释学的某些分支：理论能成为我们唯一的关注点，这主要看这一理论能否使某些社会过程更加清楚明了。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是与那些使理论脱离社会实践或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当作互文性的一种方式某些学术思想不相容的。尽管理论上的关注不能反映世界，可它们的确有利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意向。根据克利福德·格尔茨(1973)的看法，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作者的聪明，而是他把我们引向问题的核心的能力。如同博德里亚(1983)所提出的那样，理论与实践的诸种畛域是流动变化的。但与他态度相反，我们仍能将理论和实践的各种观念视为至少具有彼此的相对自主性。一种批判的研究方法，是寻求分析性抽象与社会实践领域之间的“适合”性。理论发展与社会实践应力求维系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关系应向这两个领域里的诸种新思潮保持学术上的开放性。这种观点目前在一些与后现代主义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中并不流行，它坚持将理论发展与发生于传播系统本身的变化联系起来的必要性。根据这一精神，我将把本书提出的各种理论模式应用于这十年来最重要的媒介新闻之一——海湾战争。尽管这无疑是一件特殊的事件，可这的确有助于将明显体现于此的诸种理论思想联结在一起。最后，我将从传播的角度进一步思索人类需要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等问题。这两个相关的概念均非常有益于大众传播理论，并且具有其他研究领域所没有的规范性优先权。但是，我现在更直接的问题，是想问一问社会理论为何应该研究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在这两类观点之间走钢丝：一类是过分强调大众传播媒介重要性的各种观点，另一类是不太重视大

180 众传播媒介的各种观点。有一些人的研究将媒介与社会实践的其他领域分割开,另一些人则强调媒介在意识形态方面将各主体约束于某些核心信念(core belief)的能力,这些人均犯了第一类观点的错误。还有一种情况,那些犯第二类观点错误的人提出,正是媒介形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另一种休闲活动;他们或者提出,媒介对受众的诸种成见没有什么影响。这些观点在我看来是虚妄的反对意见,本书本应该作些许努力去解构这些意见。

全球性传播的崛起已伴随着一些权势集团的兴起,这些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宗旨,竭力发表各种观点,并展示各种技术。各种传播技术的普遍发展已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新市场的热切寻求同步。业已产生的诸种文化形式,已被追求最大利润以及追逐意识形态和文化支配权的大企业所利用。这使得许多作者认为,媒介是消费者资本主义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力量,这种力量创造了新的需要和欲望。一种更辩证的研究聚焦点,揭示了抵抗商品化和意识形态策略的文化诸过程。关于公共领域的观念、真理的新闻价值观、客观性和平衡,以及创造性艺术家的概念,表现为这些形成物抵抗被金钱和权力殖民化的某些方式。对受众更具阐释性的诸种聚焦点发现,西方媒介生产的各种形式常常有意外的效果,而且在符号方面呈开放性。生产信息的人与消费信息的受众之间的分离意味着,媒介文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语境里得到观照,同时也以一些不同的方式得到审视。然而,除非技术的某些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我们甚至不能谈论这类问题。文化诸形式能通过时空来储存信息和改变信息,这一点在前文的讨论里已被认定。媒介既不是被动地服务于霸

权形态的利益,也不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清白的。同样,传播的各种技术是由私人资本和公共权力的诸种能力构建的,而媒介本身却保存了某些能力。譬如说,不论电话是公共抑或私人拥有和使用,它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因而,在现代的背景下,传播的各种技术成了某些机会和危险的焦点,其文化效应常常不可预知,而在另一方面却仍然与社会权力的运作联系在一起。这两者既具有支配性,又要接受受众的多元实践。最后,它们在引起更加离散性的效应的同时,提供了全球性各种彼此联系的层面。

这些不同的范式试图说服我们:大众传播研究对理解当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想抵御使媒介实践明显地成为中心地位或边缘地位的诱惑,凡是这样的观念都是符合我的意旨的。然而,尽管媒介研究的这三种传统范式明显地表现出分歧,可这些研究传统均强调了为什么应该进行媒介研究的各种不同的理由。最后,尽管它们具有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发展轨迹,大众传播的任何综合性研究方法,均不能无视明显体现于文献资料中的这三种范式的任何一种。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抓住了媒介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可遮掩了其他方面。关于这三种范式论述问题的不全面性,我将在讨论需要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时再提及。我不会提出我自己个人的范式,也不会认为现有的各种范式毫无用处;在某种程度上,问题在于这些理论上的研究方法对某些方面还尚未开发。

研究大众传播对理解当代社会缘何重要,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每一个方面都阐述了媒介实践的一个不同领域。这些理论阐述也研究了至今尚无答案的若干问题。无可规避的是,不

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重新得到研究，而且有些问题只能留待其他的批评家去解决。第一种方法提供了大众传播的批判理论。这一理论着意于检视在当代社会里各种媒介已成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各种方式。关于这些方式在这方面的有效程度，目前人们各执一词。本书反映的两种学术传统——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各种媒介策略在文化方面渗透于生活世界的程度问题上，仍然是态度不明朗的。除此之外，这些传统已竭力将媒介与社会实践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经济学和政治学。文化已受到各种商品化策略和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操纵的程度，依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人们通常提出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的诸种理由，涉及权威和民主的各种观念。常见的观点是，现代民主仰仗于能获取各种不同思想的公民，这样，公民们可以对民主辩论提供创造性和反思性的输入。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这意味着权威是赋予民众的。他们是一个有权开除自己所选代表的集体。然而，如同大多数批评家所意识到的那样，民主决策的过程必须在不完全理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近年来，由于参与各主要政党的人数的减少，普选中投票人变得犹豫不定，以及人们普遍意识到，金钱和权力竭力保证某些结果，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事先加以安排的，西方民主已遇到了合法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到，大众媒介在意识形态方面起维系现状的作用，而将异己之见放到次要的位置。

霸权这一概念已经表明，对信息流通的控制几乎始终是不平衡的。它显然偏袒有权势者的言论和意见，可它也会给批判反思和其他的主体间性关系提供空间。如同这一研究已表明，各导向机制有系统地歪曲了影像、言论和历史性的表述。但

是,这些机制尚未成功地将生活世界殖民化,或者说这些机制尚 182  
未成功地控制住各媒介文化不可预测的传播。譬如说,世界媒介显然以种族优越感的方式来表征第三世界中的人权危机,而极少顾及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语境。如同我所写到的那样,时下正发生于卢旺达的人类悲剧,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卢旺达民族文化的复杂性被贬低为死亡的符号。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具有风俗、传统和像我们一样工作、生活和充满爱心的民族。一具具尸体被装上卡车,让它们在阳光下腐烂或者埋葬于地下。可以争议的是,这一景象几乎无法培育全球同一性的观念。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尸体。卢旺达人由于成群结队地离开自己的国家而被烙上了无理性的印记,却又由于他们的苦难遭遇而受人怜悯。在此,如同许多作者所坚持的那样,要说媒介没有记忆,这无疑是正确的。就在几个星期之前,我们的电视屏幕充斥着关于发生于卢旺达边境的种族灭绝行径的报道。人们也有这样一种印象:假若这些人是欧洲白人,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就会更容易得到帮助。但是,假如没有全球性媒介的存在,世界的领袖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去关注大众的苦难。当然,媒介不久就会改变注意力,而且也不会再有关注卢旺达问题所需要的全球形式的重新分配和体制建设。然而,我们居住于地球的小小角落,假如没有电视图像、报刊报道和广播采访,大多数人就不会意识到我们对那些在空间上远离我们的人的义务。全球媒介具有使西方的领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感到汗颜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尽管各种报道将肯定会再生产出许多主导性体系。简而言之,虽然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批判的研究方法所概述的许多特征,但这些媒介策略的结果是常常意想不到的,较之关

于霸权的大多数理论所推测的更具矛盾性。

媒介研究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采用更具阐释性的各种方法。受众理论尽管有缺陷，可这种研究清楚地阐述了明显体现于各种媒介文化中的许多相互矛盾的心理过程。这种研究给人的印象是，媒介的诸种互动作用几乎总是在国内背景下发生，并涉及观察者、观众和听众本人的复杂的象征作用。可是，如何以最好的办法着手对受众进行考察，人们至今意见不一。我们了解到，与受到阐释的具体文本相比，戴维·莫利(1992)和安·格雷(1992)更感兴趣于观察语境本身。然而，约翰·菲斯克(1987b)和伊恩·昂(1985)所关注的，是什么东西使得某些文化形式被人广为接受；他们还研究这些文化形式的符号性和颠覆性倾向。诸种受众理论在认真对待这些行为的同时，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诸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干扰平常接受诸过程等全面情况缺少理论阐述。然而，这种视点已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肥皂剧缘何如此受人欢迎？我们怎样解释电视在当代休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媒介重要到何种程度？平常生活的诸种实践的特征已回答了这一问题。这就是说，媒介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民众凭借他们与诸种交流形式的各种互动作用来构建同一性意识，并建立起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媒介文化重要，是因为公众的普通成员的热忱参与所致。关于大众传播的这些视点看来所珍视的，是人类参与文化的能力。如果说批判性媒介理论强调媒介在诸种民主参与形式中的作用，那么受众理论所主张的是各主体参与各种通俗商业文化的权利。在诸如哈贝马斯(1989)和威廉斯(1974)那样的批判媒介理论家看来，假若我们能反思性地质问以往所信奉

的各种传统和信仰,那么我们便能成为成熟的人类。同样,尽管受众理论家们明显地强调国内语境而不是公共语境,可他们坚持认为,社会各主体有与媒介文本格格不入的思想倾向。这些理论家因都强调主体的复杂象征性能力而团结在一起。然而,研究接受的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与其说是共和制优越性的实现,倒不如说是热情的崇尚者。在此,他们的注重点是媒介文化被体验和被实践的诸种不十分显目的方式。这种理论上的实践领域,已使得专业研究人员能将自己和受众认同为其程度甚于先前所假定的诸矛盾主体。诸种政治同一性和诸种更通俗的构建似乎彼此遮掩。这些更令人愉悦和更加个体化的执著行为,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象征的聚焦点,而不是信息的或工具的聚焦点。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的执著行为使得我们参与各种各样的通俗性叙事故事,我们从中构建起一种自我和想像的共同体意识。从稍为严谨一点的角度看,家庭消费的个体化实践,本身表明了明显体现于西方民主的原子论和非政治化诸过程。不可避免的是,这两种解读均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两者结合在一起,表明了昭彰于通俗媒介文化中的深刻的矛盾心理。

再者,尽管我对霸权理论的概念的使用有自己的各种难题,可霸权理论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重新聚焦。关于霸权的诸种观念,容纳了接受的各种语境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诸种实践来建构的诸种方式。关于霸权的这种视点,不能简化为莫利(1992)和霍尔(1980)对阐释的主导性、协商性抑或抑制性的关注。对媒介文化的诸种阐释的依据,是文化高度参与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的网络。这种观点会有

助于在更广阔的结构、历史的和空间的诸实践中对接受实践的重新聚焦。

那些已将注意力聚焦于传播媒介的人，已将媒介文化发展成为现代性的历史。在用来反对那些将媒介文化研究降至次要地位的人的各种方式方法里，他们提出，这些过程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后结构主义的某些分支一样，他们认为，媒介的作用与就业模式或儿童保育安排的研究，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传播最突出的单向形式改变了时空关系，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媒介文化同任何其他的文化一样，均属于社会实践。唯物论观点常常将这种文化的运作贬低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的印刻作用，这一观点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媒介文化独立于其他的各项社会活动和实践之外，可又与这些活动和实践交织在一起，而这些活动和实践反过来对媒介文化产生结构上的影响。

影像和信息交换的技术发展，已对 20 世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 19 世纪的印刷和口语文化以来，已兴起了一种电子文化，这对维系跨时空的诸种主体间关系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各种影像和视点，而这些影像和视点则远离我们生活、工作和相爱的地方。在各种不同的时刻，传播的各种技术途径能提供一种社会黏合剂，能提供人人都谈论的各种事件的详细细节。这些事件可能是关于一个失踪的婴儿、一次地震，也可能是关于美国的总统竞选。大众传播的其中一个效应，就是跨时空地将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和社会群体统一起来。这些想像的共同体，可能是短时期内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瞬息即逝的经历，抑或同样可能是自我确认的更强烈情感的宣泄



场所。大众媒介通常向我们提供关于完全有别于我们自己生活方式的其他各种生活方式的信息。沉湎于这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引起错误的认识、霸权的操纵抑或窥阴癖式的消遣，而且还会引起我们的生活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这样一种感觉。然而，如同大多数评述人所意识到的那样，由各种技术开发的传播渠道越多，受众就会愈加离散。传播技术有利于推进超越区域的、全国的乃至全球的空间结构的统一化和分离化诸过程，其彼此交叉的线条似乎将世界凝聚在一起，尽管又持续不断地使世界分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和风格里所发生的大量媒介文化的爆炸，意味着受众始终参与各种选择。决定收看警探剧、读完一本小说抑或听听歌剧，这使我们与其他的观众、读者和听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使我们与其他人分隔开。各种技术途径使各种变化成为可能，它们继续不断地改变着这些社会关系，这种现象值得研究。

传播的技术设施的作用，对关于传播研究的其他两种模式<sup>185</sup>也具有某些意蕴。随着全国性的电视、广播和报刊的出现，传播技术的集权化赋予社会学领域里的诸种研究关于大众社会的种种观念。人们感觉到，由资本和国家控制的某些技术，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融合形式。录像设备的提供、电视和广播频道数量的增加和杂志产业的扩大等，均已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平衡。尽管意识形态诸过程依然明显地存在，可文化传播的发展已愈来愈注重于受众。先进的传播技术的使用，对受众的离散产生了作用。诸如录像机和随身听等技术，已经产生了使人个体化的效应，允许受众能对自己接收各种媒介文化的方式作出选择，而在早期的技术浪潮里，这些媒介文化并没有

十分明显的体现。受众已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进一步发展的技术已开始让受众提供各种文化输入。

这种研究领域也有其盲点；另外两种大众传播理论提出了这些盲点。博德里亚(1988a)和麦克卢汉(1994)对传播的研究抽象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资本政策和国家政策)，但忽视了受众的各种符号能力。如果将着眼点放在技术媒介上，那么这就应该被重新整合到各种更加社会化的语境和研究里去。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一系列令人感兴趣的质疑。难道有些技术形式较之其他的技术形式固有更民主的特性？难道更具互动作用的技术的发展会补充各种民主的过程抑或进一步削弱公共的讨论形式？电子文化对更冷静和更有理性的论辩形式会产生何种建构效应？我对这些问题的可能性答案已做了某些说明，虽然这些答案仍然是供讨论时参考的开放性问题。

有些人会为现代性的各种看法辩护(如威廉斯和哈贝马斯等)，有些人会为激进化的现代性辩护(如吉登斯等)，也有些人则为后现代性辩护(如博德里亚和詹姆森等)。这三种范式中的每一种范式的背景，均充分反映了这些人之间的论辩。有些人力图为以大众传播媒介的民主化为目标的现代主义计划辩护，虽然我与这些人有思想上的共鸣，可无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面至少具有描述上的相关性。以博德里亚(1988a)和麦克卢汉(1994)对内爆的看法为例，传播文化平常能完全改变明显地表现于现代性里的许多特殊化诸过程，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媒介文化里，媒介事件的迅速转向反面、媒介体系以及政治精英分子监控媒介生产的企图快速商业化，均已改变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可以这样说，媒介不仅仅报道新闻，而且在某

种程度上产生了新闻。再者，符号性资本主义对意指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和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已改变了媒介文化的焦点。如果媒介要特载一条关于埃尔维斯·崇拜者习惯行为的新闻，那么这的确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幻影。这些崇拜者本人，可能就是伴随着以下几种情形长大的：倾听他们所钟爱的明星灌制的唱片，观看他所参演的电影或阅读关于这一明星的流行故事。这本身也会成为一个媒介事件。这一例子表明，媒介与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然而其他的文化过程在起作用。通俗小报的大规模发展和批量发行，说明了一种不同的文化逻辑。报纸两极性地分化为严肃的和通俗的形式，这已形成了两种平行市场。我们看到，严肃报刊，往往关注对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所进行的广泛的公共讨论形式。然而，通俗小报则感兴趣于轰动性的报道、荒诞的事物和对世界的个体化观念，而这些观念表达了私有化和非政治化。因此，就媒介而言，去谈论两者兼而有之抑或不平行的发展，是很有诱惑力的。尽管内爆和模拟对媒介文化已毋庸置疑地产生了影响，可它们尚未逆转其他更根深蒂固的可能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倾向。因而，媒介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对信息市场进行内爆和分化。这又一次说明了媒介文化的多元性，而且不是同质性的。

在本书，我自始至终对某些理论的意义和用途提出异议。我们现在能明白，虽然媒介批评有其自己的着重点，可所有这三个方面的关注点均是相互依存的。表达这一观点，我的目的并不是虚妄地统一理论实践的多种领域——这毕竟在批判的张力

\* 即埃尔维斯·普里斯莱(1935—1977)，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风靡一时的美国流行摇滚乐歌唱家。——译注

方面对成为一种领域来说是更有成效的。但是，将各个不同的领域的关注点调和起来，这是可能的。这些不同的领域均有同样的研究对象，尽管它们突出研究的各个不同侧面。不论我们所关注的是统治的体制模式、同一性形态抑或时空的变换，这些视点均阐发了社会理论与之相关的一些中心问题。社会理论家或其他与之相关的任何人竟会重视媒介，其缘由我们已经清楚。理论实践的各种复杂领域已表明了这些原因。这些理论实践反映了媒介文化的混合性和多元性。当下这些研究并不完整，也许永远不会完整，这是以下的思考将要探讨的问题。

## 媒介与海湾战争：霸权、受众和模拟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也许是历史上由媒介助长的最为激烈  
187 的人类冲突。就这方面而言，这同样或许是首次真正的全球性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支配了电视、报刊和广播节目制作的大多数内容，使得这场战争成了一个媒介事件，这是极为罕见，而且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不论是坐在印度的恒河河畔，带着一台小小的手提收音机，还是坐在纽约某一豪华公寓的顶层收看实况转播的电视，整个世界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跟踪这场战争，仿佛麦克卢汉对一个世界村的预言已最终变为现实。当世界的所有人都神经紧张地收看、收听抑或阅读这些如火如荼的新闻事件时，世界的面积似乎已经缩小。尽管媒介报道量的广泛性使这场海湾战争引人注目，而且这也许并不代表更世俗的文化潮流，可这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论辩焦点。

我们关于传播的三种范式以何种方式帮助我们对这一事件

的理解？不足为奇的是，假如已有足够的新闻报道量，那么一些学术研究和文章便会得到激励。这些研究和文章就会主要集中在探讨强加于公众思考形式的各种控制措施，而且讨论受众的反应和阐释。然而，麦克卢汉和菲奥里（1968）对战争这一主题作了发人深思的阐述，尽管博德里亚（1991）在一篇发表于报纸的文章里对此作了简短而且现在是臭名昭著的评述。在此，我不打算综合地描述关于海湾战争的全部研究。为明了起见，加之已有麦克卢汉和博德里亚所作的那些阐述，我将主要探讨关于这方面的两项研究。这两项研究是由凯尔纳（1992）和莫里森（1992）提供的。之所以选择这两项研究，是因为它们做得很出色，彰显了目前各种研究范式的许多长处和缺陷。我的宗旨是陈述这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大众传播的有关情况，并揭示这些研究尚未开拓的一些更加广泛的问题。在此，我将聚焦于这场海湾战争所显示出的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并简要地考察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些无意识自我确认问题。我将假定，读者已经具备了关于这场波斯湾战争的某些基本知识，我不可能探讨由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引发的广泛的道德和政治问题。我的探索更有局限性。虽然这些探索会难以规避地涉及其他的一些考虑，但在此我打算尽可能地将自己局限于对所讨论的一些理论视点的探讨。

凯尔纳（1992）认为海湾战争是一场电视战争。在他的本土国家美国，观众对这场冲突所形成的主要感知，是通过与电视屏幕的交往，而不是凭借任何其他的媒介。凯尔纳对绝大多数的电视报道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提出这具有霸权性质，因为这样做重新肯定了一场无缘无故的战争。他作如是说，其意思并不是

说,电视报道是各主导性群体的一种被动工具,而是说媒介报道是由社会斗争的一种领域建构的。确实,媒介基本上能使主导性的社会群体的行为合法化,并排斥各种异己的声音。但是,在制度内部,在越南文化遗产和原先强劲的和平运动方面,媒介策略仍然需要面对各种批判的声音。凯尔纳提出的批判性问题是:公共领域是怎样允准杀害了大约 243 000 伊拉克人这一武力的使用?

在为军事上使用武力寻找理由时,电视媒介没有履行其民主责任,告知民众所面临的风险、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以及谁是战争最终的受益者。电视媒介在意识形态方面利用了一些通俗的习语和文体、纵容种族主义参照系、袒护谎言和未经适当途径加以证实的声明。这些策略主要聚焦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个体化的邪恶,宣传未经充分核实的关于伊拉克恐怖暴行的事例,以种族主义的眼光反映残虐的阿拉伯人并将其他的视点边缘化。然而,美国轰炸一开始,各主要的意识形态焦点就移向西方技术的强大。美军干净利索的技术攻势与伊拉克对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的飞毛腿导弹攻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炸弹被表现为总能击中目标,而且击中的往往是物体,而不是人。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这会使人的苦难降低到最低的限度,其目的只是为了迫使伊拉克撤兵。电视影像与这种策略配合默契,因为电视很少报道由于美国的轰炸而直接造成的环境破坏和人类的罹难,人们纷纷责备的对象就是萨达姆·侯赛因。这些意识形态和非理性的机制,被用来排斥更广泛和更具批判性的公众论辩。譬如说,乔治·布什将侯赛因描述为魔鬼的化身,使得这次冲突演变为一场善与恶的战争,压制了对各种有关具体利益的分析。

将这次冲突构建为一场两个领导人之间的意志之争，这避开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及其必须服从的目的等批判性问题。在粗糙的守旧观念和美国为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需要这一祭坛上，牺牲了各种公开的和理性的公众论辩的观念。

那么媒介缘何如此热情地支持这场战争呢？在凯尔纳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军事和政治集团之间的联盟以及在整个 1980 年代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维持的大财团的利益。媒介支持这场海湾战争，是由于自由化政策的直接结果和媒介产业中公益服务义务的衰落。电视网络的系统性失控，导致了联合大企业的兼并。这在海湾战争期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军事和媒介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根据凯尔纳（1992：59）所掌握的情况看，美国通用电力公司拥有全国广播公司这一电视网，1989 年从与军方的协议中获利 90 亿美元。所有制的混合型，意味着传播海湾新闻的各个公司也制造了具有同样杀伤力的武器。媒介支持这场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军方和政府严密地控制了信息。在海湾的新闻记者被组织为各个军事小组 189，仅被带到事先经过选择的地方采访。凯尔纳还说，那些被人了解到对这场战争持批判态度的新闻记者，被拒绝进入战地采访。由于信息不灵通，无法进入战地，加之受到政治精英们的威胁，这导致了被动媒介的形成。操纵明显体现于对公共领域的控制，这种操纵极尽所能使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是值得打的，民意也因而随声附和。

任何批判的媒介理论，本来需要调查物质社会的结构、新闻事件的文化构建和人们所说的话的真实性之间的交叉面。其做法应该是：将事件表征为一种霸权斗争，而这种斗争是为求得意

见一致而从社会的主导性群体的需要出发所作的协调产物。这样一种调查会不可避免地诸如真理和正义之类的普遍性准则的语境性应用辩护。将这些准则放到重要的位置，以便通过提出各种难度大并具有批判性的问题来解释这些准则的行为，这是必要的。这些论点提醒我们防止过分的媒介集中、国家控制和民主的腐败。应该清楚，这种分析方法与本书前文所概述的观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然而，这存在着某些难题。这些难题可能与合法性和其他的全球性媒介的互动作用有关。对西方绝大多数的公民来说，海湾战争是一场建立在距离基础上的战争。迈克尔·曼(1988)已经提出，全球核武器的普遍性拥有，已导致了更有限的常规战争的产生。这些战争并不取决于本世纪初期具有世界战争特征的全民动员。这种有限的战争通常仅仅涉及专业军人的个人牺牲，而且家人只有在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时才会支持战争。这是因为家人并不被指望去作出很大的牺牲，而且我们的士兵并不是无谓地被牺牲。因而，在当今的西方社会里，大多数情况下对军事运动的全身心投入是极为少见的。即便是最集中的意识形态运动形式，也不大可能会奏效，除非某些文化限制受到尊重。假如美国人不是速战速决，那么极有可能的是，海湾战争会遭到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愈来愈多的批评。凯尔纳认为，在战争期间，民族文化会成为军事化文化。但是，他的说法缺少这样一种认识：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sup>①</sup>假若说海湾战争作为一个全球联盟反对一个侵略者而让士兵的家人接受，那么即便是控制最严密的媒介系统，也不可能忽视在其他民族语境下产生的更具批判性的观点。众所周知，美国在构建这些关系中起到了



重要角色的作用，因此无限期地将自己的民众与批判的外界反应隔离开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凯尔纳看来片面地重视了这一看法。他在自己的书快结尾时承认，海湾战争的胜利已“解放”了科威特，可这仍然救不了乔治·布什。尽管有共和党对外政策的成功和有利的媒介，可它无法使本党在国内避免遭受日益尖锐的批评。这起到了提醒我们的作用：区域的、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信息流通只能暂时得到遏制，而且永远不可能完全附丽于全国性的权力集团。再者——这一点是美国左派（乔姆斯基，1992）常常忽视的——媒介文化总是在各种社会的语境里发生作用，这些语境既使媒介文化具备意识形态的力量又能制约这种力量。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形态文化，既受到其他社会办事机构的冲击，又常常是结果难以预料。信息的螺旋式增长和媒介文化扭曲的轨线，具有某种持久性的凌乱（鲍曼，1993：245）。

这显然明显表现于英国。凯尔纳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他没有阐明不同的传播媒介常常携带矛盾讯息和视点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他强调了电视的作用。尽管电视无疑是战争期间的主导性媒介，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可更具批判性的视点在全国性的严肃报刊的某些版面得到了讨论。肖和卡尔-希尔（1992）的研究所发现的结果与凯尔纳的相似，即海湾战争期间的媒介空间过分受制于军事文化。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策略，他们发现，在严肃报刊的读者中，妇女和老人对空袭的破坏性寄予了深切的关注。这不是要去批驳凯尔纳对在美国语境中电视节目生产的描述，虽然这无疑引发了在非集中化的全球文化中国家铁腕控制的有效性这一问题。

批判媒介理论在近几年引发的一条主要反对意见是，这种理论对受众作了过多的主观臆想。凯尔纳怎能确定美国的观众同乔治·布什一样对那场战争具有热情？受众研究提出，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考虑意识形态，那么就有必要考察那些让人记忆犹新的意义和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意义。这一论点还认为，我们不能假定，公众按他人的设想全盘接受海湾战争的媒介表征。莫里森(1992)在了解了英国 1000 多位成年人的思想观点以后提出，受众不是在以下两个范畴里审视这场海湾冲突：偏见或客观，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是否会生厌。虽然大多受众承认，他们对新闻的报道量感到满意(86%)，其他人(43%)发现报道重复，还有一部分人(38%)认为对战争的报道过多。在其他方面，根据莫里森的看法，如果受众没有感到厌烦，那么他们对媒介表征的解读是复杂的。他们不得不注意到记者工作所受到的一些限制，相信这场战争在道义上的合法性，认为萨达姆是没有理性而不是发疯，并且关心一些更令人厌恶的场面可能对孩子有影响。换言之，受众的关心并不反映媒介宣传最明显的形式的那些关注点。

但是，莫里森自己对公正的和爱好和平的英国人的表征的构建，超出了对权力与权威关系的任何关心。在这一方面，莫里森的分析与以莫利(1992)、昂(1985)、拉德韦(1987)和格雷(1992)为代表的最好的受众研究相比较，则相形见绌。这些作者中的每一位都力求将受众活动的复杂理解与更广阔的权力系统结合起来。尽管我在某些方面批评了这些作者，因为他们没有开拓与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诸问题相关的更宏观性的研究，可莫里森的著述则完全逃避了对更广阔的结构问题和阐释

问题的讨论。除此之外，凯尔纳的陈述也许没有涉及受众表现出的微妙的感知范围，可他能够表明某些霸权结构禁止更广泛的批评形式的方式。至少可以争辩的是，不愿意目睹那些历历在目的伊拉克人的苦难的人，正是受众中那些成年人。这就是说，这些担忧并不像莫里森所想像的那样真实。在一种不同的解读里，受众自己想得到保护的愿望被移置到他们自己的孩子身上。这一看法会服务于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是那个想将这场战争表征为纯洁和正义的政治组织的意图。另一个意图可以通过受众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得到说明，他们不愿意被提醒自己在这场野蛮战争的支持会具有破坏性的后果。保持国内受众与伊拉克人遭受苦难之间的“距离”，能起到在意识形态上封闭主体间性的义务情感的作用。卢旺达人如果仅仅被表征为垂死的躯体，那么我们便不可能感到对他们有义务；同样，假若“他者”就是种族主义者畸形行为这一主体，并且他们所遭受的苦难隐藏于视线之外，那么自我确认诸过程就会永远地缄默。如果遵循这一思路，那么受众保护自己孩子的愿望，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怀疑、矛盾心理和道德复杂性等情绪之扰的愿望。莫里森很希望自己能充当受众的代言人，反对大众社会的批评家，这一愿望本身就是对受众自己有限的投射和信念作毫无批判性的辩护。再者，受众对新闻报道量感到满意，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没有这样一番令人不安的经历：目睹狂轰烂炸的后果。此外，必胜主义和道德优越性与更令人愉快的自我确认形式有关，虽然莫里森几乎没有什么左证来证明这一点，但难道我们因此能确信这不涉及这些因素吗？杰奎琳·罗斯（1993）对战争作了一些饶有趣味的反思，提出，坚定的信念使我

们免受了为他者而感到悲哀的情绪。莫里森发现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为战争的正义性而深感忧虑。假若我将侵略投射到

192 他者身上——在眼下这种情况，这个他者便是萨达姆——那么这个他者就可能成为这种仇恨的化身。让人非常难以判断的是，这个他者是否真正构成了威胁。在诸如罗斯那样的心理学家看来，战争是这样一条途径：将我们在自我里所感受到的破坏性投射到他者身上。阿多诺（1991）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源自我们自己内团体\*的敌意的积聚，将破坏性的情感转移到那些我们通常以矛盾心情对待的人身上。这提供了一种自恋的利益，因为这样，我们能感觉到更纯洁一些。这样的事发生于使人心烦的自我确认向邪恶的他者释放的时候。因而，受众可能在道德上感到心安理得的一个原因，或许与民族的统一和国际的统一能提供的心理快乐有关。尽管西方在忍耐和公正的道德感方面得到了统一，可更具侵略性的投射被移置到了伊拉克身上。这可能便是莫里森发现受众为何如此通情达理的缘由。他说，“因为没有政治用心，他们宽容地收看这些新闻”（莫里森，1992：9）。根据我的解读，他们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看待新闻制作，因为这能满足某种心理需要，并能免遭负疚心理的煎熬。我无法证实这些看法中的任何一个，但与我自己的阐释相比，我不清楚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更喜欢莫里森的阐释。

受众的反应可同样被解读为对重大的公共紧迫事件的一种消极回应。这些事件相对来说与其他人的需要阐释没有联系，

---

\* “内团体”或“自己人团体”（in-group），指成员对其所属团体有团结、忠心、亲密及合作之感的团体，成员对非成员有排外情绪；与“外团体”（out-group）相对。——译注

这证实了凯尔纳关于霸权作用的许多更具批判性的思考。英国受众的麻木不仁，或许也具有一种理性的内核。如同赛义德（1993：355）已提出的那样，这场海湾战争最普遍的意识形态是，是否需要使用武力这一决策，是“美国人的内部事务”。这可以与较为古老的帝国眼光联系起来。根据这种眼光，全球的命运取决于大国。这是一场美国的战争，打仗中所使用的，是美国的军队、技术和目标，这在媒介报道中几乎没有什么避讳。因而，莫里森的调查对象对这件事缺乏兴趣，这可能是实用性评价的结果，而不是凯尔纳将其体验为普遍性意识形态灌输的形式。英国受众本可以理解，这不是他们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可争议的是，这种看法使英国公共领域的支持的重要性显得具有边缘性。如果我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那么我们无法确知，全欧洲一种更开放的论辩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会产生何种效应？

的确，莫里森确实指明了批判方法的局限性，因为这种方法是借用自己的解读来取代受众的解读。但是，我倒想声言，受众研究需要重新整合到更具结构而少有文化上无知的分析形式里去。莫里森的分析只是对相关的批判争议提出了最陈腐的看法。他忽视了对受众回应的复杂性和矛盾心理的分析。根据这种看法，受众理论有用处，是因为这一理论能制约一些更狂妄自大的批判理论。这一理论有用处，也因为它凸显了媒介文化有利于助长自我感的各种方式，这一点是与文化和社会的体制环境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然而，我既不相信一种坚如磐石的军事文化是自上而下强加的，也不相信受众的回应如同莫里森所暗指的那样既合情合理，又直截了当。心理分析研究的长处之一，就是能够揭示战争的各个时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来的各种恐惧

和投射。这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心理分析方面训练有素,而是因为战事的合法性,常常涉及充满文化意味的情感氛围而不是更冷静的思考模式。

假若海湾战争使批判探索和受众研究难以进行,那么这为麦克卢汉和博德里亚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麦克卢汉和菲奥里(1968)提出,传播的技术媒介已改变了战争的实践。战争的首要企图,不是想维持同一性,就是想获致同一性。在电子传播时代,这始终是一种复杂的成就,因为我们被迫连续不断地意识到,我们的共有同一性的感觉无非是许多感觉中的一种。即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被迫关心我们的敌人。在麦克卢汉看来,传播技术使历史、心理学和他人的技术发展水平变得人人都能了解。这种形式的知识不再受到精英的控制。电子程序通过确保战争每一个阶段的公共参与,内爆了普通公民与军事之间的区别。这导致了麦克卢汉的中心主题:全球性技术使新形式的文化的彼此联系和参与成为可能。

麦克卢汉对战争、现代性和媒介的讨论不是没有可信度的。在大众传播时代,对战争的任何理解都会不得不接触到这些特征。但是,麦克卢汉对技术的统一意蕴的聚焦,不一定使其他的研究边缘化。与麦克卢汉相一致的是,爱德华·赛义德(1993)提出,这场海湾战争产生了由全球性技术培育的各种新的主体间性关系。然而,在赛义德看来,这些形式的互相认同,不可能明智地被描述为具有教育意义,而是更准确地被表征为肆无忌惮的错误认识的诸种形式:

因而,穆斯林、非洲人、印度人或日本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从他们各自受到威胁的地方,抨击西方、美国化或帝国

主义,他们对细节、批判性鉴别、辨别和区别的注意并没有超过西方对他们的注意。美国人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近乎神圣。这到最后是一种没有知觉的动力。不论“边境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它们都会产生民不聊生的后果。人们必须参加组建团体或建成团体的活动;否则,作为一个次等的他者,他必须接受劣等的地位;或者他必须战斗到死。(1993:376)

全球后现代文化的发展,对从帝国主义早期阶段以来就信奉的 194  
自我确认的精要型式,几乎没有起到什么破坏作用。同哈贝马斯和威廉斯一样,赛义德相信,唯有通过文化交往更具人性构建的世俗空间,才能挑战这些受到损害的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与麦克卢汉不同的是,赛义德承认,不怎么具有压迫性和更具民主性的诸种主体间性关系,有赖于晚期资本主义里的各种体制性变更。赛义德推想,假若文化的全球性生产和传播受到少数私人企业的支配,那么这样一种计划是不可能付诸行动的。

让·博德里亚对文化后现代性的看法,同样忽视了美国文化在全球的统治和跨国生产的作用。他关于这场海湾战争的文章写于大规模的轰炸之前,借助人质的媒介影像、联合国的宣言和总统的讲话,他对战争作了模拟性的描述(博德里亚,1991)。博德里亚指出,同冷战一样,这会是一场威懾性的模拟战争;这是一场“虚拟的”战争。这会是一场文字和影像的战争,是模拟的谋杀和破坏的战争,而不是真实的死亡的战争。博德里亚清楚的是,这种战争是不会存在的。他作出这种令人尴尬的断言的缘由,是出于他自己没有能力将物质的事物和象征的事物联系起来。出现于我们电视屏幕上的影像,本可以与实际上试图

将人类的破坏合法化联系起来，可博德里亚的哲学立场并没有重视这一主张。然而，从反常的意义上看，博德里亚是正确的。在西方的电视观众看来，现在似乎是海湾战争未曾发生过。与这场战争发生联系的媒介影像和混乱感，现在已从我们的电视屏幕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发生于波斯尼亚、卢旺达和海地的其他冲突。下一周，或者也许就在明天，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到别处。明显表现于这些事件里的时间与空间的离散，让人难以维系历史感。各种事件接连不断的快速出现意味着，这场海湾战争似乎发生于很早以前。如同博德里亚所注意到的那样，使我们能想起这场战争的唯一东西，就是报刊上偶尔再次出现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故事、庆祝美国胜利的过时的录像带和诸如本书那样的学术研究。

海湾战争是一个不同于其他事件的媒介事件。全球的媒介均传递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和对这场战争的调查。诸如凯尔纳(1992)所提供的那些批判研究指出，关于这场战争的媒介报道具有一种民主赤字，因为这些报道明显地受到政治精英们的控制。然而，莫里森(1992)描述了一次战争的情景，这一情景似乎远离于支持这场战争的人们的生活。他们在文化和物质上均感到自己与这场战争的影响及长远的目标相分离。最后，麦克卢汉、菲奥里(1968)和博德里亚(1991)强调了文化媒介的统一和模拟的效应。在这场战争真正开始之前，这场战争已在全球的想像中降下了帷幕。这一观点是在本书中提出的主要思想。这些研究有助于拼凑一种文化拼板(cultural jigsaw)，提供多维的视点。虽然在这两种范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难题。后现代主义者对无可比拟的差异的强调，把握



住了这些研究方法的多样性。除此之外,而且在某些方面,现代主义者强调了媒介实践互为联系的总体把握,这也是妥帖的。基于这些想法,我认为尽管各种理论范式抓住了媒介表现的各个不同方面,可这些不同的方面均有助于必要地构建一种更为广阔的图景。尽管这种途径永远无法完整,可这将激发进一步的探索,添上点睛之笔。然而,进行这种课题的研究,很有可能是不要指望获得最后的成功。在接下去的两节里,我将增添一些更多的这些方面的研究。

## 人类需要与大众传播

在社会科学里,关于人类需要的思想具有悠久和复杂的历史。需要(needs)一般被认为有别于欲望(wants),因而具有一种批判的潜能。我或许想要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花在收看音乐电视上,但这可能并不是我所需要的。需要这类观念,可以以一种反动的抑或进步的民主方式来界定。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认定,那些从“自然”生物性别角度受到审视的妇女,常常在意识形态上被定位为具有成为母亲或与家庭保持密切的关系的某些需要。像雷蒙德·威廉斯(1965,1979a)一样,更多的需要批判理论家已提出,人类既具有物质的需要,又具有象征的需要,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充分满足这些需要。依照威廉斯的看法,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物质性和文化形态的历史发展,均表明了各种需要的阐释。这样一种概念避开了明显表现于将需要形态自然化和忽视需要表达历史特殊性的陷阱。所以,需要既与人类的物质基础有联系,又与他们文化发展的层次相关。这样,人们可

以将社会的和生物的看作是彼此联系的两个方面，永远处于相互的协调之中(索珀,1979)。于是,对粮食的需要既是生物的又是文化的。饥饿的剧痛也许具有跨文化的深度相似性,但解决饥饿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

尽管威廉斯有自己的主张,可当下人们对这类论点持极端的怀疑态度。随着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的到来,现在人们声称,关于人类需要的观念是毫无作用的范畴,因为这些范畴建基于关于主体的一种不适当的理论。人们认为,关于具有普遍性的人类需要的观念,忽视了文化的特殊性,作为文化帝国论思想的一种形式起作用,这种思想认定我们都具有同一性。根据激进<sup>196</sup>的多元论者的看法,唯有承认差异和异质性,才能推进一种更加进步的政治。诸如威廉斯所作的对人类需要的早期思考,是站在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角度进行的,然后将这种审视角度强加于我们中的其他人。这类策略与权力集团的霸权运作方式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关于人类需要的普遍理论使人无法进行多种多样的表达一样,权力集团竭力将某些文化的普遍性强加于公民。在文明社会里本可以蓬勃发展的各种语言游戏、同一性和阐释,由于主导性霸权的强制作用而受到制约。因而,应该激进地认可差异,以消解具有压迫性的同一性的强制作用。然而,这类观点尽管显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效度,可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抑或独霸一方,那么就会泯灭一种关于人类需要的批判理论。<sup>②</sup>在此,如同我早期对博德里亚的议论所表明的那样,我的意图就是想倒置这种投射。

关于需要的研究一定是反动的,对此,我看不出任何具有必然性的理由。认为人类具有需要,但时下却得不到满足,这一看

法具有潜在的解放意蕴。的确，我会同意多亚尔和高夫（1991）这样的一种观点：除非我们能够提出有些社会组织能比其他的组织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就只能将社会进步的各种观念都收藏起来。他们认为，激进的多元论者一会儿拒绝承认普遍性需要，一会儿却又将这些需要作为先决条件。如果社会各群体果真像上面所声称的那样在文化上具有多样性，那么我们怎么能系统地阐述批评意见？关于差异的各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可能会使我们对某些种族主义的假设作出重新肯定，这些假设认为，黑人种族和白人种族截然相异，他们因此需要隔离开来。我们相信，种族主义是错误的，其理由是因为我们需要有类似于享受平等尊重的某些普遍性观念。的确，替人类需要观念辩护的论点在开始时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某种物质的需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在肉体上经受快乐、痛苦、身体自主、苦难和死亡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都同样具有某种需要。因而，人类的交流、理解和阐释的诸种形式，既是物质的又是象征的。然而，有些需要与其被界定为物质性的，倒不如被恰当地界定为具有象征性。

尽管大多数人会认为，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具有必须得到满足的物质需要，可难道我们可以说象征的需要也是如此吗？从目前情况看，关于需要的理论对大众传播具有哪些意蕴？这至今尚未清楚。从目前所提供的一切情况看，传播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人类在文化上已表达了本体的需要。但是，尽管我们的物质属性对我们的文化需要具有意蕴，可提出文化的需要可以溯源于普通的生物结构，这一提法会显得具有过分的实在论性质。力图或实际去做这样的事，都会将我们所认为是人类

生存基本条件的文化多元性表达同质化。具有鲜明差异的文化  
197 群体，对采取无限多的多种方式来表达各种各样的人类情感和联想是很有益处的，这应该受到需要理论的鼓励，而不应该受到它的压制。某些没有压制性质的人类多元性，肯定会有助于我们人性的培养。我们对电影和戏剧中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文学、风俗、传统的体验和通过记录片的制作和摄影来传达的各种真实生活的同一性，均提升了我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凡是结合这些研究的关于人类需要的理论，本身就需要多元性。唯有出现最贫困的时候，人类需要才可以被认为是生物的效应，各人类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历史经验、政治制度和艺术群体，而所有这些均是社会独到的想像的产物。这样一种思想观点，会认可全球文化的多种价值和异质性。但是，关于文化差异的这种观念，与人类需要理论的更具规范的思想是彼此相容的。多元论和普遍主义实际上是可以和谐相处的，这一思想将会引导下面的讨论。

虽然人们承认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但如果发展到某种程度，我们还可不可以假定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需要？假若这的确是可以的话，如同我相信是可以的那样，这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理论与大众传播理论可能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尤其是，即便与商品化、非规范化和国家强加的具有压制性的审查形式有关系的公共领域具有测不准的未来，这种思想也是重要的。媒介技术的内爆、资本在全球的渗透、民族国家的衰败、人口的流动和普遍权利的观念，所有这些均已对汇聚多种多样的文化流产生了影响。我们现在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均是同一地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球化的诸种过程，已普遍地赋予这一星球

的所有成员以四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需要，这四种文化需要可以与本书的讨论联系起来。然而，这些需要在全球不同的文化里得到了不同的阐发；如果它们的阐发是一致的话，那或许是因为掌权者的曲解所致。对这些需要的正式表达，也将必须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角度加以更加具体的表述。尽管对这些需要的应用将是本章下一节的主题，可它们不可能得到有深度的探索。我在此意识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必须在一些空间上不同的场合和语境里得以实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概念必须应用于区域的、全国性的和更具跨国性的层面。我也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危险：从一个有偏向的批评家角度来提高我自己的声音，将其变成为社会变化立法的专家的角色。尽管我在不同的地方与哈贝马斯(1993)划定了特定的界线，可我意识到，对民主讨论的信念是与制定一成不变的蓝图这一行为不相容的。毋庸置疑，这不是眼下讨论的宗旨。然而，这种关于需要的思考无疑会指明这样一些情况：许许多多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被用来促进或制约传播系统的发展。假若一种文化要想获益于人类经验的全过程，那么就需表明，需要应该得到满足，这似乎是不矛盾的。 198

与文化和传播有关系的人类需要，至少有四种类型：(1)对关于专家文化如何发挥作用的知识的需要；(2)对各种欲望、要求和在时空上遥远的他人的需要阐释 (need interpretation) 的理解需要；(3)将我们自己理解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需要；(4)对审美而非工具性界定的文化经验的需要。

1. 现代性已目睹了愈来愈专业化的某些专业知识。大多公民不理解复杂的全球经济的运作，对全球变暖的科学论证感到迷惑，不清楚该采取何种正确的措施，预防自己感染上爱滋病

毒。文化内爆的诸种实践以及对这些实践的日常性重新语境化,已由原来的专业知识变成了平民百姓的文化世界,这在同时又带来了人们对这些实践的普遍关注。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均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话题。如果公民对经济政策、生态和性行为诸问题作出明智的选择,那么他们就需要了解高质量的知识 and 严肃的论辩所采用的一系列论点。在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分工高度明确的社会里,像传播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是大众传播媒介的责任。现代公民需要知道关于市场经济的效益、环境方面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和关于爱滋病毒传播的当今信息。某些批判视点已提出,由于金钱和权力的作用,大众媒介关于这些问题没有给我们提供良好的服务。那些提出文化内爆视野的人,对这些事情过于想当然。信息市场、某些右派视点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性和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其他观点的边缘化等方面的彼此分离,均是这一问题存在的例证。与这些需要有关的公民要求,是想建立传播的公共体系,这一体系应在非商品化领域和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外尽可能地发挥作用。我们已看到,文化交换的一个自由体系,会容纳多种多样的视点,尊重某些义务,关注他人,并作出理性的回应。这种交流性的交换圈子,会试图将具有广泛重要性的各种问题带入公共领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这样一个空间:非理性的偏见受到挑战,一种通达和真正民主的论辩得以发生。诚然,提供一种交流性的空间,并不能确保某些结果或公民们一定就能充分地参与。但是,这对认可人类对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风险、危险和不安全性的知识的某些基本需要,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

2. 第二个和第三个主题涉及对共同体的需要,在文化和心

理离散的情况下，这尤其明显。如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者长期以来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类需要在现代条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紧迫性。在此讨论的这两种需要会无可避免地发生重复。第一种需要认为，在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对他人具有某些义务。除非我们注意到他人的视点（尽管他们居住的地方也许离我们较远），否则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长远利益。如果我们对衍生难民危机、人口流动和散居国外的文化置换等社会和经济因素茫然无知，那么我们便不可能了解我们自己的义务之所在。难道我们有关关注这类现象直接后果的义务吗？或者难道我们应该去帮助探究这些潜在性的原因吗？这些变化与我们自己国家的政策之间有何关系？资本的日益非规范形式和流动形式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这种形势？唯有关注存在于我们直接语境之外的争议、思想和视点，我们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个已经过改革的公共空间会给他人提供作出自己表征的机会，会帮助他们简化义务，在我们的媒介上反映他们所有文化的复杂性。对生态的关注也在这方面说明了问题。面对臭氧的减少、全球的变暖、有毒垃圾的倾倒以及核武器的长期效应等全球性风险，区域性的决策理应与全球性的系统看法衔接。再者，这种决策的后果可能不会马上影响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但对身处远方的他人或我们自己共同体的子孙后代也许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媒介由于其在空间上传播信息的能力，会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我们，而且应该做这样的事。其次，最有能力履行这一任务的，非公共系统莫属。与维系现状的强有力的经济和行政结构的利益相比，这类系统会优先考虑公民的传播需要。因而，不论我们自己的内团体的忠

诚可能会是何种样子，我们均具有关注他人视域的需要。这些需要最终溯源于利益的观念和人类与他人保持移情关系的道德能力。

3. 我们也有这样一系列的相关需要：有能力在符号上界定我们自己的共同体和生活方式的界限。这类界定与我们同他人的相异点和相同点以及我们能够享受的文化物质相关。共同体的自我界定直到最近才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首要责任。然而，  
200 国家的立法力量和共同体的各种思想已继续不断地分离。民族国家最近不得不对以下情况作出回应：各种各样的很可能生活在自己边界内的少数民族的日益增多，更有自信的地方同一性的崛起，具有排他性的爱国同一性的衰落，以及相距更为遥远的各种共同体的存在（奈恩，1988；塞缪尔，1989）。但是，在短期之内，国家仍然是一个面对更加全球性和区域性文化时维系同一性的重要之地。依然重要的是，人类具有与他人一样建立同一性的需要。同一性是一种集体现象，从未是个体现象。人类的使“我们”得到认同的需要，对大众传播媒介来说也构成了某些制约因素。人类有指望自己的文化共同体不受主导性文化抑或母体文化的压制、忽视和扭曲的权利。同样，主体文化或母体文化对居住在自己圈子里的人规定了某些义务，只要少数民族的权利得到保障。这些义务就是要理解这个国家抑或他们居住的全球某一地区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霸权形态（帕雷克，1991）。传递我们得以自我认同的符号物质，需要建基于反思性、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和文化疑问。我们应该坦诚地接受诸如以下的几个问题：王室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的一个恰当象征？怎样才能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同一性？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



这一联合王国应该继续存在还是应该地方自治？我们是大不列颠人还是英格兰人？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什么？这些批判的质疑形式应该得到宏扬，使它们高于这样一种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弘愿：维护不朽的神化、典礼和仪式的形式的韵味。只要对抗性和分裂永远是文化的特征，那么这样一种思想就有可能存在：各种文化共同体将最终没有能力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然而，在我们能以合适的方式与不同的人相遇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身在何处，而且我们是何许人，而后现代的思想却低估了这一问题的。这指明了对同一性的对话式理解，而这种同一性尚未在当代的信息暴风雪下面消失或完全被湮没。

4. 人类的这个最后的需要也许是最难以维持的，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它与传播和公民身分之间的界面最没有联系。这不是想低估其千真万确的重要性，而无非是要承认它在本书宗旨中的更具边缘性的地位。根据沃尔特·本雅明（1973）的看法，晚期资本主义已使审美文化家喻户晓，可在同时又毁损了审美文化的韵味。本雅明以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将这些过程看作既展现了更加民主的文化的前景，又是资本主义对审美进行文化殖民化的产物。不论这种讨论在当代有多少功过，人类都具有文化高度参与的某些需要，这些需要是审美的而不是工具性的。加达默尔清楚地表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201

美就是那些价值不言自明的事物。你不能问这些事物有何用途。它们是因为自己而有价值，不同于那些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的事物……

因而，关于美的观念非常接近于善（agathon），只要它是被选为为自己的目的而存在的某种事物，恰如一种目的，使

其他的一切事物都成为从属于它的手段。因为，美的事物不能被看作某种其他事物的手段。（加达默尔，1975：477-478）

今天，这类论点的难题是，审美的公正在面对布迪厄时是难以维系的。布迪厄（1984）的诸项研究揭示了这样的情况：审美的判断是与文化的独特性和狂热的象征性形式联系在一起。他宣称，社会各群体调动自己的审美意向，既为了使自己有别于他人，又为了使自己的特征具有优越性。<sup>③</sup>如果说加达默尔将审美想像为文化上的天真，那么布迪厄是将审美还原为发生于文化领域的诸种斗争的效应和习惯的构建特性。我倒想提出，审美范围相对自主于社会实践的其他领域。一切已知的文化均致力于各种象征性的活动，这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那些为自己的工具性作用所需要的活动。如同桑塔格（1994）已指出的，我们对艺术品文化形式的体验，增添了其阐释性的内容。同样，约翰·伯杰（1988：7）更明确地将审美体验与艺术品分离开来，他曾经写道，不论其内容怎样，“美始终是一种例外，总是任其自然。这就是它感动我们的原因。”所以，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区分开来，尽管伟大的艺术品传达了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尽管有不同的方式表征特性，可人类的审美体验是相似的。这不是要将这类例证看作或是乌托邦式或是具有超验性。审美始终是特殊表征和写作、绘画、表演、舞蹈以及作曲的具体方法的产物。我认为，这是审美、物质和象征性事物之间既有联系而又最后分离的相关作用，正是这些相关作用才使雷蒙德·威廉斯得到了许多启发。

我根本就不想否定你们称之为审美的体验。不掺入任何别

的思考，准确无误地关注别人雕刻一块石头或发出一个音乐音符的方式，此乃人类的主要享受。想否定这件事，就意味着要取消太多的人类文化，这将会是滑稽可笑的事。但是，我认为，对释放出这种回应和作出这种关注的各种情形、场合以及信号，我们需要做一种更加具体的分析。（威廉斯，1979a:348）

这表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这承认了人类具有审美意向，但人类不太可能就审美情趣达成普遍性的一致。假若我们承认存在着一种审美范围，那么这是不是对与大众传播媒介有联系的公民的权利义务要求富有意蕴？我相信，这是有意义的。这些思想可能对这样的论点富有影响：媒介应该具有艺术生产的多元性，这种生产不仅在讯息方面成熟老到，而且在艺术样式方面要敢于冒险。犹如哈贝马斯（1989）和威廉斯（1962）所提出的那样，在艺术方面的形式复杂性与政治的交流性，以及（我或许可以增加的）真正的通俗性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矛盾。丹尼斯·波特（1994）的著作均是谈论这些事情的，他在接受最后一次采访中承认，要不是公用广播系统的支持，他的著作永远不可能如此走红。这是因为在更加商业性的体系里，为快速地吸引大批的受众，使广告商获益，祈使语是需要使用的。难以避免的是，这降低了广播网络富有难度抑或新鲜而具有挑战性工作的能力。其诱惑是通过迎合更具主流的审美情趣和既得利益的群体来求得稳定。向大众娱乐提出挑战的文化传播形式，应该有机会接触媒介。然而，这些权利必须在更广泛的种种责任和义务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承认，言论自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可以通过某些隐私权来进行一些限制，并对公然的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

认识媒介文化

资料,制定制约的措施。这些权利和义务意味着,大众传播在保持审美上的成熟的同时,仍然保留了给受众的期望带来惊奇、震撼和挑战的能力。

以上概述的四种人类需要在现代语境中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在现代语境中传统的观念正在失去其约束力(贝克,1992)。比以往更紧迫的是,人类需要新鲜的视点和体系,以便把握迅速变化的人类社会。在一个传统正变为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的世界里,一种由大众传播媒介促成的反思性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如果我们要迎接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和将来一代代人的挑战,那么这些需要有赖于从公民权利义务要求的角度加以认真的考虑。

## 大众传播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文化、后民族性和欧洲

在这最后一节里,我拟聚焦于大众传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与同一性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关系,以便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要求的角度具体地考虑社会需要的应用。本书以这种方式来结尾是合适的,因为我已强调了公共领域和民主社会同一性形态的重要性。既然电视在本书已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主要探讨这一文化媒介。

- 203 当代结构的变化,已促进了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种联系。要研究这些形态,势必涉及对世界区域性和多极性诸过程的考察。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公用事业广播的诸种观念,已暴露出危机的迹象。这可能与以下几种情况有关:由于

自由化的经济环境,公共开支必须削减;生产成本的增加;为私人投资者开辟新文化市场的新技术的出现(马特拉特等,1984)。使公用事业广播工作非规范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影像市场的国际化。类似于赫伯特·席勒(1986)的一些作者,已将文化生产的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在西欧,1983年期间有30%的电视广播时间充斥着从国外进口的节目,在这些节目中,有44%来自美国(汤普森,1990:202)。与文化帝国论有关的各种论点依然重要,但可能言过其实。其他的一些作者提出,尽管主要是因为其自己的国内市场,美国已在传统上主宰了电影的生产,可这种势头由于电视和广播的公用精神而变得越来越小(柯林斯,1990)。再者,美国化的观念模糊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其他的全球信息流通。根据马特拉特等(1984)的看法,类似于日本那样的新的传播者已经崛起,日本在1975年实际上根本没有电视节目出口,可到1980年他们有4585个动画片节目小时出口到意大利、香港、韩国和台湾。

新的后国家时代,已目睹了各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市场无序消长的能力的变化、跨国的政治变化和文化的国际化。在这一方面,欧洲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先驱性的经验:区域性的政治组织形式有可能会在今后得到发展(罗奇,1992)。建立一种跨国层次的政府,对未来的公民权利义务、同一性和传播的规范化富有意义。然而,在目前,欧洲共同体正处于过渡时期,预言它与各个国家的和地区的政治结构的长期关系以及它将来各成员组织的大小,现在还为时过早。然而,可能的情况是,它对大众传播的未来发展轨迹、公共领域的安排措施和对话式同一性的发展,将具有深刻的意义。

在现代的西方民主社会里，电视广播与公众已建立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一方面，各电视机构对受众作了研究，试图发掘受众的收视趣味及喜好。另一方面，电视组织的公众手段和个体手段，通过戏剧和娱乐形式以及为民主的作用所必需的政治信息，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全球的、全国的和区域的同一性的感觉。从全国角度得到特殊界定的公用事业的观念，正被更面向全球的商业网络所瓦解。跨国媒介的日益重要性，已经将受众从某些社会地强加的国家共同体观念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加速了非政治化的各种过程。在英国，全国性的公用事业广播始终与民主观念、英国特性和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里思对公用事业广播的最初概念建基于大众享受的普遍性和平等的原则，以及建基于这样一种愿望：在将民众团结于一个全国性想像的共同体里的同时，教育这些民众。商业广播的最初冲击，是削弱了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国家所持的谨慎小心和恭敬虔诚的态度，但最终的结果似乎是提升了文化的商业形式，而未促进政治的同一性。当下的各种迹象表明，一种相对稳定的从全国角度阐发的同一性，至少在有些方面已经被一种更流动、更离散和更变化不定的结构所取代。乔治·奥威尔(198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道，英国人是一个家族，但选错了掌管人。英国人似乎是被没有能力掌握其他语言、缺乏艺术能力、温啤酒和对极权主义的仇恨等因素凝聚在一起的。今天如果有人想要严肃地宣称，这个国家有一种共同的文化，那是不可能的。来自其他各洲的移民以及全球文化的崛起，均已打破了奥威尔关于全国团结的描述的美景，虽然这依然是更广泛的怀旧情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提供了希望的依据，因为文化的商业化已削弱了传统公

用结构完整的家长式统治的基础,并为更民主和更多元的文化同一性的兴起开辟了空间。但是,这也引起了悲观主义,因为由市场驱动的多频道(multi-channel)世界,很有可能是建立在生产低成本以及新闻和娱乐的联合性统治基础之上。

公用事业最新近的回应,就是要有潜力地开发更有区域性的节目(麦克奈尔,1994)。这一措施可被看作是面对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试图维系观众的忠诚。节目制作的非中心化和摆脱国家中心的节目内容,既有多元论者的虚妄,又有民主的虚张声势。假如区域性广播仅对全球化诸过程作出反应,并单单为眼界狭小的地方性提供发展平台,那么这也存在着深刻的危机。需要让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意识到,金钱和权力的全球机制,始终在重塑着相近的区域:相距遥远的各种社会关系改变了地方体系,在重新阐述公共领域的观念时应优先考虑将这些情况公之于众。另一种主要的发展是与大的商业企业结成一系列的合作伙伴关系,如鲁帕特·默多克\*的BSkyB电视与英国广播公司的合并。这些合作已暂时促进了全国性网络的安全,同时又使以往以公共为特征的各种事件私有化(哈格里夫斯,1993)。最后,各种新技术的发展已扰乱了公用事业的供给领域,而且这种情况在将来可能会继续存在。一个全党派议会选举委员会最近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探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鼓励电话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发展各种宽带网络来开发数字技术。凭借对电视购物、家庭购物、政府信息渠道和医疗咨询的提供,这或许会产生商业和公共的意义(班尼斯特,1994)。然而,时下

\* 鲁帕特·默多克(1931— ),澳大利亚报阀,在英、美购置大量日报,伦敦泰晤士报于1982年起归他所有。——译注

关于电视媒介未来的全国性论辩,似乎陷于这样一种困境:既带着怀旧的渴望,希望全国公用事业广播的黄金时代的回归,又想采用由市场驱动的多元文化的方法。恰似福利国家/全民就业的轴心已经崩溃,新的传播范式(卫星、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很有可能使那些有专职和稳定工作的人受益。这种情形极有可能使那享受特权的三分之二的人退出公用事业广播提供的普遍性便利。这可能使国家的公共广播陷于资源短缺的局面,同时又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各种地方争端上。再说,新的商业文化有着更明确目标的讯息,在文化上极有可能会彻底窒息关于地方和国家的观念。公用事业广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让国家参与与国家本身的对话。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和卫星可能会提供更专用的频道,这不仅无法提供“严肃节目”的多元性,而且可能会进一步使受众原子化。

在欧共体这一层面上,“电视无国界”的政策已经被采用,同时对色情、暴力和种族主义作了最低限度的规定(休恩和特罗茨席勒,1992)。这使各民族国家有能力遏制冒犯性资料的传播。迄今宣布的最具干涉意味的政策,是关于对广告的社会管理。由于迄今为止,对跨媒介(cross-media)的多种所有制的集中进行规范尚未达成一致的努力,如果要使公用事业广播恢复元气,那么欧洲范围是至关重要的。假如我们考虑一下类似于默多克和贝卢索尼的媒介巨头,他们的影响超过了民族国家的调节作用,那么这就显得尤其明显。默多克的出版物在意识形态上的力量,已吓退了各国家政府不敢提出大众媒介方面的垄断性所有制问题(埃文斯,1994)。贝卢索尼拥有意大利12个广播频道中的三个频道,他最近将文化的和经济的力量转化为政治力



量。他现在有能力在自己电视播音室的舒适环境里解释自己的政策,同时又能控制国家网络(科尔斯,1994)。民族国家太小,没有能力制约竭力控制公共论辩的跨国文化集团的操纵。然而,《电视无国界》这一文件的第四条表达了这样一种政治抱负:保护欧洲的同一性,使其免遭美国化(施莱辛格,1994)。这种政治抱负在将来可能会导致在立法上更加关心全国性公用事业广播的命运。尽管在应用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可许多西欧国家所共享的是同一种传统。公用事业广播在历史上提供了“严肃的”公共讨论形式,这些形式相对自主于商业的和中央集权的议事日程和压力之外。关于严肃的观念在此应该被看作一种受制于语境的准则,这种准则提供准确的信息,并且向力求从受众那里寻求反思性回应的各种文化视点提出挑战(布吕姆勒,1992)。那些在欧洲层面上具有这种关注的人,需要更多地根据公民的权利义务标准阐述各种政策目标。这或许是防止美国化的最佳防御措施,而且会给这种论辩提供一种更具规范性的焦点。

我们也已目睹了跨越整个欧洲的一种服务于各精英集团的跨国报刊的发展,包括《欧洲报》、《金融时报》以及《国际先驱论坛报》等等。再者,全国性的严肃报刊已提供了欧洲版,同时还有来自指定的欧洲姐妹报纸的报道(施莱辛格,1994)。这些发展从媒介文化角度来看,反映了一种正在突现的欧洲同一性。然而,尽管发生了全球化和欧洲化,有些报道称国家即将消亡,可国家依然相当重要。欧洲人所消费的大多数媒介文化都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传播、汇聚和构建。至少在英国,公用事业广播是属于民族文化的。在1991至1992年之间,受众对公用事业电视

的转播的收视率超过了 52% (内格里恩, 1994), 在 1992 年 8 月, 全国性报刊的总发行量超过了 14000000 (麦克奈尔, 1994)。尽管存在着我已指出的各种变化, 可这些文化过程在焦点、所有制、控制和毫无疑问的读者层面方面显然具有全国性。这一看法, 应该对后现代主义者以及那些声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人的一些更普遍的观点, 起到了矫正的作用。国家的观念是当下同一性冲突、公民的权利义务要求和实施交流性论辩与讨论的一个主要焦点。

我们还是离不开对欧洲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此最紧迫的问题是, 从文化的和政治的角度非常难以界定欧洲。面对离散、美国文化的主导和民族传统的弘扬等问题, 欧共体本身最近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文化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本质性特征, 可能仍然是可质疑的 (马昆德, 1994)。欧洲各民族最近已目睹了种族暴力的蔓延、苏联的解体、德国的统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式微、自由民主制度的扩张、国家社会民主制度的摇摇欲坠和欧共体更紧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整合。欧洲是一个骚动之洲。拉尔夫·达伦多夫 (1990: 13) 在共产主义处于危险之时马上就提出, 1989 年令人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各民族差异的重新发现和重新突现。老的苏联帝国似乎已将通俗的民族传统归附于它自己的意识形态需要。然而, 大多数文化评述人现在带着更为矛盾的心情审视它们的解脱。诚然, 目前面对欧洲的最重要的文化争端, 就是当下种族的紧张关系和久违的暴力事件的到处发生。时下的悖论似乎是, 给大众消费主义、美国化和欧共体更紧密联系带来统一性效应的这一时期, 也正是种族暴力和种族仇恨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大众传播政策

所能解决的，虽然这在欧洲语境里为重新思考其重要性的任何企图提供了背景。对市民社会的结构重新进行调整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不要通过统一与和谐的官方影像的展现来漠视这些冲突。另一条途径同样具有灾难性，这可能会是通过维护某些权利而不配之以相应的义务来对欧洲的交流空间进行更民主的构建。这可能很快便会变成民族主义组织的权利，以便扶植种族主义的传统思想模式。再者，这样一种论点必须受到怀疑：如目前情况所存在的那样，国家公用事业广播能为一种更具整合性的文化提供一种模式。首先，这种传统与其说源于欧洲，不如说源于特定的西方。这并不意味着，在东欧没有以为公用事业广播的模式创造一种更具交流的公共空间为宗旨的各种社会斗争的迹象（博伊尔，1994）。然而，这些个体性斗争的命运，很有可能取决于经济压力，而不是各种具有规范性的论点。这样一种情况很有可能依然存在：前东欧集团国家，仍然处于欧共体的体系与结构之外。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仍然是学术上的问题，除非有人能说服欧洲的各种结构为了交流性公共领域的发展而介入此事。第二，文化离散意味着，受众有可能有机会接触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民主化的电视网络不会自动地确保特殊的文化效应。一种对公众负责的欧洲广播系统，可以有利于推动开放而理性的讨论，但它不可能保证任何人都对此加以注意。的确，即便人人都注意了，具有阐释性的后现代研究方法表明，人们所构建的意义有可能是多元而不稳定的。

我想审视一下建立一种欧洲性的公共领域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同一性政治的各种意蕴。这是与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发展和欧共体的最终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可以证明欧洲公共领

认识媒介文化

域的规范性公正。然而，即便激烈的同一性冲突会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也不可能预见这样一种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欧洲的公共领域，应该从公民的权利义务要求而不是明显的文化标准来加以维护。重要的是文化权利和文化义务，而不是美国化的威胁。可是，关于公民的权利义务和文化的各种争端，即便  
208 分析层面不一，可依然彼此联系。对文化统一性与民主的大众传播之间关系的重视，应该能预防我们作出过于乐观的结论。

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概念，通常是与英国社会学家 T. H. 马歇尔的著述联系在一起的。马歇尔(1992)将公民的权利义务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主要发展于 18 世纪的公民权(财产权，公正审判权)。19 世纪经历了政治权利的发展，这种权利是在民主政治坚持的选举和结社自由中以选举权的形式出现的。最后，在 20 世纪，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以防止贫困、失业和疾病为形式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自然隐含着某些义务，其用意是确定某种成员地位。在最近几年里，尽管这种思想传统富有影响力，可由于若干原因已变得众说纷纭。这些原因包括马歇尔的进化论着眼点、公民的权利义务要求已被孤立于斗争语境之外的被动方式、他对不平等的漠视而不是对阶级的漠视、社会权利的限制焦点以及他对民族国家的专注(罗奇，1992；特纳，1993b)。除这些多种多样的批判思想之外，我倒想再加上一条，即马歇尔对文化的公民权利义务未作探讨。除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之外，我们需要加上文化的权利和义务(默多克，1992)。因而，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概念应该被看作一个具有四个层面的模式，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层面。只要适用，这些权利和义务应该建立在某些普遍性的需要基础之上。我的

研究方法有别于其他强调了文化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作者。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实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心之处就是大众传播体系。<sup>④</sup>在这一方面，特纳(1994)和韦克斯勒(1990)对文化上的公民权利义务提供了引人入胜的讨论，但是他们完全忽视了大众媒介的作用。

大众媒介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从沃尔泽(1983)所称的正义的一个特殊领域角度予以实施。在此的中心观念，就是关于复杂的平等的思想。就平等的简单形式而言，唯有在我们两个人均享有同样的资源时，我们才可以被认为是平等的。假如我们以简单形式的平等为参照，那么只有在我们两个人都拥有同样数量的电视机、收音机、录像机，而且能够享受同样数量的服务时，我们才是平等的。但是，在一个对美好事物众说不一的社会里，我们不可能两个人都想享用最先进的电视技术。假如我想要一台质量不太高的录像机，而不想要你那一台质量上乘的型号，那么这并不一定使我们不平等。既然所有的事都是平等的，我可以下决心通过政治活动而不是成为美国B级片\*的影迷去发展我的自我意识。只有在你能够享受高质量的信息而我却不能享受时，拥有复杂的技术形式才会成为一件让人反对的事。这是因为关于享受的各种问题应该与公民的权利义务标准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物质财富相联系。根据沃尔泽的看法，如果“任何处于某一领域而享受某种社会福利的公民，都不会因为 209 处于其他的某一社会领域享受其他的某种社会福利而遭贬损”，那么复杂的平等就得到满足(沃尔泽，1983:19)。

\* 指成本低廉、粗制滥造的平庸影片。——译注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大众传播的体系应该提供广泛的娱乐和政治信息。这需要有多元的文化形式来满足公民的各种各样需要和欲望。这些信息形式和符号形式，可以通过商业或更具公共性质的供给方式来加以满足。唯有某些社会群体比其他的公民能购买到满足这些需要的更好形式的电子信息、小说或戏剧，这种关系在复杂的平等条件下才会变得令人不快。尽管沃尔泽具有与许多关于社会科学的作者一样的典型特点，认为媒介不值得讨论，可他的论点在这种语境里无疑是有价值的。复杂的平等观念会坚持认为，公民的交往活动不应该受到金钱和权力的阻碍。这就是说，传播媒介应该能满足公众多元的期望。假如传播媒介难以满足这些期待，那么这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领域支配了另一个领域。按沃尔泽的话来说，如果经济领域逐渐支配了文化的需要，这将会是暴虐专横的。那么可争议的是，交往资源的分配应该取决于需要这一基础——适当地尊重生活的其他形式。这些观念意味着某些交往义务在一个得到根本性修正的公共空间才能实现。这种公共空间也不能建基于给受众强加某些标准化传播的一种简单的平等形式。欧洲的公共空间必须建基于彼此连结的区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各种领域。这些领域包含着能满足各种需要而不是满足制度强制性命令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娱乐。

哈贝马斯(1993,1994)最近提出，面对导向性媒介的全球化和主观性的离散，公民的权利义务要求应该得到修正。民族国家原已打下了文化同质性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基础。然而，既然同一性在时下已经多元化，在满足基本的公民的权利义务要求时民族国家已遇到了种种限制，那么这一模式现在已不合时

宜。首先，民主意志形态应该被认为从分析角度与同一性要求相分离。民主决策是程序性的，不应该事先设想一种人人所共有的同一性。公民的权利义务是关于成员的身分和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关于种族的同一性。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多种语言的政府层面，其作用跨越各种各样的种族和文化的分水岭。民主制度将在这一层面上形成，这种需要会得到超越民族层面的经济和国家制度的保障。超越民族国家也使一种更具跨国性的公共领域成为必要，因为这样的公共领域一定会给批判的论辩提供素材。

在此提供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可以从分析角度将自我同一性的各种问题与规范性公正的诸种问题相分离。其明显的意图 210 是对鼓吹公有社会的批评家作出答复，因为这些批评家已经提出，哈贝马斯的理论处方明显地处于最低限度。他们提出，如果离开各种传统、共同体和亲情关系，那么怎么会有可能理解某些对种族的执著？哈贝马斯试图将同一性问题与公正性问题分离开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些指责作出了回应。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想过美好日子的人会提出，什么事情才适合于我或我们？国家的象征是王室还是一种更具多种文化的标志？我将自己看作是印度裔英国人还是英联邦人？只有从一个个体或一个共同体，抑或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形态的角度，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如同哈贝马斯所做的那样，假若承认我们生活于一个对善具有多元看法的世界，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关注不可能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标准的主题。因而，能够生成普遍性一致的事物，会受制于我们借此能决定正义诸问题的各种程序。

哈贝马斯关于正义的观念，要求我们超越自己具体同一性

形态的利己主义，以对话的方式考虑他人的需要和利益。指导社会行为的集体所坚持的各种准则，应该建立在普遍而理性的一致基础之上。这些思想应该被允许去“战胜”我们的小集体感情。哈贝马斯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善。譬如说，如果我家里的某一个成员犯了暴力罪，那么我应该坚持民主所信奉的某些普遍性准则，超越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情结。主张公有社会的人的那些论点，低估了现代性的文化复杂性和这样一种重要性：获致关于正义问题的某些程序准则（procedural norms）的全球一致意见。

要了解这种论点是怎样能够用于维护公共领域的修正，这是不难的。一种修正的公共领域会允许批判地表达广泛的同一性形态，同时，论辩通过理性的和好究根问底的新闻业，在空间上聚焦于公正和正义的各种要求。但是，如同我在前文已表明的那样，哈贝马斯极端的形式主义与复杂的同一性问题和应用问题相距太远。与爱德华·赛义德和雷蒙德·威廉斯相比，他几乎不重视我们的需要阐释（need interpretations）、具体的同一性和规范性的关注（normative concerns）之间的彼此联系的方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对种族的忠诚不是感情情结、各种联系和具体化经验的流露，尽管他对这一问题作了各种修正。同威廉斯（1978）一样，我们可以提出，尽管我们的物质存在并不能保证某些种族立场，可这可以被认为在这一方面具有隐含的意义。哈贝马斯的伦理观是从道义学角度阐发问题，这样，我们的物质脆弱性（material vulnerability）与某些规范性的关注之间似乎根本没有联系。再者，威廉斯和赛义德的生平和学术著作，典型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情况：个体的同一性形态能说明更多的公共立



场。他们两人均是混合型的知识分子，通过交迭性地关注他们自己的自我和坚信不移的种族信仰，始终致力于社会的各种活动。可是，他们两人中没有一个人拒绝承担修正自己先前所坚持的认同和各种思想的责任。如同赛义德(1994: 24)已经说过的，“一致性从来不会先于批评”。这些关注意味着，尽管自我同一性和规范性公正的诸种问题并不是像鼓吹公有社会的人所声称的那样受到限制，可它们也不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彼此截然不同。

因而，欧洲公共领域的民主化可以被认为具有规范性的正确，但在推进文化同一性方面依然具有模糊不清的结果。欧洲大陆存在着语言的多样性，这表明，要实现欧洲性的公共领域民主化这一计划还有经验上的局限。公用事业广播的时下传统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欧洲模式将会是何种样子？确信无疑的是，区域的和民族的网络在任何未来的民主媒介中有可能保持重要性。但是，即便语言问题得到协调，媒介的民主化有可能促进更民主的同一性吗？哈贝马斯将公共媒介规范的公正性与文化同一性相分离，这使得这些争议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再者，尽管我会同意一种更民主的媒介应该在欧洲这一层面上得到推动，可要预见其结果是困难的。我现在将从当下爆发于全欧洲的种族情绪角度详细说明这一问题。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1994)已撰写了一本关于当下在欧洲大陆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种族仇恨的启示性著作。他声言，大多数暴力行为是由于一种愚笨的谋财害命促发的。这种情况没有政治目标，只是为了暴力而暴力。这种新的部落文化使欧洲遭受痛苦的后现代恐怖行为，不顺从于批评或协商的

理性形式。在这种语境下,大众媒介依凭对公开展示的迷恋,已对存在于我们社会里的最原始野蛮的现象提供了篇幅。如同恩岑斯贝格尔所评述的:

一只手拿着灌满汽油的啤酒瓶,而另一只手举起来作希特勒式致敬状的每一个笨蛋,都想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出现,而且希望在晚间新闻中看到自己在前一天夜间所干的勾当:焚烧房屋、支解尸体、深夜静坐或组织危机委员会。电视就是这样工作的:作为一幅单一而巨大的涂鸦,是对我向畏缩的(*autistically-shrunk*)自我\*的一种人工取代。(恩岑斯贝格尔,1994:54-55)

恩岑斯贝格尔的分析与哈贝马斯的冷静理性主义(*cool rationalism*)相去甚远,而且远得不能再远。哈贝马斯对欧洲公共领域的潜心研究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自然就是隐匿于恩岑斯贝格尔思想中的对仇恨的极端投射的一剂解毒药。即便官方媒介强制地执行各种让人难以执行的义务,这也不可能抑制当下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恐惧和非理性主义的爆发。对公共领域的任何修正,均会不可避免地表达时下受到排斥的各种视点。这些视点会包括民族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政客和秘密  
212 纳粹分子的形形色色的观点。排斥这些组织,不仅会削弱所谓参与性网络的民主可信度,而且还会煽动他们自己自我隔绝的英雄感。另一种方法是,他们参与媒介论辩,会给否则会处于边缘地位的政治组织增添某种合法性。虽然这些团体助长极端形式的仇恨和原教旨主义,它们也不可能进行公开的说教和论

\* 此处原文为“*ego*”,是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专用名词,作为自我人格中的一个层面与整体的自我(*self*)有别。——译注

辩。以上是更民主的体系需要努力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可是，我倒同意，任何未来的媒介政策不需要规避暴力和充满仇视的社会交往，而是需要学会去应对这些社会交往。现在我们无法马上就了解的，是应对的方式。

按克里斯泰娃(1991)的话来说，也许唯有在我们能接受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时，暴力才会得到调停。她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思想，提出，我们往往投射内心里压制不住的愤怒的无意识情感。这些个体异化的情感通常投射到陌生人身上，抑或投射到那些我们感到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身上。这些“离奇的陌生”情感也可以在社会方面发生作用：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我们才有可能接受其他的同一性。根据威廉斯和赛义德的观点，我们承认形成自我的各种复杂因素，这意味着我们自己最亲密的关系和同一性形态无非是许多关系和形态中的少数几个。我们将自己认定为英国人、英联邦人或欧洲人，这既是我们已被社会所著写的方式的产品，又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承认我们自己复杂的特质，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我们所共享的东西和使我们区别于他人的东西。清楚的是，这种认可无论如何不能由传播的民主化媒介来实现。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批评的文化资源作为照示自己的许多不同的镜子，那么这种任务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更加民主的文化的实现，会永远处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十字路口。恰如我们对处于远方的他人可能所感受到的主体间性的义务，社会政策的各种声明不可能对它们作出最后的预见和控制。

认识媒介文化

## 结 语

在这最后一章里，我的意图并不是想对就大众传播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交换方面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媒介文化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令有这种抱负，也是不合适的。在承认本书所提出的三个主要范式的过程中，我已指出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开拓的几个方面。我对海湾战争的思考更证明了这点。这三个范式被表征为具有交迭性的关注，  
213 在某种程度上清楚地阐发了现代性里媒介文化所引发的各种分歧性问题。可是，即便在这里，有些视点似乎也没有被吸收进来。与后现代的和心理分析的作者们一样，我强调，媒介文化实际上是含糊不定和互相矛盾的，在最后的两节里，我阐发了关于人类需要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彼此联系的话语。这两种视点，尽管是对这三个范式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可也指明了将来可能会出现各种论辩。这些论辩会不会是更广泛的学术、政治和政策的论辩，人们拭目以待。但是，不论媒介文化的持续性混乱的未来将是何种样子，它们肯定会日益引起社会理论家的注意并开展相似类的研究。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把握地对此作出预见。本书力求探讨的，正是未来的这些论辩；这些论辩将尊重各媒介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又将各媒介文化与更广泛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显然，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与学术圈内外的活动均有关系。

## 引 言

① 如果有人对这一分析感到怀疑,我会让他们去读一读马克·C. 泰勒和埃萨·萨里宁著写的当下时髦专著《肖像学》(1994)。然后他们再读一读麦克卢汉的作品《理解媒介》(1994)。切记,麦克卢汉的这一文本写于1964年,读者应该问问自己现在增加了哪些内容、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②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丹尼斯·麦奎尔的杰出专著《大众传播理论:入门》(1992)。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

① 利维斯对威廉斯的思想的影响,充其量明显表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威廉斯和利维斯都是剑桥大学的助教。然而,威廉斯对利维斯的美学理论日益形成了一种充满敬意的怀疑主义,同时又保持了与这一传统的联系。尽管利维斯的理论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可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理论深受阿尔都塞、格拉姆希和沃洛希诺夫的影响。

② 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文中已经讨论了霸权问题。

③ 这一点仍然是对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左派中反人文主义(福柯和阿尔都塞)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批评。

④ 韦伯斯特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常常被表征为动物而失去人性。

⑤ 霍布斯鲍姆无疑过分强调了新民族主义的反应特性。关于一种更积极的解读,请参见尼尔·阿舍森的《为新民族主义辩护》(1991)。

⑥ 戴维·莫里森(1992)提出了一种类似的研究方法。

⑦ 霍尔对阿尔都塞的具体阐述始终持批判态度。参见斯图尔特·霍尔的《理论家中的撒切尔主义:花园里的蟾蜍》(1988b)。

215 ⑧ 使得拉克洛和穆菲提出意识形态话语不一定具有属性的,是因为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缺少理论上的适合性。

⑨ 尤其是,霍尔的著作借助《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版面,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赢得了广泛的左派受众。

## 第二章 哈贝马斯、大众文化与公共领域

① 约翰·菲斯克的著作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

② 四频道、国家和北爱尔兰皇家保安队之间就《急件》这一部电视系列片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已对这一点作了清楚的说明。了解这一冲突的概貌,可参见戴维·考克斯的《当场被抓》(1992)。

③ 这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变得越发清楚了然。

## 第三章 受众研究中的各种批判视点

① 这一点在第一章第48-56页(原书页码。——译注)得到了更广泛的讨论。

② 彼得·迪尤斯在与拉克洛的对话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根据迪尤斯的看法,拉克洛对主体的看法似乎是自我决定性的,而且是通过语言来构建。参见埃内斯托·拉克洛的《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思考》(1990: 209-210)。

③ 分别参见第一章和第二章。

④ 在此,菲斯克和雷蒙德·威廉斯掉入了同样一个陷阱。我们在第一章已看到,威廉斯假定,文学理论家解读通俗文本的方式与受众的一样,菲斯克对此予以指责。我在此认为,菲斯克是作了这样的假定:受众解读通俗文本的方式始终与热情的影迷相类似。

⑤ 譬如说,1986年在安哥拉、加纳、肯尼亚、马里、莫桑比克、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中,每1000个人只有10台电视机,或甚至更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8)。

## 第四章 马歇尔·麦克卢汉与文化媒介

① 这些学术上的联系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加以说明:威廉斯  
216 和麦克卢汉两人都深受文学批评家F.R. 利维斯的影响。同时,如同现在人

们普遍认同的是,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战后广泛的学术批评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

② 这也许能说明博德里亚对麦克卢汉的热情。这两位作者均有这样一个愿望:对大众媒介、传播媒介以及内爆诸观念的技术发展作出分析。

③ 在此,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先前提出的分析方法不一样。哈贝马斯认为,精英文化持续不断地离散于文化贫困的生活世界,而吉登斯却提出,专家评价体系在通常情况下陷于日常实践。这两种观点不一定就是不可调和的,两者均具体地说明了现代经验的各种重要特征。如果我们探讨爱滋病这一问题,吉登斯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都意识到,现代状态里的性活动均牵涉不同程度的冒险。在作出明智的抑或不那么明智的选择时,我们会采纳所谓的专家忠告,这种忠告源于医学专业、媒介、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活动分子。一种更具哈贝马斯特征的研究方法会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对爱滋病进行全共同体范围的讨论,已被金钱和权力的作用所歪曲。譬如说,一些通俗报刊登载耸人听闻的故事,排斥更广泛的理性论辩。

④ 勒菲弗态度明确地批评了诸如德里达和巴特那样的后结构主义作者,他认为这些作者已将空间还原为语言的隐喻作用。这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创造了一种理论上的二元论。将空间转化为需要解读的语言,这抽象于空间凭借社会实践来构建的诸种方式。勒菲弗如此强调空间生产,其缘由就在于此。

## 第五章 博德里亚的暴风雨

① 这些作品尚未完全翻译出来。我在此依赖于博德里亚(1988a)的选集。

② 这一论点具有迪尔凯姆特征的隐含意义,应该是十分明显的。毛斯对博德里亚提出的那种观点并不是进行一种怀旧的批评。相反,他认为,可以通过提供失业保险和其他的福利措施来促进协同性的集体形式。

③ 博德里亚关于死亡和濒临死亡的评述与齐格蒙特·鲍曼(1992b)最近的著作极为相似。

④ 虽然如同萨迪·普兰特(1992)所指出的那样,环境决定论者力求对公开展示进行批评,因为公开展示会导致对各种真实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其次,环境决定论者完全指望他们的行动会融入整个制度。对于博德里

217

注  
释

SSS

认识媒介文化

业的观点,我们能否作出同样的评判,这依然不清楚。

⑤ 这篇文章原写于1968年。

⑥ 詹姆森声言,资本主义生产的每一个阶段均有一种相应的空间方式。参见詹姆森(1988b)。

⑦ 我得感谢肖恩·霍默(谢菲尔德大学精神病学系),他帮助我逐渐地对詹姆森的著述产生更通达的认识。他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尤其明显地表现于上面这节中。

⑧ 在此,我感谢与卡罗琳·奥茨的对话。她是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学研究系的博士生,目前正在完成关于妇女杂志及其读者这一论题的博士论文。

## 第六章 媒介文化和社会理论中的各种视点

① 可以论争的是,美国电视媒介对这场战争的报道比凯尔纳所想像的要更加复杂。关于有线电视网络的一些问题,有迹象表明存在着批判性节目。卢卡斯和沃尔纳(1993)描述了技术的廉价形式、区域性的卫星频道和面向公众的电视给其他视点的传播提供方便的方式。

② 这些思想非常相似于拉克洛和穆菲(1985)以及约翰·基恩(1988)提出的观点,尽管他们也有意见分歧之处。

③ 布迪厄的这些论点在第三章的130-131页(原书页码。——译注)有更加充分的概括和考虑。

④ 文化的权利和义务与大众传播体系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性,格雷厄姆·默多克(1992)是认识到这一重要性的为数不多的人当中的一个。



## 参 考 书 目

- Abercrombie, N., Hill, S. and Turner, B. (eds.) (1980)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Adam, B. (1990) *Time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Adorno, T. (1974)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London, Verso.
- Adorno, T. (199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Adorno, T. and Horkheimer, M. (1973) *The 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Allen Lane.
- Althusser, L. (1977) 'Marxism and humanism', in *For Marx*, London, Verso.
- Althusser, L. (1984)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Anderson, B. (1992) 'The last empires', *New Left Review*, 193: 3 ~ 13.
- Anderson, P. (1964)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23.
- Anderson, P. (1979)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 (1980)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 (1983) *In the Trac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Wallek Library Lectures*,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 (1992)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 Ang, I. (1991)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Routledge.
- Arendt, 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scherson, N. (1991) 'In defence of new nationalism', *New Statesman*, 20 and 27 December.
- Ballaster, R., Beetham, M., Frazer, E. and Hebron, S. (1991) *Women's Worlds: Ideology, Femininity and the Woman's Magazin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Bannister, N. (1994) 'Cable firms stake superhighway claim', *Guardian* 28 July: 15.
- Barbero, J. M. (1993)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Hegemony: From Media to Mediations*, London, Sage.
- Barbook, R. (1992) 'Broadcast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eland',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4(2): 203 - 25.
- Barrett, M. and Phillips, A. (1992) *Destabilis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rthes, R. (1973) *Mythologies*, trans. Annette Lavers, St Albans, Paladin.
- Baudrillard, J.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with introduction by Mark Poster, St Louis, Telos.
- Baudrillard, J. (1981a)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 Baudrillard, J. (1981b) 'Requiem for the media', i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 Baudrillard, J. (1982) 'The Beauborg effect: implosion and deterrence', *October*, 20, (Spring): 3 - 13.
- Baudrillard, J. (1983)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ed. and introduced by Hal Foster, in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Press.
- Baudrillard, J. (1985) 'The masses: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 *New Literary History*, 16(3): 577 - 89.
- Baudrillard, J. (1987a) 'When Bataille attacked the metaphysical principle of econom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1(3).
- Baudrillard, J. (1987b) *The Evil Demon of Images*. The First Mari Kuttna Memorial Lecture, Power Institute Publications Number 3.
- Baudrillard, J. (1988a) *Selected Writings*, ed. and introduced by Mark Post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drillard, J. (1988b) *America*, trans. C. Turner, London, Verso.
- Baudrillard, J. (1990a) *Fatal Strategies*, trans. Philip Beitchman and W. G. J. Nielschowski, London, Pluto Press.
- Baudrillard, J. (1990b) 'Mass media culture', in *Revenge of the Crystal: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Modern Object and its Destiny, 1968 - 1983*, ed. and trans. Paul Foss and Julian Pefanis, London, Pluto Press.
- Baudrillard, J. (1991) 'The reality gulf', *Guardian*, 11 January, p. 25.
- Baudrillard, J. (1993a)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ke Gane, London, Sage.
- Baudrillard, J. (1993b) *Transparency of Evil: 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 trans. J. Benedict, London, Verso.
- Baudrillard, J. (1993c) 'Games with vestiges', interview with Silvano Mele and Mark Titmarsh, in M.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London, Routledge.
- Bauman, Z. (1992a)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Bauman, Z. (1992b) *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man, Z. (1993) *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M. Ritter, London, Sage.
- Behabib, S.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njamin, J. (1988) *The Bonds of Love*, London, Virago.
- Benjamin, W. (1973) 'The Work of Art in an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London, Fontana.
- Benton, T. (1984)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 Benton, T. (1993) *Natural Relations: Ecology, Animal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Verso.
- Berger, J. (1988) *The White Bird*, London, Hogarth Press.
- Bhaskar, R. (1991) *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Oxford, Blackwell.
- Blumler, J. G. (1992)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Vulnerable Values in Western European Broadcasting*, London, Sage.
- Bobbio, N. (1987) 'Democracy and invisible power',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 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C. P.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Boyd-Barrett, O. (1977) *Mass Communication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The Case of the Third World*,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oyle, M. (1994) 'Building a communicative democracy: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itizen politics in East German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6(2): 183-215.
- Braidotti, R. (1986) 'Ethics Revisited: Women and/in Philosophy', in C. Pateman and E. Cross (eds), *Feminist Challeng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Hemel Hempstead, Allen and Unwin.
- Brooks, P. (1976)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nnadine, D. (1983) 'The context,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of ritual: the British monarc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 1820 - 1977',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 W. (1969) 'Harold Adams Innis and Marshall McLuhan', in R. Rosental (ed.), *McLuhan Pro and C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 Castoriadis, C. (1987)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trans. Kathleen Blam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astoriadis, C. (1991)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rtier, R. (ed.) (1989) *The Culture of Print: Power and the Uses of Print in*

-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msky, N. (1992) 'The media and the war: what war?', in H. Mowlana, G. Gerbner and H. I. Schiller, (eds),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oles, J. (1994) 'In the videocracy of the prime time prime minister', *Guardian* 29 July: 18.
- Collins, R. (1990) *Television – Culture and Policy*, London, Sage.
- Cox, D. (1992) 'Caught in the act',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24 July.
- Cumberbatch, G. (1986) 'Bias that lie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Guardian*, 19 May.
- Cumberbatch, G., McGregor, R., Brown, J., with Morrison, D. (1986) *Broadcasting Research Unit Report*, London, Broadcasting Research Unit.
- Curran, J.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5 (2 – 3): 135 – 164.
- Curran, J. (1991)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a reappraisal',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Curran, J. and Seaton, J. (1985)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London, Methuen.
- Dahrendorf, R. (199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 (Chatto Counterblasts Special),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Debord, G. (1987)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h and Med.
- Debord, G. (1990)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London, Verso.
-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ws, P. (1986) (ed.) *Habermas: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London, Verso.
- Doyal, L. and Gough, I. (1991) *A Theory of Human Need*, London, Macmillan.
- Eagleton, T. (1989)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Raymond Williams', in

- T. Eagleton (ed.),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agleton, T. (1990)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lackwell.
- Eagleton, T. (1991)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 Elliott, A. (1992) *Social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 in Transition: Self and Society from Freud to Kristeva*, Oxford, Blackwell.
- Elliott, A. (1994)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 Elliott, G. (1987)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Verso.
- Elliott, P., Murdock, G. and Schlesinger, P. (1983) *Televising Terrorism*, London, Sage.
- Enzensberger, H. M. (1976a)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the mind', in *Raids and Reconstructions*, London, Pluto Press.
- Enzensberger, H. M. (1976b)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 media', in *Raids and Reconstructions*, London, Pluto Press.
- Enzensberger, H. M. (1994) *Civil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 Evans, H. (1994) 'The king of broken promises', *Independent on Sunday* June: 12 - 14.
- Evans, W. A. (1990) '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media research: innovation, iteration, or illusion?', *Critical Mass Communication*, 7: 147 - 68.
- Fejes, F. (1981) 'Media imperialism: an assess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3): 281 - 9.
- Ferguson, M. (1990) 'Electronic media and redefining time and space',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Media Research*, London, Sage.
- Ferguson, M. (1991) 'Marshall McLuhan revisited: 1960s zeitgeist victim or pioneer postmodernis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3(1): 71 - 90.
- Finkelstein, S. (1968) *Sense and Nonsense of McLuha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Fiske, J. (1982)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Fiske, J. (1987a)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elevision', in R. Allen, (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London, Methuen.

- Fiske, J. (1987b)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Methuen.
- Fiske, J. (1989a)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 Fiske, J. (1989b) *Reading the Popular*, London, Unwin Hyman.
- Fiske, J. (1992) 'Popul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in P. Dahlgren and C. Sparks (eds),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 Fiske, J. (1993) *Power Plays, Power Works*, London, Verso.
- Fiske, J. and Hartley, J. (1978)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 Flax, J. (1990) *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orgacs, D. (1989) 'Gramsci and Marx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76: 70 - 88.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oucault, M. (1980) *Power /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 Fraser, N. (1992) 'The uses and abuses of French discourse theories for feminist politics', in M. Featherstone (ed.),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Sage.
- Fraser, N. (1994) 'The case of Habermas and gender', in *The Polity Reader 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risby, D. (1981)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London, Heinemann.
- Frow, J. (1991) 'Michel de Certeau and the 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Studies*, 5(1): 52 - 60.
- Gadamer, H. G. (1975)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Gane, M. (1991a) *Baudrillard: Critical and Fat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Gane, M. (1991b) *Baudrillard's Bestiary, Baudrillard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Garnham, N. (1986a)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R. Collins et al. (e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Sage.
- Garnham, N. (1986b) 'Extended review: Bourdieu's distinction', *Sociological*

*Review*, 34.

- Garnham, N. (1990)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raghty, C. (1991) *Women and Soap Opera: A Study of Prime Time Soap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eras, N. (1987) '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63 (May - June): 40 - 82.
- Geras, N. (1983) *Marx and Human Nature; Refutation of a Legend*, London, Verso.
- Geuss, R. (1981) *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Haberma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87a) 'Out of the orrey: E. P. Thompson on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in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87b)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London, Hutchinson.
-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76a) *Bad New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76b) *More Bad New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82) *Really Bad News*,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85) *War and Peace New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Goffman, E. (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London, Allen Lane.

Golding, P. (1990)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an inegalitarian social order',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Golding, P. (1993) 'The mass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the crisi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scussion paper for panel at The Public Sphere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alford, 10 January.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79) '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in M. Barrett et al., (eds),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 Gurran and M. Gurevitch(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Goody, J.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y, J. and Watt, I. (1968)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in J. Goody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Gray, A. (1992) *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Habermas, J. (1976) *The Legitimation Crisi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Habermas, J. (1981a)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Rationalis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Habermas, J. (1981b)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Winter.

Habermas, J. (1983a)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The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1983b) 'Walter Benjamin: consciousness-raising or rescuing cri-

- tique',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homas MacCart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bermas, J. (1990a) 'What does socialism mean today? The rectifying revolution and the need for new thinking on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183: 3 – 21.
- Habermas, J. (1990b) *Morality and Ethical Life: Does Hegel's Critique of Kant Apply to Discourse Ethic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bermas, J. (1993)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trans. C. P. Croni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bermas, J. (1994)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 V. Steenbergen (ed.),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London, Sage.
- Hall, S. (1972a) *External Influences on Broadcasting: Television's Double Bind*, CCCS Occasional Paper 1.
- Hall, S. (1972h) 'The 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 *Cultural Studies*, 3.
- Hall, S. (1973)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 CCCS Occasional Paper, Birmingham.
- Hall, S. (1975) *Television as a Medium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 CCCS Occasional Paper 34, Birmingham.
- Hall, S. (1977)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in J. Curran (e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 S. (1980)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Hall, S.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 Hall, S. (1983)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in S. Hall and M. Jacques (eds),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Hall, S. (1986)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interview by L. Grossber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Inquiry*, 10(2): 45 – 60.
- Hall, S. (1988a)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London, Verso.
- Hall, S. (1988b) 'Thatcherism amongst the theorists: toad in the garden',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Hall, S. (1991)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A.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Hall, S. and Jefferson, T. (eds)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and Roberts, B. (eds)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Hargreaves, I. (1993) *Sharper Vision: The BBC and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London, Demos.

Harris, D. (1992) *From Class Struggle to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The Effects of Gramscianism o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Harrison, M. (1985) *Television News: Whose Bias?* Berkshire, Hermitage.

Hartley, J. (1992) *The Politics of Pictures: The Creation of the Public in the Age of Popular Media*, London, Routledge.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ebdige, D. (1989) 'After the masses', *Marxism Today*, January.

Held, D. (1989) 'Legitimation problems and crisis tendencies',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obsbawm, E.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dge, B. and Tripp, D. (1986) *Children and Tele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nis, H. A. (1950)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Jameson, F. (1977)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London, Verso.

Jameson, F. (1988a)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E. A. Kaplan

- (ed.), *Postmoder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ories, Practices*, London, Verso.
- Jameson, F. (1988b) 'Cognitive mapping',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Jenson, J. (1990) *Redeeming Modernity: Contradictions in Media Criticism*, London, Sage.
- Jessop, B., Bonnett, K., Bromley, S. and Ling, T. (1984)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wo nations and Thatcherism', *New Left Review*, 147 (September-October): 32 - 60.
- Katz, E. and Liebes, T. (1985) 'Mutual aid in the decoding of *Dallas*: preliminary notes from a cross-cultural study',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Keane, J. (1988)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 Keane, J. (1991)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ellner, D. (1981) 'Network televis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introduction to a critical theory of television', *Theory and Society*, 10(1): 31 - 62.
- Kellner, D. (1989)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ellner, D. (1992) *The Persian Gulf TV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ing, A. (ed.) (1991) *Culture, Globalis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 Kline, S. (1993) *Out of the Garden: Toys and Children's Culture in the Age of TV Marketing*, London, Verso.
- Kristeva, J. (1991) *Strangers to Ourselves*, trans. L. S. Roudiez,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Laclau, E.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Verso.
- Laclau, E.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 Laclau, E. and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 Laing, S. (1991) 'Raymond Williams and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televis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3(2): 153 - 69.
- Lash, S. and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 Lee, S. (1990) *The Politics of Free Speec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Lefebvre, H. (199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 Lefebvre, H. (199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London, Verso.
- Lichtenberg, J. (1991) 'In defence of objectivity',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Lister, R. (1991) 'Citizenship engendered', *Critical Social Policy*, 32 (Autumn).
- Lovibond, S. (1990)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R. Boyne and A. Rattansi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Lucas, M. and Wallner, M. (1993) 'The Gulf crisis project and the deep dish satellite TV network', in T. Downum (ed.), *Channels of Resistance: Global Television and Local Empowerment*, London, BFI Publishing.
- McGuigan, J. (1992) *Cultural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 McLuhan, M. (1951) *The Mechanical Bride: Folklore of Industrial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cLuhan, M. (1969) *Counterblas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McLuhan, M. (199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Routledge.
- McLuhan, M. and Fiore, Q. (1967)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cLuhan, M. and Fiore, Q. (1968)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McLuhan, M. and Powers, B. R. (1989) *The Global Vill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Nair, B. (1994) *News and Journalism in the UK: A Textbook*, London, Routledge.

McQuail, D. (1992)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McRobbie, A. (1994)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Mann, M. (1970)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June.

Mann, M. (1988)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rcuse, H. (1977)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s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London, Macmillan.

Marquand, D. (1994) 'Reinventing federalism', *New Left Review*, 203: 17 - 26.

Marshall, T. H. (1992)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Mattelart, A. and Mattelart, M. (1992) *Rethinking Media Theory: Signposts and New Directions*, trans. J. A. Cohen and M. Urquidi,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ttelart, A., Delcourt, X. and Mattelart, M. (1984) *International Image, Markets*, London, Comedia.

Mauss, M. (199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Melucci, A.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Menninghaus, W. (1991) 'Walter Benjamin's theory of myth', in G. Smith, (ed.), *On Walter Benjam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J. (1971) *McLuhan*, London, Fontana/Collins.

Modleski, T. (1988)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 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London, Routledge.

Morley, D.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Morley, D. (1981)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a critical postscript', *Screen Education*, 39.

Morley, D. (1988)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Routledge.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rison, D. (1992) *Television and the Gulf War* (Acamedia Research monograph 7), London, John Libbey.

Murdock, G. (1978) 'Blindspots in Western Marxism -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Murdock, G. (1992) 'Citizens, consumers, and public culture', in M. Skovmand and M. Christian Schroder (eds), *Media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Nairn, T. (1964)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New Left Review*, 23.

Nairn, T. (1969) 'McLuhanism: the myth of our time', in R. Rosenthal (ed.), *McLuhan Pro and C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Nairn, T. (1988) *The Enchanted Glass: Britain and its Monarchy*, London, Radius.

Negrine, R. (1994) *Politics of the Mass Media*, London, Routledge.

Norris, C. (1990) *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Ong, W. J. (1977) *Interfaces of the Wo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rwell, G. (1980)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in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ume 2: My Country Right or Left 1940 - 1943*, Harmondsworth, Penguin.

Parekh, B. (1991) 'British citizenship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n G. Andrews (ed.), *Citizenship*,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Pateman, C. (1982) 'Critique of the public/private dichotomy', in A. Phillips (ed.), *Feminism and Equality*, Oxford, Blackwell.

Pateman, C. (1989) *The Disorder of Wome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hilips, D. and Tomlinson, A. (1992) 'Homeward bound: leisure, popular culture and consumer capitalism', in D. Strinati and S. Wagg (eds), *Come on Down? Popular Media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Phillips, A. (1991) *Engendering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hilo, G. (1987) 'Whose new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9(4): 397 – 406.
- Philo, G. (1990) *Seeing and Believing: The Influence of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 Plant, S. (1992) *The Most Radical Gesture: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in a Postmodern Age*, London, Routledge.
- Poster, M.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Poster, M. (1994)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and postmodernity', in D. Crowley and D. Mitchell (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ostman, N. (1982)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New York, Dell.
- Postman, N.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London, Methuen.
- Potter, D. (1994) 'The present tense', interview with Melvyn Bragg, *New Left Review*, 205: 131 – 140.
- Poulantzas, N. (1975)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Verso.
- Poulantzas, N.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Pursehouse, M. (1987) *Life's More Fun with your Number One 'Sun' – Interviews with some 'Sun' Readers*, CCCS Occasional Paper, No 85, Birmingham.
- Radway, J. (1986) 'Identifying ideological seams: mass culture, analytical method, and political practice', *Communication*, 9: 93 – 123.
- Radway, J. (1987)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London, Verso.
- Ransome, P. (1992) *Antonio Gramsci: a New Introductio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Reeves, G. (1993) *Communic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Ricoeur, P. (1981)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and ed. J.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s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Roche, M. (1992) *Rethinking Citizenship: Welfare, Ideology and Change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ose, J. (1993) *Why War? –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the Return to Melanie Klein*, Oxford, Blackwell.

Rustin, M. (1992) 'Democracy and social rights', *New Left Review*, 191.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Said, E. (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Samuel, R. (1989) 'Introduction: exciting to be English' in *Patriotism –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Vol. 1: History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Saussure, F. de (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Sayers, J. (1986) *Sexual Contradictions: Psychology,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London, Tavistock.

Scannell, P. (1986) 'Broadcasting and the politics of unemployment 1930 – 1935', in R. Collins *et al.* (e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Sage.

Scannell, P. (1990)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in A. Goodwin and G. Whannel (eds),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Scannell, P. (1992)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d modern public life', in P. Scannell *et al.* (eds), *Culture and Power: 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Reader*, London, Sage.

Schiller, H. I. (1970)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M. E. Sharpe.

Schiller, H. (1986)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lows: new basis for global domination?',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Schlesinger, P. (1978)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London, Constable.

Schlesinger, P. (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s, strategies and the limits of media-centrism',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

- 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 Schlesinger, P. (1991) *Media, State and Nation – 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London, Sage.
- Schlesinger, P. (1994) 'Europe through a glass darkly', *Daedalus*, 123(2), Spring.
- Schlesinger, P., Emerson Dobash, R., Dobash, R. P. and Weaver, C. K. (1992) *Women Viewing Viol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Schudson, M. (1993) *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 Its Dubious Impact on America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Shaw, M. and Carr-Hill, R. (1992) 'Political opinion and media: war coverage in Britain', in H. Mowlana, G. Gerbner and H. I. Schiller (eds),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iune, K. and Truetzschler, W. (1992) *Dynamics of Media Politics: Broadcast and Electronic Media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Sage.
- Smart, B. (1992) *Modern Conditions, Postmodern Controversies*, London, Routledge.
- Smart, B. (1993) 'Europe/America: Baudrillard's fatal comparison', in C. Rojek and B. S. Turner (eds), *Forget Baudrillard?*,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A. D. (1990) 'Towards a global culture?', in M. Featherstone (ed.), *Nationalism, Globalis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Smythe, D. (1977) 'Communications – blindspots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 – 27.
- Soja, E.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Sontag, S. (1994) *Against Interpretation*, London, Vintage.
- Soothill, K. and Walby, S. (1990) *Sex Crime in the News*, London, Routledge.
- Soper, K. (1979) 'Marxism, materialism and biology', in J. Mepham (ed.),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Materialism*, Brighton, Harvester.
- Soper, K. (1990) *Troubled Pleasures*, London, Verso.
- Sparks, C. (1987) 'Striking Resul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9.
- Sparks, C. (1992a), 'Popular journalism: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P. Dahlgren and C. Sparks (eds),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 Sparks, C. (1992b) 'The popular press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in P. Scannell *et al.* (eds), *Culture and Power: 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Reader*, London, Sage.
- Stevenson, N. (1995)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ism: Raymond Williams and E. P. Thompson*, Aldershot, Avebury Press.
-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 (1991)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A. Honneth and H. Jonas (eds),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aylor, M. C. and Saarinen, E. (1994) *Imagologies: Media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Thompson, E. P. (1978)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Thompson, J. B. (1984)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hompson, J. B.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media', in D. Crowley and D. Mitchell (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omlinson, J.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London, Pinter.
- Tuchman, G. (1978)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and the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B. S. (1993a)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itizenship', i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Turner, B. S. (1993b) 'Cruising America', in C. Rojek and B. S. Turner, *Forget Baudrillard?*, London, Routledge.
- Turner, B. S. (1994) 'Postmodern culture/modern citizens', in B. V. Steenbergen (ed.),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London, Sage.
- Turner, G. (1991)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Boston, Unwin Hyman.

- Van Dijk, T. A. (1991) *Racism and the Press: Critical Studies in Racism and Mi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Vološinov, V. N. (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L. Matejka and L. R. Tituni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zer, M. (1983)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 Webster, R. (1990) *A Brief History of Blasphemy*, Southwold, Orwell Press.
- Wexler, P. (1990) 'Citizenship in the semiotic society', in B. S. Turner,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 White, S. (1988) *The Recent Work of Jürgen Habermas: Reason, Justice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 (1952) *Drama from Ibsen to Eliot*,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Williams, R. (1961)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illiams, R. (1962) *Communicatio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illiams, R. (1965)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illiams, R. (1973)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iew*, 82.
-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Collins.
- Williams, R. (1978) 'Problems of mat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109: 3 - 17.
- Williams, R. (1979a)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Verso.
- Williams, R. (1979b)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 (1980)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 Williams, R. (1982) *Culture*, London, Fontana.
- Williams, R. (1985) *Towards 2000*, London, Penguin.
- Williams, R. (1987) 'The press we don't deserve', in J. Curran, *The British Press: A Manifesto*, London, Macmillan.
- Williams, R. (1988) 'Culture is ordinary' (1958), in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Verso.
- Williams, R. (1989a) 'A defence of realism', in *What I Came to Say*, London,

Hutchinson.

Williams, R. (1989b) 'Isn't the news terrible?', in *What I Came to Say*, London, Hutchinson.

Williams, R. (1989c)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 London, Verso.

Williams, R. and Orrom, M. (1954) *Preface to Film*, London, Film Drama.

Willis, P. (1990) *Common Cultur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索引

(本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 Abercrombie, N. N. 阿伯克龙比 22  
abstract space 抽象空间 135  
access to cultural goods 享受文化商品  
的机会 85, 95, 97  
Adam, B. B. 亚当 124  
Adorno, T. T. 阿多诺 51, 53 - 54,  
55, 56, 59, 112, 192  
advertising 广告 10 - 11, 14, 75 -  
76, 118, 138, 146, 150  
children and 儿童与广告 98, 138  
and consumer choice 广告与消费者  
选择 98  
regulation of 广告管理 205  
aesthetic enjoyment 审美享受 67 - 68  
aesthetic need 审美需要 201 - 202  
agency-structure debate 代理机构 - 结  
构论辩 84  
alienation 异化 22  
alphabet 字母 119  
alternative (radical) press 他择性(激进  
的)报刊 20, 93, 99  
Althusser, L. L. 阿尔都塞 15, 30,  
37, 38, 39, 40, 145, 146 - 147, 149,  
150  
Americanisation 美国化 203, 205 -  
206  
Anderson, B. B. 安德森 22, 61,  
118  
Anderson, P. P. 安德森 10, 51,  
69 - 70, 147  
Ang, I. I. 昂 76, 103 - 105, 108,  
110, 182, 191  
architecture 建筑 135, 164 - 165  
Arendt, H. H. 阿伦特 68  
art 艺术 54 - 55  
audience participation 受众参与 95  
audience research 受众研究 5, 6,  
19, 56, 75 - 113, 182 - 184  
and the Gulf War 与海湾战争  
190 - 193  
auratic art 富有韵味的艺术 54 - 55  
authoritarianism 专制主义 13  
avant-garde 先锋派 17, 54, 67,  
172 - 173  
Ballaster, R. R. 巴拉斯特 172  
Bannister, N. N. 班尼斯特 205  
Barbero, J. M. J. M. 巴韦罗 108  
Barbrook, R. R. 巴布克 61, 66  
Barrett, M. M. 巴雷特 102  
Barthes, R. R. 巴特 41  
base-superstructure model 基础 - 上层  
建筑模式 15 - 16, 20 - 21  
Bataille 巴塔伊 155 - 156  
Baudrillard, J. J. 博德里亚 3, 5,  
7, 64, 115, 144 - 161, 166, 167 -

- 177, 185
- fatal theory 宿命理论 156, 159, 168
- on the hyperreal 论超现实 160, 161, 165, 170
- and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 150 - 154
- on 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179
- on simulation 论模拟 160, 161, 170, 194
- on symbolic exchange 论象征性交换 152 - 153, 154 - 155, 159
- on war 论战争 187, 194
- Bauman, Z. Z. 鲍曼 23, 141, 173, 190
- BBC 英国广播公司 13, 33, 63, 72, 204
- coverage of miners' strike (1984) 对矿工罢工(1984)的新闻报道 30
- occupational culture of 英国广播公司的职业文化 32
- Beck, U. U. 贝克 202
- Benhabib, S. S. 本哈比勃 70, 72
- Benjamin, J. J. 本杰明 6, 69, 73
- Benjamin, W. W. 本雅明 51, 54 - 55, 161, 200
- Benton, T. T. 本顿 147, 177
- Berger, J. J. 伯杰 201
- Berlusconi, S. S. 贝卢索尼 205
- Bhaskar, R. R. 巴斯卡尔 177
- bias in television news 电视新闻中的偏见 26 - 34
- Birmingham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 35
- black culture 黑人文化 57
- black politics 黑人政治 151
- Blumler, J. G. J. G. 布吕姆勒 206
- Bobbio, N. N. 博比奥 71, 139
- book culture 书本文化 118 - 119, 120, 121
- Bourdieu, P. P. 布尔迪厄 56, 64, 85, 95, 97, 98, 201
-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48 - 51
- Boyd-Barrett, O. O. 博伊德-巴雷特 109
- Boyle, M. M. 博伊尔 207
- Braidotti, R. R. 布拉伊多蒂 73
- Brecht, B. B. 布雷赫特 55
- British Leyland 英国莱兰 27
- Broadcasting Research Unit 广播研究小组 29 - 30
- Brooks, P. P. 布鲁克斯 108
- Bush, G. G. 布什 188, 190
- cable systems 有线系统 62, 205
- and audience research 与受众研究 75
- Campion, J. J. 坎皮恩 68
- Cannadine, D. D. 坎纳丁 17
- capital 资本
- labour relations 劳资关系 135
- private 私人资本 18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3, 10, 12, 146, 152 - 153, 165, 180
-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与文化生产 166
- dominance of 资本主义统治 166
- globalisation of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125 - 126, 136, 164
- and mass culture 资本主义与大众文化 53 - 54
- Carey, J. W. J. W. 凯里 77, 116, 127
- Carr-Hill, R. R. 卡尔-希尔 190
- Castoriadis, C. C. 卡斯托里亚迪 31, 70, 151

- censorship 审查 136  
   self- 自我审查 61  
 charity 慈善事业 154 - 155  
 Chartier, R. R. 沙尔捷 129  
 children 儿童  
   and advertising 与广告 98, 138  
   and television 与电视 91 - 92, 137  
 Chodorow, N. N. 霍多罗 73, 106 - 107  
 choice 选择 62  
   consumer 消费者选择 85 - 86  
 Chomsky, N. N. 乔姆斯基 190  
 cinema 电影院 67 - 68, 120, 169 - 170  
 citizenship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69, 72 - 74, 153, 154, 179, 197, 202, 207 - 210  
   and consumerism 与消费主义 65 - 66  
   cultural 文化方面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208  
 civil rights 民权 208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市民社会与国家 13, 48 - 49  
 class 阶级  
   and audience participation 与受众参与 95  
   and cultural beliefs 与文化信仰 33 - 34  
   and cultural competencies 与文化能力 85  
   and cultural practices 与文化实践 95, 97  
   and television 与电视 158  
   see also ruling class, working class 又见统治阶级, 工人阶级  
 class bias in television news 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 26 - 34  
 cognitive mapping 认知图绘 165  
 Coles, J. J. 科尔斯 205  
 Collins, R. R. 科林斯 203  
 commercial television 商业电视 60  
 commercialisation 商业化  
   of culture 文化的商业化 204  
   of the press 报刊的商业化 50, 53  
 commercialism 商业主义 14  
 commodification of media and culture 媒介和文化的商品化 55, 147, 162, 181  
 communicative action 交流行为 68, 69, 70 - 71, 74, 166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交流的理性 51 - 52, 67, 74  
 community 共同体  
   need for 对共同体的需要 199  
   self-definition of 共同体的自我界定 199 - 200  
 complex equality 复杂的平等问题 208 - 209  
 computer games 计算机游戏 96  
 connotation 内涵意义 41  
 consciousness industry 意识产业 10  
 consensus formation 一致性的形成 70, 71  
 consumer choice 消费者选择 85 - 86  
   and advertising 与广告 98  
 consumer society 消费社会 149, 150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 110  
   and citizenship 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65 - 66  
 cool media 冷媒介 119, 120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5, 6, 181  
 cross-media ownership 跨媒介的所有制 205  
   cultural citizenship 文化方面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208  
 cultural distance 文化距离 54  
 cultural elites 文化精英 12



-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同一性 21, 22, 59, 60, 207 - 208, 211
-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论 24, 103, 104, 203
- cultural impoverishment 文化贫困 52 - 53
- cultural materialism 文化唯物论 15 - 17, 18 - 20, 170
-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relations 文化生产, 与经济关系 43 - 44, 52, 165, 166
-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echnical media 文化关系, 与技术媒介 133 - 134
- culture 文化
- commercialisation of 文化的商业化 204
- commodification of 文化的商品化 55, 147, 162, 181
- symbolic nature of 文化的象征特性 77
- as tool of class domination 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97
- Williams' definition of 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 11 - 12
- culture gap 文化沟 99
- culture industry 文化产业 53, 54
- Cumberbatch, G. G. 坎伯巴奇 29 - 30, 45
- Curran, J. J. 柯伦 20, 53, 64, 65, 77, 110
- Dahrendorf, R. R. 达伦多夫 206
- Dallas 《达拉斯》 103 - 105, 108, 110, 111
- Debord, G. G. 德博尔 145, 147 - 149, 174
- De Certeau, M. M. 德塞尔托 90, 91, 100
- decoding of media messages 对媒介讯息
- 的解码 41 - 42, 78, 79 - 80, 83 - 84
- decommodification 消除商品化 96
- democracy 民主 39, 71, 139, 141, 181
- direct 直接民主 69, 71
- representative 代议制民主 69, 71, 72
- democratic model of cultural production 文化生产的民主模式 14
- democratic realism 民主现实主义 14 - 15, 22, 23, 25
- democratic will, formation of 民主意志, 民主意志的形成 209
- democratisation of the media 媒介的民主化 44, 65, 68 - 69, 159, 185, 211
- democratising effect of new media 新媒介的民主化效应 136 - 137
- denotation 外延意义 41
- dependency theory 依附理论 109
- deregulation 废除管制 62, 64, 66, 153, 203
- determinism 决定论
- economic 经济决定论 21
- technological 技术决定论 19, 115, 125, 127
- difference 差异
- recognition of 对差异的认识 196
- sexual 性别差异 102
- digital television 数字电视 205
- documentary films 记录片 169
- dominant aesthetic 主导性的审美情趣 95, 97
- dominant ideology 主导性意识形态 34, 59, 86, 87
- domination, structures of 统治, 统治的结构 10
- Doyal, L. L. 多亚尔 196

- Eagleton, T. T. 伊格尔顿 20, 21, 22, 33, 52, 88, 167
- Eastern Europe 东欧 207
- ecological concerns 对生态的关怀 199
- ecological movement 生态运动 52
- economic determinism 经济决定论 21
- economy 经济
- an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与文化和政治体制 15 - 16, 20 - 21
-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与文化生产 43 - 44, 52, 165, 166
- political 政治经济学 9 - 11, 165
- education 教育 123
- access to 享受教育的机会 12
- and class 与阶级 97
- effects school of media analysis 媒介分析的效应派 37
- electronic media *see* technical media 电子媒介 见技术媒介
- elitism 精英论 12
- Elliott, A. A. 埃利奥特 40, 56, 107
- Elliott, G. G. 埃利奥特 37, 40, 147
- Elliott, P. P. 埃利奥特 34, 61
- empathetic relations 移情关系 69
- encoding and decoding of media messages 对媒介讯息的编码与解码 41 - 42, 78, 79 - 80, 83 - 84
- Enzensberger, H. M. H. M. 恩岑斯贝格尔 10, 20, 159, 211
- equality, complex 平等, 复杂的平等问题 208 - 209
- ethnic tensions in Europe 欧洲的种族紧张关系 207, 211
- European Community (EC) 欧共体 205 - 206, 207
- Europeanisation 欧洲化 206
- Evans, H. H. 埃文斯 205
- Evans, W. A. W. A. 埃文斯 110
- evil, principle of 邪恶, 邪恶的原则 158
- expert knowledge 专家知识 198 - 199
- expert systems 专家体系 130 - 131
- Falklands War 福克兰岛战争 27 - 28
- family television project 家庭电视计划 80 - 82, 83, 85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55
- fatal theory 宿命理论 156, 159, 168
- Fejes, F. F. 费耶什 109
- feminism 女性主义 151, 168, 172, 195
- feminist theory 女性主义理论 6, 72 - 74, 78, 83, 101 - 113
- Ferguson, M. M. 弗格森 136
- film 电影 67 - 68, 120, 169 - 170
- Finkelstein, S. S. 芬克尔斯坦 125
- Fiore, Q. Q. 菲奥里 121, 123, 187, 193
- Fiske, J. J. 菲斯克 25, 26, 29, 57 - 58, 78, 89 - 101 各处, 110, 182
- Flax, J. J. 弗拉克斯 107
- Forgacs, D. D. 福尔加奇 16
- formations 结构 17
- Foucault, M. M. 福柯 121, 138, 139, 167, 168
-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51, 53 - 56, 59, 76, 112
- Fraser, N. N. 弗雷泽 40, 74
- free expression 言论自由 13, 14
- Frisby, D. D. 弗里斯比 22
- Frow, J. J. 弗劳 100
- functional analysis 功能分析 77

Gadamer, H. G. H. G. 加达默尔 170, 172, 201  
 Gane, M. M. 甘恩 145, 156 - 157, 158, 162  
 Garnett, T. T. 加尼特 14  
 Garnham, N. N. 加纳姆 20, 21, 63, 64, 65, 96  
 Geertz, C. C. 格尔茨 77, 179  
 gender 性别  
   and power 与权力 83, 85  
   and television viewing 与电视收看 81 - 83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力公司 188  
 Geraghty, C. C. 杰拉蒂 105  
 Geras, N. N. 赫拉斯 15 - 16, 21, 176  
 Giddens, A. A. 吉登斯 5, 22, 43, 69, 84, 129 - 132, 133, 143  
 Gilroy, P. P. 吉尔罗伊 57, 61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GUMP)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 9, 10, 11, 26 - 34, 41  
 global culture 全球文化 24, 47  
 global scrutiny 全球监视 139  
 global village 全球村 125 - 126, 135  
 globalisation 全球化 56, 61, 66, 131, 178, 197  
   of capitalist relations 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化 125 - 126, 136, 164  
   of 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的全球化 66  
   of television 电视的全球化 18 - 19, 130, 203 - 204  
 Goffman, E. E. 戈夫曼 137  
 Golding, P. P. 戈尔丁 10, 43, 64, 85  
 Goody, J. J. 古迪 5, 128 - 129, 131, 132, 133, 143  
 Cough, I. I. 高夫 196

graffiti 涂鸦 155, 159  
 Gramsci, A. A. 格拉姆希 15, 16, 22, 35, 38, 166  
 Gray, A. A. 格雷 82 - 83, 106, 182, 191  
 Gulf War 海湾战争 70, 167, 179, 186 - 195  
 Habermas, J. J. 哈贝马斯 2, 3, 6, 22, 23, 47 - 74, 93, 99, 100, 166, 167, 183, 202, 209, 210, 211  
 Hall, S. S. 霍尔 9, 10, 11, 33, 34, 35 - 46, 78, 83, 125, 126, 173, 179, 183  
 Hargreaves, I. I. 哈格里夫斯 204  
 Harris, D. D. 哈里斯 35  
 Harrison, M. M. 哈里森 26, 31  
 Hartley, J. J. 哈特利 29, 92  
 Harvey, D. D. 哈维 135, 136  
 Hebdige, D. D. 赫布迪格 96  
 hegemonic reading of media discourse 对媒介话语的霸权解读 42  
 hegemony 霸权 16 - 17, 21 - 22, 44, 45, 46, 59 - 60, 181 - 182, 183 - 184  
   crisis in 霸权的危机 36  
 Held, D. D. 赫尔德 59, 71, 72  
 high culture 高品位文化 95  
 historical knowledge, abolition of 历史知识, 消除历史知识 148  
 history, sense of 历史, 历史感 164  
 Hobshawn, E. E. 霍布斯鲍姆 24  
 Hodge, B. B. 霍奇 91 - 92  
 Hoggart, R. R. 霍格特 56  
 Horkheimer, M. M. 霍克海默尔 51, 53 - 54, 55, 56, 59  
 hot media 热媒介 119 - 120  
 human nature 人性 176  
 human needs 人类的需要 149 - 150.

- 175 - 177, 179, 195 - 202
- humanism, socialist 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146
- Hurd, D. D. 赫德 61
- hybridisation of media forms 媒介形式的混合化 123 - 124
- hyperreality 超现实 160, 161, 165, 170
- ideal speech situation 理想的言语情景 52, 73
- identity 同一性
- cultural 文化同一性 21, 22, 59, 207 - 208, 211
- formation of 同一性的形成 40, 105, 106 - 107, 200, 210 - 211, 212
- self- 自我同一性 209, 210, 211
- sexual 性别同一性 102
-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As) 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37, 38
- ideology 意识形态 10, 16 - 17, 32 - 34, 35, 46, 86 - 7, 146
- and class 与阶级 34
- dominant 主导性意识形态 34, 59, 86, 87
- of leisure 休闲的意识形态 88
-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 37 - 41, 46
- reality effect of 意识形态的现实效应 38
- and the tabloid press 意识形态与通俗报刊 99
- impartiality 公正 28 - 32
- imperialism 帝国论
- cultural 文化帝国论 103, 104, 203
- media 媒介帝国论 109 - 112
- implosion 内爆 3, 5, 6, 122 - 123, 131, 134, 145, 157, 185, 186
-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以父之名》 161, 163 - 164, 164, 171 - 172
- individual, sovereign 个人的, 至高无上的个人价值 21, 22
- individual style 个体风格 163
- individualising effects of media technologies 媒介技术的个体化效应 174, 185
- industrial relations,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产业关系, 对产业关系的电视新闻报道 26 - 27, 29 - 31, 86 - 87
- information overload 信息超载 64
- Innis, H. A. H. A. 英尼斯 115 - 117
- 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 即时传播 136, 145, 148, 174
- institutions as cultural processes 作为文化过程的体制 17
- interactive media 具有互动作用的媒介 141, 185
- interpretation of media discourse see decoding of media messages 对媒介话语的阐释 见对媒介讯息的解码
-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 主体间性关系 127, 173 - 174
- and Gulf War 与海湾战争 193
-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 2
- investment in cultural industries 文化产业的投资 20
- Ireland, Northern 爱尔兰, 北爱尔兰 60 - 61
- ITV 工业电视 60
- Jameson, F. F. 詹姆森 5, 7, 14, 22, 54, 76, 162 - 167, 171, 174, 179
- Jefferson, T. T. 杰斐逊 36

- Jenson, J. J. 詹森 140  
justice 正义 52, 210
- Katz, E. E. 卡茨 110  
Keane, J. J. 基恩 13, 100  
Kellner, D. D. 凯尔纳 34, 145, 149, 156, 173, 187-190, 191, 194  
King, A. A. 金 56  
Kline, S. S. 克兰 138  
knowledge 知识 52  
expert 专家知识 198-199  
Kristeva, J. J. 克里斯泰娃 212
- labour-capital relations 劳资关系 135  
labour movement 工人运动 12  
labour power 劳动力 146, 152  
Lacan, J. J. 拉康 40  
Laclau, E. E. 拉克洛 29, 33, 34, 39, 80-81  
Laing, S. S. 莱恩 25  
language as material and symbolic practice 作为物质和象征实践的语言 170-171  
language use 语言使用 84-85, 97-98  
Lash, S. S. 拉希 153  
Leavis, F. R. F. R. 利维斯 12, 25  
Lee, Simon 西蒙·李 22  
Lee, Spike 斯皮克·李 15  
Lefebvre, H. H. 勒菲弗 88, 134-136  
leisure, ideology of 休闲, 休闲的意识形态 88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9, 17, 47  
Lichtenberg, J. J. 利希滕伯格 30  
Liebes, T. T. 利布斯 110  
life-world, colonisation of 生活世界, 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52  
Lister, R. R. 利斯特 72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批评 25  
literary culture 文学文化 12  
literate societies 文字社会 116, 120, 129  
literature 文学 50  
Live Aid 生命援助活动 69  
Loach, K. K. 洛奇 14  
local public sphere 区域公共领域 61-62  
Lovibond, S. S. 洛维邦德 168-169  
Lukacs, G. G. 卢卡奇 14, 22
- McCarthy, T. T. 麦卡锡 48  
McGrath, J. J. 麦格拉思 14  
McGuigan, J. J. 麦圭根 98  
McLuhan, M. M. 麦克卢汉 2, 5, 114-128 各处, 129, 132, 134-143 各处, 145, 174  
on hybridisation of media forms 论媒介形式的混合化 123-124  
concept of implosion 关于内爆的概念 122-123, 134  
on media of communication 论传播媒介 117-124, 185  
on the public sphere 论公共领域 140, 141, 174  
on space, time and technical media 论空间、时间和技术媒介 6, 114, 120-122, 124-125, 127, 134, 135  
on war 论战争 187, 193  
McNair, B. B. 麦克奈尔 206  
McRobbie, A. A. 麦克罗比 172  
Madonna 麦当娜 89-90, 100  
magazine production 杂志生产 123-124, 185  
magazines, for women 杂志, 妇女杂志 172

- Malcolm X* 《马尔科姆·艾克斯》 15
- male power 男人的权力 82, 85  
see also patriarchy 又见家长制
- Mann, M. M. 曼 59, 189
- Marcuse, H. H. 马尔库塞 51, 112
- Marquand, D. D. 马昆德 206
- Marshall, T. H. T. H. 马歇尔 69, 72, 208
- Marx, K. K. 马克思 16, 54, 147, 149, 150 - 154
- 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 50, 51 - 62, 103 - 105
- mass production 批量生产 54
- mass society 大众社会 173, 185  
decline of 大众社会的衰落 133
- material culture 物质文化 15 - 17, 18 - 20, 170
- Mattelat, A. A. 马特拉特 126, 203
- Mattelat, M. M. 马特拉特 126
- Mauss, M. M. 毛斯 154
- meaning 意义 77 - 78  
encoding and decoding of 对意义的编码和解码 41 - 42, 45 - 46, 78, 79 - 80  
linguistic 语言意义 126  
negotiated 协商性意义 42, 78  
preferred 预想性意义 78, 80  
symbolic 象征性意义 77
-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机械再生产 54
- media of communication 传播媒介 117 - 124, 148, 158 - 159, 184 - 185
- media events 媒介事件 89
- media imperialism 媒介帝国论 109 - 112
- media use 媒介用途 76 - 77, 84
- melodrama 情节剧 108  
see also soap operas 又见肥皂剧
- Melucci, A. A. 梅卢奇 64
- men 男人  
and television viewing 与收看电视 81 - 82  
see also male power, patriarchy 又见男人的权力, 家长制
- Menninghaus, W. W. 门宁豪斯 55
- MeTV 个人电视 141, 142
- Meyrowitz, J. J. 梅罗维茨 127, 136 - 138, 139
- Miller, J. J. 米勒 126
- miners' strike (1984) 矿工罢工(1984) 29 - 31, 86 - 87
- money markets 货币市场 153
- moral panics and the press 道德恐慌与报刊 35 - 36
- Morley, D. D. 莫利 77, 78 - 89 各处, 110, 182, 183, 191
- Morrison, D. D. 莫里森 187, 190 - 193, 194
- Mouffe, C. C. 穆菲 29, 33, 39
- mugging 行凶抢劫 35
- Murdoch, R. R. 默多克 44, 205
- Murdoch, G. G. 默多克 10, 43, 66, 208
- musical codes 音乐代码 163 - 164
- myth 神化 55
- Nairn-Anderson thesis 奈恩 - 安德森论 51
- Nairn, T. T. 奈恩 50 - 51, 125, 200
- nation state 民族国家 61, 200
- national differences, re-emergence of 民族差异, 民族差异的重新出现 206 - 207
- national-local cultures 民族 - 区域文化 24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24, 116 - 117, 118

- Nationwide study* 《国内焦点》研究 78, 79 - 80, 87
- needs, human 需要, 人类的需要 149 - 150, 175 - 177, 179, 195 - 202
- negotiated meaning 协商性意义 42, 78, 79
- Negrine, R. R. 内格里恩 62, 206
-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17
- news see television news, bias in 新闻  
见电视新闻, 电视新闻中的偏见
- newspapers 报纸 49 - 50, 178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 与  
时间的和空间的关系 122, 131  
see also press 又见报刊
- newsworthiness 新闻价值 33
- Nietzsche, F. F. 尼采 168, 169
- Norris, C. C. 诺里斯 170
-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 60 - 61
- object/sign system 客体/符号系统 149
- objectivity 客观性 28 - 32, 180
- obligations 义务  
of communication 传播的义务 47, 199, 209  
towards others 对他者的义务 199
- Ong, W. J. W. J. 翁 116
- opinion polls 民意测验 160
- oppositional reading of media discourse  
对媒介话语的对抗性解读 42, 78, 79
- oppositional tendencies 对抗性倾向 17
- oral cultures 口语文化 116, 119, 120, 128, 129
- oral tradition 口头传统 129
- orientalism 东方文化的研究 22
- Orrom, M. M. 奥罗姆 15
- Orwell, G. G. 奥威尔 204
- others, obligations towards 他者, 对他者的义务 199
- ownership and control, patterns of 所有制与控制, 所有制与控制的型式 10, 43 - 44, 71 - 72, 205
- Parekh, B. B. 帕雷克 61, 72, 200
- partnership deals in broadcasting 广播中的合伙经营 204
- Passeron, C. P. C. P. 帕斯龙 97
- pastiche 东拼西凑的模仿 163
- Pateman, C. C. 佩特曼 72, 73
- paternalism 家长作风 13 - 14
- patriarchy 家长制 102, 106, 107
- peace movement 和平运动 52, 70
- perception, impact of technical media on  
感知, 技术媒介对感知的影响 114, 117
- Phillips, A. A. 菲利普斯 33, 62, 72, 102
- Phillips, D. D. 菲利普斯 88
- Philo, G. G. 菲洛 26, 31, 86 - 87
- Piano, The* (film) 《钢琴》(电影) 68
- Plant, S. S. 普兰特 148
- police 治安 36
-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9 - 11, 165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 92
- political rights 政治权利 208
- Popper, K. K. 波珀 55
- popular aesthetic 通俗的审美情趣 95
- popular (tabloid) press 通俗报刊 12, 20, 53, 93 - 94, 98 - 99, 100, 101, 139 - 140, 186
- Poster, M. M. 波斯特 150
- Postman, N. N. 波斯特曼 137, 140
-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5, 115, 125, 144 - 145, 149 - 158, 162 - 163, 185

-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 2
-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6, 15
- potlatch 互赠礼品 154
- Potter, D. D. 波特 202
- Poulantzas, N. N. 普兰扎斯 15, 33
- power 权力
- disciplinary 惩戒性权力 138 - 139
  - in domestic leisure settings 家庭休闲环境中的权力 83, 85, 88 - 89
  - male 男人的权力 82, 85
  - see also patriarchy 又见家长制
- Powers, B. R. B. R. 鲍尔斯 123
- preferred meaning 预想性意义 78, 80
- press 报刊 19 - 20, 49 - 50, 93 - 94
- commercialisation of 报刊的商业化 50, 53
  - and moral panics 与道德恐慌 35 - 36
  - popular (tabloid) 通俗报刊 12, 20, 53, 93 - 94, 98 - 99, 100, 101, 139 - 140, 186
  - quality 严肃报刊 20, 53, 93, 99, 100, 186, 206
  - radical (alternative) 激进的(他择性)报刊 20, 93, 99
  - as space-biased medium 作为偏倚空间媒介的报刊 116
  - transnational 跨国报刊 206
- print culture 印刷文化 118 - 119, 120, 121
- Prisoner Cell Block H* 《H号牢房》 91 - 92
- privacy, rights of 隐私, 隐私权 72
- privat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文化的个体消费 18, 50, 150, 183
- private lives, surveillance of 私人生活, 对私人生活的监督 139 - 140
- profit 利润 85
- 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 56, 106 - 107
- public interest 公共利益 63
-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公用事业广播 13 - 14, 18, 19, 21, 32, 33, 34, 60, 204, 205, 206
- autonomy of 公用事业广播的自主性 63
  - crisis in 公用事业广播的危机 203
  -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与文化的整合 207
  - and the public sphere 与公共领域 62 - 68
- 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 3, 47 - 74, 122 - 123, 174, 180
- European 欧洲的公共领域 207, 209, 211 - 212
  - global 全球的公共领域 61, 66
  - local 区域的公共领域 61 - 62
  - and public broadcasting 与公用事业广播 62 - 68
  - refeudalisation of 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 52, 60
  - and technologies of communication 与传播技术 140 - 141
- publicity 公开性 49, 50, 63, 74
- Pursehouse, M. M. 珀斯豪斯 101
- quality press 严肃报刊 20, 53, 93, 99, 100, 186, 206
- radical (alternative) press 激进的(他择性的)报刊 20, 93, 99
- Radway, J. J. 拉德韦 105 - 107, 191
- Ransome, P. P. 兰塞姆 16
- rape 强奸 110 - 111
-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168
- realism, democratic 现实主义, 民主现



- 实主义 14 - 15, 22, 23, 25  
 reality, media construction of 现实, 现实的媒介构建 28, 30 - 31, 38  
 reception of media discourse 媒介话语的接受 42, 58, 183 - 184  
   *see also* audience research 又见受众研究  
 Reeves, G. G. 里夫斯 109  
 reflexivity and technical media 反思性与技术媒介 132 - 133  
 regional broadcasting 区域性广播 204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对广告的管理 205  
 Reith, Lord 洛德·里恩 13, 62, 63 - 64, 204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RSAs) 强制性国家机器 37  
 resistance, semiotic 抵抗, 符号抵抗 94, 100  
 Ricoeur, P. P. 里克尔 170, 172  
 rightness 公正 209, 210  
 rights of citizenship 公民的权利 208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ommunication 传播的权利和义务 47  
 Robertson, R. R. 罗伯逊 126  
 Roche, M. M. 罗奇 203, 208  
 romantic fiction 浪漫小说 105 - 107  
 Rose, J. J. 罗斯 191  
 ruling class 统治阶级 50 - 51  
 Rushdie, S. S. 拉什迪 22 - 23  
 Rwanda 卢旺达 182  
  
 sacrifice, notion of 牺牲, 牺牲观念 155  
 Said, E. E. 赛义德 22, 166, 167, 192, 193, 194, 210, 211  
 Samuel, R. R. 塞缪尔 200  
 satellite systems 卫星系统 62, 205  
 Saussure, F. de F. de 索绪尔 41, 126, 170  
 Sayers, J. J. 塞耶斯 107  
 Scannell, P. P. 斯坎内尔 58, 60, 63  
 Schiller, H. H. 席勒 203  
 Schiller, H. I. H. I. 席勒 24  
 Schlesinger, P. P. 施莱辛格 32, 33, 36, 58, 111, 136, 206  
 Schudson, M. M. 舒德森 98  
 Seaton, J. J. 西顿 20, 53  
 self, formation of 自我, 自我的形成 37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 61  
 self-identity 自我同一性 209, 210, 211  
 semiotics 符号学 79  
 sexual difference 性别差异 102  
 Shaw, M. M. 肖 190  
 signifier-signified relationship 能指 - 所指关系 41, 151, 163  
 simulation 模拟 3, 160, 161, 170, 186, 194  
 Siune, K. K. 休恩 205  
 Smart, B. B. 斯马特 157, 173  
 Smith, A. D. A. D. 史密斯 24  
 Smythe, D. D. 斯迈思 10, 20, 21  
 soap operas 肥皂剧 82, 91 - 92, 103 - 105, 108, 110, 111  
 social class *see* class 社会阶级 见阶级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52  
 soci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社会实践与理论发展 179  
 social rights 社会权利 208  
 social solidarity 社会协同性 69  
 socialist humanism 社会主义人文主义 146  
 Soja, E. E. 苏贾 125

- Sontag, S. S. 桑塔格 67, 201
- Soothill, K. K. 苏西尔 110
- Soper, K. K. 索珀 73, 195
- space age 太空时代 6-7
- space-time distancing 空间-时间的疏离 130, 131
- Sparks, C. C. 斯帕克斯 20, 30, 53, 61, 100
- spatial practice, levels of 空间实践, 空间实践的层次 134-136
- spatial relations, impact of technical media on 空间关系, 技术媒介对空间关系的影响 5, 6, 114-117, 120-122, 125, 127, 131, 134, 184
- spatially-biased media 偏倚空间的媒介 116
- state 国家
- and civil society 与市民社会 13, 48-49
  -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与文化生产 43, 52
  - intervention in broadcasting 对广播的干预 60-61
  - role of 国家的作用 9
- Stevenson, N. N. 史蒂文森 16
- Stone, O. O. 斯通 169
-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 37, 84
- structuration theory 构造理论 84-85
- stylistic codes 风格代码 163-164
- subjectivity 主观性 10
- Sun, The* 《太阳》报 101, 140
- surveillance 监督 138, 139-140
- symbolic exchange 象征性交换 152-153, 154-155, 159
- symbolic nature of culture 文化的象征特性 77
- tabloid (popular) press 通俗报刊 12, 20, 53, 93-94, 98-99, 100, 101, 139-140, 186
- talk shows 电视座谈节目 132-133
- taste 趣味 52, 95, 201
- Taylor, C. C. 泰勒 70
- technical media 技术媒介
- and audience research 与受众研究 75
  - centralisation of 技术媒介的集中化 185
  - and cultural relations 与文化关系 133-134
  - developments in 技术媒介的发展 2, 205
  - and formation of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 与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 127, 173-174
  -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与历史过程 164
  - individualising effects of 技术媒介的个体化效应 174, 185
  - and media imperialism 与媒介帝国论 109
  - and reflexivity 与反思性 132-133
  - and restructuring of time and space 与时空的重构 5, 6, 114-117, 120-122, 124-125, 127, 131, 184, 205
  - unificatory implications of 技术媒介的统一化意蕴 193, 194
-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技术决定论 19, 115, 125, 127
- technologies, as extensions of the body 技术, 作为人体的延伸的技术 118
- telecity 通验 141-142
- telegraph 电报 127, 131
- telephone as a cool medium 作为冷媒介的电话 120
- television 电视 2, 140-141, 205
- audience reading strategies 电视受众

- 的解读策略 78 - 83  
 and children 与儿童 91 - 92, 137  
 and class 与阶级 158  
 commercial 商业电视 60  
 as a cool medium 作为冷媒介的电视 120  
 democratising effect of 电视的民主化效应 136 - 137, 141  
 evolution of 电视的演进 21  
 as form of social control 作为社会控制形式的电视 88  
 globalisation of 电视的全球化 18 - 19, 130, 203 - 204  
 Gulf War coverage 海湾战争的电视新闻报道 187 - 188  
 and magazine production 电视和杂志生产 123 - 124  
 private consumption of 电视的个体消费 18  
 see also BBC;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又见英国广播公司; 公用事业广播  
 television flow 电视流通 19, 25  
 television news, bias in 电视新闻, 电视新闻中的偏见 26 - 34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电视无国界》 205 - 206  
 temporal organisation see time 时间安排 见时间  
 Thatcherism 撒切尔主义 34, 36, 38 - 40, 44 - 45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actice 理论发展与社会实践 179  
 theoretical practice 理论实践 146 - 147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82  
 Thompson, E. P. E. P. 汤普森 37, 66, 147  
 Thompson, J. B. J. B. 汤普森 52, 56, 63, 86, 101, 127, 129, 138, 139, 203  
 time 时间  
   impact of technical media on 技术媒介对时间的影响 5, 6, 114 - 117, 120 - 122, 124 - 125, 127, 131, 134, 184  
   influence of media organisation of 媒介时间安排的影响 87 - 88  
 time-biased media 偏倚时间的媒介 115 - 116  
 time-space distancing 时间 - 空间的疏离 130, 131  
*Time to Spare* 《难得偷闲》 63 - 64  
 Tomlinson, A. A. 汤姆林森 88  
 Tomlinson, J. J. 汤姆林森 109  
 total expression 全面表达 15  
 traditions 传统 17  
 transn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s 跨国的广播系统 62  
 transnational press 跨国报刊 206  
 Treutschler, W. W. 特罗茨席勒 205  
 Tripp, D. D. 特里普 91 - 92  
 trivialis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文化产品的平常化 50  
 truth 真理 29, 31, 169, 180  
 Tuchman, G. G. 塔奇曼 102  
 Turner, B. S. B. S. 特纳 157, 208  
 Turner, G. G. 特纳 35  
 'two nations' thesis "两种国民"论 45  
 unificatory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技术的统一意蕴 193, 194  
 Urry, J. J. 厄里 153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用途与满足的研究 76 - 77, 84  
 utility, principle of 实用性, 实用性原则 155

utopianism 乌托邦主义 105, 107, 112, 167

Van Dijk, I. N. I. N. 范戴克 99

Van Gogh, V. V. 梵高 162, 163

video technology 录像技术 185

women's relationship with 妇女与录像技术的关系 82 - 83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169 - 170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141

Volosinov, V. N. V. N. 沃洛希诺夫 170 - 171

Walby, S. S. 沃尔比 110

Walzer, M. M. 沃尔泽 208 - 209

war 战争 193

see also Falklands War; Gulf War  
又见福克兰岛战争; 海湾战争

Warhol, A. A. 沃霍尔 162 - 163

Weber, M. M. 韦伯 52

Webster, R. R. 韦伯斯特 22

Wexler, P. P. 韦克斯勒 208

White, S. S. 怀特 52

Williams, R. R. 威廉斯 9, 10, 11 - 15, 31, 34, 35, 44, 50, 56, 60, 64, 76, 99, 100, 126, 167, 170, 171, 183, 202, 210

on the aesthetic 论审美 201

on the avant-garde 论先锋派 172 - 173

theory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关于文化唯物论的理论 15 - 17, 18 - 20, 170

definition of culture, 对文化的界定 11 - 12

on hegemony 论霸权 16 - 17

on the masses 论大众 173

on needs 论需要 195

on the press 论报刊 19 - 20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论技术决定论 125

on television 论电视 18 - 19

Willis, P. P. 威利斯 56 - 57

Wilson, H. H. 威尔逊 27

women 妇女

magazines for 妇女杂志 172

needs of 妇女的需要 195

and the public sphere 妇女与公共领域 72 - 74

as readers of romance fiction 作为浪漫小说读者的妇女 105 - 107

and soap operas 妇女与肥皂剧 103 - 105

and television viewing 妇女与收看电视 81, 82

and video technology 妇女与录像技术 82 - 83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51, 95, 97, 154

# 译 后 记

媒介文化在社会理论研究领域，早已引起域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国人对此也寄予了极大的热忱，此项研究方兴未艾。译介这方面的专著，相信对研究工作定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史蒂文森的《认识媒介文化》一书，比较全面地对 20 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这对我们知晓西方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是极有裨益的。但是，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

本书的翻译，始于 1999 年国庆节。平时忙于行政事务及教学工作，真正属于自己的，唯有晚上及周末的断续时间（况且连这些时间也时常因公务而得不到保证），矻矻然似蜗牛爬行，终于将本书译完，可在欣慰之余生出遗憾。本人不是媒介文化理论的行家，日常所研读的仅仅是语言学及翻译理论。尽管对社会理论有所涉猎，可这毕竟只是停留在出于好奇这一层面上，对许多社会理论视点不甚了解。因此，译文中所出现的舛误及

纰漏,恳请学界方家批评、匡正。

译 者

2000年4月28日于宁波大学